

W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

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荷】马歇尔·范·林登 著 周穗明 译 翁寒松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理论关系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为国内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国外社会主义、苏东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话题和主题，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同时，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研究进行了多年的理论跟踪和材料积累，基本上把现有的国外资料一网打尽，仅本书附录中的书目就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线索和进路。

上架建议：马克思主义/哲学

ISBN 978-7-214-08180-3



9 787214 081803 >

定价：37.00元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

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荷】马歇尔·范·林登 著 周穗明 译 翁寒松 校



1030799



T1030799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  
争论概览/(荷)林登著;周穗明译;翁寒松校. —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180-3

I. ①西… II. ①林… ②周… ③翁… III. ①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4176号

---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Copyright © 2007 by Marcel van der Linde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1-588

---

书 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著 者 [荷]马歇尔·范·林登

译 者 周穗明

校 者 翁寒松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王 溪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页4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80-3

定 价 37.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主 编 张一兵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戴亦梁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本书英译本由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OW)资助翻译出版。本书中文版根据朱利安·本迪恩(Jurriaan Bendien)的英文译本译出。



##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在中国的面世令我非常骄傲。表面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是一部纯粹的思想史,重构了对2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社会的种种争论。但是,每个读者当然也都了解这一事实: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辩论对今天的进步政治有着极大的政治关联性。这本书背后隐含的真正问题是:在苏联的经历中有可以汲取的教训吗?如果有,那么,是哪些教训?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自2007年出版以来,已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许多共鸣。在几个国家中,已经产生了对其主题的广泛讨论。评论者认为,总的来看,本书是开先河之作,对所有这些关于苏联社会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sup>①</sup> 尽管一些作者提

---

<sup>①</sup> 见马丁·克拉夫(Martin Kragh)2007年10月在“经济历史网”(http://eh.net/book\_reviews)的书评;亨利·雷克曼(Henry Reichman)2008年11月在H-俄罗斯网(www.h-net.org/reviews)的书评;凯文·迈克尔斯(Kevin Michaels)在《新闻与来信》(*News and Letters*)2009年8—9月的书评,参见www.newsandletters.org/issues/2009/Aug-Sep;保罗·怀特(Paul Le Blanc)《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载《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总143期,2009年11—12月号;安迪·纽曼(Andy Newman)《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载《社会主义者联盟》(*Socialist Unity*),参见http://www.socialistunity.com,有204个在线评论;Serdal Bahce,《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解释:在对立和中立之间》,载《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月刊》(*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总39期,2011年第3期,第443—452页。

出了一些小的修改或补充,但是,真正的辩论并没有把重点集中在我重构的具体细节上。<sup>①</sup> 真正的辩论聚焦于第八章,我在其中批评了三种主导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和官僚的集体主义论),并得出了结论:“根本不能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解释苏联社会”。

美国的一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月刊《科学与社会》的编辑认为,我被迫得出苏联社会不能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的结论,是因为我有意识地只讨论那些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假如我考虑那些比较积极的思想家,那么,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高度的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我就会了解“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单一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政治行动的坚实基础是一致的。<sup>②</sup> 他们辩称,毕竟,资本主义已见过早期的花开阶段,以及“回归地中海和亚洲古老的商业文明;资本主义采纳了许多虚构的起点,说明大量重要的市场发展和产生自我突破的相关社会技术前提。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更复杂的并在某些意义上是更漫长的过渡阶段……因此,先前那些‘实验’(巴黎公社、苏联、古巴等)也许会失败、徘徊,转入撤退和休眠状态,我们不应感到吃惊”<sup>③</sup>。这是一个已导致了一场重要辩论的非常严重的异议。<sup>④</sup> 我不信服这个观点。在远古的美

---

① 例如,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回到俄罗斯问题》,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二辑,总118期(2008年春季号),第195—197页;保罗·弗莱沃斯(Paul Flewers):书评,载《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总10期,2010年第1期;阿伦·摩根(Alun Morgan):《特德·格兰特(Ted Grant)在什么地方?》,载《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总10期,2010年第2期。

② 参见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西方左派、苏联和马克思主义》,载《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总73期,2009年10月第4期,第540—553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载于《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总75期,2011年1月第1期的文稿:丹尼尔·加伊多(Daniel Gaido),《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第99—107页;帕雷什·托帕迪亚(Pareesh Chattopadhyay),《论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第107—114页;梅尔·罗滕伯格(Mel Rothenberg),《失败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教训》,第114—120页;大卫·莱伯曼,《简短的回应:对深入辩论的期待》,第120—124页。

索不达米亚已经有资本主义的种子，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条件下就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早期无疑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萌芽”，但是，这些萌芽没有得到成熟的机会。

苏联实验的失败将我们引向这一问题：如何和在哪些条件下我们能够实现“自由王国”。如我们所知，自由王国是以对必然性的超越为基础的。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只能存在于此：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集体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然而，“真正的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开始超越这一必然王国，“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sup>①</sup> 因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会被轻易击败的极其顽强的力量。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30多年以前写道：“我并无这种印象，资本主义正以某种‘内源性’恶化的形式自行崩溃；因为发生任何崩溃，那里都会有一些外部影响极大的暴力；而一种可信的替代选择将会是有用的”。如果本书通过对苏联的“虚构起点”的种种反思，对构建这样一个“可信的替代选择”做出贡献，它的目的就实现了。

马歇尔·范·林登

2011年11月于阿姆斯特丹

---

<sup>①</sup>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第959页。



## 译者的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一书的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2009年,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做研究期间,偶然认识了该所的科研负责人、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马歇尔·范·林登,偶然在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此后便开始了我与作者关于此书中文版的合作。鉴于这本书的题材的重要性,我们的合作是一次必然的选择。

该书的题目非常具有吸引力,它涉及了中国读者关心的两大热点问题:“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诚如作者所言,“‘俄国问题’绝对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从20世纪初苏联的诞生到它70年以后的消逝,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苏联的争论从来没有止歇过。尤其是从苏联崩溃至今的20年间,关于苏联及其失败教训的讨论,始终是国内外左翼思想界的中心话题之一。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新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观。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概念之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把一切主观和客观上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圈子的人物与流派

统统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sup>①</sup>这样做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本书对西方左翼的苏联观的概括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也是本书出版后国际学界对它的一致评价:该书是一个前卫的尝试,对一切关于苏联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和思潮进行了全面盘点。<sup>②</sup>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观的全面概括,是作者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也是本书最突出的理论价值。

全书共分九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从考茨基—列宁以来的六大历史时期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的评价。作者的理论分析紧紧围绕四大理论线索(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官僚集体主义论、国家资本主义论和新生产方式理论),阐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对苏联的性质、特点、发展历史的评价和他们之间的理论争论。此外,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研究进行了多年的理论跟踪和材料积累,本书附录中提供的大量书目基本上囊括了现有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进路和基础,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本书的原文是荷兰文版,1989年第一版发表,1992年德文版发表,苏东变局后经大量修订后再版,2007年在修改和扩展的基础上推出英文版。中文版根据2007年塞巴斯蒂安·巴德根(Sebastian Budgen)翻译的英文版译出。由于转译带来的困难,也由于本书涉及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观点的复杂性,中译本的翻译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恳请读者谅解并指正。

周德明

2011年12月于北京

---

① 马歇尔·范·林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更接近于中国学界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泛的定义。他的概念使用给我们的启示是:过分狭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已经过时。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新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在总体上并不大,因此,在这个范围内的各个流派和思潮之间,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同理,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当用开放的视野和心胸对待这个开放的研究对象。

② 参见作者的中文版序言。



## 前 言

本书的大部分是 1989 年在荷兰首次出版的,德文版出版于 1992 年。这一修订、改正和扩展了的英文版的问世,得力于塞巴斯蒂安·巴德根(Sebastian Budgen)的主动和热情。

在书稿的写作和修改中,我有幸能与许多学者和实践活动家讨论和通信,他们提供的评论是无价的。我特别要向这些人致谢:于尔根·鲍姆加腾(Jürgen Baumgarten)、罗伊·查理诺尔(Ray Challinor)、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Paresh Chattopadhyay)、已故的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尼尔·费尔南德斯(Neil Fernandez)、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已故的邓肯·哈洛斯(Duncan Hallas)、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伊达尔·赫(Idar Helle)、朱斯特·科克(Joost Kirc)、克努特·基尔德斯塔德利(Knut Kjeldstadli)、伯恩德·克莱姆(Bernd Klemm)、彼得·库莱曼(Peter Kulemann)、博-阿克·林德布洛姆(Per-Ake Lindblom)、已故的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已故的戈特弗莱德·默格纳(Gottfried Mergner)、威尔伯特·范·米尔特(Wilbert van Miert)、艾丽丝·穆尔(Alice Mul)、皮埃尔·卢斯塞特(Pierre Rousset)、于尔根·桑德莫塞(Jørgen Sandemose)、詹恩·威尔勒姆·斯塔铁(Jan Willem Stutje)、凯

利因·松兹拜克(Kariin Sundsbak)、弗利提约夫·提切尔曼(Fritjof Tichelman)、希勒尔·迪克亭(Hillel Ticktin)、已故的保罗·威尔伯利肯(Paul Verbraeken)、埃尔斯·魏格纳(Els Wagenaar)、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已故的亚当·威斯托比(Adam Westoby)和已故的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

无论如何,我最最要感激朱利安·本迪恩(Jurriaan Bendien);我不可能期望有更能干和更专注的英文译者了。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1917—1929) 10

第一节 考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三次争论 11

考茨基与列宁 12

考茨基与托洛茨基 16

考茨基与布哈林 19

第二节 李、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批评与反批评 22

李 23

卢森堡 25

各种解释 29

蔡特金、卢卡奇与考茨基 30

第三节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批评 35

高尔特、潘涅库克、鲁尔 35

柯尔施 40

第四节 总结 42

### 第三章 从斯大林的“大跃进”到“伟大的卫国战争”(1929—1941) 44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 48

米亚斯尼科夫 50

阿德勒 51

魏格纳 53

沃洛尔 56

波洛克 59

#### 第二节 托洛茨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62

####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68

罗拉 68

韦尔 72

里齐 74

伯纳姆 78

沙特曼 83

卡特 85

佩德罗萨 87

希法亭 88

#### 第四节 批判 90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批判 90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批判 92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批判 94

#### 第五节 总结 95

### 第四章 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到东欧的结构趋同(1941—1956) 98

#### 第一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102

#### 第二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106

格兰迪若/佩瑞特 106

詹姆斯/杜娜耶夫斯卡娅 109

卡斯托里亚迪斯/莱福特 114

克利夫 117

波迪加 121

####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124

古特曼 124

第四节 “无标签”的种种解释	127
斯泰因伯格	128
赛康	130
弗勒利克	132
科夫勒	135
第五节 各种争论与相互批判	137
多伊彻争论	137
对伯纳姆的回应	144
曼德尔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批判	151
第六节 总结	155
第五章 从苏共二十大到镇压“布拉格之春”(1956—1968)	157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158
围绕克利夫的思潮	158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159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162
吉拉斯	162
库伦/莫扎列夫斯基	166
第四节 各种“无标签”理论	168
魏特福格尔及其批评者	168
马尔库塞	170
罗斯道尔斯基	172
博泽	174
第五节 总结	175
第六章 从镇压“布拉格之春”到改革(1968—1985)	177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178
克利夫思潮	178
马蒂克	179
毛主义的变体:霍姆伯格;贝特尔海姆及其批评者	181
工人主义的变体	190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191
各种阐述	191

各种批判	192
莫汉的修正	195
第三节 官僚集体主义诸理论	198
斯托扬诺维奇	198
批判的里齐支持者:卡罗和梅洛蒂	200
范赞/迈奇奥瓦	204
斯威齐	206
第四节 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208
先驱者:阿瑟·纳维尔、阿尔法特/纽索斯	208
《联合》月刊上的辩论	212
杜契克及其批评者	215
季敏	218
其他例子:索恩-雷特尔、汤马斯和“社会综合体”	222
巴罗及其批评者	225
施米德雷尔	236
迪克亨及其批评者	238
匈牙利的“新左派”	243
坎佩亚努	248
第五节 总结	250
第七章 解体及其后果:从1985年至今	252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253
围绕克利夫的思潮及其批评者	253
达姆及其批评者	256
萨皮尔	259
查托帕迪亚伊及其批评者	261
费尔南德斯	264
《扬弃》	266
桑德莫塞	269
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及其批评者	270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274
第三节 官僚集体主义诸理论	278
卢恩	278

布伦纳及其批评者	278
芬格	281
第四节 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282
弗雷迪	282
迪克亨及其批评者	286
考克斯	290
阿瑟	291
贝伦斯	292
坎佩亚努	295
第五节 总结	296
第八章 代结论	298
第九章 元理论注释	314
参考书目	323

## 第一章 导论

哪里大量的学习渴望，哪里必然会有许多争论、许多著述、许多观点；因为优秀的人的看法，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知识……有些叹息，我们应当感到高兴。……不过，正是这些人强调反对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

约翰·弥尔顿，1644

“俄国问题”<sup>①</sup>绝对是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的，它将是“自称革命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态度的试金石”<sup>②</sup>。因此，至今尚未有一个学者试图全面、系统地评估和描述 1917 年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就更令人吃惊。<sup>③</sup> 与总体上并不发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编史工作相比，很可能涉及这一特殊问题领域的文献空白更大。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数年前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一书中总结道，马克思主义接连

---

① 专有名词。“俄国”和“苏联”在这一研究中由于文体风格的原因，到处交替使用。

② “导论”，载 Castoriadis 1973，第 18 页。

③ Beyerstedt 在 1987 年对 1924—1953 年时期做了有用的尝试。但是，该作者错误地断定，在英国那类国家中，“对描述苏联没有做出任何值得注目的贡献”（第 21 页）。



变异和转型的原因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勘察。<sup>①</sup> 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史中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sup>②</sup>

然而,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文献,而且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第二类文献,也是相当广泛和丰富的,比如从本书末尾的参考书目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验证。总体来看,相关文献分属于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有关某一特殊理论的家族谱系研究。国家资本主义论往往受到特殊青睐。<sup>③</sup> 第二,关注据认为重要的一些理论(通常带有争论目的)的比较研究。<sup>④</sup> 第三,关于某一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的理论研究(占大量比例)。大部分这类工作集中在俄国和苏联的早期批评者身上,比如卢森堡(Luxemburg)、潘涅库克(Pannekoek)和托洛茨基(Trotsky)。但是,更多论及的是像巴罗这类当代作者。第四,还有极少量对多样化的理论进行客观盘点和总结的尝试。这一类型中最好的样板是基尔德·迈耶尔(Gerd Meyer)的教科书,它寻求提供“对该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解释的最重要的模式”的总体概览;在迈耶尔的著作中,形形色色的观点首次通过文本的各个片段呈现出来,然后,这些观点在作者本身的理论中得到评判,最后被纳入或放弃。<sup>⑤</sup>

从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的有关文献看,这些著作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把可利用的材料塞进一个先验图式中去的强大诱惑。例如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就是这种不良方式的例子,当时他只划分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偏向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划分的一边或另一边”这两种主要思潮。结果,一种标签被不适当地强加在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实际上外在于这两个阵营的作者身上。<sup>⑥</sup> 同样的倾向表现在勒

<sup>①</sup> Anderson 1976, p. 1.

<sup>②</sup> 因此,汉森(Hansen 1985, p. 143)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像它们作为其一个部分的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样,已经在思想史中导向一种边缘的存在”。

<sup>③</sup> Jerome and Buick 1967; Farl 1973; Olle 1974; Ambrosius 1981.

<sup>④</sup> Bellis 1979; Binns and Haynes 1980.

<sup>⑤</sup> Meyer 1979.

<sup>⑥</sup> 例如 B. 里齐,见 McLellan 1983,第 173—176 页。

内·埃尔伯格(René Ahlberg)的著作中,他区分了三种趋势(过渡时期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并因而将希勒尔·迪克亨的分析强行打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sup>①</sup>

在这一研究中,我已试图避免这种强求一致的方法;而由于我所积累的大量研究材料,这一任务也变得更为容易。通过确立初始部分的优先地位,就可以更精确地追溯传统中的连续性和转折点,结果分类标准问题本身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逐渐认识到,埃尔伯格和众多作者建立的(我起初也相信是正确的)三种理论类型的划分,过于简化了苏联问题研究的发展;至少,它不可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相关发展。尽管如此,在准备这一研究中,我显然极大地受益于这些早期有相同目的的成果,从而可以评估这些成果的性质究竟是怎样变换的。

我本人的探索与早期研究不同,其目的是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批判横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1917年至今)、在一个广大地区(西欧和北美)的发展。在这一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区分中,我已通过关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它们对较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的偏离或补充),尽力确保其全面性。<sup>②</sup> 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评价早期的成果及它们对我本人理论的效用,尽管由于这一重释的进展,一些方式显而易见比其他方式更好地经受住了批判的检验。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一般认为,它涉及一个西方作者群体,他们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研究与批判。这一解释会排除掉各种分析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权力等问题的作者。<sup>③</sup> 不过,这种强调有时被政治地理学所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被理解为在西方的“非苏联的或非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sup>④</sup>。这第二个定义就是我所理解的那种定义。它对称地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

① Ahlberg 1979, p. 87.

② 没有提供新观点的、重复旧思想的出版物不予讨论,但是经常在参考书目中提到。

③ 见 Anderson 1976; Russell Jacoby 1981。

④ Merquior 1986, p. 1.

苏联”的问题：在这一研究中我的探索涉及在政治上独立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那些发展。

但是，“非苏联的或非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念本身需要更精确的定义。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以恰当的方式提问，“非苏联的”和“非准苏联的”术语真正提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一研究背景中，我已将这两个术语有效地定义为：(1) 不顺从于官方的苏联意识形态的；(2) 不把苏联的社会结构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或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其次，更困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指什么的问题，尤其是因为过去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作者指责另一个作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进行争论。<sup>①</sup> 我把所有这些作者都看作是他们自己同样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部分地绕开了这个整体问题。虽然，一些作者从来不明确地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情况下，我采取了霍华德·伯恩斯坦(Howard Bernstein)的解释，他区分了五个“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结合意味着一种对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式：

1. 物质因素和经济社会力量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2. 历史由一个连续接替的社会形态的特定系列组成。
3. 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辩证过程。
4. 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伴随着阶级斗争。
5. 平衡和停滞是虚假的；现实本质的变化和改造是社会常规。<sup>②</sup>

在这些问题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我始终如一地使用这五个概念作为标准；一个例子是，基于此，我把这类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作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包括进来，他将自己的著作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评价。

我只讨论来自北美和西欧的作者，以及其著作已在北美及/或欧洲

---

<sup>①</sup> 在这一研究中，我区分了“马克思的”思想(它在确切的意义上等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者伪装追随马克思的一般方法，尽管在特殊情况下它可能大大地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sup>②</sup> Bernstein 1981, p. 445.

出版的或通过翻译得以让人理解的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欧和苏联)的作者。<sup>①</sup>

进行这一研究本质上是一项长期观察。通过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1917年到2005年的发展演进,我旨在分析长期持续的发展和变化,即如果采用一个较短期的框架则仍然会是模糊不清的那种变化。

这里提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苏联的分析,主要是一种文本分析。正如所有的文本那样,这些分析在许多不同的背景线索中演进发展,从它们与作者的意图、生活和其他著作的联系,到围绕该作者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都是纷繁多样的。<sup>②</sup> 虽然,对一个文本的“这一个”背景线索进行全面检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呈现脉络关系而进行一种历史—批判的评估仍然是重要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既有的文本获得了其特定的内容。比如,在关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本质的主题的例子中,最多的相关脉络发展关系很可能首先是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在这一研究中,我采纳的工作假说即受三组脉络线索强烈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理论解说。

1. 社会形式(生产方式)及其演进的总体理论及其演进。这一发展线索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在下文关于苏联的争论中渐渐明朗化的是,各种社会类型的演变顺序问题尤为重要。从大约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1)直到1930年代初,各种不同的解释并存:有些人,包括政治上有分歧的人如考茨基和列宁,相信发展是以一种单线方式——即通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序——产生;另一些人(*the Aziatchiki*,指那些相信俄罗斯的亚洲成分比欧洲成分更大的人。——译者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讨论基点,确认第二种可能的发展线索;少数人(如魏特福格尔)

① 我已进行了努力,去获取对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相关著作文献的总体概览。我没有试图去概括俄罗斯最近的讨论,也没有包括1920年代曾在苏联小范围传播的而现在渐为人所知的那些更陈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本。

② Lacpra 1983.

进一步采纳了这一观点,并设想了三种可能的历史发展道路。(2)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下半叶,尽管单线论思想几乎处处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继续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3)至1950年代末,统一的发展顺序(单线论)的概念开始瓦解了。经历一个最初阶段后,“亚细亚生产方式”被重新发现,并被许多人看作是解决分析难题的万应灵药,随后的理论发展风暴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生产方式的“发现”,最终导致对生产方式旧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的质疑。这一事态演进过程对该研究主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持续演变的)生产方式的总体理论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先在前提,它已决定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苏联社会怎样被指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如果自始至终坚持运用单线论思想,那么苏联社会只可能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但是,如果苏联社会被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式,那么这同时意味着抛弃单线论。

2.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活力的认识。一般而言,这一认识自1917年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它终结于1950年代初——一种理解模式突出地强调一般商品生产所主导的制度的腐败、衰落和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短暂的经济恢复,接踵而来的是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在1929年达致极点。随后的“大崩溃”只是到1930年代下半叶才得以战胜。但是其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的战后年代根本没有表明正在形成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恢复;经济增长仍然疲软,而1950年代初期的美国似乎有可能陷入一场更严重的衰退。因此,发现资本主义的活力在这整个时期都是微乎其微的,并不令人吃惊。<sup>①</sup>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从十月革命到大约1952年左右这一时期,都被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和“崩溃”的思维所主宰。一个众所周知的和极端的例子是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他在1920年代末设计出一个公式,他据此相信,如果其模式中种种变量(“因素”)的数值可以

<sup>①</sup> 这只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适用。见 Cannadine 1984,第142—143页。

确立,他能够估算出资本主义最后崩溃的时间。<sup>①</sup> 极其典型的还有托洛茨基的估计,他在其 1938 年的《过渡时期纲领》(*Transitional Programme*)中对世界形势作了如下描述:“人类生产力走向停滞。新的发明和进步已经无法提升物质财富的水平……资产阶级自身看不到任何出路。”<sup>②</sup>

(2) 第二阶段始于 1950 年代初,大约持续到 1960 年代末。这一历史空前的经济增长期,成长的繁荣和低失业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达成了实现某种程度的变化的共识。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他们尽管相反表现出继续坚持那个时期的早期概念),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家出现了,他们越来越怀疑经典的危机理论的有效性。<sup>③</sup> 在关于利润率的经验研究的一个评论中,吉尔曼(Gillman)在 1957 年举例假设:“在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数年中,历史统计学似乎完全支持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而那场战争后的系列研究则总体上表明,运行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展望正相反。”<sup>④</sup> 几年后,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进一步采纳了这一观点,总结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该体制的发展,其剩余趋向于绝对地和相对地上升”<sup>⑤</sup>。

(3) 在自 1960 年代末以来的第三阶段,再次存在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逃脱地快速走向经济危机的普遍信仰。

(4) 虽然从那以后这一信仰没有消失,但是许多人在 1990 年代归结出,资本主义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统治世界。

① Grossmann 1929, pp. 198 - 225.

② Trotsky 1938c, p. 1; 英文版,第 111 页。

③ “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两个人的认识转向,他们在 1930 年代曾是非常有影响的,相信资本主义理想共和国不可避免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一个人是 John Strachey,其著作《正在到来的权力斗争》(*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在大萧条中成为最好的卖点,另一个是莱易斯·科里(Lewis Corey),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932)声称,由于利润率不断降低,一场无可挽回的危机已经到来。20 年后,两人均成为混合经济及经济规划——但正如科里提出的,它‘并非中央集权制’——的支持者。”见 Bell 1988, pp. 137 - 8.

④ Gillman 1957, p. Vii.

⑤ Baran and Sweezy 1966, p. 72. 关于“剩余”,巴兰和斯威齐不是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产品和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别的意义上去理解的。

3. 认识到苏联社会的稳定性和活力的方式。这一发展线索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因为每一阶段都将在本研究的过程中详尽讨论,我在这里仅仅给出一个简短的提示。(1) 第一个时期持续到1930年代初。社会在这一时期似乎组织得非常混乱和糟糕。(2) 第二个时期到1956年,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真相的那一年。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主义似乎已经巩固了它的权力,而苏联社会似乎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计划的”总体。(3) 第三个阶段从1950年代开始,显现出社会的断裂、日渐明显的政治和经济调整的困境,以及在许多重要方面不断失败的改革尝试。(4)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后阶段,阐明了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正在发生,它最后以一次总崩溃告终。每一个阶段或许都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如同我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试图证实的那样。

这三条发展线索对于创作有关苏联本质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作者共同发挥着影响。然而,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这些作者一般并非孤立行动,而是思考这类政治问题<sup>①</sup>的一个更广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该问题本身使人想到,关于在这一研究中运用库恩(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是否能被接受。简言之,我不这么认为。“范式”概念已经运用在表示理论形态的所有类型的方面。但是这一概念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它不再属于任何特殊的事物。围绕该术语的这一混乱,可能要部分地归咎于库恩自己,他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中,在不少于21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Masterman 1977, pp. 61-5)。库恩后来承认这一模糊造成的问题,试图提供一个更合适的定义。在1969年他的书新版的后记中,他写道:“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成员,并且,反过来,科学共同体组成了共享范式的人。”(Kuhn 1970, p. 176)范式在这里被定义为科学实践,其中,根据其最初著作中给定的描述,“法律、理论、应用和使用的工具一起”形成一个有严谨内聚力的总体(Kuhn 1970, p. 10)。在库恩1969年的后记中,“科学共同体”本身被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视自己为并被其他人视为独立向一套共享目标的追求负责的人,包括培训他们的继承人。在这个群体中,交往相对充分,专业评判相对自主。”(同上, p. 177)虽然这些描述在总体上还不能被认为摆脱了含糊,但它们至少确实澄清了这里最好避免的那种范式概念。首先,我所讨论的苏联批判决不能与库恩脑子里已有的那些自然科学中的理论相比较,甚至正是因为这些批判不赋予经验研究一种逻辑转换的方法;如果说区别的话,在批判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一条深远的鸿沟。而且,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不曾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例子中,后者既不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也不是一个相互共享目标和尺度意义上的共同体,还不如说,它所包括的主要是政治参与者,多多少少组织成小的政治群体,或属于围绕一个刊物的圈子,他们相互就许多主题展开争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相互之间根本不交往。这样,在这一研究中使用“范式”概念将会是误导性的,而不是有帮助。我更愿意使用如(政治)理论、话语和争论这类概念。在我看来,这些概念要比范式概念造成更少的误导性联想。

团体的组成部分。

本研究安排如下：第二章至第七章提供该文本的内容，重新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争论。第八章拟定这一重释的主要线索，而第九章提供了所描述的这一发展中最初的元理论模式。该研究的结尾提供了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关于1917年以来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本质的理论著作的参考书目。

最后，是关于几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我充分意识到，对于这些文本的分析不存在任何被普遍接受的规律（超过了尽可能地精确表述我所研究的那些著作的需要），我试图通过每一位作者去找到一个对我的研究主题来说是根本性的少数几个问题的答案，这几个问题是：（1）在交替演进的生产方式形态中，哪一个位置是留给苏联的；（2）如果是这样，被认为存在于苏联社会的基本的阶级对抗是哪一类；（3）作者认为苏联社会的动力（发动机）是什么？<sup>①</sup> 在一些情况下，我不可能证实一个既定的作者对所有问题的全部清晰的答案。在重新解释各种不同的说法中，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被检验话语的独特风格的直接印象，我毫不踌躇地引用了简要的段落。

长期使用一个笔名的作者[罗拉(Laurat)、托洛茨基、杜娜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克利夫(Cliff)]，用其笔名标示。引文原文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版本的文本，已参考原来的文本译成英语。原文看起来更贴切的地方，就取代已发表的英译文。在语言上有困难的场合，或作者的原始文本无法得到的地方，我已在译文中标出，并同样在注释中进行了说明。

---

① 由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政治理论，这里提及的许多作者不仅分析了苏联，而且也解释了其后的有关社会主义战略的思想。我在叙述各式各样的观点中，不过是聚焦于已做出的那些分析，而不是那些战略建议。



## 第二章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1917—1929)

1917—1929年标志着苏联的社会形势在各方面都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一个时期。起初,新政权期望通过西欧革命迅速地摆脱其政治上的孤立。但是,这一革命并未发生。外国干涉的威胁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因素。当“战时共产主义”的混乱年代过去之后,新经济政策时期到来了,带来了国家和市场成分之间的紧张冲突。那时,不存在任何“有计划的发展”。

苏联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差别似乎尤其是在经济中存在着大比例的国家成分,而事实上,该国家机器的新领导人已经诉求于马克思主义(及后来的列宁主义),通过一场工农起义夺取了权力。在1930年代给苏联带来了新面貌(集体农庄、五年计划)的那种社会组织形式此时尚未产生,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预见到。那种关于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完整理念,尚未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仍被锁定在单线图式中:反对派对苏联发展的批判主要聚焦于十月革命是否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否由于各种可能的因素(诸如缺少一场西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政治错误),一场潜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蜕变为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一讨论中,还没有把认为单线图式本身可能实际上并不适用的观点视为一种可能的

选择；而由于那时苏联社会关系的现实状况，这种观点本身几乎不可能被考虑。

## 第一节 考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三次争论

如塞尔维多利(Salvadori)所指出的，从1918年起，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发动了一场持续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sup>①</sup>。在一套给人深刻印象的丛书、几本著作和发表在《斗争》(*Der Kampf*)和《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中，他对该问题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切。人们的注意力已被集中在现存文献中考茨基撰写的那些著述上。<sup>②</sup> 这里，我将聚焦于我的研究背景中的本质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老考茨基的“特殊魅力”：他自始至终运用单线图式说明所有的社会变化。

正是因为单线图式强大的图式特点，考茨基的推理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1. 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2. 1917年的俄罗斯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3. 因此，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一场被宣告为“革命”的政变而强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上难以忍受的、被认定为异化的形态。<sup>③</sup>

① 卡尔·考茨基(1854—1938)长期被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教皇”。他是1883年该党的创建者，直到1917年都是《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主编，该刊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理论机关报的职能。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分裂之时，考茨基加入了其左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并于1922年加入了USPD与右翼重新统一的党。见参考书目信息中的Gilcher-Holtey 1987; Panaccione 1987。

② 最有深度的讨论是Salvadori 1978, pp. 218—25, 251—312。广度不够的是Waldschmidt 1966, pp. 81—99, 101—24和Steenson 1978, pp. 201—11, 229—31。

③ 概括地说，塞尔维多利提出了一种“政权‘怪物’：它在意识形态上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控制，但是它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它在政治上组建了专制政治体制”(Salvadori 1973, p. 77)。

4. 这种被认定为异化的形态必将是不稳固的,必将在短时间里瓦解。<sup>①</sup>

考茨基的单线论推理,尤其是在他与布尔什维克作者的论辩冲突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我将简短地讨论这三场辩论,即其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Bukharin)的持续辩论。最后提到的那场论战对话,直到现在,在历史文献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 考茨基与列宁

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指控,即考茨基已经抛弃了他革命的去并已经成为一个“叛徒”相反,考茨基在1917年之后的分析与他在1917年以前所作的那些分析极其惊人的一致。显然,他的思想确实演变到了某种程度,但是在他思想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新起点的迹象:

当然毫无疑问……考茨基的种种观点确实逐渐转向温和方向。但仍然不可否认,这一转变产生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总体概念框架内,并且该国家从一开始(以《爱尔福特纲领》作为其根本出发点)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因此是与1917年不可调和的。考茨基可以被指责为固执,但是不可以指责他已抛弃其关于革命进程概念的根本线索,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sup>②</sup>

甚至早在1905年以前,考茨基已经设想了在俄罗斯进行一场资产

---

① 考茨基曾经坦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马克思主义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仙,不为人所信的预言家。——译者注),一再预言布尔什维克体制将迅速崩溃。以一些语录为例:“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在可见的未来共产主义专政的瓦解。我们不知道它准确地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可能很快发生,或比预计要更久些发生。但是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既然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越过了它的界限,并发现它自己在上升中,其死亡速度自然必定也加快了”(Kautsky 1921, p. 77)。“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个泥足巨人,它不可能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中逃脱,而且它也不可能使它自己重生。它经历的首次重大危机必然把它引向一场大灾难。”(Kautsky 1925a, p. 380)“布尔什维主义正在走向它的终点。……白卫军的独裁主义措施抑或正统主义都无法取代苏维埃统治。一旦克里姆林宫的红色政权失去掌握和领导这个国家的权力,各种选举无论如何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大混乱。”(Kautsky 1930, p. 258)

② Salvadori 1978, p. 253.

阶级的、一般所说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在1917年和其后,他以严格的一致性坚持这一观点。最初,他在1917年4月——当政治成果尚不确定之时——强调俄罗斯小农阶级在整个进程中是“百搭牌”(wild card,指牌局中有变数的牌,意喻未知的因素。——译者注)，“变数X,未知的能量,我们对此还无法指定一个确定的量”。尽管这场革命因此仍然能产生许多惊人之举,考茨基不怀疑,它在本质上而且从其结局看,是一个民主化的进程。

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随着它作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最可靠的基础和东欧无产阶级起来对政治权力的征服,至少将会是像在西欧一样得以稳固建立。<sup>①</sup>

将近五个月后,他在不同的背景下重申了这一信念:俄国革命本质上主要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将开启一个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新阶段,这将使无产阶级发展起来,组织起来,并因此“成熟到征服政治权力”。<sup>②</sup>

因此,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措施(比如解散立宪会议)大大地震动了他。考茨基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他的题为《无产阶级专政》(*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书里,他写道: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该设想为基础:它将作为一场总体的欧洲革命的出发点;俄国人大胆的首创精神将唤醒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奋起。<sup>③</sup>

但是他提出,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因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有一种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不可能被制造,它们产生于社会关系。然而西欧的社会关系与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如此不同,以

<sup>①</sup> Kautsky 1917a, p. 20.

<sup>②</sup> Kautsky 1917b, p. 507.

<sup>③</sup> Kautsky 1918, p. 28.

至于在那里没有必然性的革命,在这里却必定引发一场革命。当1848年革命在法兰西爆发时,它的确传播到了东欧的许多部分。但是它止步于俄国边界。而反过来,当1905年革命(在俄国)释放时,它在西方引发了一些争取投票权的强大运动,但是并没有产生任何类似于革命的运动。<sup>①</sup>

布尔什维克党人因此把战线扩展得太远。当他们在西欧争取革命的希望被证明是徒劳时,他们承担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其结果是,他们被迫用专政——一种并没有利用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何成分的专政——去替代民主。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考茨基区别了作为一种状态(*situation*)的专政和作为一种政府形式(*form of government*)的专政。第一个提到的变体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变体与“剥夺反对派的公民权”同义,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议会民主。<sup>②</sup> 马克思所采取的同样观点,被考茨基根据马克思所陈述的意见所证明:在英国和美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很可能会和平地、民主地产生。<sup>③</sup>

列宁在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中,愤怒地反击考茨基的各种观

① Kautsky 1918, pp. 28-9.

② 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不过,就马克思并未构想一个一党体制而言,考茨基认为应当诉诸于马克思。Mautner 解释道:“至于马克思提出的国民大会的专政,他并不是指一种由其参与者通过废除所有人的权利而行使的左派专政,而更多是指有其自身利益的一个集团(国民大会)、由人口最大多数(‘人民’或真正的大多数)组成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唯一统治。”(Mautner 1926, pp. 281-2)在这一背景中,重要的是说明19世纪的“专政”概念还意味着一种比专制更积极的管理,并因此比该概念在今天具有较少的贬义内涵。见 Draper 1962。

③ 考茨基参照的是下述的马克思引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恰恰必须采取暴力。”(Marx 1872, p. 160)马克思的讲话被报导在布鲁塞尔的报纸 *La Liberté* 和阿姆斯特丹的报纸 *Algemeen Handelsblad* 上。

点,反对他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走得太远的责难。列宁认为,由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当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是的,只要我们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一起行进,我们的革命就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于我们可能是再清楚不过了,1905年以来我们已经对此说了成千上万次,而我们从未尝试跳跃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必然阶段或靠各种政令取消这一阶段。……但是,从1917年4月开始,在十月革命前的长时间中,也就是,在我们取得政权以前的长时间中,我们向人民公开宣布并说明:革命现在不可能停止在这一阶段,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前进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崩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将要求走向社会主义(无论人们喜欢它与否)。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进步方式拯救这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并减轻劳动者和被剥削者遭受的苦难。<sup>①</sup>

列宁反驳对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是不民主的那种责难,他认为,相反,存在着民主的空前扩张和发展。他说,这已经被以下事实所证明:外交政策正在受公众、同时受国家结构的指引,它把工人群众直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sup>②</sup>在这一背景下,列宁最后指出,以马克思关于美国和英国的论述为参照是非历史的,并且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降低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是错误的。毕竟,1870年美英两国的形势几乎不可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存在的形势相等同。

前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其顶点),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它最典型的表达,相对而言,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大热爱而著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就是仅仅在20世纪才最终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小喜好、以军国主义的最大的和普

---

<sup>①</sup> Lenin 1918.

<sup>②</sup> Lenin 1918, pp. 20-2.

遍的发展而著称。<sup>①</sup>

总之，列宁用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去证明，这位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前领袖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并且现在几乎已经无法与“某一个自由主义的公开仆从”<sup>②</sup>相区别。然而，伴随这一诅咒式的结论，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论战仍然丝毫也没有结束。在第二个回合中，更多的争论产生了。

### 考茨基与托洛茨基

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Terrorism and Communism*, 1919)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例证。他引用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例证，称俄国无产阶级致力于客观上(尚)不可能的目标。他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的特征是，他冲动地寻求尽快摆脱其状况，并因此渴望以最短时间立即推翻资本主义。

群众并非本能地想获得指引他们走上发展道路的教义，而宁愿要一种提供规则或计划的东西，规则或计划的实行，无论情况如何，都可能会结束他们的痛苦。<sup>③</sup>

一个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将必须尝试防止这样的发展，即使因此冒着失去它对群众的领导权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在一个历史意义上“过早的”时刻夺取政权，那么导致的问题将会是极其广泛的。毕竟，剥夺资本是一个简单的权力问题，因此并不特别困难，但是组织剥夺后的生产，将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相对地缺乏经验和没有受过教育。

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在资本家本身或资本家的

---

<sup>①</sup> Lenin 1918, p. 13.

<sup>②</sup> Lenin 1918, p. 90.

<sup>③</sup> Kautsky 1919, p. 12.

代表中找到它的领导。如果人们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必须创造出一种组织形式,它即使没有资本家的领导,也能运行,如果不是运行得更好的话。这就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事,就像过去菲利浦四世和斯坚卡·拉辛(Stenka Razin)的例子;因为它要求物质和精神类型的一组特定条件,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组织,一个不单单是生产的而且是原材料的输出和供应的组织。而且,它还要求一个意识到自己义务——不仅是对无产阶级自己的邻居和同志而且是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义务——的无产阶级,而且是通过长年累月的群众组织已经变得习惯于自愿服从纪律和自我管理的无产阶级;而它,最终,有足够的智慧去区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区分受过科学教育和有教养的领袖与既无节操又无知识的煽动性政治家类的人物。<sup>①</sup>

既然俄国无产阶级尚未准备好实现这一巨大的任务,一场大混乱的到来就是必然结局。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论题,考茨基参照托洛茨基的观点——俄国工人阶级尽管缺乏经验,然而能够“及时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提出了下述类似观点:

但是,托洛茨基敢于搭乘上一个火车头并让它开动,确信在这个行程中他将“及时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吗?无疑,他完全可能会这么做,但是,他有必要的时间吗?火车难道不会很可能脱轨或者爆炸吗?一个人在试图让机器运行之前,他必须获得某些操纵机器的必要技能。同样的,无产阶级如果想要从事这一工作,它必须获得那些对生产组织不可或缺的素质。<sup>②</sup>

为了拯救经济,将不得不恢复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一个新“管理阶级”(Herrenklasse),它将在那时承担起权力的执掌。因此将出现“所有专制主义中最具压迫性的、俄国曾有过的那种专制主义”<sup>③</sup>。由于旧的资

<sup>①</sup> Kautsky 1919, p. 112.

<sup>②</sup> Kautsky 1919, p. 117.

<sup>③</sup> Kautsky 1919, pp. 134 - 5.



本主义被摧毁了，一个新资本主义将渐渐形成，因为该时代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还不成熟，所以新资本主义对于无产阶级要比旧资本主义更糟。因为这一新资本主义将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将是以卑鄙的讨价还价和金融投机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如果是那样的话，“工业资本主义已经从私人资本主义转化成国家资本主义”<sup>①</sup>。

这些段落解释了，考茨基并不真正知道他应当怎样定义那种新的“被认定是异化的形态”。官僚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官僚是否确实是一个资本家阶级，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无论情况如何，他确定，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命中注定必然失败。布尔什维克既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创举之上重建民主（考茨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前景），也不会有一场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它将肯定不是一个热月9日，但是我觉得它与那个热月相去不远”<sup>②</sup>。

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托洛茨基寻求避开考茨基的攻击。特别是，托洛茨基否定任何关于布尔什维克过于轻易地夺取政权的观念。他提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他认为人们不能因为俄国工业的崩溃而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因为真正的原因是内战、反对俄国的封锁，等等。<sup>③</sup>第二，他反对无产阶级必须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已经学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技能的观点。第三，他说明，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超出夺取政权的其他选择。托洛茨基合并后两个观点反驳考茨基关于火车头的类似观点，他认为这过分简单化了。

一个人可以用无限多的根据说：“在已经学会在马鞍中坐稳之前，考茨基会敢于登上一匹马并按它的全部步子指挥这个动物吗？”我们已有根据相信，考茨基不会下决心要这个危险的、纯粹布尔什维克的经历。另一方面，我们担心，不通过冒险登上马，考茨

---

① Kautsky 1919, p. 134.

② Kautsky 1919, p. 146.

③ Trotsky 1920, p. 105.

基要了解骑在马背上的秘密会有相当的困难。对这一基本原理，布尔什维克的精准见解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当坐到马上时，才能学会驾驭马背。<sup>①</sup>

而且，俄国工人阶级必须登上这匹马，如果它不想被整个时代的历史阶段所抛弃的话。而一旦它已夺取了权力，并建立了政权，所有其他人将自行遵从它。必须通过社会化战胜资产阶级对生产组织的破坏，无论那个时刻的社会化进步与否：“既然已经登上马鞍，骑手有义务驾驭那匹马，即使冒着摔断他的脖子的危险。”<sup>②</sup>

考茨基的回答很快就来了。在《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From Democracy to State Slavery*, 1921)中，他反驳说，虽然他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学会了骑马。

真的，在我登上马之前，我没学会骑马，但是这匹马在我登上它之前，已经学会携带骑手。我并不独自骑马，而是与朋友骑，他们已经学会骑马，并给予我建议和指导。然而，最后，挑战变得比较容易，因为我预先做体操锻炼了我的身体。<sup>③</sup>

考茨基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以尽可能清晰的解释表明了如下差别：当托洛茨基声言布尔什维克为环境所迫首先骑上马，然后才掌握对它的驾驭时，考茨基认为，一个没有经验的骑手将很可能会摔下马去。然而，两位理论家都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两种立场可能都有一定的正确性，而二者可能都相当有想象力地表述了十月革命的一个根本悲剧。

### 考茨基与布哈林

在其后数年的过程中，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批判，语气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1925年，他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国际和苏维埃俄国》

① Trotsky 1920, p. 82; 英文版, 第 101 页。

② Trotsky 1920, p. 83; 英文版, 第 102 页。

③ Kautsky 1921, p. 12.

(*The International and Soviet Russia*),他在书中宣称,苏联政权是国际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他写道:

(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最大的直接障碍——它甚至比匈牙利臭名昭著的霍尔蒂政权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还要坏,后者并没有制造一切可能的对立运动,所以完全不可能像苏联所做的那样。<sup>①</sup>

考茨基概括道:

(布尔什维克)在今天的位置上,他们通过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而生存。但是他们不愿意作为一个资本家阶级在这个位置上行动。因此他们今天高踞于无产阶级和资本之上,以便将其作为工具使用。<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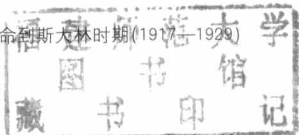
尼古拉·布哈林用三倍于他对手的书的内容的一本小册子《卡尔·考茨基和苏维埃俄国》(*Karl Kautsky and Soviet Russia*)来回应考茨基。<sup>③</sup> 他的回应在本研究的前后背景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布哈林追溯了单线图式与他们的逻辑结论的部分因果关系,并因此为探究有关这一主题的单线论思想的局限性做出了贡献,尽管这不是他的直接目的。可以说,他试图站在考茨基的立场上,只是为了揭示后者观点中的矛盾。

一方面,考茨基用许多著述否认十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他承认自1917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比如废除了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如果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那么,布哈林问他自己,结论应当是什么。如果苏维埃国家既不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又不代表工人阶级的统治,布尔什维克权力的真正社会基础可能是什么呢?尽管考茨基没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布哈林已假定在

① Kautsky 1925b, p. 11.

② Kautsky 1925b, p. 25.

③ Bucharin 1925. 这本小册子看起来躲过了布哈林的传记作者斯蒂芬·F. 科亨(Stephen F. Cohen)的注意,见Cohen 1975。A. G. 洛维(A. G. Lowy)的确提到过这本小册子,不过他并不认为它主要是与考茨基的论战,而认为布哈林为了延续与另一个人即斯大林的辩论,而涉及与考茨基的讨论。见Lowy 1969, pp. 259 - 61.



这种情况下该问题的逻辑解答必将是什么。最明显的可能性是，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

像美国的一些百万富翁那样，他们是从工人阶级当中攀升上来的。但是，他们成功了，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发财致富；然而在这里，一切又都颠倒过来：自我发财致富是夺取政治权力的结果。<sup>①</sup>

但是布哈林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导致了“最奇特的结论”。因为毕竟正是那些“新经济政策人”最类似于美国类型的资产阶级；然而恰恰是他们，已被布尔什维克剥夺了政治权力。如果布尔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那么这将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就因此被称作资本家阶级。这种看事物的观点也更符合考茨基的主张：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高踞于”劳动和资本之上的新统治阶级。然而问题仍然是，“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逻辑上意味着什么？它必须是哪一类型的阶级？大比例的党员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成为“剥削者”因而是不可能的。只有一小群职业管理者是“新阶级”成员的候选人。但在什么程度上真正可以说这些人完全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是以该事实为特征的：它具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或至少是对一个确定的阶级制度中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垄断。如果一个群体的人是统治阶级，那么这意味着，这个群体拥有“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换言之，在考茨基看来，接下来就是，如政治局，尤其是我自己（我可怜的灵魂！）成为大规模工业总体的拥有者和剥削者，即金融资本主义寡头，一句话，独占其利润的新的“百万富翁们”。<sup>②</sup>

这个观点在布哈林看来是荒谬的——确实是一个“苍白的谎言”。在另一方面，如果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新统治阶级，如果考茨基对“阶

<sup>①</sup> Bucharin 1925, p. 28.

<sup>②</sup> Bucharin 1925, pp. 34 - 5.

级”概念的使用仅仅是比喻性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一个阶级,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如考茨基自己承认的,他们被没收了),也不是那种资本家阶级(这也得到了考茨基的承认)。这个阶级不是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称为一个有其自己权利的阶级)。那么还有什么?无产阶级。<sup>①</sup>

通过把考茨基的观点还原到荒谬,布哈林认为他已前否定地(*ex negativo*)提供了苏维埃官僚制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确切证据。但他的推理还是包含了两个潜藏的假设,即:

1. 如果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必然不得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金融资本家寡头”,而不是任何其他阶级,也就是说,他假设所存在的既是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工人国家,并且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

2.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构成一个新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将是一个必然代表了特殊阶级利益的集团。

这两个潜藏的假设,接下来将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辩论中得到辩论;即便如此,布哈林的理论成就是,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思考了该观点的内在含义。

## 第二节 李、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批评与反批评

1922年,保罗·李(Paul Levi)发表了罗莎·卢森堡(Luxemburg)的书《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的主要文本。卢森堡开始写作该书是在1918年秋,而德国起义的爆发阻碍了它的完成。<sup>②</sup> 围绕着这本书的真实性有不少虚构的故事。其中,据来自某些出处[也即利奥·约

<sup>①</sup> Bucharin 1925, p. 35.

<sup>②</sup> Frölich 1967, p. 286.

吉希斯(Leo Jogiches)]的文本,李在他的前言中称,原手稿曾经差点被烧毁。虽然没有证据证实这一指控,约吉希斯阻止它的出版的确是真的,他断定卢森堡在后来写到这个文本的一些基本方面时已经修改了她的观点,并已转而打算全力撰写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

李发表的版本是基于一份未完成的、并不始终是准确的复制本。原稿在动荡的1919年1月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就被遗忘了,只是在许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1928年,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对李的版本进行了必要的修改。<sup>①</sup> 由李编辑的这个文献因此并不完全可信,不过我将讨论它,因为它曾是一个影响了1922年和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版本。

## 李

在其对该书的广泛介绍中,李<sup>②</sup>解释了他为什么决定要出版它。他指出,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之后,俄国的议会共和国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自1921年2月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全面转折。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在1918年曾争取消灭资本主义,三年以后则寻求复活资本主义。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已经转化为农村的阶级矛盾;处在以前的庄园主(*muzhiks*)和富农(*kulaks*)反动立场位置的“中农阶层”,已形成了格罗索模式(*grosso modo*)。<sup>③</sup> 不过,在早期阶段,产业工人曾在农业地区的下层阶层中找到了他们的天然盟友,现在,他们在农村面对着一个很少感到与他们有亲近感的、相对富裕的广泛的农民阶层。力量平衡因此转变成无产阶级的不利地位。

<sup>①</sup> Weil 1928.

<sup>②</sup> 在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被谋杀之后,律师保罗·李(1883—1930)是仍然很脆弱的德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对左倾激进冒险主义有明显反感的李,很快推动了与该党左派的分手,于1920年创建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KAPD)。他因为对1921年德国共产党失败的“三月攻势”的公开批评,此后很快辞去主席一职并被开除。他后来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左翼。除此以外,见 Beradt 1969.

<sup>③</sup> Levi 1922, p. 16.

李延续了考茨基和列宁之间的辩论,辩称考茨基对民主和专政的解释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列宁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列宁或多或少把政府形式简化为国家形式的外在表现。关于相关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定义,李认为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相关的无产阶级国家,无论如何,他怀疑描述“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任何意义。

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中,不同的“政府形式”是可能的,正如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中,极其多样化的政府形式(共和国、君主制、议会制)都是可能出现的。列宁曾经研究并回答了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已经用他的多种论述进行了表达,他在这些论述中确认了这一观点。<sup>①</sup>

按李的说法,列宁相信,如果替代的政体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令人怀疑的观点意味着:

像一个真正的母亲一样,该先锋队在(创造)苏联制度中做了一件衬衫,并(耐心地或不耐烦地)等到孩子能够穿上这件衬衫。只要还不能穿,那么母亲仍是母亲,衬衫还是衬衫,先锋队还是先锋队,苏联制度还是苏联制度。<sup>②</sup>

李拒绝这一由先锋队替代<sup>③</sup>的观念(一个“替代主义的”错误)的合法性。他觉得,无产阶级将会战斗中成长壮大,并掌握它自己的未来。<sup>④</sup>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灾难性政策,他们在1917年后丧失了他们的阶级基础,并使他们自己在俄国社会孤立了。唯有其组织强权仍然维持着他们的运行。为寻求一个新的阶级基础,他们选择了农民。<sup>⑤</sup>于是,在一个

---

① Levi 1922, p. 35.

② Levi 1922, p. 29.

③ 该术语是托洛茨基的。见 Cliff 1960。

④ Levi 1922, pp. 50 - 1.

⑤ Levi 1922, p. 47.

“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的方式下,已经发生了政治本质的根本转变;或换句话说,通过政府形式的一种变化,国家机器的本质也被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还剩下什么?”一无所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主体。<sup>①</sup>

李提出的中心问题还将在以后的年代被再三地讨论:一个工人国家是否能够用一种特定的政府类型(例如一种议会民主制)或少数几种类型来定义?

### 卢森堡

完全无法确定,如果卢森堡活得更长,她是否会得出与李同样的结论。<sup>②</sup> 她的著述在相关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提示;很难说她会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然而她在1917年和1918年的出版物中主张一种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批判性团结的态度。她的第一批文章无疑是非常热情的。<sup>③</sup> 很简单,《俄国革命》的手稿的确不是首先批判布尔什维克,而是首先批判考茨基。卢森堡反对考茨基关于俄国因为经济落后、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她的否定意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性。在理论上,考茨基的观点将会导致如下结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发生的,可以说,是每个现代国家自身经历的国内事务。<sup>④</sup> 在实践上,这种方式将意味着一种倾向,即尽量减少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尤其是德国的

<sup>①</sup> Levi 1922, p. 51.

<sup>②</sup>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0—1919),经济学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成员。在1914年4月4日SPD党团在神圣帝国的帝国议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之后,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等人共同致力于创建左翼反对派,这个派别从1916年起成为著名的斯巴达克派,并在1918至1919年的转折前后成为德国共产党。从1915年2月到1918年10月,她因为所谓的非法活动几乎不停地入狱(首先是因为叛国罪,后来是保护性监护),后于1919年被自由军团的成员所谋杀。其权威传记见Nettl 1966。

<sup>③</sup> 见Luxemburg 1917a和Luxemburg 1917b。两篇文章都是匿名的,但都属于卢森堡。见Nettl 1966, pp. 680—1。

<sup>④</sup> Luxemburg 1922, p. 69;英文版,第368页。



工人运动对俄国重大事件的责任。

战争和俄国革命事件已证明,并非俄国的无产阶级不成熟,而是德国的无产阶级没有成熟到去实现其历史任务。而这充分说明,对俄国革命进行批判的考察是首要的任务。<sup>①</sup>

在这里也许应当指出,由于对考茨基的这一批判,卢森堡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单线论,往前多走了一步。在她看来,如果当时发生一场联合的德国—俄国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可能的。然而卢森堡也意识到了包含在这一观点中的反题:如果俄国革命无法在国际上传播,那么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将导致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果是那样的话,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而只有“虚弱的、被扭曲的首创精神”<sup>②</sup>。在这种情势下,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自己极为艰难,犯错误的可能性极大。在她看来,任何人都不应得到“不加批评的赞美”,而唯一负责的态度是以根本的团结为基础的批评。

卢森堡提出的第一点批评关系到布尔什维克的农村政策。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允许农民均分大型地产,她感到已采取了一个危险的步骤。理由是,通过这一政策,社会财产没有得到强化,相反却产生出一种私有财产新形式。相对发达的大农场企业被摧毁了,代替它们的是曾经出现过的小原始农庄,从技术上说,小农庄仍然以“产生于暴君时代的技术方式”运作。<sup>③</sup> 土地政策以这种方式强化了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影响,并改变了力量的均衡,使工人阶级处于劣势。极大地膨胀了的、拥有财产的新农民阶级会竭尽全力地捍卫他们新得到的财产,因而严重地阻碍农业社会化:“列宁主义的农业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阶层——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平民敌人,这些敌人的抵抗要比那些贵族大土地所有者的

---

① Luxemburg 1922, p. 70; 英文版,第 368 页。

② Luxemburg 1922, p. 71.

③ Luxemburg 1922, p. 85; 英文版,第 377 页。

抵抗更危险、更顽固。”<sup>①</sup>

她的第二点批评涉及民族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已成为她与列宁也是与波兰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政治冲突的一个源头。卢森堡一贯激烈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她从以下观念出发：既然工人没有祖国（如《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那么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她曾经写道，工人的祖国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up>②</sup>沿着这一总体思路，卢森堡继续表达她的忧虑：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将导致这个新国家的分裂。一旦赢得独立，一个又一个民族将运用它们的自由去与德国帝国主义建立联系并助长反革命。<sup>③</sup>

布尔什维克通过他们的土地政策和民族政策，在他们国家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了强大的反对派。这将卢森堡引向其批判的实质——专政和民主问题。解散立宪会议（1917年10月）对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托洛茨基曾在理论上说明，像立宪会议那样的制度，可能会首先过着“它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一旦制度不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就应当被摧毁。卢森堡不同意说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被选举人和选民之间如何产生了一种持续互惠的互动。“公众情绪的生气勃勃的流动”（*lebendige Fluidum der Volksstimmung*）不断地冲刷着代议制的机体，浸染着它们，并指引着它们。

恰恰是在那场通过其白热化而产生的革命中，在微妙的、活跃的、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公众感情的起伏，公众生活的脉动，用目前最美好的时尚影响着代议制机体。<sup>④</sup>

自然，立宪会议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选择甚至更不理想。这种选择同样摧毁了民主，并因此破坏了群众的政治

① Luxemburg 1922, p. 87; 英文版, 第 378 页。

② Luxemburg 1916, p. 47.

③ Luxemburg 1922, p. 90.

④ Luxemburg 1922, p. 102; 英文版, 第 386 页。

生活。

只承认那些靠他们自己的工作生活的人的投票权,这种布尔什维克方式受到了卢森堡的批评。她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令人不能理解的方式”<sup>①</sup>,它剥夺了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而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因为无法就业而变得贫穷。卢森堡更一般地指出,需要对民主进行最宽泛的解释,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作为政治学习进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她提出了她关于自由的著名论题:

仅仅对该政府的支持者、仅仅对一个政党的党员而言的自由,无论它们可能有多大,都根本不是自由。自由是对有不同思想的人的始终的和唯一的自由。不仅因为“正义”的狂热概念,而且因为政治自由中一切有益的、健康的和纯净的东西,都仰赖于这一根本性质,而当“自由”成为一种特权时,它的有效性就荡然无存了。<sup>②</sup>

卢森堡预言,废除民主将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全面僵化。官僚制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群众运动的活力将会消失。她在一个构想的段落中,为这样的未来勾勒了一个不祥的情景:

数十个有无穷精力和无限理想主义的党的领袖进行指导并统治。在他们之中,实际上只有一打杰出的头脑进行这一领导,工人精英一次又一次地被邀请到会,在会上他们将为领袖们的发言鼓掌,并将全体一致批准建议的决定——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事务。这是一个专政,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即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在雅各宾派们的统治的意义上的专政。……是的,我们甚至能够走得更远: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杀人质,等等。<sup>③</sup>

① Luxemburg 1922, p. 105; 英文版,第 388 页。

② Luxemburg 1922, p. 109; 英文版,第 389—390 页。

③ Luxemburg 1922, pp. 113—4; 英文版,第 391 页,改编本。

即使有人仔细地推敲卢森堡的全部话语,其准确含义是什么仍是不明确的。一方面,她警示了资产阶级力量在农村的强化和各民族取得独立,有可能导致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危險;另一方面,她也正视布尔什维克体制有可能蜕化为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但是后一种可能性只是一种含糊的参照物。当她说到“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时,她真的是指那种形式(也就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决定的形式),还是指一种变成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性的社会转变?<sup>①</sup> 无论人们如何解释,很明显,卢森堡相信,她能分辨许多因素,包括导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内源的和外源的因素。不过,她并没有去构想那种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

### 各种解释

关于卢森堡在放弃了她在本书上的工作后,是继续执著于她最初的批判,还是相反——改变了观点,有许多讨论。1922年,阿道夫·瓦佐夫斯基(Adolf Warzawski)在回忆中引用了据称是卢森堡的标注着1918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封信:

我同意你的所有有限条件和保留,但是我已经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放弃了它们,而在一些问题上,我并没有走得像你那么远。……的确,新创造的农业生产关系是俄国革命最危险、最受伤害的一点。但是在这里,也适用以下真理:即使最伟大的革命也只能完成通过发展已经成熟了的的任务。最受伤害的这一点只能通过欧洲革命才能治愈。而这一革命即将到来!<sup>②</sup>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也称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她有关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sup>①</sup> 李在他的“导论”中,明显选择了第二种形式。

<sup>②</sup> 见 Warski 1922, p. 7。Gilbert Badia 的著作(1974, p. 204)称, Warski 曾记得“30年以后”这一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明显是出自这本书的年代。

尽管她在1918年夏天两次写信给我,但是我与弗兰茨·梅林还是想要完成有关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科学的批判,尽管她对我提到她自己想要做的主要工作,但是她在她后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说“已经解决了”。其原因所有人都一目了然,因为德国革命爆发后罗莎·卢森堡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看法表明,她关于立宪会议、民主和专政等问题的观点与她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早期批评相矛盾。罗莎·卢森堡采取了改变过的历史评价。<sup>①</sup>

巴迪亚(Badia)在说明没有证据表明罗莎·卢森堡已明确放弃了她关于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批评时,他看起来是正确的。<sup>②</sup>在把揣测的卢森堡的思想变化仅仅与立宪会议问题联系起来时,蔡特金无疑同样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卢森堡似乎真的好像确实对民主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在德国革命的影响下,她关于议会重要性的态度显然有所变化。尽管为了给国民大会打上“胜利的”标记,她曾呼吁成立参选的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sup>③</sup>晚些时候,她又以“一切权力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姿态支持了这种变化。因此,卢森堡观点的这一变化并没有原则意义。她只不过是德国现实政治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回应,并因此调整了她的策略观点。她与列宁的真正的相互理解,根本无需一定要成为列宁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④</sup>

### 蔡特金、卢卡奇与考茨基

西方的布尔什维克同情者对于卢森堡(以及李)所进行的批判,简明地表述了不同的答案。克拉拉·蔡特金甚至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书,题为《罗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立场》(*Rosa Luxemburg's Position on*

---

<sup>①</sup> Zetkin 1922, p. 7.

<sup>②</sup> Badia 1974, p. 205.

<sup>③</sup> Luxemburg 1918-19, p. 484.

<sup>④</sup> Amodio 1973, p. 324 和 Jost 1977。

the Russian Revolution)。她在这本书中指责李“滥用”卢森堡的文本，如前所述，部分因为她认为卢森堡后来已经修正了她的观点，部分因为李的叙述错误地解释了卢森堡的手稿。<sup>①</sup>

蔡特金详细地考察了李和卢森堡提出的各种观点。要言之，蔡特金的观点的总的理路是，被污名化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曾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她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一致，也为解散立宪会议以及其他为了消除“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危险”的措施辩护。<sup>③</sup>不必说，蔡特金明确拒绝了李的论题，即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蜕化变质，而且党的机构孤立和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执掌了一个独裁政权。诚然，她感到不得不承认该党的社会孤立，但是她认为这是一个只有短暂意义的政治危机问题。以此类推，她阐明了她的观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么大胆、这么狂暴地冲向其目标，这么令人始料未及，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英保持了它们的活力，在总体上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步调一致。”<sup>④</sup>通过运用工会作为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沟通渠道，政治团结还是会得到恢复。<sup>⑤</sup>苏维埃组织也将会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这些组织只是一个上升中的运动、一种进步的社会民主化的开端。<sup>⑥</sup>

蔡特金尝试反驳个别论点时，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于同年殚精竭虑地写作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对卢森堡方法的批评。卢卡奇称，卢森堡的早期作品(它曾阐明了她与列宁的区别)和她关于十月革命

① Zetkin 1922, pp. 132 - 44. 在某种程度上，蔡特金的书是她那些否定考茨基批判布尔什维主义的早期论文的继续。见 Haferkorn and Schmalfuss 1988。

② Zetkin 1922, p. 146.

③ Zetkin 1922, p. 38.

④ Zetkin 1922, p. 199.

⑤ Zetkin 1922, pp. 202 - 3. 值得注意的是，蔡特金正如卡茨基和托洛茨基早期曾做过的那样，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推理。先锋队的快速行进、火车头的司机、骑马的驭手；所有关于激烈速度的构想，都是试图宣传这一进程的必然性。

⑥ Zetkin 1922, pp. 204 - 13. 尽管蔡特金始终如一地认同苏联，但看起来她在后来的年代中同情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她从未接受过反对派的反官僚政治的观点。见 Hermann 1971, 尤其是 pp. 418 - 21。

的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sup>①</sup> 他针对革命问题的“有组织的”方式批评卢森堡,因为在他看来,需要一种“辩证的革命的”方式。卢卡奇用“有组织的”方式指卢森堡曾根据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sup>②</sup> 他认为,卢森堡没能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已经在封建制度内出现,造成社会经济的紊乱;这场革命当时只是一个社会对于很大程度上已经在经济领域与日俱增地发生的种种变化进行政治法律的调整。这正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相对“有组织地”和迅速地(“魔幻般地走向暴风骤雨式的”<sup>③</sup>)实现的原因。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经济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这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要更根本和更广泛,它不是“一蹴而就”实现的<sup>④</sup>,而且正恰恰相反,它伴随着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是一个自觉地发展的过程,而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下要求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坚持以一切方式并在所有条件下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

然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以独断的方式决定其政策。正如在社会阶级的改造之后,它必须灵活地调控经济政策(社会化、让步,等等),以赢得工人总人口的特殊社会阶层支持其专政,至少使他们保持可能的和必要的中立,只有这样,它才肯定不会在复杂的自由问题上让自己犯错误。……自由(正像社会化一样稀有)可能是在它本身之中和它本身具有的一种价值。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相反。<sup>⑤</sup>

---

① Lukács 1923. 卢卡奇同意该解释:卢森堡在写作她的小书中是极其明白的,但是她在原则上认为它(十月革命)几乎没有重要意义,“抽象地说,相当可能的是……Warski 和蔡特金所说的卢森堡的观点的变化是一种错误的解释。”(p. 276)

② Lukács 1923, p. 288.

③ Lukács 1923, p. 286.

④ Lukács 1923, p. 287.

⑤ Lukács 1923, p. 296.

凭借这一总体方法上的反批判,卢卡奇得出了如下结论:卢森堡提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所有不同意见都是错位的。正像蔡特金那样,他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做法比布尔什维克所遵循的做法更具有可能性。卢森堡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她过于简单化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并因此过度估计了这一发展的组织特点。“她不断地把决战的挑战与即将到来的革命阶段对立起来”<sup>①</sup>。

卡尔·考茨基对卢森堡小册子的回答,是蔡特金和卢卡奇那些回应的一个最鲜明的反映。正如后面提及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考茨基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无法采取其他行动。因此,他提道:

毫无疑问,(土地再分配)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进步增加了巨大的障碍。但是这一事件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它最多只会以一种比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更理性的方式发生。它在所有事件上表现出,俄国在本质上发现自己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sup>②</sup>

同样,关于民族政策,考茨基不赞成卢森堡的观点,在他看来,民族独立构成了民主的基本成分。反之,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因为在实现自决权中他们走得不够远,迫使外族人受俄罗斯人的统治。<sup>③</sup>

相形之下,考茨基更多地肯定了卢森堡对民主的热情辩护,即便他认为卢森堡因为相信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相容而陷入幻想。按照考茨基的看法,前者将始终是后者的大敌。<sup>④</sup>

通过图表,我们可以清楚地将卢森堡批判的三个主要观点和考茨基与前布尔什维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蔡特金、卢卡奇)对它的回应总结如下:

---

① Lukács 1923, p. 280.

②③ Kautsky 1922, p. 35.

④ Kautsky 1922, p. 44.



	罗莎·卢森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克拉拉·蔡特金、 乔治·卢卡奇)	卡尔·考茨基
土地再分配	否定： 资产阶级因素被 强化	肯定： 它是必要的让步	肯定： 它表明革命的资产阶 级性质
民族自决权	否定： 资产阶级因素被 强化	肯定： 它是社会主义政策 必要的组成部分	肯定： 它是民主的，但是布 尔什维克无论如何不 会持续贯彻它
废除立宪会议、 限制选举权等	否定： 布尔什维主义变 成一种孤立的专 政的威胁	肯定： 无产阶级民主必 须受到保护	否定： 布尔什维主义已变成 一个独裁政体

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一图表中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卢森堡观点的特殊性便一目了然。因为，当蔡特金和卢卡奇作为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辩护者赞同它所采取的一切政策，并相信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才能得到维护”时，考茨基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一个否定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独裁尝试，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计划。蔡特金、卢卡奇和考茨基都设定，关于土地分配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准确地说，这一前提并未被卢森堡接受。从一个多少是唯意志论者的观点出发，卢森堡对俄国革命提出的要求，是从她关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全面的民主（所有人的投票权等）在她的观点中是相容的。这就是她那个因此受到卢卡奇批评的“组织的”方法，这致使她以强调那种形势的“未完成”性的方法，去描述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向社会主义关系前进的道路和回到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都是存在可能性的。

尽管这样，她承认，一方面，一个进程正在革命的俄罗斯发生，它到目前为止不可能轻易地适合既有的图式，另一方面，她的思想仍停留在单线论的理论框架中。

### 第三节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批评

#### 高尔特、潘涅库克、鲁尔

起初,未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高尔特、潘涅库克和鲁尔是俄国发生的大事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但是,正像卢森堡那样,他们很快表现出保留态度。例如赫尔曼·高尔特<sup>①</sup>将他1918年以《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为名的小册子题辞献给列宁,称其为“使他自己成长为高于所有其他无产阶级领袖”和“唯一与马克思同等并列”的革命者。<sup>②</sup>高尔特特别钦佩俄国革命的有两件事,即它的最高纲领主义和工人委员会。但是,他也谈到西欧的形势和俄国之间的四个根本区别:

1. 工人阶级在俄国是小规模的,而在西欧它的规模非常大。

2. 贫穷的、无财产的农民在俄国是极其大量的,他们的革命行动来自于他们对教会、贵族阶级和国家的反抗。相比而言,西欧的农民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为基础,不含革命潜能。

3. 革命的国家机器(政府和官僚制度)在俄国是“虚弱的”,但是在西欧是强大的。

4. 雇主阶级在东欧是微弱的,但是在西欧它是强大的。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意味着,工人阶级在俄罗斯,“与一个广大的同盟军——贫苦的农民一起”对抗一个“孱弱的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在西欧,则“单独”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sup>③</sup>高尔特由此得出了

① 赫尔曼·高尔特(1864—1927),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从1897年起就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SDAP)党员;作为该党左翼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1909年与Wijnkoop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社会民主党,该党于1918年成为荷兰共产党。由于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高尔特辞去了他在这个党的职务,并于1920年加入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随后他建立了这个党的荷兰支部——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APN),不过该党在其短暂的存在期间(到1932年)仍然是边缘的。高尔特的传记,见De Liagre Böhl 1996。

② Gorter 1920b, p. 77.

③ Gorter 1920b, p. 88.

两个结论。第一,西欧革命的胜利将会比它在俄罗斯的实现要困难得多;但是,第二,西欧在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将会容易得多。

在西欧,工人阶级发现了一个比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要更强大的基础,因为,首先,银行、大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和商业在战前(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已经成熟到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第二,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在西欧和美国已在总体上将生产和分配组织化和集中化了。而这一组织化在技术上十分强大,并能够直接被无产阶级接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种组织化在俄罗斯缺乏或很不完善。俄国社会在战前尚未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而它的组织方式在战争期间被削弱,反之西欧社会在战前已经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并且它的组织化和集中化已经在战争期间得到加强。<sup>①</sup>

附带说明,我们在这里注意到,高尔特如何与他特有的机械的单线思路相反,默许俄国革命跳跃一个阶段:俄国,毕竟据说还“未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我们将看到的,高尔特很快消除了他观点中的这一矛盾。<sup>②</sup> 潘涅库克<sup>③</sup>和鲁尔也赞同对俄国事件的这个格罗索模式的肯定评价。

因为在1919年和1920年共产国际内部“左派”和其他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激烈化,高尔特和其他人所提出的俄国和西欧之间的差别,

<sup>①</sup> Gorter 1920b, pp. 88 - 9.

<sup>②</sup> 当写作《世界革命》时,高尔特已经批判了布尔什维克,但在他这一本书中几乎没有这一迹象。然而在他的私人信件中,高尔特没有隐瞒他对土地再分配和民族自决权政策的保留意见(Bahl 1973, pp. 195 - 7),这与卢森堡的批判有显著的相似性。我不知道高尔特和卢森堡是否相互接触过,但不排除如下可能性:他们相互独立地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尤其因为这些观点是对他们两人早期已经表述过的那些观点的逻辑的演进。

<sup>③</sup> 晚至1919年,潘涅库克仍相信,“俄罗斯近两年以来真正实践了共产主义”(Horner 1919, p. 495)。潘涅库克(Pannekoek, 1873—1960),天文学家,1899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SDAP)。1906年到1914年,他住在德国,在那里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理论家起了突出的作用。1918年以后,他加入了荷兰共产党,但是在1921年离开了该组织。他同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并在后来保持了与围绕在Henk Canne Meyer周围的共产国际议会共产主义者党团(the council-communist Group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的联系。见Malandrino 1987 and Gerber 1989。

开始成为各种不同的政治策略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中,应提及潘涅库克1920年的书《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World Revolution and Communist Tactics*)。当高尔特特别强调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差别时,潘涅库克更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潘涅库克宣称,葛兰西预见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隐蔽的权力”。特别是在西欧,与俄罗斯相比,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从中世纪起就共同生活着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工艺;当封建主义被击败之时,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农民阶级同时产生出来,他们也是他们自有小经济方式的主人。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精神生活发展出一定的民族文化。<sup>①</sup>

俄国的情形同西欧非常不同:“不存在任何一个在传统上支配精神生活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因此,与在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不同的是,在东方,群众较少被塑造,因此更易于接受共产主义。<sup>②</sup>从这一区别可得出如下结论:革命者如果想要征服群众的精神,他们必须遵循一种与西欧非常不同的策略。在西方,最主要的是,必须批判那些无产阶级仍然信赖的资产阶级组织,比如议会、工会。潘涅库克的小册子写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几乎与列宁的《论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同一时刻发表。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列宁在他自己的书中把潘涅库克(别名 K. Horner)说成是那些满嘴“胡言乱语”和“胡说八道”<sup>③</sup>的人中的一个,而当他详细地论述“荷兰左派”时,他甚至几乎完全不提及他们最重要的观点——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差别。这一切说明,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流派之间的距离迅速地扩大了。

---

① Pannekoek 1920, p. 12.

② Pannekoek 1920.

③ Lenin 1920, pp. 28, 31.

列宁的书使左派共产主义者感到极大的失望。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赫尔曼·高尔特撰写了他的《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他在信中表达了这种幻灭的情绪。即便如此,他在这本书中仍然流露出对列宁的钦佩之情(类似于在《世界革命》中,该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革命》的续篇<sup>①</sup>),高尔特的批评现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他用一个评论展开他的论述,他已从列宁的最后一本书中再次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抛弃了许多“幼稚病”的病菌。不过,他认为,列宁著作的主要线索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简单地把东欧和西欧的条件相等同。因此,他评价说:“这是你的(也即列宁的)第一本不好的书。对于西欧,它是最坏的可能性”<sup>②</sup>。

在其他方面,高尔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新意。它大部分由对潘涅库克早期阐明的观点的重申而组成,只是这一次,它们被用更雄辩的措辞来表述。高尔特还表明了其对欧洲的划分,使其观点十分清晰:

就像我们从东方向西方移动,在确定的意义上,我们越过了一条经济边界。它从波罗的海流向地中海,大约是从但泽到达威尼斯。这条线分开了彼此两个世界。这条线以西,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与高度发达的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实行了绝对的统治。……这一资本是非常高度组织化的,并在这个世界上最稳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中找到了表现方式。这条线以东,也存在着集中的工业、商业、运输和银行资本的迅速发展,但是它缺乏一个稳定的绝对的统治的史前史,以及相随而来的一个稳固确立的现代国家。<sup>③</sup>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分界线的东方和西方需要非常不同的策略

---

① “高尔特的公开信与他在战时写作的那本书合并成一个整体。在《帝国主义》(*Het Imperialisme*)中,他敦促工人们实现国际联合。在《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中,他向他们指出了一场由西往东运行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场国际革命斗争的纯无产阶级性质是其公开信的中心论题”(De Liagre Böhl 1973, p. 251)。

② Herman Gorter 1920a, p. 213.

③ Herman Gorter 1920a, pp. 178 - 9.

的原因。

在大约同一时间,高尔特和潘涅库克与布尔什维克拉开了距离,奥托·鲁尔<sup>①</sup>放弃了他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残存的积极评价。在他作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回之后<sup>②</sup>(他和他的代表同伴墨吉斯实际上并未参加大会,甚至在它召开之前就已愤怒地离场了),鲁尔斗胆在几篇论文中说出了心里话。按照鲁尔的看法,布尔什维克通过直接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试图超越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这一尝试已经失败了。其结果是什么?“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社会主义。一种理论解释。一个官僚政权。一个纸面法令的集成。一种煽动话语。以及一种可怕的失望。”<sup>③</sup>

布尔什维克已创造出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它完全适合他们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中央集权制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期的组织原则。它服务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但它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要求议会制度。<sup>④</sup>

在后来的一本书中,鲁尔试图运用单线图式进一步证实他的一些观点。他声称,无论谁相信俄国革命意味着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起点,都是错误的历史分析的受害者:“俄国革命因为其历史环境,从其起点就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必须清除沙皇制度,为资本主义铺平

① 奥托·鲁尔(Otto Rühle, 1874—1943),教师,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1915年,他是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第二个议员。虽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但在1920年被该党开除。他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作为其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他成了所有政治党派反对者(“Die Revolution ist keine Parteisache!”),并同时被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开除。1933年,鲁尔经由布拉格永久移居墨西哥。见 Herrmann 1973; Mergner 1973; Jacoby and Herbst, 1985。

② Bock 1969a, pp. 251—5; Mergner 1973, pp. 154—8.

③ Rühle 1920a.

④ Rühle 1920b.

道路,并在政治上帮助摇篮中的资产阶级。”<sup>①</sup>当鲁尔在1924年写到这一点的时候,高尔特和潘涅库克已同时抵达了同样的观点。<sup>②</sup>

## 柯尔施

在德国共产党中,多次出现左派和反对派团体,表达对苏联及其自身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发展的抵制。<sup>③</sup>在这些人中,柯尔施表达了他们的忧虑。<sup>④</sup>及至1925年,他除了少量的批评之外,已把苏联视为唯一成功的革命榜样。<sup>⑤</sup>然而,当一封莫斯科来信批评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费舍尔、马斯洛等),并敦促建立一个新领导层时,柯尔施投入了战斗。在1925年9月法兰克福一次党的会议上,他把苏联领导层严斥为他所称的“红色帝国主义”。1926年1月,他和另一些人共同创建了左翼联盟团体,该团体给自己提出了重组该党的任务。1926年3月,该团体着手出版一份反对派期刊《共产主义政治》(*Kommunistische Politik*)。一个月以后,它公开发表了其政治纲领,在其中谴责共产国际扼杀了革命前景,并断言机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兄弟党中占了上风。<sup>⑥</sup>在国际上,柯尔施也试图组成一个反对派;为此目的,他与其中的阿马德奥·波迪加(Amadeo Bordiga)和苏维埃反对派领袖T. V. 萨普罗诺夫(T. V. Sapronov)保持接触。<sup>⑦</sup>

---

① Rühle 1924, p. 17.

② 作为总结,见 Bock 1969b, pp. 31 - 48.

③ Langels 1984 所提供的—个概览。

④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律师,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DP),并追随这个党的左派,它在1921年与德国共产党(KPD)联合。从1923年起,他担任图林根议会的议员,并担任该州司法部长数周。他于1926年被开除之后,曾短暂地在“坚决的左派”(the Entschiedene Linke)中活动。柯尔施的思想在这些年中发展成为议会共产主义。1933年,他移居丹麦,并于1936年移居美国。见 Buckmiller 1973b; Buckmiller 1976; Goode 1979.

⑤ Michael Buckmiller, 1973a, p. 62; Kellner 1975 - 6, p. 83.

⑥ Entschiedene Linke 1926.

⑦ “他会见了在莫斯科的意大利领导人阿马德奥·波迪加。然后他会见了萨普罗诺夫……当后者来到柏林进行一次秘密旅行时。他们谈了很多话,并同意合作从事反对派的工作。”(Korsch 1972, p. 42)关于形成一个国际反对派的这一尝试的更多信息,是 Montaldi (1975) 和 Prat (1984) 的书中所提供的。

然而,这些活动几乎没有产生组织意义上的切实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反对派活动的组织中(这使他在1926年4月底失去了他的党证),柯尔施尝试在理论上彻底探索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

在标注着1927年10月的一篇重要短论中,柯尔施提出了他的“静悄悄的反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在革命后的俄罗斯,两个群体会持续地相互对抗。一方是那些的确不再想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或想要抑制它的人(其中有列宁),另一方是那些始终想要继续推进阶级斗争的人。第一种思潮主要是从国家的考虑出发进行推论,而另一种思潮是从阶级利益出发进行推论。在两种思潮的冲突中,国家主义者完全赢得了胜利。这些胜利的证据是布列斯特和约(the Brest-Litovsk peace treaty)、战胜工人反对派、镇压卡朗施塔得叛乱和清算托洛茨基反对派。最终导致的一场大失败即一个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是各种局部失败的积累。

作为简单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思维,它表现出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赞扬红色十月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却将其历史成果即当代苏维埃国家称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大多数人去寻找原罪的源头(一些人在1917年的布列斯特和约中寻找它,另一些人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它,第三群人从1924年“列宁逝世以来”俄国党的蜕化变质中寻找它,第四拨人从192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从新经济政策向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中理解它,等等),以使用一个既定的日子来记载波澜不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和作为既成事实的“一个革命的工人国家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斯大林主义者可以用全面的合法性对这些进行回答:这样一种“堕落”,这样一种与以前的经济和政治的绝对明确的断裂,是不可能成立的。

实际上,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与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是同时开始的。特别是从1921年以来,当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社会阶级之间的



权力关系已经变得有利于资产阶级集团时,反革命的影响力开始迅速增长。因而,在十年的空间中,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缓慢地并几乎是秘密地取得了胜利。<sup>①</sup>在这同一衰落过程中,列宁主义已经蜕化为一种表面上是无阶级的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人们必须完全彻底地与之决裂。<sup>②</sup>

#### 第四节 总结

在1920年辩论期间,单线论在总体上主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所有主要参与者都设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无情历史顺序将会发生。然而,当考茨基只是在一国框架内解释这一顺序时(在每一个国家,每个阶段都必须在它能够被下一阶段取代之前“已经成熟”),另一些人则认可在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其中有卢森堡)和/或借助适当的国家政策的帮助(蔡特金、卢卡奇)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至于其他,所有讨论者都同意,沙俄帝国至多建立了一个带有封建残余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对关于“布尔什维克经验”的解释得出的结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 一批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在苏俄的时机尚未到来,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必须首先“已经成熟”。从这一观点出发,两种说法得到辩护:

(1) 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一种唯意志论的尝试,预先已命中注定让一个国家脱离历史规律;从这一努力中产生的这一异化形态将在短期内崩溃。(考茨基)

(2) 另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不论布尔什维克其他的主观意图——只是一场为发育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

---

① Korsch 1927a, 也见 Korsch 1932。

② Korsch 1927b. 见《论柯尔施关于苏联社会的理论》, Orsoni 1981 and Kornder 1987, pp. 149-59。柯尔施的学生之一,也是“坚决的左派”的成员,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也称库尔特·马丁(Kurt Martin),他从事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的工作。见 Mandelbaum et al. 1974 和 Martin 1979。

(高尔特、潘涅库克、鲁尔)

2. 另一批作者相信,十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在落后的俄国,在某些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1) 第一种观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过程;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仍然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卢森堡)

(2) 第二种观点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过渡已经失败,通过一种“静悄悄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柯尔施)

(3)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达到了重大程度上的巩固。(蔡特金、卢卡奇)

事实上,单线图式合乎逻辑地认可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排列变换,目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已经明确化,只有一个例外:他们无一人为“暴力的”的反革命(区别于“静悄悄的”反革命)已经发生的命题进行辩护。

### 第三章 从斯大林的“大跃进”到“伟大的卫国战争”(1929—1941)

由于事后诸葛亮之便,而不是由于虚构的历史必然性,人们可以说,在始于1917年、完成于1939年前后的国家建设进程中,新经济政策(NEP)年代是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始于1920年代晚期的“来自上层的”社会革命,是这一过程第二阶段的标志。这一阶段实行的政策,其规模及其绝对的冷酷无情,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苏联的面貌在当时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1927至1930年间,发生了三个齐头并进的结构性改造。首先,该政权本身成功地获得了切实的巩固。它在内部消灭了围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政治反对派,从而在党内和其他方面使中央政治机构免受影响,此时,它的权力在外部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工会的相对自主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受到严格限制,完全被改造成了党的机构。第二,1927年出现在农村地区的大范围的紧张局势,导致了粮食市场的局部瘫痪[尤其是“剪刀危机”(scissors-crisis),影响了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当时新政权不顾风险并迅速采取行动,用极端方法在农村地区实行集体化。这个过程由于延伸到对富农的肉体消灭从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造成了数量巨大的死亡。第三,1929年4月通过了实行五年计划的决定之后(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已经在1928年1月开始了),建立起一个强制

性的现代化计划。重工业(特别是金属工业、机器制造和能源供应)被赋予绝对的优先地位,然而并没有高度重视这一计划对社会整体造成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市场制度被“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s’,亚历克·诺夫(Alec Nove)的术语]所削弱,并被“计划”、“集体”等取而代之;在政治领域,产生了中央集权化,消灭了民主和多元化的大部分残余。一个单一组织化的社会[如里格比(Rigby)对它的表述]已经形成了。

在多样化的社会亚系统中对各个单个组织的整体协调,是其自身组织化的实现,也即通过统帅部的最高层级结构(非常像战时的最高统帅部),去指导并协调控制在特殊的战争舞台上运作的大量的结构组合、分支部门和服务系统。<sup>①</sup>

在如此形成的社会中,伟大领袖的权力不管怎样依然不是至高无上的。1934年斯大林的竞争者、政治局成员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杀之后的大清洗,标志着这一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成。大规模的恐怖具有两个相联系的后果。一方面,在社会构成中领导精英改变了。沙俄时期的布尔什维克老兵、许多1917年和后来加入该运动的人,以及为斯大林的“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的人,被取而代之。取代他们的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历史却具有技术官僚观点的人。同时,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越来越坚不可摧。由于这些变化,已在1920年代末出现的被强制的劳动大军,增长极为迅速。与此同时,对“普通”工人的约束引人注目地加强了(工作手册的引进,对旷工者的严厉罚款,单方取消雇佣合同权利的废除,等等),引进了传统的家庭政策(禁止堕胎,宣布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并且艺术、科学和哲学完全隶属于官方政治。

在大约十年期间,苏联就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遵循者无疑很快地承认了这一点,并得出了他们的结论。当然,这些结

---

<sup>①</sup> Rigby 1977, p. 53.

论也受他们对苏联外部种种发展的观察的影响。

笼罩在 1930 年代一切事物上的阴影是大萧条。苏联批评者在当地经历的经济困难和苏联向现代化的快速大踏步前进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对比(部分是虚假的),使他们缓和了对俄国人的批评。1931 年,考茨基就这一点指出:

这场经济危机在最后一已经达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以致我们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已经发生。与此相对应的是苏维埃俄国不断加强的对五年计划的广告宣传。……人们所渴望的是轻信。由此,在这一非常时期产生了一种需要,即去理解俄国将要在其上建设其未来圣殿的基础。<sup>①</sup>

如果这种诱惑是强烈的,那么以下这种情况就并不奇怪:早期的苏联批评者以认错的方式重新调整了他们的观点。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奥地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他的观点最初与考茨基的观点相接近。<sup>②</sup>但他在 1930 年代修正了他的观点,并在 1936 年的《处在两场大战之间吗?》(*Between Two World Wars?*)一书中,捍卫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宣称:“然而,正像伟大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进程导致的牺牲是可怕的,它的结果恰恰是如此令人振奋。”<sup>③</sup>

其次,1933 年希特勒发动政变上台,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政权之间的某些共同特点昭然于世(例如,一党制、经济“计划性”等)。此外,两种制度有时看起来仿佛在政策层面上相互影响。<sup>④</sup>莫洛托夫—李宾特洛

<sup>①</sup> Kautsky 1931, p. 342.

<sup>②</sup> 见他对考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批判的肯定评价: Bauer 1919.

<sup>③</sup> Bauer 1936, pp. 13 and 37. Croan 已经明确地指出了鲍威尔的认错倾向和世界形势之间的联系:“一场正在深化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正在使欧洲各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黯然失色。……唯有在这一背景中,鲍威尔乐观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作用……才可能得以理解。……太阳正从东方升起”(Croan 1962, pp. 292 - 3)。作为一本论述鲍威尔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专著,见 Löw 1980.

<sup>④</sup> 例如 Schwarz(1951)注意到,劳动手册大约在同一时间被引进纳粹德国(Reichsgesetz, 1935 年 2 月 26 日)和苏联(1938 年 12 月 30 日颁布),然而,“……苏联的劳动手册,一旦改变了纳粹德国的模式,不再可能执行它们在第三帝国执行的功能”(p. 101)。

甫条约强化了这一印象。这些观察激发了一些理论家去思考这两个社会的相同本质。众所周知,非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受到这种诱惑,并在当时为未来的各种极权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sup>①</sup> 一个议会共产主义者在1939年的一段引文中总结了这一时代思潮:

俄罗斯必须首先被置于新极权主义国家之中。……它具备了极权国家的所有特征……成为那些被迫废除民主的国家制度和转变为独裁统治的国家的样板。俄国是法西斯主义的典范。

这里与任何意外无关,也不是历史开了一个坏玩笑。两种制度的重复在这里是明显而真实的。每一件事都指向该事实:这里我们必须涉及运用于历史和政治发展的不同层面的相同原则的各种表述和逻辑结论。不管党的“共产主义者”是否喜欢它,事实仍然是:俄罗斯的国家秩序和统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那些制度毫无二致。人们可以谈论一个红色的、黑色的或棕色的“苏维埃国家”,也可以谈论一个红色的、黑色的或棕色的法西斯主义。<sup>②</sup>

类似的观点后来被各种各样的学者再次提到,如下述章节将讨论的那样。

苏联社会1929年的结构改造取得的发展契机并未诱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去把它看成社会主义的变体,奥托·鲍威尔的见解现在开始广为人知,即:再也不能对苏联简单地使用“资本主义”的标签。不知何故,批判理论不得不表述这一事实: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已经出现了某些全新的东西。提到那种全能的官僚政治精英,左翼反对派克里斯廷·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将之描述为一个“新的社会范畴”,要求一种全新的分析。<sup>③</sup>

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在1929—1941年间被付诸讨论。我将首先论述

① 见 Adler and Paterson 1970。

② Rühle 1939, p. 245.

③ Rakovsky 1929, p. 131. 这个俄国人最早认真地论述了“一个新的社会学范畴”。

它们的内容,然后对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在这一时期的辩论进行检验。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

要了解“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历史最好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已形成共识的是,该术语是1890年代初首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创造的,以回应格奥尔格·冯·福尔马(Georg von Vollmar)及其追随者的改良主义观点。后者认为,应当鼓励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国有化)政策,这些政策将会为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然而他们的对立面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和另一些人主张,资产阶级国家的扩张不可能导致“国家社会主义”,而只会导致“国家资本主义”,从而改变力量的平衡,导致工人阶级的劣势地位。<sup>①</sup> 国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带有分析目的的范畴;相反,这一概念通过两种方式与现实相脱节——“通过强调它与国家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和强调后者与一种未来社会的关联”<sup>②</sup>。

在1914—1918年间,德国的战争经济,由于迄今为止对经济过程空前未有的国家干预(使用暴力强迫企业进行生产,调控消费品的分配,制定最低价格,等等),刺激了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详尽阐释。那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提出了一种解释,即国家资本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即国内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由国家干预进行有倾向的调节,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向世界市场转移的阶段。<sup>③</sup> 持其他政治取向的作者,诸如社会民主党的卡尔·伦纳(Karl Renner)和议会共产主义者奥托·鲁尔(Otto Rühle)阐述了同样的理念。<sup>④</sup>

<sup>①</sup> Huhn 1952 - 1953, pp. 170 - 80; Olle 1974a, pp. 103 - 12; Ambrosius 1981, pp. 9 - 18.

<sup>②</sup> Olle 1974a, p. 107.

<sup>③</sup> Stehr 1973; Haynes 1985.

<sup>④</sup> Renner 1917; Steuermann 1931.

对于1917年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存在的程度问题,很快开始在布尔什维克自身的讨论中发挥了作用。团结在《共产主义者》(*Kommunist*)杂志周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担心正在执行的工业政策将会破坏企业中工人的权力,并因而摧毁革命进程的基础。奥辛斯基(Osinsky)明确表达了这种关切:

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知道怎样去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前提,那么没有人能为它去这样做,并且没有人能迫使它去这样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否则它们将根本不会被建立;另外一些东西将被建立起来,即国家资本主义。<sup>①</sup>

同一时期前后,列宁也把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运用于俄国。然而,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容。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将会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革命者必须尽可能多地借用来自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来自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技术—组织化的方式和真知灼见。<sup>②</sup> 在布哈林、奥辛斯基、列宁以及其他人的多种文献中,国家资本主义被非常广泛地解释为以国家干预为主的市场经济。在1930年代关于苏联的辩论中,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被众多作者所接受,但是,在该过程中,这一概念获得了一个略微不同的和更狭窄的意义:在经济过程中,国家是唯一的雇主。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转折,是由苏联本身的结构改造引起的,它包括新经济政策以后传统市场的消失,和国家作为有无限能力的权力中心的构成。

在1929—1941年间付诸讨论的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最为流行的。这种流行说明了什么?其答案肯定是,这些理论在本质上仍然非常接近于旧的单线图式。即使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构成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却是一个“新的”或“更高的”的资本

<sup>①</sup> 这里的引证依据 Daniels 1960, pp. 85 - 6。

<sup>②</sup> Olle 1974a, pp. 121 - 31; Ambrosius 1981, pp. 29 - 33; Borilin 1929.



主义形式,它仍然可以直接塞进那种“封建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旧有顺序中。除了下面所讨论的各种变体以外,仍然有许多相类的文献。这里不讨论这些文献,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没有给所概括的这些变体增添任何东西。<sup>①</sup>

## 米亚斯尼科夫

1931年初,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加夫里尔·米亚斯尼科夫<sup>②</sup>写了一本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书,他以《流行的欺骗》(*The Current Deception*)为题出版了这本书。其荷兰版本发表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De Nieuwe Tijd*)上。<sup>③</sup>

按照米亚斯尼科夫的观点,在苏联发生了一场暴力的反革命。在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最初掌握了政权之后,“世界资产阶级”通过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用三年时间实现了这一权力平衡中的一个根本转折:“工业丧失了活力,工人已经被原子化,因而工人委员会也被摧毁了。无产阶级不再是具有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统治阶级……”<sup>④</sup>

因为本土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正在消失,权力落入农民和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手中。这种形势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很久。

小资产阶级胜利了,但是这一胜利将不意味着进步,而是倒退。小资产阶级只能依靠官僚机构来管理工业,并且由于这一阶级典型的原子化结构,它不可能施行对官僚制的充分控制,并因此不可能防止后者从一个女仆变成一个压迫女仆的女主人。<sup>⑤</sup>

<sup>①</sup> 例如,Steuermann 1931, pp. 183-212; München-Helfen 1932。

<sup>②</sup> G. T. 米亚斯尼科夫(G. T. Miasnikov, 1889—1946?), 金属冶炼工人,1906年后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起,他采取了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他在一段时间是“工人反对派”的著名倡导者。1928年,他逃离苏联到法国,在那里逗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年,他回到苏联,据猜测被处死。见 Sinigaglia 1973 和 Avrich 1984。

<sup>③</sup> Miasnikoff 1932; 也见 Miasnikoff 1939。

<sup>④</sup> Miasnikoff 1932, p. 40。

<sup>⑤</sup> Miasnikoff 1932, p. 44。

在1920年代期间,该官僚制已将自己转变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官僚制的权力基于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并且它不断地追求扩张这一权力。

该官僚制,站立在国有化工业的最前沿,并且它逐渐破坏或吸取私人资本主义剥削的残余,具有将其统治扩张到全部工业领域的倾向。<sup>①</sup>

于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已然出现,它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和剥削。<sup>②</sup>苏联的国家经济整体表现出,它将是一个大工厂,其中不同工作岗位之间的等级化的合作和劳动分工是现在时。<sup>③</sup>

米亚斯尼科夫发出警告,反对把这一新资本主义形式与旧的私人资本主义置于同一层面。土地、矿山和工业的国有化,以及它对国家预算的全面控制,意味着这一官僚体制能够比古典资产阶级更为有效地运作。它可以任意引导资本流动,并安排进行投资的财政方式,这种方式除了不阻碍土地所有者和其他企业执行它的计划,并不利于“普通的”雇主。这样,苏联社会就处在一个比竞争性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层次上。

这种官僚制始终不可能管理好商业,但是它总是比资产阶级好些。官僚制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运作并代表了一种比任何私有生产体制都更高的生产形式。<sup>④</sup>

在国际斗争中,社会主义者因此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

## 阿德勒

1932年,从1923年起就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书记的弗里德里

---

① Miasnikoff 1932, p. 84.

② Miasnikoff 1932, pp. 82-3.

③ Miasnikoff 1932, p. 111.

④ Miasnikoff 1932, p. 110.

希·阿德勒<sup>①</sup>，“作为一个同志，而不是作为国际书记”提出了他的苏联理论。<sup>②</sup>阿德勒拒绝考茨基持续不断的卡珊德拉预言<sup>③</sup>以及认错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出了一种比较历史观。

他赞同考茨基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工业和工人阶级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在革命后的俄罗斯并不存在，斯大林的“经验”应当被判定为一种尝试：通过整整一代工人的牺牲，实现发达资本主义早期已发生过的原始积累过程<sup>④</sup>，并以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奠定基础。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当代苏联，我们越来越吃惊地发现，在其工业化中，即使私人资本家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的原始积累的特有阶段再次展示出它们的外观。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是通过没有私人资本家合作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sup>⑤</sup>

既然该过程的历史承担者——自由资本家——是缺席的，那么国家权力必然取代他们的位置。该专政的社会功能因此是：“工人们本身的隶属地位，使原始积累在他们头上实现，而工人们反抗强加于他们的那些牺牲的每一种尝试，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sup>⑥</sup>

整体上，他相信，一方面由于有可能支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更发达的国家没发生革命，另一方面由于这场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俄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已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会发展起来。

---

① 阿德勒(Friedrich Adler, 1879—1960), 1911至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 1917年在图谋行刺Karl Graf Stürgkh总理后被判入狱。他于1918年获得自由, 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创始人。见Braunthal 1965 and Ardelit 1984。

② Adler 1932, p. 4. 一个短暂时期之后, 阿德勒基于同一立场对考茨基进行了雄辩的批判, 并称他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压倒性的多数说话, 见Adler 1933。

③ 卡珊德拉(Cassandra), 希腊神仙, 凶事预言家, 据认为是不为人相信的预言家。——译者注

④ 关于“所谓的原始积累”, 见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第1卷第24章。

⑤ Adler 1932, p. 9.

⑥ Adler 1932, p. 10.

由于这一结论,计划经济现象也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理解:

计划经济的转变,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架中是唯一可能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并不以社会主义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竞争的否定性标准为其前提,并完全可能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sup>①</sup>

这种解释在(左派)社会民主党范围内拥有广泛的支持,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威林(Rafail Abramovich Rejn)的回应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孟什维克移民领袖之一,他注意到,阿德勒的分析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解释本质上是相同的。<sup>②</sup>

### 魏格纳

1933年,赫尔穆特·魏格纳(Helmut Wagner, 1904—1989),一位左派社会民主党记者和教师(于1934年底从德累斯顿逃往瑞士)<sup>③</sup>,写下了一本名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论文》的书。这些论文部分是1932年以来“红色战斗机”(Rote Kämpfe)——一个受议会共产主义影响的非法小团体——举行的讨论的结果。<sup>④</sup>

① Adler 1932, pp. 11 - 2.

② Abramowitsch 1932, p. 145. 关于孟什维克观点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在 Wolin 1974; Anon 1981a, pp. 131 - 204 和 Liebich 1981 中找到。

③ 1941年,魏格纳移民美国,几年后他与马克思主义决裂。Röder and Strauss 1980, pp. 787 - 8; Müller 1977, pp. 66, 155 note 480; Buick 2004.

④ Ihlau 1969. 伊洛(Ihlau)认为,这些“论文”作为蜡纸印刷版单独在非法的德国组织中散发,而且它们“从不在任何地方出版”(p. 95)。然而这是不正确的。1934年,这些“论文”在《通信速率》(Rätekorrespondenz, 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德国期刊)和芝加哥的《国际理事会通信》(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的美国版中发表(见 Wagner 1934)。两个版本包括 67 篇论文。在德国版本中最后的论文共计 68 篇,遗漏了论文 60。在美国版本中,这个数字是从 1 至 67,这样论文 60 相当于德文版中的论文 61。美国版本在编辑前言中说明,这些论文是由“荷兰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集体写作的。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论文“多次被暂时归于荷兰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 of Holland)”(见 Jaap Kloosterman, “注释”,载 Pannekoek 1972, p. 198)。这里引用的这些“论文”依据于美国版。

鉴于高尔特、潘涅库克和其他人早期已强调过，东欧和西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魏格纳向前迈进了一步，把俄罗斯看作是欧洲和亚洲之间一个地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纽带。欧洲和北美一起，形成了“主动的帝国主义发展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东亚构成了“被动的帝国主义掠夺物的殖民地中心”。这两个中心具体体现了国际阶级斗争的轴心，并共同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sup>①</sup> 在俄国经济中，一个包括封建因素并持续到1917年的亚细亚农业和现代的欧洲工业结合在一起。<sup>②</sup>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殊结合为俄国革命创造出了错综复杂的任务。<sup>③</sup>

事实上，俄国革命肩负着没有资产阶级支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必须完成资产阶级的任务，因为这首先是一项推翻专制主义，清算贵族阶级的特权并形成现代国家机器的挑战。<sup>④</sup> 所有这一切必须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产生，因为这个阶级使自己依附于沙皇制度，并因此甚至在它自己的革命完成之前已经变成了反革命分子。<sup>⑤</sup>

一个“阶级三角”接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sup>⑥</sup>：庞大的农民群众组成了“被动的基础”，数量较少但富有战斗性的工人组成了“斗争的手段”，而少数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革命的主要头脑”。<sup>⑦</sup> 布尔什维主义成功地组织了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并夺取了权力。但是，1917年建立的新政权因此从一开始就处于不稳定的地位：它必须确保作为它基础的两个阶级彼此不发生公开冲突，尽管他们的部分利益相矛盾。<sup>⑧</sup> 面向两个阶级，国家机器的自主化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沙俄政府的国家机器在两个占有阶级之上独立地统治，因

---

① 论文5。

② 论文6。

③ 论文10。

④ 论文9。

⑤ 论文13。

⑥ 论文18。

⑦ 论文17。

⑧ 论文30、31、35、36、37。

此,新的布尔什维克国家机器开始使自己独立于它的两个阶级基础。俄罗斯走出了沙俄帝制的绝对主义环境,步入布尔什维克的绝对主义环境。<sup>①</sup>

这一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由这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在两个阶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种资本主义。苏联的国家政策因此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之间摆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强制性的集体化只是靠暴力牵制这些矛盾,但到此时为止,这些矛盾仅仅是“使经济困难增长到经济矛盾爆发的危险基点”<sup>②</sup>。

苏维埃经济的功能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其基础由商品生产组成,其总体目标是利润率,运用资产阶级的激励和奖赏制度,工人创造剩余价值。<sup>③</sup>

的确,俄罗斯国家并未显示出任何人民阶级成为单独的和直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受益者,而是国家通过整体的官僚寄生机器,把这一剩余价值据为己有。除了其自身相当昂贵的维护费用,剩余价值还提供用作扩大生产,支持农民阶级,和用作解决国家外债的手段。……俄罗斯的国家经济……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独特历史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因此与甚至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所不得不展现的生产类型不相同,代表了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类型。<sup>④</sup>

1936至1937年,魏格纳在流亡瑞士期间,将他的论文详尽阐发为一个大篇幅的但未发表的手稿,题为《布尔什维克权力政治的基础:论布尔什维主义社会学》(*Foundations of Bolshevik Power Politics: On the Sociology of Bolshevism*)<sup>⑤</sup>。他用鲁道夫·施普伦格(Rudolf Sprenger)

① 论文 44。

② 论文 57。

③ 论文 58、59。

④ 论文 59。

⑤ 这个题目是在 Ihlau 1969, p. 101, note 232 中被提及的。注明日期 1936—1937,是依据了一本用笔名发表的西班牙文小册子。(见 Sprenger 1947, p. 3)

的笔名发表了他的发现的一些部分。<sup>①</sup>一般来说,这些出版物是与其“论文”前后一致的。

## 沃洛尔

“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苏联身上,实质上并未得到米亚斯尼科夫、阿德勒和魏格纳的赞同。他们只不过声称,苏联体现了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剥削等,但是并未对证实这一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观点。毫不奇怪,这个弱点迅速地被卫道士们抓住了。<sup>②</sup>及至1930年代末期,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理论意义上渐渐变得更为深奥和微妙。1939年,美国的《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无产阶级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sup>③</sup>的分析文章。其作者瑞安·沃洛尔(Ryan Worrall, 1903—1995),一个澳大利亚的托洛茨基分子<sup>④</sup>,竭力为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为了强调其理论正统性,沃洛尔提到三个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

1. “被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们如此忽视”,在《资本论》第3卷的两个地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被定义为:生产资料集中由少数所有者掌握,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化,世界市场的创造,<sup>⑤</sup>商品和剩余价值生产。<sup>⑥</sup>特别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第二个东西是,“剩余价值生产是直接的目的和生产的决定性动机。”<sup>⑦</sup>

---

① Sprenger 1933-4, pp. 314-20; Sprenger 1940.

② “因为人们既无法否认苏联不存在私人资本主义,但是人们也无法肯定那里的社会主义统治,可以说残留下来的唯一东西是国家资本主义。”(Linde 1932, p. 3)

③ Worrall 1939.

④ 见 Worrall Tribute 1996.

⑤ 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的下述段落(p. 375):“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关键事实:(1)生产资料集中由少数人掌握……(2)劳动本身作为社会劳动的组织化……(3)世界市场的建立”。

⑥ 参考下述段落:“两个典型的特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来自其起点。首先,它产生出作为商品的产品。……”

⑦ *Capital*, vol. III, pp. 1019-20.

2. 马克思在他关于股份资本的分析中已经表明,也见《资本论》第3卷,在股份公司中,企业的经理们成为其他人的资本的“指导者”,而那些提供资本的人只保留了所有权的名头。这样,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界限内被“废除”了。<sup>①</sup>

3.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中,不仅预见了股份资本的成长,而且预见了把私人企业主太大的投资(例如,在铁路部门)委托给国家去组织的趋势。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这两种发展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资本关系并未被它消灭,反而只是得到了强化。<sup>②</sup>

从1中,沃洛尔总结出,私人所有权(尤其是生产资料的)不必是资本主义“在其每一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从2特别是从3中,他推论出,“朝着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权方向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可能导致“私有财产的事实上的废除”,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仍然同样不变。以他对经典著作的诉求,沃洛尔看来尤其想要证明,国家和资本融合为一个统治总体的社会,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内部是一种理论可能性。列宁也引用这一论述为证。

沃洛尔下一步是打算为这个观点——即这种理论可能性在苏联已经成为现实——举一个可信的例子:经济和政治权力核心的一种历史性的独特融合已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真正发生了。在这点上,沃洛尔定理可总结如下:

(1) 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毕竟,它的结构并

① 参考下述段落:“三、股份公司的形成。由此:……2. ……它是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界限内的废除。3. 实际运作中的资本家转化为纯粹的管理者,掌管他人的资本,并负责把其他资本所有者转化为纯粹的所有者,纯粹的货币资本家。”(*Capital*, vol. III, p. 567)

② 特别是参考下述段落:“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本质上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国家总资本的理想化身。它越进入对生产力的掌握,它越是在实际上成为国家资本家,它就剥削越多的公民。工人仍旧是工薪劳动者—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废除。列宁说它走向了尖锐化。”(*Engels 1878*, p. 266)



未表现出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有任何相似性。

(2) 然而这种官僚制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的功能是同样的。

客观地说,它的社会目标,是在俄罗斯进行资本积累——商品生产,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将这种剩余价值实现变成国家利润和将利润转化为更多的国家财产——特别是采取生产资料形式的更多的资本;更多的工厂,更多的机器,更多的矿山,等等。<sup>①</sup>

(3) 如果该官僚制从属于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如果苏维埃或其他的工人民主形式掌控了该官僚制的政策,苏联将会是一个工人国家。然而并非如此,而“事实恰恰是让一个‘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国家替代了一个工人的国家”<sup>②</sup>。

(4) 苏联制度并不输出资本,并不剥削任何殖民地。它因此不是帝国主义的,尽管它是资本主义的。

(5) 苏联制度比一般的资本主义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它已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其中私有财产原则已被废除,而生产资料只由一个安排不稳定的官僚制支配而不赋予无产阶级”<sup>③</sup>。

(6) 苏联资本主义可能是从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从大约 1923 年起,已经产生了“遍布整个十年”的暴力的反革命。由于客观因素(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世界市场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观因素(即在关键性的 1923 至 1929 年期间,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的反抗水平已经式微)的结合,这场反革命是可能的。<sup>④</sup>

尽管沃洛尔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唤起了柯尔施的观点(“静悄悄的反革命”),但他显然是使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第一人,他的贡献是创新性的,他的概念不仅是描述的标签,同时也是分析性的。对于

---

①② Worrall 1939, p. 12.

③ Worrall 1939, p. 13.

④ Worrall 1939, p. 18.

他,一个工人国家和一个积累的政权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谁掌握了政治权力。他认为,一个资本主义积累的政权,不可能同时也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即使是工人阶级自己做出对它自己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决定。

### 波洛克

1941年,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 1894—1970),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sup>①</sup>经济学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即原来的《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发表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这本刊物中,他不仅继续了他在1920年代已经开始的苏联研究<sup>②</sup>,而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计划经济的评论。1932年,波洛克已经坚信,资本主义将通过计划编制技术找到新的平衡。<sup>③</sup>并且,在他1941年的稿件中,波洛克把这一理念发展成一个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该理论最初是受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所启发,而波洛克对这一理论的整体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苏联的问题踌躇不决,因为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比,苏联社会的旧资本家群体和国家没有发生任何联合,并且其生产资料反而是对以前的有产者阶级的剥夺。波洛克因此审慎地表达了他对于“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否适合处在现阶段的苏联”的怀疑。<sup>④</sup>然而这一保留并没有阻碍他把苏联置于其思考之中,例如,他说,在苏联,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要比德国更发达。<sup>⑤</sup>

除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种种极权主义变体之外,波洛克还构想了各种民主变体的可能性——不过这些变体暂时仍然只是对于“我们的经验所

① Jay 1973; Dubiel 1975; Wiggershaus 1994.

② Pollock 1929.

③ Pollock 1932.

④ Pollock 1941, p. 221, 注释。

⑤ Pollock 1941, p. 211, 注释。

给予我们的极少数线索”的假设性解释。<sup>①</sup> 他的观点中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术语不仅是指政体形式,而是指更一般的状况:它涉及一种不再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然而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其中利润动机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国家从私人资本家那里接管了基本功能。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自发的市场活动已被消灭。在它的地盘,国家调节已经产生:总计划指出了所想要的生产、消费、储蓄和投资;价格不再自由浮动,而是行政上确定;个人和群体的赢利兴趣服从于总计划;创意活动和即兴创作被基于科学的管理所取代;经济的“运行规律”再也不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sup>②</sup> 在企业中,私人资本家被剥夺了权力。管理工作变得与资本一样独立;企业的功能被让渡给国家,或无论如何完全由国家决定;旧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被国家施展使用,只是作为食利者留下来。<sup>③</sup> 物品和劳动力的分配,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完成:通过直接配置,企业联合的合作,互相关联的配额制度,等等。

既然在这一制度中不再存在任何经济“运行规律”,那么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制约:“当一切经济活动的协调受一个有意识的计划所影响之时,旧有意义上的经济问题不复存在……”<sup>④</sup> 这些独特的制约具有非经济的本质:例如,充分的原材料供应、生产经验、职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同社会立场的形成,不同的权力策略等;以及来自底层的压力。<sup>⑤</sup> 关于涉及的这些极权主义的变体,可能形成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区别,那里新统治阶级已显现为“要害位置的官僚在商业交易中的勾结,国家和政党与残留的既得利益结盟”,而苏联的官僚体制的精英并不依赖这些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残余。<sup>⑥</sup>

同时,波洛克详细阐释了这一模式,他的密友和同事麦克斯·霍克

---

① Pollock 1941, p. 200.

② Pollock 1941, pp. 204 - 7.

③ Pollock 1941, pp. 209 - 11.

④ Pollock 1941, p. 217.

⑤ Pollock 1941, pp. 217 - 9.

⑥ Pollock 1941, p. 221.

海默(Max Horkheimer)写了一篇关于权威主义国家的评论,许多年以后才发表。<sup>①</sup>很有可能,这一评论部分是受他与波洛克的一次观点交流的启发<sup>②</sup>,而这一交流可能有助于阐明波洛克理论的意义。霍克海默比波洛克更尖锐,他在表述为一种“混合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整体的中央集权制(integral étatism)或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之间划分了一道界限。当时,在法西斯主义下,私人企业仍然存在,即使它们的运行领域受到限制,并继续消耗大部分剩余价值;而在一个整体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integral étatism socialisation)中,社会化则是通过政令实现的。

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从此以后,红利只从政府合同中收取。官员和部门之间小规模斗争,只是作为该政权革命的过去的结果,而不像法西斯主义那样,由于官僚体制内部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关系的差异而复杂化。这些差异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中导致了許多摩擦。整体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权力的退却,而是权力的发展。它能够排除种族偏见而存在。然而,生产者——虽然资本在法律上属于他们,但“他们仍然是工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注定都一无所有。工厂的管辖被扩展到整个社会。<sup>③</sup>

按照霍克海默的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两个发展阶段:法西斯主义的“混合形式”和斯大林主义的“整体形式”。通过把这一区别追溯到波洛克的理论,波洛克对于把苏联和纳粹德国归于一种模式的迟疑就变得可以解释:该理论最初集中关注纳粹主义,而纳粹主义还没有表现出国家和资本全面融合的特征,同时该理论仍然试图开脱苏联的模仿行为,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某些模糊。

① Horkheimer 1942.

② 波洛克和霍克海默从1911年起就是朋友,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波洛克1970年去世。见 e. g. Gumnior 和 Ringguth 1983, p. 13.

③ Horkheimer 1942, p. 19; 英文版, p. 102。“仍然是工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的简要解释是参考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注53)。

## 第二节 托洛茨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一个全新的理论是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提出来的。<sup>①</sup>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发展的认识过程是格外复杂的。他的大量作品清楚地表明,尽管可以在他的思想中辨识出许多矛盾和摇摆,<sup>②</sup>但是他坚持了贯穿于整个时期、作为其思想核心的统一论证形式,这一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 (必然是暴力的)社会革命,只能被一场(必然是暴力的)反革命所废止。

2. 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它导致了一个工人国家。

由1和2中得出结论:

3. 只要没有发生暴力的反革命,苏联仍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工人国家的性质。

托洛茨基把所有官僚化和蜕化现象装进不断改变的理论框架,这些假定成为其理论框架的不变的核心理念。当官僚精英专政日益变成一种恐怖之时,为了维持这一解释,托洛茨基不得不将其政治范畴的内容削足适履地适应正在演变的政治环境。既然“工人国家”对于他来说从根本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称法,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意味着与“工人民主”完全一个样,托洛茨基最初无法想象一个并不(丝毫也不)掌握政权的工人国家。迟至1931年,他宣称:

---

① 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 1879—1940),托洛茨基的别名,俄国社会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作为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1913年起领导 *mezhraintsy*——一个试图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他于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领导协调发动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1918年至1925年,他是战争部人民委员。在1920年代,他在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于1921年被开除出党,并在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1938年,他创立了第四国际。1940年,他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标准传记是 Deutscher 1954d, 1959 and 1963。

② 对托洛茨基思想中大量变化和矛盾的分析在 McNeal 1977 中,特别是第31—33页。

在工人阶级中,十月革命是有生命力的和强大的;牢牢确立的是阶级思维的习惯;在老一代中不能忘怀的传统是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中,怀有对从前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仇恨。在他们的整体构成中的这些趋势,不仅是未来的储备,而且是今天的生动力量,它保护苏联成为一个工人国家。……**承认目前的苏联为一个工人国家**,不仅表明资产阶级只能依靠武装起义来征服权力,而且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尚未丧失使官僚制度服从于它、重新复兴这个党、更新这个专政政权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场运用改良方法和走改良道路的新的革命。**<sup>①</sup>

由于思想上的这种“改良的”观点,托洛茨基多年来拒绝脱离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去写作,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使自己与敢于在第三国际之外组织起来的各种具有相似目的的思想保持距离。<sup>②</sup>

在1933年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后——一件德国共产主义者感到相当无奈的大事——托洛茨基逐渐抛弃了他关于党和国家可能改良的想法。<sup>③</sup>但是,这样做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他曾认为,缺乏一场暴力的反革命证明了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该政权的改良现在不复可能,而因此一场新的革命提上了历史日程。为了清除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托洛茨基看来已采取了考茨基关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旧划分<sup>④</sup>;托洛茨基论证道,因为工人国家已经在俄罗斯建

① Trotsky 1931, pp. 11 - 2; 英文版,第224—225页(黑体字由MvdL标注)。

② 一种看法认为,托洛茨基批判了与他有共同看法的Rosmer和Monatte,他们想要组建他们自己的组织。(见Trotsky 1925)典型的是其随后在1929年的一个访谈中的论述:“我想要建立一个第四国际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社会民主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二者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不需要中间的(两个和两个半国际)或另外的(第四个)国际。”(Trotsky 1929, p. 108)

③ 托洛茨基通过类比推理方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变化:正如在法国革命中,“共和(Thermidor)”将会产生导致“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关于这一类似性,见Law 1982; Bergman 1987, 特别是 pp. 83 - 98; Caillosse 1989。

④ “从本质上说,在俄国,在第一个范例中,不是社会革命的问题,不是关于一个从属性的社会阶级征服政治权力、为新生产模式扫清道路的问题,而是关于一场政治革命,关于清除种种政治障碍——这些政治障碍阻碍了已经存在的生产模式的自由运作——的问题。”Kautsky 1904 - 5, p. 675.

立,未来只有**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它必须去清除制约计划经济的自由运行和进一步发展的种种障碍。

1936年,托洛茨基完成了《什么是苏联和它正在向何处去?》(*Chotaki SSSR i kuda on idet?*)的手稿,之后数年,这本书在几个国家以《被背叛的革命》为名出版,如法文版(*La révolution trahie*)、英文版(*The Revolution Betrayed*)和德文版(*Verratene Revolution*)等。<sup>①</sup>这一著作——并自那以后——保留了一个重要的(时而肯定时而否定的)参照点即托洛茨基坚持工人国家的概念;同时,他寻求把官僚化现象结合进他的理论。正像以前一样,他的出发点是:苏维埃政权及其种种矛盾不可能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而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性政权**”。<sup>②</sup>这在当时解释了为什么苏维埃国家具有一种双重性质:“就它保护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权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就它以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实行生活物品分配和随之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的。”<sup>③</sup>

因为社会主义特征支配了生产领域(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工业国家化、计划经济),因为那是为什么说一个工人国家仍然是有意义的唯一原因,所以,依据定义,官僚制的根基不可能定位于这一生产性的领域内。它们必须建立在分配领域,那里存在着短缺并因此盛行资产阶级的分配概念。

官僚制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在消费物品方面的贫乏,带来由此产生的每个人反对全体的斗争。当商店里有足够的物品时,购买者无论什么时候想来就可以来。当只有极少物品时,购买者被迫排队。当队排得很长的时候,派一个警察维持秩序就是必要的。这就是苏联官僚体制的起点。它“知道”谁将得到某些东西和谁必须等待。<sup>④</sup>

---

① 在俄国的最早手稿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中。

② Trotsky 1937b, p. 52.

③ Trotsky 1937b, p. 58.

④ Trotsky 1937b, p. 110.

在这一意义上,在一个革命后的国家中,生产力越不发达,那里官僚制的社会势力自然就会越大。官僚因此将会独占特权就是顺理成章的。

没有一个掌有财富去分配的人总是忽略他自己。因此,在社会需要内部已产生出一个过度滋长其社会需要功能的机构,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随之成为对整个有机体有极大危险的根源。<sup>①</sup>

在任何其他历史情境中的确都不存在的这种官僚制[托洛茨基有时将它说成“社会等级制度”,而另一些时候说成“(社会的)阶层”],取得了相对于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这样一种程度的独立性。即使列宁活得更长,也只能控制这种蜕化,而不可能做得更多。简言之,“官僚制沉重的臀部比革命的头部有更重要的价值。”<sup>②</sup>

托洛茨基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他自己的观点中有某些矫情的东西。计划经济和工人民主必须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他一直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另一个,这一个就不可能维持,因为只有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值得信赖的信息和来自相关所有人的最佳努力才会得到保证。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其理论中建立了一种世俗的观点。正如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描述的,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不可能长期持续。在1938年,他评论道:

民主……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在生活中实现它做准备的一个和唯一一个可能的机制。……在斯大林的审判词中被指称的“阴谋破坏”,是现实中专横的官僚手段的恶果之一。明显的失衡、浪费和困境的表现形式,预示着破坏计划经济真正基础的危险不断上升。<sup>③</sup>

不久前写到这一点时,他已警告过:

<sup>①</sup> Trotsky 1937b, p. 111.

<sup>②</sup> Trotsky 1937b, p. 94.

<sup>③</sup> Trotsky, 1938d, p. 19, 引证根据英文版,第127页。



这个“官僚制变体”目前正在准备鲸吞工人的国家,不留下任何残余……如果无产阶级及时驱逐苏联的官僚体制,那么它将在其胜利后找到生产的国有化方式和计划经济的基本因素。<sup>①</sup>

对托洛茨基而言,官僚制的蜕化根本就是个短期现象。正如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正确地指出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斯大林主义是一个偶然的意外,不是历史的持久创造”。<sup>②</sup>因而托洛茨基比喻该官僚制是“胎死腹中的孩子”或“癌瘤的生长”,可以并应当用外科手术处理掉;他还把苏联比做一辆小汽车,虽然它已经撞坏了,但是经过机械工修理之后,还会再次开动。<sup>③</sup>

在对托洛茨基的评论中,他对历史时代的这种理解几乎总是被忽略。如弗里茨·斯泰因伯格(Fritz Sternberg)所提出的,这种当时的局限性是否能够主要解释为托洛茨基个人心理的产物,是值得怀疑的。<sup>④</sup>一种更可靠的解释是,这是托洛茨基确信计划经济与官僚制专政根本不相容的一个直接结果。

在这一背景中,指出托洛茨基对国际形势的全面估价也是重要的。在托洛茨基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其最后阶段。当他在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并委之以“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这一传承重任时,这个政治文献被冠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经济低迷,对于托洛茨基意味着生产力不可能再增长。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停滞,已经表现出越来越野蛮的和原始的特征:

① Trotsky 1938a, p. 18, 引证根据英文版,第 67、69 页。

② Frank 1977c, p. 21.

③ Trotsky 1939.

④ “托洛茨基不再对俄国最近的大事做客观分析,但已变成试图去回答该问题(我,托洛茨基,会像我在1905年和1917年所做的那样回到俄国吗?我会成为一场新的反斯大林主义革命的领袖吗?)的个人因素中的成分。这种个人因素就是他所谈说的所有事情的背景,尽管他当然从未用过过多的话来表述过它。”(Sternberg 1963, p. 156)

人类生产力停滞。新的发明和进步已经不能提升物质财富的水平。……资产阶级自身看不到任何出路。……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弗吉尼亚帽子(Phrygian cap)标记下就像在德国的纳粹党十字记号的标记下一样继续腐朽下去。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才可能打开一条出路。<sup>①</sup>

尽管是斯大林主义专政,但苏联展现出的迅速的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总体的社会腐朽画面的清晰的、积极的对照。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和一个腐朽中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同样是在与资本主义各国武装冲突事件中实现他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诉求的根本基础。

在托洛茨基看来,1930年代末期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不稳定,所以由于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迫近,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官僚制二者的存在,都会受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挑战。在短期内,只有工人的权力可能拥有未来。因而,1938年他以下述方式表达了他的预言:

如果这场战争被挑起,正如我们坚定地相信的那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它肯定不可避免地导向推翻苏联的官僚制,并在一个比1918年更高得多的经济和文化的的基础上重建苏维埃民主。……然而,如果被迫承认目前的战争将不会引发革命,而是引起无产阶级的衰落,那么仍然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腐朽,它与国家的进一步融合,以及无论何处它都会被依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维持的那种民主替代。

如果是那样的话,苏联官僚可以将它自己转变成为一个新剥削阶级,它将反映“文明的衰退”。<sup>②</sup> 这样,托洛茨基将旧格言“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解释为两个短期选择。中间道路是他无法正视的一种前景,沿着这一道路,无产阶级将不去实现世界革命,苏联的结构和资本主义的

<sup>①</sup> Trotsky 1938c, pp. 1-2; 英文版,第111、113页。

<sup>②</sup> Trotsky 1939, p. 4; 英文版,第8—9页。

结构都将完整地保持它们的本质。

###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关于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社会类型的理论,对此的首次尝试通常归功于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他在1939年发表了对这种类型的一个解释。<sup>①</sup>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出,在斯大林的“大跃进”开始后的第一年,类似的思想已经由他们之中的罗拉(Laurat)和韦尔(Weil)提出来了。<sup>②</sup>

#### 罗拉

吕西安·罗拉(Lucian Laurat, 1898—1973),原名奥托·马什尔(Otto Maschl),生于维也纳。1918年,他是德国—奥地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莫斯科作为大学讲师进行了一段教学后,他在1927年左右离开共产主义运动并定居法国。他在那里很快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从1930年代初开始成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的“计划主义(planism)”的倡导者。<sup>③</sup>

在1931年题为《苏联经济》(*The Soviet Economy*)的书中,罗拉提出了一个常为大家忽视和错误解释的苏联社会分析。<sup>④</sup>事实上,他第一个

---

① 一个新近的例子充分说明:“……里齐可能求诉的主要思想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共产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形式(用他的术语‘官僚的集体主义’),这个社会形式的存在是由它本身受‘新阶级’统治的事实所决定”(Westoby 1985, p. 2)。对这种统治的一个反对意见是1977年的葡萄牙文的文选《苏联的性质》(*A Natureza da USSR*),西蒙·韦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② 新阶级社会理论最大的可能是在1930年代上半叶更广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中已经产生了。因此,杜曼涅夫斯卡娅(Domanevskaja)在1935年写道:“某些苏维埃制度的批评者”声称“取代资本家阶级,一个新统治阶级已经出现了”。他们说:“这个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和国家官僚制,它只按照自己的利益掌管生产资料,剥削工人阶级。”(Domanevskaja, 1934—1935, p. 272)

③ Hautmann 1971, pp. 80, 105, 125, 256; Lefranc 1966, pp. 72—3. 部分自传参见 Laurat 1965。也见 Harmel 1973, *Est & Ouest* 杂志关于罗拉的主题专刊。

④ 完全无法解释的是,Gras说:“罗拉自己为苏联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和国家资本主义那两种理论辩护。”Gras 1971, p. 385 注释。

为苏联社会已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观点创造了一种详尽的理论基础。<sup>①</sup>依照罗拉的观点,十月革命绝对已然是社会主义的。对于俄罗斯 1917 年并没有“成熟到”社会主义(如考茨基、高尔特和鲁尔已论证过)的说法,他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是否高度发达,原则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称为“成熟”。毕竟,社会主义要求合理使用该星球所提供的全部资源。因而罗拉相信,对该问题的更正确的观点是:倘若它的革命已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罗斯就已经为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sup>②</sup>

在 1920 年代,未受过民主规范检验的官僚精英曾试图加强他们自身,除了因为缺少一场西欧革命以外,还归因于缺少无产阶级的干部。宪法确立的解除官员职务的权力因此仍然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规定。该官僚制的癌症可能恰恰是因为官员不可能被替换而安居于所有国家机构中。

(该官僚制)越来越丧失了它与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它把自己树立为被剥夺的资产阶级资产的不可改变的监护人,和还没有足够能力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指导教师。由于一个例外的历史情境赋予了它幸运的全能地位,并通过把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理论转换成党凌驾于阶级之上,它铆足了劲把自己树立为永恒的监护人。<sup>③</sup>

这样产生的社会制度有着许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东西。初看上去,人们甚至可能有理由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毕竟,它拥有全部工业和银行,并购买工人和被雇用者的劳动力。然而罗拉并不相信这涵盖了该制度的本质。讨论预先设定,阶级对抗的

① 在一个贬低罗拉创造力的尝试中,托洛茨基提出,罗拉犯了剽窃错误:“很可能,罗拉直接或间接地从米亚斯尼科夫那里借来了他的理论,只是使之带有一种迂腐地‘习得的’样子。”(Trotsky 1933, 英文版,第 112 页)托洛茨基的指责因为两个理由看来是错置的:(1)米亚斯尼科夫的文献未达到罗拉的理论深度(只涉及一个小文本),(2)米亚斯尼科夫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辩护。

② Lurat 1931, pp. 15 - 23.

③ Lurat 1931, p. 162.

资本主义,是在一个阶级拥有生产方式而其他阶级只拥有劳动力的意义上。但是苏联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它的非私有化部分(国有部门和劳动者集体所有部门)不是。

苏联工人和雇员在**他们自己的**企业工作……在那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被占有为利润的款项,不能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它们并没有回归到一个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而是归于集体……<sup>①</sup>

官僚寡头政治团体因此实际上并不拥有作为自己财产的生产资料:“它作为资本主义遗产的监护人和工人的指导教师分配产品。它出卖它的劳动力,正像它的奴才们一样。”<sup>②</sup>

尽管拒绝这种资本主义理论,罗拉仍感到运用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所发明的术语有助于他对苏联经济的深入分析。因此,他声称苏联官僚制确实独占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名下的资产阶级并不做同样的事。同样,他认为价值规律仍然“在社会主义部分内部”发挥作用,<sup>③</sup>即使他先前已得出过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在资本全面垄断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当竞争已经被消灭时,价值规律是“几乎不可能发挥作用的”。<sup>④</sup>

罗拉还利用从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中汲取的概念,抨击官僚寡头(他把它候补为一个社会等级或一个阶级)的社会立场问题。这里的出发点是生产劳动也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流通的代表被排除于生产劳动范畴之外,从事非生产劳动。<sup>⑤</sup>但是罗拉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仍然有对社会机能有用的共同特点。官僚制精英的劳动与此相反,因为它通常完全没用:

三个人做一件工作,当一个人就能不费力地做这个工作时,另

---

① Laurat 1931, p. 81.

② Laurat 1931, pp. 168-9.

③ Laurat 1931, p. 167.

④ Laurat 1931, p. 78.

⑤ 一个在流通中挣工资的代理人“工作得像其他人一样努力,但是他的劳动内容不创造价值和产品。他本身是生产的部分杂费(间接运营成本)”(Marx 1978, p. 209)。

外两人就不再是有用的。在这一条件下,另外两个工人的工作不仅是非生产性的,而且是无用的,不仅是“昂贵的虽然是必要的花费”,而且是时间的浪费。……官僚们,在合乎比例的数量中,无论如何他们也许是有用的,但当他们的数量不成比例地大的时候,就成为寄生虫。……流通的运营间接成本,因此在俄国比在西方国家增长更剧烈。<sup>①</sup>

官僚们的大部分工作的无用性质,被认为导致了工人工资和官僚薪酬在性质上的差别。官僚在本质上是寄生性的。

(官僚们)是有强制力的,为了维护他们的收入……蚕食国家收入的其他领域;他们截留了工人的部分个人收入;他们占有越来越多的、应当构成工业积累基金的那部分利润……<sup>②</sup>

因为缺少竞争和来自下层的民主控制——也就是缺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的矫正——这一寄生状态可能会毫无节制地产生溃烂。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对于罗拉而言,苏联是一种“异化形态”(不完全是在考茨基的意义上,但略微与之相关),其中,工人理论上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企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一个统治性的寄生的官僚阶级所掌握。在这一背景下,罗拉完全否认柯尔施关于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观点,就并不令人惊讶了。毕竟,没有任何东西复辟,而一些全新的东西已经开始存在。

那种将俄国革命与早先的革命区别开来并且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革命的东西,是在夺取权力之后,在革命本身的进程中,出现了新的统治性的特权阶级和形成了这一特权阶级的经济地位。<sup>③</sup>

① Laurat 1931, pp. 171-2.

② Laurat 1931, p. 175.

③ Laurat 1931, p. 155.

在他的这本书的续篇中,罗拉再次明确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另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是否准备好自己去替代资本主义的剥削?”<sup>①</sup>毕竟,将一个社会描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条件,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是有目的的和中央指导的,而且在于是没有剥削的和民主地产生决策的。两个条件都不适合苏联。官僚制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一个剩余价值的攫取者”<sup>②</sup>。

在后来的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破产吗?》(*Is Marxism Going Bankrupt?*)的书中,罗拉含蓄地谈及马克思对路德派的描述——把现代的计划技术与一部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可以用不同方式运作的机器相比。这些“中介政权”(他以此不仅包括了苏联,而且同时包括了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种政治上性质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这部机器。然而,这将阻挡不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学习日益显而易见的“新事实”,从而把它们运用于自己的目的。虽然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本质不同——“在德国和在意大利,统治阶级是布鲁托——技术官僚(*pluto-technocratic*,布鲁托是罗马神话中的阴间之神——译者注);在俄国,它是官方——技术官僚(*bureau-technocratic*)”<sup>③</sup>——但它们仍然有共同之处,即在经济机构的领导权和财产权二者之间,不再有任何中介联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体体现了“资本家阶级的腐败”。<sup>④</sup>同时,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并在更大的规模上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做准备。通过集中化、积累和计划技术,它们明确地创造了如下可能性:工人将依靠一场“新的颠覆”夺取权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计划社会。

韦尔

作家和哲学家西蒙·韦尔(Simone Weil, 1909—1943),1930年代

① Laurat 1931, p. 4.

② Laurat 1931, p. 8. 这段显然与《苏联经济》(*L'économie Soviétique*)中的主题——即官僚阶级像工人阶级一样出卖其劳动力——相冲突。当人们看到罗拉将他的最初观点与官僚制通过其部分寄生的特征占有“剩余价值”的观点相结合时,这种不一致性就消失了。

③④ Laurat 1939, p. 210.

初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曾因1934—1935年间在雷诺汽车工厂工作期间的事件而著名<sup>①</sup>，在她1933年的文章《我们正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吗？》中，显然紧紧地追随着罗拉的早期工作。她把罗拉对“由官僚体制操纵的剥削机制”<sup>②</sup>的分析，与当时日益流行的关于经理和技术官僚权力增长的观点结合起来，<sup>③</sup>结果提供了一个“熟读同志们思想的朴素理论”<sup>④</sup>。

韦尔分析的出发点是日益增长的劳动和专业化的分化，这一分化在资本主义的许多场域中宣示自身；这一趋势的后果是个人失去了在总体上理解社会的能力。他们已被禁锢在一个社会领域中，不再可能探究逻辑和历史。作为一种平行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专业领域：对大量碎片化活动进行协调。这一分化的后果是“行政功能”和官僚机器异常迅速的增长。

这正是一个也可以企业中见证的过程，脑力和体力劳动加速分离。在劳动力的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资本主义的旧矛盾之后，第二个矛盾因此产生出来，它取代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导致了社会的三重分化。

今天，围绕着企业，存在三个非常清晰的社会阶层：工人——企业被动的工具，在经济体系走向腐朽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和那些相反得到了技术支持的行政管理者，技术的发展只会增强后者的权力。<sup>⑤</sup>

她认为，如果资本家被逐出这一体制，工人掌权的体制不会自动取而代之。更大的可能是这样一种“剥夺剥夺者”（这毕竟不影响执行和协调两种功能之间的新矛盾），它会把这些行政力量转化为一个独裁官僚制的特权阶级。而一个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社会阶层，将不会自动地放

① Davy 1956; Cabaud 1960, pp. 11 - 42; Rees 1966; Krogmann 1970; Accornero et al. 1985.

② Weil 1933, p. 314.

③ 那个时代的一个著名的标记是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1932年出版的一本书，突出了经理们正在上升的权力。

④ Weil 1933, p. 314.

⑤ Weil 1933, p. 315.



弃这一垄断。

以行使行政功能来定义的社会阶层,将永远不会接受拥有合法财产的政权开放,让工人大众有权使用这些功能……无论哪种类型的所有权剥夺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工人的英雄主义由此遭遇背离。<sup>①</sup>

官僚制统治一旦建立,让所有生活领域服从其权力的内在趋势开始展示其自身。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仍然保留了某些自由的地方,这种官僚政权则具有渗透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那种不可遏制的趋势——不同意见被改造成一种精心培育的盲从,而个人价值让位于国家宗教。

韦尔同样相信,这一走向的趋势在苏联之外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种“三重官僚制”在每个地方都茁壮成长:工会、企业和国家。“罗斯福新政”已经引人注目地强化了对经济进程的官僚干预;而在德国,企业和国家官僚制的绝对融合似乎正在发生。韦尔因此预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未来,尤其是因为所有的群众政治运动——不管他们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统统沿着同一方向运行。但是,无论所有的一切可能看起来如何令人气馁,默认这种不可避免都是错误的:“如果,最可能的可能性是我们必将毁灭,那么让我们坚信,我们不这样活着,就不会毁灭。”<sup>②</sup>

里齐

1939年,意大利人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 1901—1985),一个正徘徊在波迪加主义(Bordigism)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边缘地带<sup>③</sup>的鞋商和中途辍学的学生,秘密出版了《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sm of the World*)一书。这是一本后来长期影响了关于苏联的辩论,特别是

<sup>①</sup> Weil 1933, pp. 315-6.

<sup>②</sup> Weil 1933, p. 318.

<sup>③</sup> Westoby 1985.

通过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的书。这本著作在一个时期像谜一样鼓舞着各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流派。不仅作者自己藏在谜之中——他只将自己署名为“Bruno R.”，而且，该书的复制本在出版后很短的时间，就被法国警察局以文本中有敏感段落为由查抄了。<sup>①</sup>《世界的官僚化》起初出名，只是因为托洛茨基正好在被暗杀之前的一次争论中抨击了这本书。<sup>②</sup>尽管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在1947年揭示了里齐的身份，<sup>③</sup>但只是到1950年代末期，这本书才在更广的范围内出名。<sup>④</sup>我们现在知道，先于他这本书的出版，里齐已经进行了几年对苏联本质的反思。1937年，他已经写了《苏联向何处去?》(*Where Is the USSR Going?*)，这是一本他后来认为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没有得出对这些问题的好答案的书。<sup>⑤</sup>

在里齐的书中，西蒙·韦尔的主题回归了：里齐也觉察到官僚制的权力到处在齐步前进；同样，他把苏联描绘为官僚已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齐的观点缺乏韦尔提出的官僚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里齐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他只是觉察到有这一走向的“趋势”的地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辨识出一个稳定的官僚阶级。

正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里齐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已消逝的社会力量”，它在政治上已完全被迫处于防卫地位。但这

① Westoby 1985, pp. 16-7. 见 Rizzi 1939, 第三部分, 第四章:“犹太人问题”,在那里人们可以读到:“希特勒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我们应当校正我们自己并成为反犹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反资本主义者。”(p. 296)也见 Adler 1985—1986, 他提供了里齐的敏感段落的英文版(pp. 109-13)。

② Trotsky 1973, pp. 1, 4, 10, 11, 52.

③ Naville 1947.

④ 也参见本书第五章。

⑤ Rizzi 1937. 有关这本他最著名的书的前史,里齐写道:“我们始终远离了我们的同志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是在1938年11月《国际季刊》(*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的第9期中才被认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并且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吗?》。一个月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份标注着1938年6月的《国际季刊》特刊,内有纳维尔、托洛茨基和克雷波的稿件。我们因为写了这本书,在那里成为羡慕的对象,因为与这些同志们的思想相比,这些被赞扬的思想我们早三年就已经提出出来了。”R[izzi]1939, p. 334.

并不意味着像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相信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更正确地是“官僚的集体主义”)提上了日程。为了分析这一新的社会构成,里齐在他的书中形成了三个部分的概念:苏联、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只有第一和第三部分最后纳入了《世界的官僚化》。中间部分从未发表过。<sup>①</sup>

关于苏联,里齐断言,官僚统治阶级在那里已将自己确立为十月革命遗赠的结果:“这种国家占有赋予了官僚对所有那些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占有,尽管这些财产已社会化,但是一点不少地全部属于这个新统治阶级。”<sup>②</sup>由于这一新的集体占有社会财富的方式,官僚的集体主义超越了阻碍资本主义功能的那种无法解决的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所以将这一矛盾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剥削仍然保留,却以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取代了人对人的剥削。”<sup>③</sup>

在从私人剥削到集体剥削的过渡中,里齐对一个从无阶级的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反向过渡作出了诊断。

财产,在属于所有人之后,(当下不存在的)古人首先集体转移到共同体,然后变成了私有财产。现在,看起来好像财产再次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形式,但却是作为阶级的财产。<sup>④</sup>

在官僚集体主义中,剥削——更确切地说,剩余价值的占有<sup>⑤</sup>——通过国家机器而产生,它同时也构成压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因此融为一体。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取决于资本家,而取决于买方——垄断的国家。工资由计划确定。同样的方式也被运用于物价。因此现在要求工

① Westoby 1985, p. 13.

② R[izzi]1939, pp. 25-6;英文版,第50页(修正译本)。

③ R[izzi]1939, p. 47;英文版,第63页。

④ R[izzi]1939, p. 46;英文版,第63页。

⑤ R[izzi]1939, pp. 48, 64;英文版,第64、75页。里齐使用“剩余价值”术语,与“剩余产品”形成比照,尽管他否认了苏联是资本主义的。大概这正是术语的粗疏性,对这个词不应附加任何重要意义。

人“自由”(在从生产资料中“获得自由”和摆脱个人依赖性的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苏联工人有了唯一的主人,他不能再出卖他的劳动力商品,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选择可能性的囚徒。”<sup>①</sup>里齐因此发现了一种与奴隶劳动非常精确的相似性。

剥削恰恰像在奴隶社会中那样发生。工人为已经买了他的那个主人工作,他变成一种资本利益,他是必须被照顾、被圈养的牲畜,而他的再生产与他的主人有极大的利害关系。<sup>②</sup>

只有一个与古代奴隶们的重要差别:俄国工人被允许服兵役——一项“旧式奴隶没有的特别待遇”。

里齐的苏联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缺乏一种因果联系,乃至那个方向上的一种适度尝试。似乎他最关心的是去设计许多静态的概念,它们可被用于与其他解释的辩论。他的苏联论述因此为批判托洛茨基及其“代理人”纳维尔保留了许多空间。<sup>③</sup>

关注美国新政的那部分也没有用分析方式提供什么东西。里齐关于新政意味着一个新统治阶级崛起的论题只是尚待证实的,而不是已经证实的。然而,这一论题符合他的总体理论,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被官僚集体主义所战胜,官僚集体主义同样构成了社会主义之前的最后历史阶段。

大宗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中央集权化,为了一个与个人投机不同的目的的经济计划 and 生产,体现了官僚集体主义主要的吸引焦点。……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个社会因其使命必须以一种制度安排

① R[izzi]1939, p. 71; 英文版,第 80 页。

② R[izzi]1939, pp. 72-3; 英文版,第 80 页。

③ 纳维尔或将这一“名头”归结于如下环境:在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他是托洛茨基立场的最卓越的捍卫者。1937—1938 年,纳维尔捍卫正统思想,反对埃文·克雷波(Yvan Craipeau),后者将苏联官僚制称为一个新统治阶级。见 Naville 1938 和 Craipeau 1938。里齐自己说明,他受到这一讨论的影响(见注 122)。

的方式,提高它的全球总产量。<sup>①</sup>

这种官僚制国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个历史上最后的统治阶级是如此接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所以它拒绝作为一个阶级和作为所有者的身份!”<sup>②</sup>

该官僚集体主义的统治者们比资产阶级更接近工人阶级。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因此必须抛开对希特勒痛恨和憎恶的全部情感。因为既然他们将工业生产合理化,这些领导人就履行了一项进步的任务。他们也不过是历史的工具,个体渴望解放的“伟大的囚徒,踏进了一个金色的牢笼”<sup>③</sup>。

我们相信,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在心底和作为人,不喜欢他们的政权,他们也不喜欢在他们的生活中被某种孤立的和戒备的臣民归结为人性分裂,不喜欢以他们的个人警卫和他们的崇拜者为中介被表现。他们已经接受了该事实,包括为了政治需要和摆脱社会需要这两个方面……<sup>④</sup>

## 伯纳姆

同年,布鲁诺·里齐写就了《世界的官僚化》,关于苏联的辩论在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迅速展开。1937年,内部冲突已经产生: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两大领袖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约瑟夫·卡特(Joseph Carter,即约瑟夫·弗里德曼)采取了略微有些持异见的姿态,他们声称,“在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一术语的传统意义上”,苏联不可能再被视为一个工人国家。<sup>⑤</sup> 他们中的哲学

---

① R[izzi]1939, p. 253.

② R[izzi]1939, p. 254.

③ R[izzi]1939, p. 345.

④ R[izzi]1939, p. 343.

⑤ Burnham and Carter 1937. 托洛茨基以其的《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也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吗?》(Trotsky 1938a)作了回应。里齐在 R[izzi]1939, pp. 33-5 中提到这一讨论;英译本,第 55—57 页,也见 Bubis 1988。

家伯纳姆<sup>①</sup>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论战第二轮的重大事件是红军入侵芬兰。正统托派想要支持苏联，因为他们赞成无条件地保卫这个“蜕化的工人国家”；他们的对立面却认为，入侵芬兰作为一种侵略行动，应当受到强烈的批判。<sup>②</sup> 伯纳姆运用一种理论原理支持后者的观点，指出苏联是一个新型的阶级社会。与他持共同思想的人，除了提到的约瑟夫·卡特之外，还包括迈克斯·沙特曼(Max Shachtman)，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欧文·豪(Irving Howe)和索尔·贝洛(Saul Bellow)。一场冲突激烈的辩论随后发生，已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几篇文章介入了争论。<sup>③</sup> 也正是托洛茨基指出了伯纳姆观点和“Bruno R.”思想的相似性。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分裂了，而围绕伯纳姆及其副手沙特曼的团体创建了工人党。<sup>④</sup> 不过，同年伯纳姆也退出了这个新组织，他在辞职信中声明：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系斗争，它的结局，和工人党的最近组成，以我自己的情况，是回顾我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的不可避免的机会。这一回顾已展现了，我无法靠术语的任何引申来把我自己或让别人把我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sup>⑤</sup>

随后一年，1941年，伯纳姆的名著《管理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出版了。虽然因为它的作者的缘故，这本书不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将在这里讨论它，因为它不仅仍受马克思主义非常强烈的影响，<sup>⑥</sup>而且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⑦</sup>

①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 1905—1987)，哲学家，1933年加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迅速升迁到领导位置。见 Nash 1976, pp. 87—91, Borgognone 2000, Kelly 2002。

② Macdonald 1958, pp. 17—8。

③ 托洛茨基的稿子被收入 Trotsky 1973。

④ 迈尔斯(Myers)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9—1940年的这一危机和分裂的大致说明，见 Myers 1977, pp. 143—171。

⑤ 该辞职信被发表在 Trotsky 1973, p. 207。

⑥ 见伯纳姆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他所运用的标准。

⑦ 甚至在1947年一个孟什维克作者谈道：“伯纳姆脱离他过去的社会主义信仰已经走了很远。然而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他坚持了马克思的方法……”Sapir 1947, p. 366。

在《管理的革命》中,伯纳姆把不同的兴趣集中在一起。一方面,这本书体现了他对其苏联分析的深入阐释和证明,他在前一年曾以托洛茨基运动成员的身份为苏联辩护。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是他曾发表的有关美国新政的早期分析的继续。自1935年以来,他全面观察了新政的发展、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官僚制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中的扩展,在托派的理论刊物《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上用“约翰·韦斯特(John West)”的笔名发表著述。<sup>①</sup>在其最初的设想中,《管理的革命》表现出与里齐的《世界的官僚化》的惊人相似。这种相似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沙特曼和纳维尔竟然指控伯纳姆剽窃。<sup>②</sup>不过这一指控无法证实,并且难免不中肯,因为正如韦尔的文稿所表述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已经“在流传”。<sup>③</sup>在《管理的革命》——一本据其作者说既不包括一个未来纲领也不包含一种道德伦理的书<sup>④</sup>——中伯纳姆肯定了一个对西蒙·韦尔来说曾经只是一个可怕前兆的确定事实:新官僚阶级的统治正在世界范围内无情地确立其自身: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一个有以下特征的时期,即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正经历一种不寻常的高速变化。这一转型,是从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类型,转向一种我们所称的管理社会类型。这一转型期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相比,可以预料是短暂的。这个日子或许屈指可数,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随着这个新社会的巩固,可以预测到那

① 阿什顿·迈尔斯(Ashton Meyers)介绍,“John West”是伯纳姆的笔名。见 Myers 1977, p. 104。伯纳姆撰写的关于罗斯福和新政的文章包括:West 1935a, 1935b, 1935c; West 1936; Burnham 1938b, 1939。

② 里齐本人也感到被伯纳姆掠美了,“当他自己1941年的畅销书发行的时候,他称后者运用了剽窃手段”。Rizzi 1972, p. 92。

③ Westoby 1985, pp. 24-6。伯纳姆自己注释道,他的理论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项开创性的和个人的创新”,“在持续20年期间,该理论的许多成分已经包括在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书中,对此我必须答谢全部的亏欠,而无法在此提到特别影响了我的每一个特定的个人。”Burnham 1941, p. 7。也见 Draper 1999, p. 30。

④ Burnham 1941a, p. 8。

以后大约 50 年结束,也许还要更快。<sup>①</sup>

这里比里齐的例子要更清楚的是:最初看上去与单线论(即资本主义之后存在两种可能性:社会主义或新阶级的统治)决裂的新阶级社会理论,是怎样受到法西斯主义以及与其相似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的影响,产生了建立一个新单线图式的趋势愈益明显,只是这一单线链条的连接环节有部分改变:其顺序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到一个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阶级社会。

通过讨论已失败的革命(德国和巴尔干半岛的革命)和一场与预言的后果全然不同的造反(俄国),伯纳姆说明,资本主义的衰落并不自动导致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观的这一失败,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高估工人阶级的作用相联系的。就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预言来说,不仅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的确没有发生,而且工人的结构性无权地位还由于他们的技能缺失而日益强化。一方面工人的学校教育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和生产的领导层已在企业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出现。这意味着即使企业所有者将会消失,工人也不再可能自己领导生产过程。

在技术上说唯一真正有能力消灭资本主义的人是经理们——生产过程的领导者。这些未来统治者的身份,是由伯纳姆精确描述的。他并不是指高技能工人和化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等,而是专指严格意义上的经理们。

我们常常会把他们看作“生产管理”、运作经营者、主管、行政工程师、监督技术员,或看作政府中的……行政官员、部门专员、办公室领导,等等。<sup>②</sup>

管理层的统治在苏联是最发达的,但在其他地方同样迅速上升(德

---

① Burnham 1941a, p. 71.

② Burnham 1941a, p. 80.



国、意大利等)。在他们的社会类型结构中,该国的管理阶级面临三个问题,即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贯穿全世界),群众的服从地位,以及他们自己之间在通过民族国家走向世界统治的道路上的斗争。解决这些问题的顺序,国与国不同。俄国图式表现如下:

(1) 资本家阶级在国内迅速弱化到无力状态……(2) 群众铺路石持续多年处在走下坡路和一盘散沙的状态;(3) 今后(虽然已经未雨绸缪)与正在崛起的管理世界领域的其他部分的直接竞争。<sup>①</sup>

德国运作了一种不同的图式。在那里,群众的服从地位产生在资本家权力消失之前。美国发生的转型图式与德国类型而不是俄国类型相似,尽管北美的这一进程据认为产生得更为缓和,而那里的资本主义依然也更为强大。

什么是一个现实化的管理社会的外部特征?在诸如这类社会中(伯纳姆尤其想到了这一背景中的苏联),管理精英已经成为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可由两个根本特征辨认,即“第一,……阻止他人有权使用那些掌控(拥有)对象的能力;第二,在掌控(拥有)对象的产品分配中的优惠待遇。”<sup>②</sup>第二个特征来自于第一个特征。因为只有如果一个人拥有了生产资料,他才能占有它的成果。在这一意义上,伯纳姆很清楚,苏联的管理者们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

俄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的革命。……今天的俄罗斯,就其结构方面而言,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沿着管理的道路前进的国家。<sup>③</sup>

在管理的经济中,货币不具备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它不再发挥个人资本的功能,而在交换过程中起不太重要的作用。在国有部门控

---

① Burnham 1941a, p. 210.

② Burnham 1941a, p. 59.

③ Burnham 1941a, pp. 220 - 1.

制的各个领域(健康医疗等),货币的作用降低了。在理论上,为货币作用的这种降低划定一个限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实践上,就收入差别能够由它制定而言,货币仍将保留。

例如,伯纳姆在极力重温里齐观点的一段话中总结道,工人将不再是有双重自由的工人。拥有生产资料的自由显然还保留了,但是出卖或拒绝出卖劳动(伯纳姆不使用劳动力的表述)给一个单独的资本家的自由是缺乏的。

管理的社会以一种计划方式运行,并且是在高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一如苏联和德国所证明的,它能够解决大量社会经济问题(群众失业、生产衰退)。群众获得了略高一点的生活标准,尽管这并没有保障。与此同时,管理的社会仍将经历严重的紧张状态,因为它仍然是一个对抗性社会。

伯纳姆在他的书中做了几个关于未来发展过程的预测。在全球政治中,将出现三个权力中心:美国、德国和日本。<sup>①</sup> 苏联将分化为两个部分。其西方部分将成为德国影响范围的部分,而其东方部分将落入日本的影响之下。而且,管理社会将逐渐变得较为民主,它仍然展现独裁的特征。毕竟独裁阶段对于征权力力和巩固权力是唯一必要的(伯纳姆在这里描绘了一个与专制主义国家的相似点)。如果这一阶段成功了,那么民主化由于两个理由就成为绝对必要的,即,(1) 如果群众具有他们的利益不被忽视的感觉,有计划的经济只能有效率地运行;(2) 一定数量的民主有可能释放各种反抗力量的能量。

## 沙特曼

迈克斯·沙特曼(Max Shachtman),伯纳姆在与托洛茨基的派系斗争中最初的支持者,<sup>②</sup>他的论文《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吗?》对1940年

<sup>①</sup> 里齐顺带预言了“大约七八个封闭的自给国”。R[izzi]1939, p. 343.

<sup>②</sup> 沙特曼(Shachtman, 1901—1972),在1920年代是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后来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核心之一。其详细的传记信息见 Drucker 1994。

的辩论做出了贡献。与伯纳姆相反,沙特曼的观念出发点是:十月革命曾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获得的成果只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之后才丧失了。托洛茨基相反的观点(从来不存在对1917年诞生的工人国家的暴力颠覆)受到了沙特曼依据这一观察事实所作的反驳:斯大林主义的确立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如他所补充的,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相比,斯大林主义的确立“实质上是不流血的和非暴力的”)。<sup>①</sup>

沙特曼描述了财产形式和财产关系在分析上的区别。如果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生产资料,那么一种特定的生产形式继续存在,它仍然能与各种财产关系相结合:“即使我们可以提及苏联的国有化财产,这仍然确定不了那种财产关系是什么。”<sup>②</sup>当时已提出了谁控制了这个问题。如果国家由无产阶级掌握,那么无产阶级通过国家掌握了财产,就存在一个工人国家。如果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那么还认为存在一个工人国家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他相信苏联的例子是后一种情况。这种官僚的反革命“意味着该制度的建构全面失控,工人阶级已经终结了它的国家”。<sup>③</sup> 拥有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官僚制财产关系和官僚制机构,就是其结局。

当时,里齐和伯纳姆把官僚阶级看做是全球未来的统治者,而沙特曼认为还牵涉到一种短期存在的和有地区局限性的现象。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诸因素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不发达的生产力。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反抗将导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将意味着苏联将在不久的将来寿终正寝。在20世纪,所有的事件和现象集中“被压缩在一个时间点”。这个官僚制因而将会很快崩溃,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不稳定

---

① Shachtman 1940b, p. 199. 重印的沙特曼论文载 Shachtman 1962, pp. 37 - 60, 是一个校订版,为了符合沙特曼后来采取的政治观点进行了调整。

② Shachtman 1940b, p. 197.

③ Shachtman 1940b, p. 198.

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已经是经济发展的羁绊”。<sup>①</sup>

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反动的障碍”;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将保留这一财产形式(生产资料和交换的国有化),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财产关系。然而,如果资本主义破坏国有财产,那么可以想象,社会主义者将为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辩护。

苏联作为凯旋的帝国主义将实行的这样一种转变,必将对世界的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和持久的反动影响,给资本主义和反动派一个新的生命延长期,极大地阻碍了革命运动,同时因为我们不知道,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要延迟多长时间。由于这一观点,并由于处于这些条件下,为苏联甚至是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的苏联辩护,是可能的和必要的。<sup>②</sup>

因此,苏联的“财产形式”是进步的,但财产关系则不是。

## 卡特

约瑟夫·卡特(Joseph Carter, 1910—1970)<sup>③</sup>认为,他的同志沙特曼的分析是混乱的,因为这一分析将“俄国是一个新的、反动的经济制度的观点和那种相反的观点(“俄国工人的革命建立了一个进步的经济,但又被官僚统治所扭曲”)结合起来。<sup>④</sup>在他看来,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辩护都乏善可陈。“从历史的观点看,俄国采取了一条从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向后倒退的异化路径。”<sup>⑤</sup>他宣称,沙特曼曾通过描述所有权形式和所有权关系的区别,试图逃避这一结论;但是,这个区分没有意义。

<sup>①</sup> Shachtman 1940b, p. 201.

<sup>②</sup> Shachtman 1940b, p. 205.

<sup>③</sup> 论卡特,见 Trotzki 1988, p. 1119, 注释 2。

<sup>④</sup> Carter 1941, p. 220. 关于卡特—沙特曼争论,也见 Drucker 1994, pp. 131 - 8; Haberkern and Lipow 1996; Callinicos 1996.

<sup>⑤</sup> Carter 1941, p. 219.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及“财产形式”时，他们总是指财产的**社会形式**，即财产关系，如封建的财产（和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的财产（和经济）形式，社会主义过渡期的财产（和经济）形式，等等。

如果沙特曼为了让这种新俄国现象更清晰，选择引进“财产形式”和“财产关系”的术语学区别，他只能基于一个条件这么做：**通过说明他不是用“财产形式”指“财产的社会形式”**。此外，这个答案并不清晰而且混乱；另则，财产形式**就是**财产关系。<sup>①</sup>

卡特把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描述为**官僚集体主义**，一个后来也被其他“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所用的概念。在官僚集体主义中，统治阶级，也即官僚，试图靠强力扩大社会剩余产品，以增加其自身的收入、权力和地位。“强迫劳动因此是现今俄国生产关系的一个固有特征。”<sup>②</sup>和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卡特认为苏联是一个效率很低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要低于在一个民主计划的制度内可能实现的增长。即使苏联已成功地提升了其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其年增长率日益下滑，而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官僚制的关系和相关的国家恐怖主义应承担责任，因为这些因素造成了“生产的持续破坏；相互依赖的各种工业产量的比例失衡，以及因此导致的大规模经济浪费；生产的低效率”。<sup>③</sup>

在国际上，苏联发挥了“一个巨大的国民信托组织”<sup>④</sup>的功能，不允许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它的国内市场，并努力去推翻资本主义，作为“解放它自身局限于国内的生产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以便它能够充分受益于发达的西方的技术，并取代西方的地位成为前进的世界经济的一个应有的部分”。<sup>⑤</sup>

---

① Carter 1941, p. 219.

②③④ Carter 1941, p. 218.

⑤ Carter 1941, p. 219.

## 佩德罗萨

美国托派党的内部和周边关于苏联的广泛讨论,在1941年产生了一系列论文,特别是在《新国际》杂志上。<sup>①</sup>绝大多数人为已在本章讨论过的各类观点辩护。不过,一个例外是马里奥·佩德罗萨(Mário Pedrosa)——化名M.勒布伦(M. Lebrun),一个暂住美国的巴西艺术批评家——的来稿。<sup>②</sup>在他题为《苏联社会的群众和阶级》的论文中,佩德罗萨同样强调苏维埃国家而不是社会阶级的核心地位,并提出了下述假设: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并且也许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也由于使自己打破了这一限度,每一个国家的固有趋势(脱离它自身,使自己凌驾于阶级之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在俄罗斯已然是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这一统治阶级过于软弱而无法实行它对官僚——这个国家化身——的统治,这种发展进程已然是可能的。官僚确认自己和国家为一体。官僚以对自己的这种确认,已经获得了一种绝对的发展,以致它可以作为一个官僚系统而运行。<sup>③</sup>

官僚起初是国家公仆,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已将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转而反对那个社会并试图使所有社会阶级原子化,变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使用这些术语的那种意义上的

① 在沙特曼的文章之后,《新国际》在1941年第7卷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应当如何定义苏联本质的文章:Alvin 1941a和1941b;J. R. Johnson 1941a和1941b;Coolidge 1941;Kent 1941a和1941b;Lund 1941;Carter 1941。

② 马里奥·佩德罗萨(Mario Pedrosa, 1905—1982),是从1930年代早期开始的巴西托派小团体最重要的领导人。1938年,他与C. L. R. 詹姆斯和另一些人一起,成为第四国际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佩德罗萨是加入沙特曼反对派的第四国际领导层中唯一的非美国人成员。勒布伦就是佩德罗萨的假名的报道,可能是在“第四国际基金会会议”,1979, p. 57中被发现的。更多的信息载于“Mario Pedrosa(1905—1982)”,*Cahiers Léon Trotsky*, no. 10(1982); Dulles 1973, pp. 421, 457; Dulles 1983, p. 167; 和Castilho and Neto 1996。1980年,佩德罗萨成为巴西工人党(PT)的第一个党员。

③ Lebrun 1940, p. 88.

“自由国家”。<sup>①</sup> 这一发展是“极其短暂的”，因为，尽管官僚想把自己构建为一个阶级，但是它到那时为止仍缺乏一个独立的经济基础。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出来的生产不足的危机，迫使官僚去寻找经济扩张的方式。

（它）像一只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下蛋的母鸡一样不安定。它想要给自己找到一个适当的、稳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它能基于此自由自在地伸展自己，并确保自己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阶级的持久地位。<sup>②</sup>

一方面，这导致了渴望冒险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它也诱使这个官僚体制把小块土地和轻工业私有化。

### 希法亭

1940年，孟什维克的杂志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 发表了一篇文章的俄语译文，沃洛尔在其中阐明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但是该杂志同时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撰写的批判性回应，希法亭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sup>③</sup> 希法亭的稿子[稍后也用英语和德语发表在《在其他事物之中》(*inter alia*)]重申了他在希特勒问鼎最高权力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结论，这些结论涉及在纳粹德

---

① 多半或许是佩德罗萨记住了下述段落：“合乎逻辑地说，一个自由国家是一个其国家相对其公民而言是自由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拥有专制政府的国家”。Engels 1875, pp. 63-4.

② Lebrun 1940, p. 91.

③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早先是一名开业医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稿，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融资本》(*Das Finanzkapital*, 1910)。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追随其右翼于1922年返回社会民主党。他是1924—1933年德国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及1923年和1928—1929年的财政部长。他1933年移民瑞士，然后到法国。1941年，据猜测被盖世太保谋害。见Gottschalch 1962, pp. 13-31。有用的传记信息载Kurata 1974。

国和苏联的发展。<sup>①</sup>

尽管存在一些与里齐、伯纳姆和佩德罗萨的明显近似，希法亭的理论却是独树一帜的。在希法亭看来，官僚不可能是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其构成的异质成分过多，没有形成共识的机制。

各个地方尤其是在苏联的官僚，由一个多样化因素最多的混合物组成。它不仅是该词汇最狭义的政府官员（也就是，从最低阶的雇员到将军们乃至斯大林本人），而且是各工业部门的指导者和这样一些职员，比如，邮政和铁路的雇员。这个多样化的群体如何能够实现一元化的统治？它的代表是谁？它如何通过决议？哪些机构由它支配？<sup>②</sup>

这种官僚制不可能是一个社会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希法亭赞成托洛茨基的意见。但是，与后者相比，希法亭不把官僚制看做是依赖工人阶级及其工人国家的一个寄生的有机体，而宁可看做是国家领袖斯大林的工具。这个乔治王时代的暴君已经使国家公仆和全体人口一起臣服于他自己。

由于这一发展，经济不再是决定政治的因素，政治也不指导和主宰经济。国家已经将它自己与所有阶级彻底根绝关系，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一理论标志着希法亭思想的显著转向。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曾经表示出对这个国家的极大的信心（据我等人的看法，过大了）；但是，很明显，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实践推动了一场倒退。然而希法亭最初的信仰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国家必须服从于经济，现在已经

① 例如，Richard Kern 1936a, 1936b。希法亭似乎已经在孟什维克的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尤其是在与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卡娅 (Boris Nikolaevsky) 的讨论之后。见 Sapir 1979, p. 367。希法亭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表述了他的自治国家理论的核心：“当然，国家组织及其利益是一个因素，它获得了独立性并且特别是在独裁时代致力于战胜其他的社会利益。”Hilferding 1937。

② Hilferding 1940。这是 1940 年对 Uoroll 的一个回应。引证依据发表于《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 p. 268) 的美国译文。



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服从导致了独裁。<sup>①</sup> 尽管如此,希法亭思想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在他的文章中仍然是明白无误的:国家终究是一个无阶级的制度,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下可以或好或坏地去运用;无论运用国家权力的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一个全能的独裁者,对这个核心理念都影响不大。

#### 第四节 批判

#####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批判

阿德勒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受到了德国共产主义者 H. 林德(H. Linde)依据前斯大林主义观点的批判。这位作者提出了两个反对观点。第一,该论题按其论述包含有一个术语上的矛盾。毕竟,马克思观点中的原始积累意味着“一种积累,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sup>②</sup> 这意味着一个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序列:首先是原始积累,然后是资本主义。依照林德的说法,其逻辑结论是必然的:既然苏联存在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原始积累,否则,已经发生了原始积累,那么就不可能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的观点。<sup>③</sup> 第二,对马克思来说,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原始积累的一个根本特征;<sup>④</sup>然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正好实现了其反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什么是集体化? 它不是小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它是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集中统一,在小生产者的社会化中,这些生产资料(不算国家支配集体经济的那些生产资料)仍然是集体财

---

<sup>①</sup> Stephan 1974, p. 141. 也见 Gottschalch 1962, pp. 242 - 61 和 James 1981。

<sup>②</sup> Marx 1976, p. 873.

<sup>③</sup> Linde 1932, pp. 26 - 7.

<sup>④</sup> “因此,所谓原始积累,除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什么也不是。它表现为‘原始的’,是因为它形成了资本和与资本相应的生产模式的前史。”Marx 1976, pp. 874 - 5。

产,而不是在他们共同的集体的所有权之外的、该集体的个体成员的私有财产。<sup>①</sup>

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论题受到少数作者的激烈反对。移民国外的孟什维克奥莉加·杜曼涅夫斯卡娅(Olga Domanevskaya)指出,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由竞争和对利润的追逐构成。相比而言,这些因素在苏联不起主导作用。这里最根本的是如下事实:经济主要由国家领导。<sup>②</sup>希法亭补充指出,苏联的工资和价格都不是以市场制度的同样方式形成的;它们不是通过自发的过程(供应和需求)建立的,而是由国家确定的,并以那种方式指导经济:

形式上,价格和工资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再相同;它们不再决定生产过程,该过程现在由一个确定价格和工资的中央权力所掌控。价格和工资……现在组成一种技术的分配形式,与不可能再分类为商品的产品的直接个人配置相比更为简单。价格已成为分配的符号,而不再是经济中的一种调节因素。一旦维持价格分配形式,就产生了功能的全面转变。<sup>③</sup>

苏联官僚制孕育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的论题,也受到托洛茨基基于社会学的否定:

官僚既没有股份也没有债券。它是按一种行政等级制的样式被聘用、补充和更新的,不受它本身的任何特殊的财产关系所支配。个体官僚不可能把他在国家机器剥削中的权力遗传给他的继承人。官僚在滥用权力的形式下享受其特权。它隐瞒其收入,它伪装成甚至不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对国家收入巨额分配的剥削具有社会寄生性的特点。<sup>④</sup>

① Linde 1932, p. 27.

② Domanevskaya 1934 - 1935, p. 271.

③ Hilferding 1940, pp. 266 - 7.

④ Trotsky 1937b, 英文版,第 236 页。

这个关于“静悄悄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发生的论题(一个如我们所见,起源于柯尔施),被托洛茨基以历史不平衡性为由进行了批驳:

关系到权力从一个阶级手中向另一个阶级手中让渡的灾难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论题,不仅适用于革命时期,即历史疯狂地席卷向前的时候,而且适用于反革命时期,即社会向后倒退的时候。他断言,已被**渐渐地**从无产阶级转化成资产阶级的苏联政府,可以说只是把改良主义的影片向后倒放。<sup>①</sup>

如我们所见,沙特曼提供的相反观点是:斯大林的反革命是“灾难性的”和暴烈的。

###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批判

伯纳姆以生产资料已基本国有化为基础,批判了苏联工人阶级尽管在政治上被“剥夺”、在经济上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论调。他提出了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即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以有待解决的问题为论据**的观点:

我们问他们(也即该理论的辩护者),苏联是哪一类国家?他们回答,它是一个工人国家。我们问,为什么它是一个工人国家?他们回答,**因为**存在国有财产。我们问,为什么国有财产使之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他们回答,**因为**一个工人国家是一个存在着国有财产的国家。

这在形式上,完全是那些人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话的那些观点的同义反复。我们问他们,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们回答,**因为**《圣经》自己说它是上帝的话。我们问,但是怎么证明它是真的?而他们回答,**因为**上帝不可能说谎。

在这两个例子中,结论均在前提中得到认可;该观点完全是循

---

<sup>①</sup> Trotsky 1933a, p. 2; 英文版,第 102—103 页。

环论证,并且什么也不可能证明。<sup>①</sup>

托洛茨基的相同论题也受到批评,因为他认为国有财产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是一个不完全及格的条件。在这一背景线索中,里齐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也日益采取国有化和计划手段,而且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将最理所当然地把这种“十月革命的创新”运用于自己的目的。<sup>②</sup> J. R. 约翰逊进行了类似的批评:

托洛茨基与追随他的我们无法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区分:第一,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国家仅仅是像信托、银行、卡特尔(cartel,指联合企业——译者注)那样的经济形式;第二,国有制是一种纯粹的法律关系,这只是告诉我们,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是国家的职责;第三,一个工人国家也就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这最后一点根本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生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问题,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人阶级是不是主人?这第三个范畴包括了其他的两个。但是无论单个还是两个一起,前两个范畴都不必然地包括第三个。……在国有财产形式中,工人阶级可以像在1921年那样成为主人,或像在1941年那样被奴役。<sup>③</sup>

与刚刚提到的观点一起,另一个相关的观点紧接着提出来了:托洛茨基在其理论中已分割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但是在一个工人国家的情况下,这种分割恰恰是不可能的。用约瑟夫·卡特的话说:

无产阶级是一个无财产的阶级。它对经济的支配和它对社会的统治只能通过首先赢得政治权力。正是通过其国家权力,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为消灭一切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条件。没有政治权力,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统治阶级。<sup>④</sup>

① Burnham 1938a.

② R[izzi]1939, pp. 38 - 9.

③ Johnson 1941a, pp. 54 - 5.

④ Carter 1941, p. 218.

##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批判

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观点,反对任何一种称官僚是一个新统治阶级的理论:

一个阶级不能单单由于它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定义,而是由于它在总的经济结构中的独立作用和由于它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独立根基而定义。每个阶级(封建贵族、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创设出它自己特殊的财产形式。官僚缺少所有这些社会特性。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财产根基。它的运作基本上系于阶级统治的政治技术。一个官僚制的存在,以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其所有丰富的形式和差异中,表现出每一个阶级政权的特色。官僚制的权力具有一种得自于他人的特征。官僚制与一个经济统治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靠后者的社会基础养活自己、维持自己并与这个阶级相结合。<sup>①</sup>

W. 肯特(W. Kent)对托洛茨基的这一反驳提出了一个反批评,即托洛茨基曾无理地宣称,旧社会关系是普遍适用的:

如果承认,在欧洲历史上,官僚从来不是一个统治阶级,而且它总是服务于其他统治阶级,那就意味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它自己的阶级吗?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新事物吗?200年前,在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一个聪明的“理论家”正好也可能说过:什么,资产阶级成为一个统治阶级?荒唐!资本家,正像我们一向都了解的,他们——商人和放债者——永远只服务于王公贵族!<sup>②</sup>

杜曼涅夫斯卡娅对这个国家已使自己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观念进行

<sup>①</sup> Trotsky 1937b, pp. 112-3. 也见 Domanewskaja, 1934-1935, p. 272.

<sup>②</sup> Kent 1941a, p. 179.

了批评,在她看来,这部国家机器并不具备这样一种自主性:

如果人们设想一个新阶级形成的可能性……那么(必须)作为先决条件的是某一种在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之间公开确立的和长期持久的关系。人们必须可以想象,国家机器是他们在一个更大或更小范围内的联合。在现实中,这里不存在这种情况。苏联机器特有的(负面)特征是人员成分的持续流动,国家工作人员从一个管理部门转向另一部门,从机关转向生产过程,而反之亦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这部国家机器的实在群体,是从真正的工人中形成的,相互变动发生在工人阶级和国家机器之间;在那里展示着替换过度热心的官僚的社会意义,这些官僚已经以某种方式违犯了工厂的法纪,“返回工作台”。这个过程的经验是,尽管存在着走向官僚化的倾向,但是该机器基本上不可能长期把自己与周边环境分开,(并且)没有变成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各种势力的工具。<sup>①</sup>

里齐和伯纳姆把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归为同类的结论(韦尔已大致预见到了),受到托洛茨基和沙特曼两人的质疑。两人都承认,两个政权在不和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特征(恐怖、秘密警察、政治结构,等等),但认为在财产关系层面上的根本差别是可以辨识的。两人均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允许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继续保持,并因此以一种与斯大林不同的社会基础进行运作。<sup>②</sup>

## 第五节 总结

随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巩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所有苏联的批评者现在似乎都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在“工

<sup>①</sup> Domanewskaja 1934 - 1935, pp. 272 - 3.

<sup>②</sup> Trotsky 1940a; Shachtman 1940, pp. 201 - 3.

人的祖国”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再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认可经典的单线顺序。最抵制这种旧图式的那些人,是发觉苏联是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的一个特殊变体的作者;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在苏联发现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理论家们进一步进行了一些大胆的表达。

现在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十月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抑或“造成了一个掌权的新统治阶级”的革命。取第一种解释的人,把这个革命看成随之而来的一次官僚蜕化,或一个替代的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反革命。以下图表总结了这些变体和代表这些观点的作者:

十月革命的本质	后来的发展	作者
无产阶级革命	官僚的蜕变 资产阶级革命 官僚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 沃洛尔 沙特曼
资产阶级革命		魏格纳
官僚革命		伯纳姆

1920年代,当时还没有一个批评者称能够识别出一个公开的、暴力的反革命,到1930年前后,人们明显感觉到苏联的社会变化是如此剧烈,所以各式各样的作者此时都已经相信,这样一种发展已经发生了。

每一主要的理论思潮内部都发展出不同的版本,除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只是在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中单线延续下来,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追随者和支持新的社会类型论的那些人,尤其在两个问题上观点截然不同:

1. 苏联是独特的,还是与法西斯主义社会存在着结构相似性?对于这一问题有三个不同的答案:一些人(阿德勒、沙特曼)从独特性出发,另一些人认识到(波洛克、霍克海默)苏联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形式变体是另一个变种,还有些人(里齐、伯纳姆)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断定为本质上是同一的。

2. 官僚已经是一个统治阶级,抑或还不是? 这个问题也有三种答案:希法亭认为,官僚不可能在结构上变成一个阶级,佩德罗萨则在官僚制中发现了一个竭力把自己转变成阶级的社会集团,而米亚斯尼科夫、里奇等人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 第四章 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到东欧的结构趋同 (1941—1956)

1941年7月22日,德国军队突然向苏联发动进攻,毫不含糊地终结了执行了两年的两国旧条约。迅速推进的德国军队迫使苏联政权采取激烈的行动,除了显而易见的军事准备(征兵动员、发布俄国欧洲部分的战争声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项)之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工业和农业的军事化转型,许多行业的工厂整体搬迁到东部。士兵、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一动员中展现的传奇般的努力,只能由一个事实来解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场国家的自卫战争。爱国主义和对狡诈的敌人的仇恨是所有官方宣传的主要内容。德国人的进攻最初看起来不可阻挡,但是在战争蔓延到莫斯科期间(1941年冬—1942年)反攻开始逐步明朗化,1943年(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反攻强化了。在国际层面,斯大林与英国和美国结成了联盟。对于他所设想的“世界革命”目标,此时他试图尽量地使他的外国盟友解除疑虑,并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苏联红军在1944—1945年进攻东欧期间,遭遇了许多抵抗。但是,纳粹占领军在许多地方士气低落,当地人民的各种组织公开反叛他们,某些地方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片地区。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军队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在前“轴心国”国家(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其军队由于与第三帝国的合作已信誉扫地,而在同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军队被纳粹占领军重创。同时,有些政府机构或多或少已经瓦解(尤其是在波兰)。

红军的到来总的来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当红军更逼近的时候,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了起义、群众罢工和游行示威、占领工厂,甚至早期出现了工人委员会。这意味着,斯大林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新占领区进行社会改造。

斯大林在 1944 和 1945 年的欧洲是旨在军事和领土目标,而不是社会改造目标。——就那些目标是社会的而言,它们在社会方面是保守的。如果当时他意在将波兰“苏维埃化”,那么他既不会接纳如此之多的华沙战前政治家,为分享权力进行协商,更重要的是,也不会使哪块领土是波兰部分、哪块领土是苏联部分的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战时“一国社会主义”的结束对斯大林意味着,“友好的”政府统治苏联西部边境的“友好的”地区,保护苏联抵御可能卷土重来的德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sup>①</sup>

东欧在 1944—1945 年到 1947—1948 年时期的发展,可以概括如下:

——在“人民民主”的口号下,组建了共产党(或替代的社会主义统一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有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应共产党人之邀(重新)建立的。<sup>②</sup>

——建立了新的中央国家机器,它联合了(并官僚化了)那些在起义期间创造的自我管理机构,并吸纳尽可能多的“进步人士”。

<sup>①</sup> Westoby 1981, p. 10.

<sup>②</sup> 关于匈牙利, Hugh Seton-Watson 举例概括道:“在最初几个月的一个奇特的悖论是,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坐在红军宣传车里到处逛的共产主义宣传队的工作。”(Seton-Watson 1956, p. 191)同时与 Klement Gottwald 在 1945 年就共产党的作用所做的一次讲话相比照:“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在现阶段,我们遵循着民族与民主……的路线而不是社会革命的路线。”引自 Brzezinski 1961, p. 27.

——经济部分实行了国有化；在许多情况下，这并不牵涉对老板们的剥夺。通常，它们涉及接管以前德国占领者的财产和/或工人自我管理的那些企业。尽管实行了国有化，但大部分经济——特别是农业部分和零售商业——仍然由私人掌握。

尽管东欧缓冲区在第一阶段保持了它的资本主义特征，但它仍然处在苏联的直接监管之下。此时，在苏联和它的前西方盟友开始公开展现自身的冲突的压力下，所有这一切都在1947—1948年改变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在当时获得了新意义。<sup>①</sup> 由于这些缓冲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开始表示出与苏联的强烈相似性，结构趋同的过程开始了。<sup>②</sup> 实行了三项内在相关的结构改造：第一，解除资产阶级军队遗留的权力基础。在政治领域，解散了联合政府，清除了独立的农民政党，等等。在经济领域，引进追随苏联模式的“命令—计划”，<sup>③</sup>加强与苏联的双边贸易，大力强化重工业的发展。第二，巩固共产党的单一地位。各国共产党的特点各个不同。有些党，如波兰共产党，是战后的创造，尽管部分干部来源于战前。有些党，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共产党，“解放”前已经是真正的政治力量。但是不管它们的前史有什么不同，所有的共产党1944年以来都经历了迅速的成长。这些共产党的巩固是以两种方式取得的：通过大规模的清洗<sup>④</sup>，或通过迫使社会民主党合作。第三，垄断的党和国家机器的融合。与共产党的这一“垄断化”相比较，工会全然丧失了它们的自主性，而国家机器得以“净化”。其结果是共产党现在主宰了社会的全部权力基础。

这三项巨大变化同时与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个各国共产党的信息交流机构）的成立相结合，后者服务于莫斯科与外国

① Heiter 1986.

② Heiter 1986.

③ 五年计划的引进给经济趋同已经实现的时刻提供了一个标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49年，波兰和匈牙利在1950年，罗马尼亚和东德在1951年。

④ Fejtó 估计有2500万人，约为总成员的四分之一，被从东欧共产党中清除，有12.5万到25万人被关进监狱。Fejtó, n. d. p. 246.

(尤其是在缓冲区)共产党之间的政见协调。<sup>①</sup>然而很快东欧的防疫封锁线出现了一道裂痕。从1948年3月起,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扩大。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间一些简要的通信交流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48年6月28日被草率地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个被革出教门的党的领导层被斥责为“其政策仇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散布“来自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武器库”的诽谤,和对内追随反列宁主义的政策,此外,它还反对土地国有化。<sup>②</sup>

这一政治分裂主义的背景是复杂的。在该文献中,被认为更深刻的原因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是东欧唯一一个在“二战”期间使自己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摆脱了德国占领者统治的党。这意味着,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如同中国共产党,中共也将在1963年与苏联割袍断义——掌握着自主的权力基础,比其他东欧共产党领导层更不愿意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束缚。由于南斯拉夫已遭受斯大林在近邻希腊(它已被牺牲给了西方大国)的大多数政策之害,这为早期阶段就已产生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紧跟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破裂之后,“铁托主义”思潮和偶然有(小小的)同感的党在许多西欧国家出现了。南斯拉夫思想家,如卡德尔(Kardelj)和吉拉斯(Djilas)阐发的苏联批判,在那个圈子里找到了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听众,而且这些批判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扩大。

与1930年代相比,自1945年起出现了各种结构性的困难:“尽管苏联的内部结构早先经历了一场深刻改造,虽然它的外部处境在广义上依然不变,但是现在其内部连续性面临着其外部地位的一次重大变化”。<sup>③</sup>

① 当共产党情报局在波兰城市 Szklarska Poreba 建立之时,东欧的共产党和两个最大的西欧共产党(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出席。

② 1948年3月20日至6月28日这一时期的相关文件再现于 Bass and Marbury 1959, pp. 4-46。

③ Beyerstedt 1987, p. 232.

## 第一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左派社会民主党对西方关于苏联的辩论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此后,讨论者的政治光谱值得注意地收窄了。争论比早先更强烈,现在集中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多数文献来自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方,尽管波迪加和他的同道思想家、左派社会主义者等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年中可被纳入苏联辩护者的吉尔·马尔蒂内(Gilles Martinet)在1947年指出,第四国际及其政治外围应当为对斯大林主义最广泛和一贯的批判负责;比较而言,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苏联批判已经“休眠”。<sup>①</sup>

出自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的批判者的这一优势,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可以毫无疑问地自我支撑,并得到发展。相反,第四国际发现自己面对严重的概念问题,这些问题在它的队伍中引发了论战的白热化。如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曾设想,苏联的官僚制将会被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否则,它控制不稳的权力基础将会通过一场直接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革命来巩固自身。在此背景下,他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全面估价对他的预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他曾断言(完全用共产国际的传统),资本主义已经到达其最后阶段。在纳粹军队入侵比利时和荷兰之后,他说道:

除了认为这是一场拖延死亡的剧烈痛苦,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任何出路。必须准备拖延多年,即使不是数十年的战争、起义、短暂的休战间歇、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sup>②</sup>

资产阶级将会越来越经常地被迫采取独裁主义的政治形式(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同时,工人们将会打破它们的一潭死水,奋起反抗。

---

<sup>①</sup> Martinet 1947, p. 14.

<sup>②</sup> Trotsky 1940b, p. 218.

尤其是战争暴力注定会加速平均押宝式的政治发展：“那些仅仅在昨天看起来岁月漫长的(即使没有数十年之久)的伟大任务,可能在今后两三年,甚至更快,直接在我们面前赫然显现。”<sup>①</sup>这个时期因此是最后的斗争的时期,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苏联的形势不可能再原地踏步。

第四国际从战争(和托洛茨基死亡)的结局中有了某些恢复之后,它寻求严格地坚持托洛茨基的预言,即使它很快发现这与现实相冲突。1946年,该组织宣布,对已预言发生的事件的失败,必须用以下述方式进行解释:

即使战争没有立即在欧洲产生出一个我们所预期的那种范围和发展速度的革命高潮,仍然不可否认,它在世界范围内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因此开启了一个漫长的革命时期。所有自我批判……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禁锢在发展速度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时期的**根本特点**上。<sup>②</sup>

与这一观点完全一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可能性被否定,并预言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政治革命。

各处收集的实证参数都依据这一“大灾变理论”进行设置,<sup>③</sup>但是没有成功。几年以后,国际资本主义的确表现出复兴的动力,而斯大林主义却被证明比以往更稳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绪转化为一种接纳态度。但是该运动最重要的领袖米歇尔·拉普蒂斯(Michel Raptis)后来进一步走向修正的世界观。他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短论,预言(也是受朝鲜战争的影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然性,认为它将可能导致一个持

<sup>①</sup> Trotsky 1940b, p. 220.

<sup>②</sup> 1946年的决议《新帝国主义和平和第四国际党的建设》是由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起草的。

<sup>③</sup> 特别是见Cliff 1947。克利夫的稿件是对Germain 1947a的一个回应。曼德尔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在这个资本主义衰败的时期,英国工业**不再可能有超越复苏阶段的上升,和获得真正的繁荣。**”克利夫在他的回答中否定了这一点。

续数世纪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国家的历史阶段。<sup>①</sup> 因此,尽管他以前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现在则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斯大林主义将从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胜利凯旋,并导致一个无限期持续的苏维埃模式的政权。这种局部的“修正主义”肯定能够激起对整个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重新评估,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sup>②</sup>

对正统性的长期严格坚守——虽然有着被托洛茨基认为重要的那种时间因素的拖延——对处理东欧事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应当如何理解那些新社会的性质? 如果它们被定义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基于它们与苏联日益增长的结构趋同,那么这一解释陷入了两个理论障碍,第一个比第二个更有原则性:

1. 一个工人国家,如果它采取正统方式(遵循马克思关于工人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论题),只能在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领导下,从一个自主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中产生出来。那么工人国家怎么可能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在已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2. 一些国家与第一个工人国家结构趋同的早期情况,一直是和它们并入苏联结合在一起的(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东部波兰等)。托洛茨基因而相信,其他国家的“结构性趋同”将与废除它们的国家边界相结合。<sup>③</sup>

在1947—1951年间,关于这一问题的三个观点是相互关联的。恩斯特·曼德尔最先指出,所有东欧的缓冲区国家,从南斯拉夫到波兰,都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米歇尔·拉普蒂斯同意这一观点,除了所涉及的南斯拉夫以外;在他看来,因为南斯拉夫已经历了国内战争,这个国家是个工人国家。最后,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和伯特·科克(Bert

<sup>①</sup> Pablo 1951.《论拉普蒂斯(1911—1996)》,见 Richardson 1996。

<sup>②</sup> 这被指出于 Bleibtreu-Favre 1951, p. 60。

<sup>③</sup> 例如见 Leon Trotsky 的《芬兰事件(1940)资产负债表》,重刊于 Trotsky 1973。

Cochran)将所有被占领的东欧国家都定义为工人国家,但是它们从基础上实现了官僚化畸变。1951年,该辩论以最后提到的这一观点的胜利告终。<sup>①</sup>

如果我们观察第四国际有连续性的官方文本,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形成一个确定观点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和迟缓。在1947年,缓冲区国家被描述为处于转型状态的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的)官僚制将最后证明,不可能成功地实行那种要求摧毁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结构同化。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实现这种真正的结构同化。<sup>②</sup>

1949年,这一解释得到了修正:

苏联和缓冲地区的社会具有一种质的差异……即使缓冲地区具有这种质的差异的社会更紧密地接近于苏联社会,而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在同样的意义上,苏联本身在量上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sup>③</sup>

最后,在1951年,已经抵达了如下结论:

这些国家与苏联的结构同化现在应当被视为已在实质上完成了,而且这些国家也被视为基本上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sup>④</sup>

这一发展的理论后果是,现在苏联不再被看做是工人国家的原型,反倒更适于被看做是一个特例。不过,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本身仍未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正宗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继续坚持旧的假设。

① Conner 1973, p. 6.

②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③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9.

④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1. 为了把它们与苏联相区别,缓冲区的国家不被称为“蜕化的工人国家”,但是,工人国家从其起点就是“畸型的”。



## 第二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支持者的理论困难,在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反对的思潮。大多数反对者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论。他们从托洛茨基最卓越的政治遗产捍卫者、他的遗孀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的理论中汲取支持。从大约1946年起,谢多娃确信,苏联肯定不能被视为一个工人国家,而在1951年,她与第四国际决裂。在一封致该组织的最重要部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中,她对采取这个步骤说明了她的理由:

他(即托洛茨基)反复指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巩固是如何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恶化,和一个残暴的、有特权的贵族的胜利。他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这场革命将会终结,而资本主义复辟将会实现。

不幸,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即使是以新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形式发生。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那里社会主义的真正思想和支持者被如此野蛮地追杀。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革命已经被斯大林主义完全摧毁了。然而你继续说,在这个坏透了的政权下,俄国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我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打击。<sup>①</sup>

### 格兰迪若/佩瑞特

在墨西哥,在他们反对弗朗哥将军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后,一个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小组于1940年前后成立了。这些流放者中鼓舞人心的灵魂人物是曼纽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若[Manuel Fernandez Gran-

---

<sup>①</sup> 见娜塔莉娅·托洛茨基(Trotsky 1951)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信。与这些信一起,《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娜塔莉娅·托洛茨基的信的回答》发表了。注释是迈克斯·沙特曼在 Shachtman 1951b 中提供的。

dizo, 1911—1989; 他以‘G. Munis’的署名写下了《有机体的别名》(*the nom de guerre*)<sup>①</sup>], 他在 1936 年建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运动的西班牙支部。<sup>②</sup> 1938 年, 他被斯大林主义者监禁, 但他在第二年策划了逃亡。格兰迪若亲密的合作者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本杰明·佩瑞特(Benjamin Péret, 1899—1959), 他也在墨西哥生活过一段时间, 并且还以笔名 Peralta 发表了政治论文。<sup>③</sup>

1946 年, 格兰迪若和佩瑞特继续把他们对官方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有关苏联阶级性质的批判公开化。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是那年 4 月第四国际一次会议采用的“宣言”。这一宣言最重要的论题是, 第四国际的分析——包括关于苏联的分析——已被最近的全部事件证明是完全正确的。<sup>④</sup> 佩瑞特撰写了一本对该宣言极具批判性的书, 他抨击宣言为一个自鸣得意的文献, 与第四国际不相配, 并充斥着自命不凡的虚荣(*vanité béate*)。佩瑞特认为, 由于最近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十月革命在苏联创造的成果已荡然无存。官僚的反革命已经获胜, 而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确立。

同样, 佩瑞特的这一思想几无可能称得上原创, 但是他对官僚精英的描述显现出一些新特点。他虽然放弃了托洛茨基的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但仍一定程度上坚持托洛茨基关于精英不是一个统治阶级而是另一类社会集团的概念。他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线索推断, 一个统治阶级, 有着发展那种产生它的社会形态(“所有权制度”)的历史任务。因

① Sinclair (no date), p. 338; Prager 1978, p. 432.

② 格兰迪若是墨西哥西班牙移民的孩子。1930 年, 他回到西班牙, 并在那里成为政治积极分子。见 Broué 1982a, p. 16, 注释; Gramonte 1977, pp. 513—17; Guillamón Iborra 1993。

③ 佩拉尔塔(Peralta)是佩瑞特(Péret, 1899—1959)笔名的证据, 是在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的档案 Peralta 1946 年复印件上的笔迹中发现的。该注释原文说明:“佩瑞特: 在墨西哥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和‘Fomento Obrero Revolucionario’(一个有着很难翻译的名字的组织, 大约是‘革命工人促进会’的意思)的战斗成员本杰明·佩瑞特(Benjamin Péret. G. Munis)的笔名。”(这段注释原文为法文, 由作者发现并引用, 最后协助本译者译出。——译者)。关于佩瑞特, 参见 Goutier 1982。

④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1946.

此,它至少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发挥了进步的作用。然而苏联的官僚精英并不体现任何进步,只有堕落和腐败,因此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揭示它的性质。佩瑞特在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这种官僚只能定义为“一个其最后结构仍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事实上的阶级”。如果这一阶级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使自己成形,它可能会发挥一种堪比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进步作用。

第二,这种官僚只能定义为可与古代印度文化衰落时期的婆罗门相比的世袭阶级。佩瑞特相信,在一个衰落的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显著的宗教特征,也只能在苏联看到,在那里斯大林获得了某种先知的地位。<sup>①</sup>

格兰迪若在他的书《面对俄罗斯和世界斯大林主义的革命者们》(*The Revolutionaries in the Face of Russia and World Stalinism*)中,阐述了“没有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sup>②</sup>

第一,他试图用经济观点说明在苏联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其冗长的观点基本如下:在资本主义中,工资价格尽量保持低位,而(物化于剩余价值中的)剩余产品被资本家用于新的投资或非生产性消费;相比之下,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将由全体人民民主地决定,而大众的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在苏联的发展中(以拒绝劳动力买卖为特征,为了强制性的投资和官僚制的消费使用剩余产品),没有任何过渡社会特点的迹象,反倒有资本主义的迹象。

第二,像佩瑞特那样,格兰迪若试图以一个历史类比来阐明官僚的阶级地位。他把当代国际资本主义与罗马帝国的衰亡相比较。当那个古老帝国已经进入其衰败阶段,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时,统治派系内部发生了权力转换:贵族——那些衰老的、先前趾高气扬的阶级——不得不让位给缺乏家世和历史上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成分。

<sup>①</sup> Peralta 1946, pp. 3-9.

<sup>②</sup> Munis 1946.

恺撒(Caesar,前100—前44年,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和历史家。——译者注)和奥克塔维厄斯(Octavianus)是这一阶层的领袖。他们扩张了该国的权力,并因此形成了一道抵御社会瓦解的最后壁垒。格兰迪若认为,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与这些贵族同样的磨难。正像那些罗马人那样,它也在其衰落阶段被迫将权力让渡给控制了它的地盘的成分——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并因此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

从这一观点看,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蜕化的标志:这个资产阶级已经能够扼杀这场无产阶级革命,但还不能成功地登基成为强大的统治阶级。在较晚近的出版物中,格兰迪若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题,并且似乎颠倒了伯纳姆的“管理革命”论:苏联的管理者们正像他们的西方同僚一样,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反倒是表征了如下事实,即老牌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对事物的掌控,因此为其反动的帮手创造了空间。<sup>①</sup>

### 詹姆斯/杜娜耶夫斯卡娅

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一个出生于特立尼达岛的革命者,曾是1938年第四国际的创建者之一;<sup>②</sup>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雷·斯皮耶格尔(Rae Spiegel)的笔名],一个美国妇女,曾是托洛茨基一个时期的合作者之一,<sup>③</sup>领导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国家资本主义”反对派。

1941年,围绕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团体(也以用每人各自的

<sup>①</sup> Munis 1975, 特别是 pp. 48 - 62。

<sup>②</sup> 詹姆斯(1901—1989)1932年从特立尼达移居大不列颠,在那里做板球记者的工作。1936年,他与他人共同创建了托洛茨基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联盟,并在1938年参加第四国际创立大会。从1938年底起,詹姆斯住在美国。1952年,他被拘留,并于1953年被驱逐出美国。随后,他在英国住了五年,并于1958年回到特立尼达,在那里担任了多年西印度群岛联邦劳工党的书记。詹姆斯成为著名的黑人解放的理论家,并写作了《黑人雅各宾派——Toussaint L'Ouverture 和圣多明各革命》(*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1938)。见 Buhle 1986 和 1988; Boggs 1993。

<sup>③</sup> 传记数据在 Anon. 1987; Anderson 1988, Markovic 1988。

化名命名的“约翰逊—福斯特思潮”而知名),与沙特曼及其支持者一起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创建了工人党。但是,这一团体与这个新组织的多数进行辩论(后者拥护官僚集体主义论),越来越牵涉到基本原则。因此,约翰逊—福斯特派在1948年离开了工人党,直到1951年发生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决裂。该团体当时在“面向现实”的名义下独立地继续它的活动。<sup>①</sup>

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在这一时期的全部理论发展可总结如下。在1940年前后,两人已得出结论,托洛茨基的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把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变成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拜物教”。<sup>②</sup>与托洛茨基的这一不完全破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分歧的开端。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和哲学基础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价,其中,尤其是与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习俗形成

① 据我所知,还没有关于约翰逊—福斯特思潮的任何实质性的学术研究。多种相关出版物提供的信息始终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在涉及与第四国际重新恢复联系的地方。Jerome 和 Buick 在1967年写道:“在1947年,约翰逊—福斯特派重新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在1951年再度离开”(p. 68); Ashton Myers 1977年写道:“曾与沙特曼一起离开的 C. L. R. 詹姆斯,回到社会主义工人党两年,即1948年和1949年,只是再一次被开除”(p. 200); 罗宾逊1983年称:“当时,在1942年……一个集中围绕着詹姆斯和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团体,约翰逊—福斯特派,离开了‘沙特曼派’。后来,在大约(原文如此)1949年,约翰逊—福斯特派将重新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只是两年以后再次毅然变成独立的派别。”(p. 389)。我通过詹姆斯本人的陈述构成我自己的解释。在《侵犯性的社会主义社会》(*The Invading Socialist Society*)的第二版前言中,他写道:“约翰逊—福斯特派是1940年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分离出来的一个团体,并与成为工人党的部分在一起。然而,在工人党内部,我们还发现,不仅仅是反对迈克斯·沙特曼的折衷的跳跃还必须阐明我们的观点,反对托洛茨基的那些观点,即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以仪式般的强调重申的观点。这样做的期间,1947年我们发表了《侵犯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恰恰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严肃态度,导致我们离开工人党随心所欲的即兴发挥,并在1948年重返社会主义工人党。”James, 1972, p. 1. 而在一篇标记着自1967年起的以“黑人权力”冠名的文章中,他陈述道:“……在1951年,我的朋友们和我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演绎前提无可挽回地和根本性地决裂了。”(James, 1980a, p. 235)。

② “因此,为了去找到一个相似物,我们必须逃入迷雾一般的宗教领域。在那里,人类头脑的产物显现为赋予了他们自己生命的自主形象,它进入了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与人类的关系。于是,它处在作为人的双手的产物的商品世界中。我称这为拜物教,它们一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就把它自己依附在劳动产品上,而它因此不能与商品生产相分离。”Marx, *Capital*, I, p. 165.

对比,他们转向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黑格尔。<sup>①</sup>

同时,否定托洛茨基的“国家崇拜”,是与重视生产关系、重视生产关系对现代工人生活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该团体发表了由工人撰写的关于他们日常工作的报告<sup>②</sup>,常常试图将总体化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观与“来自下层的”方法联系起来。

这就导致了一个多少有点儿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论,但这并不是轻易提出的。第一个贡献是詹姆斯做出的。随后,精通经济学并能参考俄国原始资料<sup>③</sup>的杜娜耶夫斯卡娅将这一分析精练化。

在关于该主题的第一篇文章中,詹姆斯就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提出了他最重要的观点:工人和农民是依赖工资的。

工资劳动的突出性质形成了生产资料的资本。生产资料被社会的一部分人所垄断,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功能中,其自身有一种独立的生命和运动。<sup>④</sup>

然而同时,詹姆斯认识到,工资劳动者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还处于统治地位,依据他论述的观点,在那时,工人国家仍然存在。他以下述方式解决了这个明显的矛盾:

在列宁主义的俄罗斯存在工资劳动吗?仅仅是形式;还是存在和不存在?因为工资劳动在一个过渡期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存在的可能性超过了存在。……然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一方面是工资劳动者,另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在列宁主义的俄罗斯这一关系则是:一方面只有工资

① 特别见 James 1980b,最早出版于 1948 年。在这本书中,詹姆斯用黑格尔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辩证批判的指南。

② 最著名的是工人 Paul Romano(Phil Singer)写的“自我证明”。见 Romano 和 Stone 1946。

③ See Dunayevskaya 1944, 1945.

④ Johnson 1941a, p. 55.

劳动的形式,因为另一方面拥有所有权的劳动者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资料。<sup>①</sup>

事实上,我们可从这一段话得出结论:同样,不是工资劳动构成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我引用的第一段话的意思),而是工资劳动和无产阶级主权的缺乏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这个社会。

在讨论他举证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例子之后,詹姆斯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被集中于一点(中央国家)上,而工人和农民依赖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工资,那么从逻辑上说就存在一个“国家资本家”,一个控制了个国家、从中能够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后者无论如何不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那样采取利润的形式,而是采取(官僚)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

然而这个论题造成了一个理论问题。不再与另一资本竞争的资本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不再是资本。如果苏联并不是由许多资本而是由唯一的资本构成,那么怎么能够仍然存在市场竞争?在第二篇文章中,詹姆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一个新的领域——世界市场去寻求结论:苏联在世界市场与其他国家资本的竞争将意味着,价值规律继续适用于苏联。

(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由工资调节,而工资由价值规律支配。由于在现代世界中一个阶级社会的庞大开支;在持续进行的生产技术革命中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追赶其他国家的需要;在自给自足(伴随生产成本的巨量增长)还是对世界市场进行渗透(并因此服从于它的一切波动)之间的选择;帝国主义的争斗和一个落后的经济,这一切迫使斯大林完全像在德国那样看待劳动,把它看做一种商品,按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进行支付。<sup>②</sup>

---

① Johnson 1941a, p. 56.

② Johnson 1941b, p. 214.

无论如何,这个并不完全清楚的段落似乎暗示了三个结论,即:

第一,苏联试图尽量便宜地生产它自己的物品,以免被迫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它们和/或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它们(“追赶的需要”)。

第二,苏联试图获得国外特殊的物品,因为它们的国内生产将使这些物品太贵[“自给自足(伴随着生产成本的巨量增长)”]

第三,苏联的劳动力是商品,因为要维持尽可能低的工资(“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进行支付”)。

杜娜耶夫斯卡娅进一步阐述了詹姆斯提出的观点。她在三篇文章中集中了相当大量的关于苏联社会经济关系的信息,运用俄国的原始资料,并尝试去说明由总人口的 2.05%组成的新统治阶级(她在统计上定义其为知识阶层的“最先进的部分”),<sup>①</sup>此后,她在一篇写于 1946 年末和 1947 年初的分三部分的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更系统的理论。正像沃洛尔早先做过的那样,杜娜耶夫斯卡娅也从一个“证据”——马克思曾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出发。与沃洛尔不同,她求助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另一节,即其中提到全部资本集中化的极限的那一段:全部资本融合到一个大资本家或公司中。<sup>②</sup>

其次,杜娜耶夫斯卡娅再次正好像沃洛尔那样,试图说明这一理论可能性在苏联已成为现实。她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确定,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必须应用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但是其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必须区别于“常规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她看来,两个特征适用于苏联。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占有以一种新方式发生(通过中央计划),而另一方面,价值规律以许多不同方式宣示自己:贫富矛盾已然扩大;工人必须按其价值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防备失去谋生手段;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生产更重要;存在着(隐蔽的)失业;存

<sup>①</sup> Forest 1942—3。我在第三篇文章谈及, p. 57。

<sup>②</sup> “在任何既定的工业部门中,如果所有的个人资本都投向被融入单个资本的那个地方,集中化将到达其极限。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只有当全部社会资本统一掌握在单个的资本家或单个的资本主义公司手中,这一极限才会抵达。”Marx 1976, p. 779。



在着与世界市场其他资本的长期持续的斗争；以及存在着由经济协作问题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危机。

依照杜娜耶夫斯卡娅，新制度确立于 1930 年代中期。反革命用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不同的方式发生了：不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工人的权力逐渐地被侵蚀。当时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计件工资造成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最后，在 1936 年，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的权力已仰仗一部新宪法而合法化，而布尔什维克的老兵在大清洗期间被清除。

对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工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等这些多少有些偶然的论述，在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后来的出版物中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与前面提到的相类似，他们对现代工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在他写于 1950 年的书《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中，詹姆斯以高度发达的美国企业为一方和苏维埃 1936 年以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另一方，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类比。两类组织都以相似的方式（生产线、计件工资）强迫工人从事精神麻木的苦工，而在别的地方受重视的生产过程的知识，在那部官僚机器中被计划方式用于推动积累过程和训练工人。<sup>①</sup>

如果我们把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多种相关出版物集中起来，我们将获得一幅画面：苏联是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国家计划压迫和剥削它自己的工人，并在世界市场上与外国企业和国家进行竞争。

### 卡斯托里亚迪斯/莱福特

从 1946 年起，出生于希腊的经济学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与来自围绕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圈子的哲学家克洛德·莱福特(Claude Lefort)合作，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

<sup>①</sup> James 1969, pp. 39 - 46.

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sup>①</sup>因为他们各自组织的名称,该团体被命名为科尼利厄斯—蒙塔尔思潮(Tendance Chaulieu-Montal)。他们在分别标示着1946年和1947年的两个文件中提出了他们的异端理念。他们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即苏联尽管有许多缺点,然而必须将其当作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来捍卫)予以否定,指出,在苏联,一个新精英阶层即官僚已经征服了权力,而且这个精英阶层独占性地追逐它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新的社会类型,正如同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竭尽全力进行扩张。<sup>②</sup>

最初,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的理论朝着“第三种历史解释方式”(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类型)的方向行进,但是从1948—1949年起,他们把斯大林统治的社会说成“官僚资本主义”,显然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必要去证明这一理论变化。<sup>③</sup>他们为什么保留了相对有差异的应用于苏联的准确“标签”,这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Socialism or Barbarism*)杂志——卡斯托里亚迪斯、莱福特及其支持者在他们于1948年离开第四国际之后出版的期刊——第一期面世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强调:在苏联,尽管消灭了传统的私有财产,但剥削和压迫仍然持续存在。

卡斯托里亚迪斯把剥削定义为社会关系,其中一个社会集团由于它与生产组织的关系,能够占有部分社会产品,这种数量的占有与它对生

① 希腊经济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 1922—1997)在短时期局限在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之后,加入了Spiros Stinas的托洛茨基主义小组。1945年,他移居巴黎,在那里他长期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ECD)工作,同时使用假名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圈子里的积极分子。莱福特(生于1924年)在1943年当学生的时候,已经组织了一个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地下小组。他拜M.梅洛,庞蒂为他的主要老师研究哲学。从1946年起,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始政治合作。见Castoriadis 1975; Lefort 1976—1977; Liebich 1977; Ciaramelli 1987; Busino 1989; Gottraux 1997; van der Linden 1998; David 2000。

② Chaulieu and Montal 1946。

③ 表明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并没有论及“国家资本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后来解释说,他把“国家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几乎完全无意义的表述”,制造了“一场灾难性的混乱……因为它使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在私有财产、市场和竞争消失之后仍然保留着,这是荒谬可笑的。”Castoriadis 1973, pp. 20—1; 英译本,第9—10页。

产过程的贡献不相等。苏维埃官僚在他眼中构成了这样一个剥削群体。毕竟,官僚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分配制度,并掌握了社会消费资金,它因此表现为死劳动,凌驾于活劳动之上。它作为一个统治和剥削的集体(不像传统的资产阶级),使苏联不亚于一个资本家,因为资本家的剥削是指

生产者并不拥有由他们处置的生产资料,包括个体的(小手工业者)和集体(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而且活劳动取代支配性的死劳动,通过生产资料人格化的个人(资本家)的中介被生产资料所支配。<sup>①</sup>

苏联只有唯一一个全能的雇主这一事实,明显地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因为,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挣工资的人可以改换他们的雇主,而俄国工人的自由是受限制的:通常,他们既不可能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也从来不可能不介意他们的国家。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地位有点儿类似农奴。

工人流动性的有限的可能性,是与近乎全面缺乏对剥削的制约相关的。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工资水平和其他就业条件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谈判产生,而苏维埃官僚可以单方面地强制实行这些条件。无可否认它受制于某些限度(例如,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保障),但是它的操控能力仍然极其强大。作为他们的零件,被剥夺了自治组织和生存保障降低到最低值的工人只有两种反抗的可能性:偷窃(成品和半成品、工具等)和通过生产劣质产品所表达的冷漠。

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整个状况——它可以被描述为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个社会小集团和“人类劳动生产力中可怕的危机”的矛盾统一<sup>②</sup>——在一个意义上是俄国工人本身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认识到,1917年以后剥夺资本家只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否定的动力”。毕竟,肯定的那一半,应由全部管理向工人阶级让渡来构成。俄国工人没有彻

<sup>①</sup> Chaulieu 1949, p. 34; 英译本,第 13 页。

<sup>②</sup> Chaulieu 1949, p. 47; 英译本,第 141 页。

底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抑或他们的不作为)造成了官僚的权力。

工人们认为,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资本家(往往仰仗于布尔什维克的愿望),占领了工厂之后必将是把管理移交给政府,移交给布尔什维克党,移交给工会领袖。通过这种做法,无产阶级正在它奋力创造的新社会中放弃它自己的根本作用。<sup>①</sup>

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以这种方式接近了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的观点。诚然,他们并没有提出两个美国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问题(例如世界市场问题),但是他们对企业层面权力关系的重视类似于约翰逊—福斯特思潮。因此,科尼利厄—蒙塔尔思潮和约翰逊—福斯特思潮相互保持联系,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杂志发表了这些美国人的论著。<sup>②</sup>

## 克利夫

伊格尔·格卢克斯坦(Ygael Gluckstein, 1917—2000),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sup>③</sup>)为笔名写作,自大约1947年起在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组织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反对派。他起初在1947年批判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和官僚的集体主义论之后,于1948年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性质》(*The Nature of Stalinist*

<sup>①</sup> Chaulieu 1949, p. 35; 英译本,第97页。

<sup>②</sup> Paul Romano(Phil Singer)和Ria Stone(Grace Lee)写作的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作为《美国的工人》一文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1949—1950年第1—7期上连载。1958年,围绕詹姆斯和《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杂志的团体合作了一本书。见Lee, Chaulieu和Johnson 1958。背景信息载Boggs 1998, p. 62。

<sup>③</sup> 格卢克斯坦/克利夫1917年生于巴勒斯坦。从大约1938年起,他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于1946年移居英国。1947年,他被引渡,并定居于爱尔兰。但是,因为他的家在英国,他定期访问英国,并参加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讨论。1952年,回到英国,在那里成为工党内部的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国际社会主义者,以及更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与同名的美国党相混淆)即脱胎于此——的领导人。该信息基于1979年7月9日在伦敦对作者的一次访谈。进一步见Cliff 1979和2000,和Sarney 2000。

Russia)为题发表了对他自己观点的一个详尽说明,这是一本有多个修订和扩充版、被数次重印的书。克利夫通过1944年后的东欧事件调整了思想。如果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些缓冲区国家是工人国家,那么,正如他所总结的,斯大林就是在那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建立没有无产阶级自己行动的无产阶级国家,就会是可能的。克利夫认为自己遭遇了两个互相排斥的逻辑可能性:要么,东欧缓冲地区构建了真正的工人国家,于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可以由他人来实现;否则,只有工人阶级能够解放自己,于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就无法维持。在这一悖论中,他自己的选择是明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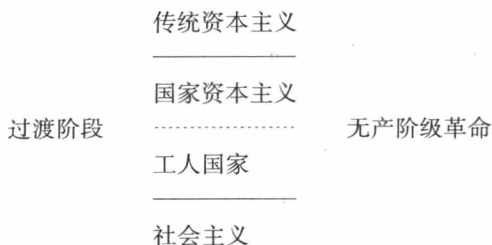
当我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论时,我并不通过对价值规律在俄国、经济统计学在俄国的冗长分析达到它。没有任何这类东西。我是通过简单的陈述来达到它,即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的行动,那么你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权指令社会发生什么的、没有工人的工人国家。于是,我必须在托洛茨基所说的东西——托洛茨基的核心是工人阶级的自我主动性——和所有权形式之间进行选择。我决定抛开决定该问题的所有权形式。<sup>①</sup>

克利夫回到了托洛茨基1933年以前捍卫的观点,即唯一能使关于工人国家的讨论有意义的事情在于,是否需要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掌控。一旦不存在这个情况,人们也就再也不可能说存在一个工人国家,不管人们说它“蜕化”与否。那样,人们就可以把工人国家的概念运用于1917到1918年时期的俄国,因为当时它有一个社会性的自主化行政系统,但是,不能将之运用于那以后的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构成了革命性质的改变:官僚制开始以此为起点高速实行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大批无产阶级的产生和资本积累)。<sup>②</sup>

<sup>①</sup> Cliff 1979, p. 21.

<sup>②</sup> Cliff 1948, pp. 59-60, 81; 2003年重印版,第56、75页。

克利夫将斯大林体制下所巩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理论极限”。<sup>①</sup> 正如一个工人国家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最后的过渡阶段。人们可以用以下图表表述这一思想:



既然不可能以渐进方式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取资产阶级武装,因而国家资本主义向工人国家的过渡本质上必然是暴力的,克利夫相信,相反的过渡(据说1928年前后已在俄国发生)也可能没有暴力。这里唯一的需要是,军队的内部民主制逐渐瓦解,并代之以一个来自下层的失控的指挥结构。<sup>②</sup>

那么,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有哪些特点? 克利夫表示,他已相当透彻地研究了相关的当代文献,<sup>③</sup>把形形色色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元素结合在一个与众不同的综合方式中,这在最初看上去显得非常协调一致。他支持希夫亭的观点,苏联的价格机制不表达自发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一条(不完全是武断地决定的)传动带,国家机器以此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劳动分工。他分享了杜娜耶夫斯卡娅和詹姆斯的观点,相信个体企业在俄国不是自主的经济单位,而仅仅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从属的齿轮。<sup>④</sup> 如果

① Cliff 1948, p. 62; 2003年重印版,第58页。

② Cliff 1948, p. 82.

③ 参见Laurat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Marxism and Democracy*, p. 16; 2003年重印版, p. 15),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 p. 61; 2003年重印版, p. 57)和希夫亭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p. 97; 2003年重印版, pp. 128—129。

④ 在一个短时期,克利夫维持了与杜娜耶夫斯卡娅的同志式关系。罗伊·查理诺尔报道,两人曾就关于苏联理论中的“劳动分工”达成一致:“我有一封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的来信,说她在1946年(第四国际的)第四届世界代表大会上会见了克利夫。他们同意她将投入时间研究哲学问题,而克利夫将考虑经济问题。”Challinor 1995, p. 27.

人们认为苏联处于孤立中,排除对国际背景的考虑,那么它就会极像“一个大工厂”,受一个中心的领导。如果人们在分析中包括了世界关系,那么这个大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特点就显而易见;当时众所周知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苏联,堪比任何一个寻求在竞争关系中生存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然而克利夫并未放弃这一分析。当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已不考虑苏联和外国竞争者之间真正的竞争本质时,他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他的出发点是下述观察:

到目前为止,俄国的落后已经排除了一切有关俄国产品泛滥于外国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俄国市场则通过惟有军事力量才能摧毁的外贸垄断,阻止了外国商品的泛滥。<sup>①</sup>

不过这一状况可以用来说明,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苏联并不与其他外国资本竞争。而如果是这个情况,那么谈论“资本”在根本上还会有意义吗?克利夫认为,他可以通过假设国际竞争并不靠商品发生,而是靠以军备形式的使用价值发生,来中和那种明显的反对意见。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的“创新”——这毕竟只涉及依靠已经实现的价值竞争(商品的有效销售)——得到了克利夫下述方式的辩护:

价值表达独立生产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俄国坚持参与竞争的成果,是通过将使用价值提升为一种目标来表达的,该目标在这一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因此,使用价值一旦成为目标,将仍然是一种手段。<sup>②</sup>

---

① Cliff 1948, p. 99;重印于2003年,第91页。

② Cliff 1948, p. 100;2003年重印版, p. 92。许多作者声称,克利夫的理论类似于官僚集体主义论,因为二者都假设价值规律在苏联内部不适用。(参见,举例来说, Hobson 和 Tabor 1988, p. 369。)尤其在克利夫和约瑟夫之间,显然存在突出的相似之处,他们把苏联定义为“巨大的国民托管组织”(Carter 1941, p. 218;见上述第三章),但是这一解释没注意到克利夫设计他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即因为在他看来,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不可能解释苏联的经济增长。克利夫称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仅仅是否定的”并“因此是空洞的、抽象的因而是武断的”理论。(Cliff 1948b, p. 156)

## 波迪加

阿马德奥·波迪加(Amadeo Bordiga, 1889—1970), 意大利共产党前领导人, 1930 年被该组织开除, 曾在有关政治问题上完全保持沉默, 直到墨索里尼确实垮台。<sup>①</sup> 然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当时他的影响力减少到只局限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少数几个边缘性政治团体, 但是他立即着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波迪加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永恒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不变的本质, 正像他对这些原则的解释), 他把从最新的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一批判的历史重构的过程中, 对产生于十月革命的那个社会的分析占据了中心地位。从 1946 年起到 1970 年他去世, 波迪加发表了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于苏联的文章, 后来被收录入书。如瑞切斯(Riechers)的评论所述, 所有这些作品的巅峰, 处于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和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间这一时期。<sup>②</sup> 波迪加把自己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区别, 后者致力于获取对苏联详尽的经验辨析。

除了一篇用笔名“Alfa”发表的早期短文<sup>③</sup>, 波迪加最重要的著作(大多数用化名发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在他的政治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会议上所做的演讲。这些冗长的讲话部分连载于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纲领》(*Programma Comunista*)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迪加 1954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俄国和革命》为题发表;<sup>④</sup> 以及 1955 年 4 月 24 日和 25 日在那

① 有两个关于波迪加的政治传记: de Clementi 1971 和 Livorsi 1976。两个传记都可以理解地对波迪加早年的“光荣岁月”投入了特殊的关注。也见 Camatte 1974 and 1975; Grilli 1982; Goldner 1991; Peregalli 和 Saggiaro 1995 和 1998; Bresciani 2001。

② Riechers 1977, p. 157。也见 Camatte 1975, p. 8: “至于涉及他所称的‘俄国问题’, 他写过很多东西……特别是在 1954—1957 年那个时期, 当时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着迷”。

③ Alfa 1946。

④ Bordiga 1954—1955。在博洛尼亚会议上的短报告, 载 Anon. 1954。



不勒斯,1955年8月6日和7日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发言,以《今日俄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为题发表。<sup>①</sup>

第二类,是带有虚构性的对话。每一个对话(看上去实际上更像是自言自语)都分成三个“时期”,并解释了作者对苏联方面刊发的一个文本的立场。相应的出版物是《与斯大林的对话》(1952),对斯大林同一年的论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判,<sup>②</sup>以及《与死者的对话》(1956),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的回应。<sup>③</sup>此外,波迪加论述了以前的所有类型的问题,多少附带地论及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sup>④</sup>在波迪加后期全部论述中显示出来的对苏联的巨大兴趣,是整个“波迪加主义”思潮所共有的。这种全情关注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深刻意见分歧引发了1952年的分裂。<sup>⑤</sup>

波迪加认为,1917年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反封建的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资产阶级(农民也被认为与之结盟)和无产阶级形成了暂时的同盟。这样一场革命,由于无产阶级的重要贡献,可能导致三个结果:

第一,胜利(最初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福音)——由该运动转变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模式。

第二,胜利后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接踵而至。

第三,失败——造成旧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复辟。<sup>⑥</sup>

布尔什维克在为上述第一个结果而奋斗,但并不成功。由于1920

---

① Bordiga 1955a, 1955b, 1955—1957. 关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那些会议的信息出于 Anon. 1955a 和 1955b。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一系列文章后来作为增补部分重新发表于 Bordiga 1976。

② Bordiga 1952a. 作为一本题为《与斯大林对话》(*Dialogato con Stalin*)的书出版。见 Bordiga 1953。

③ Bordiga 1956a and 1956b.

④ 例如,Orso 1948—1952。

⑤ Vega 1952; Damen 1977; Burrinet 1981, p. 180. Damen 将苏联的资本主义等同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而波迪加明确地否定了这个观点。

⑥ Bordiga 1951.

年代期间激进势头的退潮(特别是在西欧和中欧),国际资产阶级可以去实现第二个变量。在一个“漫长的回旋期”中,它的产生显然没有更多地流血,不是对权力精英形式上的替代。<sup>①</sup>因此,封建束缚迅速让路于剧烈展开的资本主义。

因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已把苏联视为后资本主义的复合体,而克利夫及其追随者认为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波迪加则认为只存在一个非常“初始的”资本主义,用他的话说,“一个并非从资本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sup>②</sup>1952年,波迪加甚至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发展水平与1848年以后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相比。<sup>③</sup>

在他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苏联的描述中,波迪加采用了一个非常异质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概念。在他的定义中,比如存在还是缺乏一个统治阶级的社会学因素,和关于国家干预性质的政治因素,根本不起作用;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由按照一般等价物(货币)计算收支和争取投入产出之间的差异最大化(“利润”)的企业组成,资本主义就存在。这一定义宣称摆脱了谁剥夺了这一“利润”的问题:

当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或被“解释”为企业资产、被理解成一个独特的但非常之大的经济孤立体,同时劳动者的报酬被置于负债方时,资本主义始终是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伴随着复式簿记的经济学。资产阶级个人不是一个人类个体,而是一个公司。<sup>④</sup>

对于我们,现代世界中的每一个商品生产体系,在与劳动力相关的领域,也即工人在生产公司中类集,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sup>⑤</sup>

基于这一总体概括的定义,波迪加以逻辑一贯性来“证明”苏维埃经

① Alfa 1946, p. 35.

② Bordiga 1953, p. 29.

③ Bordiga 1952b.

④ Orso 1948—1952(1948年11—12月期间),第497页。

⑤ Bordiga 1953, p. 17.

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显然并不困难。苏维埃国家在性质上区别于“常规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如前所述,对波迪加不具任何重要性。毕竟,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在对生产关系的特定叙述中无法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国家在苏联并不体现一个独立阶级的权力,它最多只能被视为这种权力的代表。

与伯纳姆相反,波迪加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国家官僚永远只构成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从不化身为统治阶级本身。超出工具范围,谈论苏联的统治官僚没有任何意义,尚且有另一个理由:人口的大多数受雇于国家。<sup>①</sup> 尽管资本主义已经胜利了,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并没有因此崛起。国家只是一个仲裁者,一种工人阶级通过它受剥削和压迫的“竞争渠道”。从这一状况中得益的真正代表是俄国的农民和国际资产阶级。<sup>②</sup>

###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 古特曼

约瑟夫·古特曼(Josef Guttmann, 1902—1958),曾在一段时间被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最有前途的青年共产主义者领袖。他是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921 年创建起就加入该党的积极分子,当时他 19 岁。八年以后,他被选入政治局,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红色权力》(*Rudé Právo*)的主编。随后在 1931 年被任命为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然而这一段耀眼的政治生涯在 1932 年戛然而止,当时古特曼开始批评德国共产主义者执行的对希特勒的策略。他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一种他开始觉得有吸引力的思潮。1933 年,他被开除出党的所有领导机关。<sup>③</sup>

① “……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所有人都是官僚”,Bordiga 1952c。这一陈述必须被看作修辞夸张;在全书中其他的地方,他找到了使普遍的公共服务相对化的途径。

② Bordiga 1976, p. 507.

③ Lazitch and Drachkovitch 1973, pp. 137 - 8; Rupnik 1976; 和 Broué 1982b.

古特曼 1938 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后经由哥本哈根和伦敦前往美国;到达那里之后,他积极地参加了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移民中的政治讨论,并发展了他自己的苏联理论。他第一次在移民同僚卡尔·魏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住所的著名会议上提出这一观点,并随后在 1944 年以 Peter Meyer 的笔名发表。<sup>①</sup> 古特曼反对那种非此即彼(*tertium-non-datur*,拉丁语,意为“没有第三种可能性”。——译者注)的观点,认为它或明或暗地隐含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家和(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理论家的根本前提。他们指责缺少对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特点进行的特殊定义,并推断已存在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比较而言,古特曼愿意认可第三种可能性,即他们对苏联的两种否定性解释都是正确的。正如“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家”的支持者所正确指出的,资产阶级和价值规律的统治在苏联是缺位的,但也正如“国家资本主义”所正确指出的,社会平等、自由和民主在苏联同样是缺位的。他相信,唯有这两个观点的结合,才能对斯大林主义形态提供真正的洞见。

开始看来似乎是,他们的两种否定性观点都是正确的,而当他们从这些观点非常危险地跳跃……到他们的结论时,两方面都是错误的。也许俄罗斯既不存在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社会主义,而是第

<sup>①</sup> 魏特福格尔在 1970 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在这里,我(在美国作为移民——本书作者马歇尔·范·林登注)在这所房子里,第一次接触了……激进的分裂主义者、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的那个男人做了一个关于苏联“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分析,这给凯斯特勒(Koestler)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带有我们天生注定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和半列宁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一质疑极其严重。”Greffrath 1979, p. 328. 亨利·雅柯比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君特·雷曼(Günther Reimann)带我们去会见卡尔·魏特福格尔。到了那里,我们遇到了约瑟夫·古特曼(昵称 Pepik)和布拉格共产主义党前领导人卡兰兹拉(Kalandra)。”“他一开始说话,人们就佩服他的清晰和敏锐。他详细作了关于苏联作为一个阶级国家的解释。管理和控制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私有财产。他后来用彼得·迈耶尔(Peter Meyer)的笔名在《政治学》(*Politics*)杂志上对此做了广泛的说明。”Jacoby 1983, p. 120. 更多可利用的信息载 Ulmen 1978, pp. 266, 566. 不过,这个作者错误地称古特曼后来把他的名字改为“Gordon”。Meyer (Josef Guttmann) 1944, p. 49; Greffrath 1979, p. 328.

三种事物,某种在历史上相当新颖的东西。<sup>①</sup>

在论及国家在经济中的统治作用、饥荒和实际工资下降、收入不平等、工人的无权状态和缺乏政治权力之后,古特曼得出了苏联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论。但是,这个统治阶级是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类型。古特曼的解释可呈现为下表:

	资 本 主 义	苏 联
生产资料	通过私有财产权利控制	通过社会行政权利控制
	由私人雇主管理	由等级制的集体管理
劳动力	工人可以选择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谁(在有限的时间内)	工人的劳动力无限期地从属于集体剥削者
工资水平	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界线被竞争的劳动市场和经济规律的自发运作所决定	总产品和剩余产品之间的界线由官僚剥削的努力所决定。工资水平被压到更低的限度,在此之下工人阶级处于灭绝的危险中

古特曼还在与资本主义的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比较中,确定了苏联的中间阶级[集体农庄的农民、劳动者贵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然而苏联的中间阶级的存在无法防止统治者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封闭。依赖裙带关系、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和继承的财富,未来的官僚阶层主要由官僚的子女组成。

与早期的理论家们相比,古特曼很能看出该官僚制度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失衡。首先,他确定了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每个统治阶级成员的社会位置——他的地位、工资等,有时甚至包括他的生命和肢体本身——都仰赖于计划的实现,而且因为物品的投入和产出价格由上方决定,所以每个官僚都感到要强迫降低工资和提高工作速度。<sup>②</sup> 但

<sup>①</sup> Meyer 1944, p. 49.

<sup>②</sup> 逻辑上的必然环节是,如果仍然维持在该计划之初就存在的价格和工资,该计划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古特曼并不同意这个说法。

是,由于低工资,工人营养不良,减少了劳动生产力,因此也减少了社会产品,以至于官僚必须再降低工人的生活标准,去实现计划产出量。

其次,资本主义的缺位和社会主义的矫正方式(一方面是价格和利润,另一方面是民主统治)意味着,整个计划过程变得混乱无序。

“唯一来自上面”的管制和批评无法替代公共管理。如果来自上面的指令即使毫无意义和无法实行都不受批评,那就不得不弄虚作假去执行它们。专制制度迫使每个人去说谎。……即使用最好的统计学,计划经济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它们变成了统治。<sup>①</sup>

古特曼说明该官僚制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中维持,是依靠了计划经济提供的如下优点:在紧急形势下,所有人员和物资可以被集中在一项任务上,没有任何社会障碍挡道。

如果苏联社会将产生向社会主义的真正过渡,那么像托洛茨基建议的一场政治革命是不够的;需要一场总体的社会革命,它将在质上改变那种生产关系。

#### 第四节 “无标签”的种种解释

1950年代初产生了一种有意思的理论发展。几个来自西德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从1930年代起用以描述苏联的种种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标签太过粗陋,并试图阐明比旧方法更“开放”的新理论。这些作者不是太重视寻求正确的描述,而是去寻找一种可能与观察事实相符的理论。他们中仍珍视早期理论的人认识到,把一切传统“标签”都归于苏联比较勉强。因此,比如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他曾指出苏联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的蜕化过程)说:

<sup>①</sup> Meyer 1944, p. 83.

如果适当地思考这个政权的历史起源和历史地位,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两点远比人们可能选择的名称更根本。

他因此拒绝使用如“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官僚的集体主义”等标签。<sup>①</sup>

这一(短暂的)反教条主义是与1949年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和联邦德国以“独立工人党”(UAP)命名的铁托主义运动的出现相联系的。<sup>②</sup>虽然独立工人党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该党只存在于1950至1951年),虽然铁托最重要的思想家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为这一时期各式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辩护,<sup>③</sup>但是它所体现的对共产主义正统性的侵蚀似乎也激发了其他许多更大胆的解释。新异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中以及在围绕独立工人党的圈子中处处可见。

### 斯泰因伯格

经济学家弗里茨·斯泰因伯格(Fritz Sternberg, 1895—1963)<sup>④</sup>从1926年起就是国际知名学者,他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Imperialism*)对1950年代初的苏联分析做出了一些贡献。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斯泰因伯格明显不再像20年前那样接近托洛茨基,而且同时已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变体。

在他1951年出版的概括性广泛的著作《研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中,斯泰因伯格适当地关注变化的世界形势,概括地分析了俄国社会自1917年以来的发展。首先,有意义

---

① Lenz 1950. 这个“Lenz”是赫尔穆特·弗莱舍的笔名,是在弗莱舍注明的1987年2月3日致那个作者的信中显露出来的。

② 见论这一题目的Kulemann 1978。这个党肯定不会被建于1962年的右翼极端主义的独立工人党所迷惑。

③ Djilas 1951。

④ 更多的自传资料载 Grebing 1981, pp. 582 - 92。

的是,与其他许多人不同,他反对一切贴标签的倾向。俄国(斯泰因伯格几乎从不提“苏联”)已经在国内终结了封建关系,同时消灭了资本主义。同时,它所建立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像任何东西。相反,一个压迫性的党的专政已经产生,它接续了一些沙俄帝国的传统。在政治上,这种矛盾状况的结果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形式(依照斯泰因伯格的看法,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它混杂了进步的和反动的潮流:“企图用一个名称来概括它(比如,新的国家形式)是徒劳无益的。把俄国发展的一面误认为另一面,容易发生误导。”<sup>①</sup>

在他对十月革命后的发展的重新解释中,斯泰因伯格也注意到其他人已确认的许多方面:该党专政的社会基础的缩小,比如表现为工会的阶层化、在世界市场上的那种独裁倾向,等等。在这一解释中,他指出,这种党的专政最初(在列宁的领导下)主要是对准旧剥削者的,但已越来越发展成一种专政,它通过对工人和农民生活标准的强大干预,强制推行工业化进程。

对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斯泰因伯格添加了两个新要点。第一,他相信,惟有人们认识到农业集体化的结果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同,才能正确理解农业集体化。也就是说,国家拥有农业集体的机械(拖拉机和各种工具)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集体像旧中国的乡村社会那样依靠国家。搞不清楚这些判断是否受魏特福格尔的影响。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斯泰因伯格通过解释水利方面的相似例子,的确是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接近了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其次,斯泰因伯格打算把战后苏联对东欧的扩张称为“红色帝国主义”,带有限定的条件,即指一个受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影响的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当资本主义在它的殖民地实现了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联盟时,苏联推动了一场土地革命;当资本主义操纵限制其殖民地的工业化时,苏联相反刺激了工业化;而资本主义为了寻求高利润销售其

---

<sup>①</sup> Sternberg 1951, p. 172.



商品剩余进行扩张时,苏联经受着物品短缺,并且没有任何必要把物品销往其他地方。简言之,“红色帝国主义”的社会内涵完全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内涵。依据斯泰因伯格,这也意味着,对于苏联,不存在扩张主义的内在必要性,尽管这样一种扩张对于维持该政权肯定会有某种效用。

同年,斯泰因伯格还出版了另一本关于苏联的书,题为《它这样终结……》(*So It Ends...*)。在这本著作中,他在全面推进同类观点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他不再提及一个结合了进步和反动潮流的社会,而说成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必须在全球的每一层面上(政治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与之进行斗争。<sup>①</sup>

## 赛康

1952至1953年,新闻记者迪特尔·赛康(Dieter Cycon, 1923— )<sup>②</sup>在《火花》[*Funken*, 弗里茨·兰姆(Fritz Lamm)及其追随者的独立左派社会主义者月刊]上,用缩写名字“D. C.”发表了一些锋芒毕露的文章。在对各种反驳[由亨利·雅柯比(Henry Jacoby),化名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和荷兰社会主义者弗里茨·基夫(Frits Kief)提出]的回答中,赛康后来扩展了他的一些分析。

赛康对斯泰因伯格的著作的理解,<sup>③</sup>至少像后者一样认真。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赛康争辩如下:

多数观察者认为,我们对苏联的进步知道得太少,而且我们知道的那一点点也是不完整的,并且总是从一种特殊的观点去看。说

① Sternberg 1952.

② 赛康从1948年起就是《斯图加特报》(*Stuttgarter Zeitung*)的编辑。1951到1953年,他在《火花》上发表作品。从1957年起,他在政治上演变成右派。1969年,他成为保守派日报《世界》(*Die Welt*)的外国事务专栏的首席记者。这一信息根据伯恩德·克莱姆(Hannover)标注1986年10月22日致作者的一封信,和Kreter 1986,第94—96、190页。

③ 见对Sternberg 1951的评论,载于Cycon 1952b,第6页。

到底,我们正在对待一个历史上独特的经验,没有可比性。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参照点,用那些肯定能及时被证明是错误的常识,来仔细地得出一些结论。<sup>①</sup>

在苏联自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发展中,赛康发现了运行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共产党内一个小领导集团的独裁权力;强制性的工业化;以及伴随这一工业化的一个具有技术和经济功能的主要阶层的出现,他将这个阶层指称为“新知识阶层”。

由于大型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复存在,这个新知识阶层在社会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知识因此成为一种比财富更大的资源。它是一个包括了在收入和社会权力上差别极大的大规模职业群体的阶层。尽管就平均水平而言,他们在物质上都比工人和农民富裕,但是他们内部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其最低层的生活水平接近于工人的生活水平。相互的社会界限因此是相当不固定的。

新知识阶层能够争取和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他们的职业知识。在这个范围内,这种知识越来越形成社会垄断(因为作为非新知识阶层子女的其他人不太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知识精英能使自己与社会其他部分相隔离,并将自己转变成真正的统治阶级”。依据赛康,这个走向的趋势已显而易见,然而这个过程决没有完结:“具有大大小小功能的数百万管理人员决没有成功地使这一阶级形态稳定化”。<sup>②</sup>

赛康并没有明确回答该阶级形成过程究竟是否会达到其稳定点的问题。他的观点似乎的确是指向另一方向。他注意到,苏联经济自大约1930年代以来的“显著增长”可能是由于三个因素的结合形成的:投资品生产的优先性;一个非常低的生活水准(由于相对抑制消费品领域的生产能力);以及大范围的恐怖行为(必须强迫全民接受那些不得不做出的

---

<sup>①</sup> Cycon 1953b, p. 9.

<sup>②</sup> Cycon 1952a, p. 4.

牺牲)。<sup>①</sup>

在1950年代初,赛康称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成果:重工业达到了高水平,国家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可观。因此,正像最新的五年计划目标建议的那样,到了更多地注重消费品部门的时候了。现在,计划有可能既提高新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平,从而巩固它的统治阶级地位,也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平等(这还可能减少恐怖行为)。

苏联领导层可能会选择这些选项的哪一项,取决于这个社会等级制度最高层的权力关系。赛康发现了以党的领导层为一方和以经济官僚及国家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更多的权力,顺着阶级国家的方向发挥作用;前者则操控着这一发展。党的领导阶层高踞于形成中的新阶级之上,抵制官僚阶层的膨胀,并试图通过各种清洗使社会体制更有活力。通过在广泛的人口阶层中寻求支持,它试图控制住官僚制。赛康似乎有信心取得这一工程的成功。至少,他的一篇文章设想,总体生活水平从1960年代起将会有很大提高。<sup>②</sup>

### 弗勒利克

保罗·弗勒利克(Paul Frölich, 1884—1953)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老兵,曾是魏玛共和国国会中的共产党议员代表,并在后来(1932年)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从1934到1935年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先是在法国,后来在美国。在重返联邦德国后,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

<sup>①</sup> Cycon 1953a, p. 8. 赛康的文章激起了相当大的争论。我特别提到 Franck 1953a; Kief 1953; Cycon 1953b; Hellmann 1953; Weinberg 1953; 和 Leonhard 1953。关于这些文稿,从我研究的观点看, Susanne Leonhard 的文章是最有意思的。与赛康形成对比, Leonhard 持以下观点:苏联官僚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和自我再生产的精英,但是看不到把它命名为一个阶级的任何理由,因为它是过于异质性的和内部分化的。她认为,苏联工人还未形成一个阶级,因为不再存在自由的劳动力和多样的购买者,也不存在争取自由的组织的可能性。她在整体上把苏联描述成一个发展的专政(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关于 Leonhard, 1895—1984 的生平,见 Weber 1984, 她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度过了许多年。

<sup>②</sup> Cycon 1953a.

此外在《火花》即赛康也发过稿的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sup>①</sup>

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弗勒利克继续写作一本关于斯大林政权本质的书。这一未完成研究的片段很晚才发表，<sup>②</sup>但是通过在西德政治出版社的一些书稿和他与其他左翼社会主义者的相同观点，弗勒利克理论的重要成分在1950年代初已广为人知。弗勒利克在他致罗斯道尔斯基的一封信中称苏联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并补充道，“将为这一现象建立名称。同时，如果人们设想该问题”<sup>③</sup>，像大多数作者一样解释斯大林主义专政的起源，解释关于西方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程度，“这个名称能够做到”。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弗勒利克从客观原因推论这一缺乏：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别处，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至今并不存在。俄国革命因此在试图建立社会主义中不得不失败。其结果是：

一个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但是，它是一个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屏障的制度，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的规律不再适用于它。而这个计划经济以最残酷的矛盾和最野蛮的统治方式在一个社会中实现，这完全是社会主义时机未成熟的结果。<sup>④</sup>

在作者身后出版的那些片段中(与他生前发表的反思部分相同)，弗勒利克试图通过研究与“第一流的”统治官僚机构(例如中华帝国)的差异和类同，更深刻地认识苏联官僚制。他的理念出发点是：明显稳定的“中国”类型官僚制，只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限的、相对平衡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官僚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现象。在这个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中，弗勒利克发现了大量不稳定的均

① Klemm 1983.

② Frölich 1976.

③ 弗勒利克1950年6月20日致罗曼·罗斯道尔斯基的信，载于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罗斯道尔斯基档案文件。罗斯道尔斯基论文的案卷保管人 Wilbert van Miert，善意地提醒我注意这封信。

④ Frölich 1952, p. 13.

衡的一种结合体,它将会在或短或长的期限内走向动荡不安。

第一,目前匮乏的中间阶层将能够吸收和疏导官僚“机器”与人口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例如,当专制主义国家不断从特权阶层和剥削农村人口的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取得长期支持时,“极权主义的”苏联官僚制却形成了一个国家机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联合体。这使统治阶级成为一个非常残酷的和压制性的政权,一旦人民大众开始动员起来,其政权地位就将受到挑战。

第二,该官僚统治阶层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精英阶层,它保持自己对教育的垄断,并开始呈现出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各种特点。这最终将对精英的行动能力和政策决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统治能力在什么地方变成一种可靠的特权,其承载者的道德将不可避免地耗竭殆尽。意志力、付出巨大牺牲的准备、一个人与自己个性的不计后果的斗争,当然还有作为统治阶层的态度的坚定性,肯定都将变得麻木不仁。操控成为一种常规。然而如果这部机器变得墨守成规,它就会变得不可能适应新的条件。<sup>①</sup>

第三,精英的僵化导致一种渐进的官僚化。工人以及在那个官僚体制内的各种阶层,都被剥夺了行动自由和争取自由能动性的可能性。那时,阴谋诡计和奴颜婢膝开始决定行为密码。

第四,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出现,窒息了任何一种形式的独立思想。批判成为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橡皮图章式的教条主义。过去曾作为衷心搜集讨论意见的论坛的党,现已蜕化成一个只允许唯唯诺诺的人发出和听从命令的集团。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意味着,在非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中的这个非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官僚专政是极其脆弱的。虽然不能排除该政权在相当一个时期仍然会“不可动摇”的可能性,但它的垮台被断定是不可避免的。

---

<sup>①</sup> Frölich 1976, p. 152.

## 科夫勒

利奥·科夫勒(Leo Kofler, 1907—1995),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学生, 阿德勒评价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他确认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 确认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已属于该党”<sup>①</sup>。1947至1950年他曾在东德工作, 后来前往西德。<sup>②</sup> 在重新定居之后, 他很快撰写了几本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书。1951年, 他用 Jules D'éverité 的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 还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arxist or Stalinist Marxism?*)。在这本小册子中, 他加入了反对那些宣称计划经济的存在和全能官僚制的崛起有着因果关系的人的辩论。1952年, 科夫勒的《卢卡奇的例子》(*The Case of Lukács*)即关于这个匈牙利哲学家的评论面世了。在他看来, 卢卡奇是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最伟大的批评家和最伟大的理论家。<sup>③</sup> 他随后立即出版了《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本质和作用》(*The Essence and Role of the Stalinist Bureaucracy*)一书。

在后一本书中, 作者时而倾向于铁托主义, 试图戳穿苏联社会的本质。尽管科夫勒正如铁托主义者那样, 将斯大林主义官僚说成一个有特权的社会阶层,<sup>④</sup>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计划经济内行动,<sup>⑤</sup> 不过, 科夫勒不同意这一官僚制在本质上是寄生性的观点。毕竟解释不了它主动争取和捍卫特权的事实; 真正的问题涉及允许官僚获取如此之多权力的环境, 它能够使官僚积累这些特权, 并能够使特权保留数十年。<sup>⑥</sup>

① D'éverité 1951, p. 5. 着重为原文所加。

② 自传资料载: Garstka and Seppmann 1980, pp. 11-26。也见这一文选中《关于利奥·科夫勒生活和工作的记载》一文, 第305—309页。

③ Kofler 1952a.

④ Kofler 1952b, p. 25.

⑤ Kofler 1952b, p. 73.

⑥ Kofler 1952b, p. 24.

科夫勒认为,即使是一个从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革命后的社会,也将不得不应对种种严峻的内在困难。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的评论相一致,科夫勒假定,在这些环境下,在新生产方式和保留下来的旧分配方式(货币、资产阶级的公平)以及官僚制之间的矛盾将会继续存在。不过,在一个民主过渡社会,决策将从下层产生,计划经济的官僚式蜕化的可能性将因此被排除。<sup>①</sup>

然而,在苏联,另一个大问题使这一状况变得复杂了。第一,几乎没有民主传统。那些将能够阻止向一种新的独裁发展的少许力量,在国内战争中被摧毁了。第二,1917年前后的俄国的确不具备工业发展的先进水平。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本积累和消费品生产趋于相互增长(一个科夫勒并未详细解释的概念),而积累的发生并不以损害消费为代价。然而,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如苏联,两个经济部类之间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原始积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组成——在损害消费品生产的情况下发生。官僚制因此肩负了为这一鸿沟搭桥的矛盾任务,并至少确保不让这一矛盾爆发。表面上,它充当了一个客观的仲裁人,只关注这一总体的利益,也就是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但是实际上,它反对群众的利益,捍卫积累的利益。在这一政策框架中,它肆无忌惮地将它的权力扩张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包括文化和精神领域。<sup>②</sup> 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官僚相比,是由曾经是“理想主义的”和主观上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组成的。科夫勒鉴别出其某种与早期资产阶级官僚(在16和17世纪)相似的特征。正像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官员(因为他们都卷入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顽强斗争)一样,斯大林主义的精英也曾是献身的和乐观的。这两个社会集团都表现出那些马克思和韦伯所认定的早期资产阶级的

---

① Kofler 1952b, pp. 19 - 22.

② Kofler 1952b, pp. 23 - 4.

典型特征：

积累的狂热、勤奋和这一态度的道德底色，不仅在它自己的阶级中，而且首先在工人群众中，有一个实现基本以纪律约束为主的教育效果的目标。<sup>①</sup>

毋庸讳言，科夫勒将这一相似特征（他并不想扯得太远，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缺少禁欲者的狂热和个人节俭的努力）与以下事实相联系：两种官僚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都是工具性的。<sup>②</sup> 凭借这一分析，科夫勒得出了以下结论：斯大林主义，由于其官僚制和恐怖行为，“迟早”将会消失。<sup>③</sup> 积累和消费之间的鸿沟一旦被填平，一个在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就可能会出现。

## 第五节 各种争论与相互批判

### 多伊彻争论

进入 1940 年代，讨论主要围绕着苏联制度如何产生、它应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广泛的历史清理中定位的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参与者对于这一社会形态结局的思考存在两种主要看法：要么工人阶级将在适当的时候很快解决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要么这种专政将会长期持续，然后逐渐使自己变成累赘。

波兰犹太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 1907—1967)，直到大约 1940 年才成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化名 Josef Bren），<sup>④</sup>他提出了关于该官僚制将在 1940 年代期间垮台的一种全然独特的构想。当他的有关斯大林的传记最终在 1949 年发表时，这个构想

①② Kofler 1952b, p. 45.

③ Kofler 1952b, p. 73.

④ Bornstein and Richardson, 1986, p. 50, 注释 97。多伊彻虽然曾反对建立第四国际，但他仍然加入了它。见 Syré 1984, pp. 56-7。



已变得很清晰了。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多伊彻无疑抛弃了他关于可能甚至大概有一场走向民主的快捷革命的看法。<sup>①</sup>他在其写于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第一个月的《斯大林以后的俄国》(*Russia After Stalin*)一书中,详尽地解释了这一预言的细节。在这里,他捍卫和改造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多伊彻认为斯大林主义——他在其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半亚细亚的”成分——作为一种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工业化的绝对权力,曾以迅疾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既然强制积累的工作已经完成,这种政治权力也将愈益趋于过时。

斯大林主义已经耗尽了它的历史功能。如同其他每一个伟大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已无情地运用强力和暴力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并确保了它的存活。一个过去建立的政权为其持续性依赖于社会习惯的强力。一个革命的制度靠强力创造了新的习惯。只有当它的物质架构稳定地确立和巩固时,它才能够依靠它自己内在的活力;它才能从原先保卫它的那种恐怖中获得解放。<sup>②</sup>

按照多伊彻,伴随着斯大林之死的种种变化,为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到新经济“基础”的深远调整,拉开了一道序幕。

尽管他不排除斯大林主义再度复苏的可能性,但多伊彻相信,这种倒退由于其在结构上的多余,本质上只可能是短暂的。作为第二个可能的情节,他构想了一个军事专政的建立。如果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导致了混乱并削弱了社会纪律,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拿破仑式的”政权,将会离开原来的经济制度,而以一种权威主义的方式改造其上层建筑,并相当可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好斗的姿态。然而,如果第三种选择失去控制,这一变体仍然只有一个被现实化的现实机会。对于多伊彻,第三种选择是最可能的:由马林科夫(Mal'enkov)领导的改革者,将实行一种向

---

① Deutscher 1949.

② Deutscher 1953, pp. 96 - 7.

民主方向的渐进演变。

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倡导一个反斯大林的“有限的政治革命”。他不是将这场政治革命看作一个已全然羽翼丰满的社会反叛,而是看作一个把矛头对准那些使这个国家恐怖化的政治警察和小宗派的头子的“行政行动”。托洛茨基悲剧般地领先于他的时代和他的未来观中的预言,尽管他不可能想象斯大林的亲密合作者会按照他的计划行动。马林科夫政府现在执行的恰恰正是托洛茨基构想的“有限革命”。<sup>①</sup>

多伊彻在各种背景下重复了这个“来自上层的民主化”理论,并至死不渝地坚持这一观点。<sup>②</sup>

毫无疑问,多伊彻的解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分歧。当托洛茨基可能将一场“政治革命”仅仅想象为工人阶级来自下层的造反运动——按照他的设想,没有任何一个精英会自愿放弃他的权力给他人——时,多伊彻则认为,(部分)官僚是革命主体。丝毫不令人意外,这一修正主义推动了来自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猛烈批判。《第四国际》杂志将多伊彻比做爱德华·伯恩斯坦,并指责他的空想:

马林科夫的“有限革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多伊彻虚构的产物。当新的血腥清洗在苏联开始,马林科夫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械步枪来回击反抗的东德工人和大规模逮捕罢工者之时,多伊彻的新书几乎墨迹未干。<sup>③</sup>

然而,这一批判并不妨碍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相信多伊彻的非正统理论的一些方面。那些人的大部分——包括像伯特·科克(Bert Coch-

<sup>①</sup> Deutscher 1953, p. 164.

<sup>②</sup> 例如,Deutscher 1955b,尤其是第113—130页和第173—228页;Deutscher 1967.

<sup>③</sup> Cannon 1954, p. 13. 不久以后,外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表达了强烈的批评,他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见Cliff(Ygael Gluckstein),1964—1965和Jacobson(来自Shachtman学派),1964—1966.

ran)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那样的人——很快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sup>①</sup>

多伊彻还在托洛茨基主义阵营之外挑起了激烈的争论。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反共杂志《证据》(*Preuves*)上尖锐地攻击他。阿隆反对多伊彻的预言,认定“渐进民主”这一理念不适合充当拯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1917年梦想”的全新尝试。而更大的可能是一种波拿巴主义专政的到来,一种阿隆以某种乐观主义去欢迎的前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军事领导人将会寻求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sup>②</sup>

多伊彻在天主教左翼杂志《精神》(*Esprit*)上对阿隆、附带也对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批判做出了回应。在这一答复中,他以一种原则性很强的方式反对所有作者(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方面的),后者都把苏联描述为一个僵化的垄断集团。多伊彻比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一书中更强烈地捍卫他的观点,即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专政,它曾强势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要国内和国际形势是理性稳定的,随后它将能够基于它自身的力量使它自己民主化。多伊彻强调他的分析的制约条件。关于工业化和民主要求之间的联系,他评论道:

我所说的一切,是那种趋于提高群众的民主愿望的工业化。当然,这种愿望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阻挠和抵制。<sup>③</sup>

他同样强调,他的有关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必要性在苏联已经消逝的论题,应当被解释为仅仅是论及一种趋势。掌握特权的少数,在一个较长的时段,没有兴趣维持社会对抗和社会镇压。收入的重大差别

---

① 围绕着科克(Cochran, 1915—1984)的反对派从1953年开始独立地组织起来,建立了美国社会主义者联盟。从1954年直到1959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杂志《美国社会主义者》(*The American Socialist*)。早期对多伊彻的一个(无保留的)辩护见Clarke 1953。后来的一个无保留的辩护见Braverman 1954。

② Aron 1953.

③ Deutscher 1954a.

(因此是精英的特权)在强制的工业化进程中已经补偿了强烈的物质刺激需要,并因此带有“更广泛的国家利益”。既然已经克服最初的社会贫困,收入内部的逐渐拉平将变得值得努力。这种再分配不会导致精英的损失。政治不自由,也已使该体制变得功能紊乱(多伊彻并不明确支持这一观点),该体制将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灭亡。如果国际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可能导致民主化受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国内也将出现强烈的紧张状态,社会不稳定可能导致产生一个俄国的波拿巴问鼎权力,这可能复活战争的幽灵。斯大林在国内的恐怖行为已与他的相对“和平”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如果新的波拿巴产生,这一结合将会被颠倒过来:“他将被迫去国外寻找对(俄国)国内紧张状态的解决方式”。<sup>①</sup>

在几个月内,美国独立社会主义者杂志《异议》(*Dissent*)发表了《精神》上这篇文章的一个略有删节的译文,<sup>②</sup>导致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讨论。受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出生于德国的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认为,如果存在用民主意识教育工人大众的自治工人组织,工业化可以单一地、独立地导致民主化。斯大林主义使工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一事实,在这一背景中没有任何意义;而教化的可能性惟有靠民主教育来提高。多伊彻关于能够实现一种更平等主义的收入分配的观点,也是科塞批判的目标:

如果大多数物品在俄国是“自由的物品”,就像去说水在美国东部,无需任何竞争性争夺就可能获得,但是这样的话,人们还需要认真地讨论这个选择吗?<sup>③</sup>

只要苏联还没有变成工人的天堂,精英(科塞将它作为一个阶级)就会寻求保持他们自己的权力。他注意到,统治阶级从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特权,除非在现实的和具有强烈威胁性的革命发展的形势下。

① 关于多伊彻—阿隆争论的一个评论(非常赞成多伊彻的观点)见 Pouillon 1954。

② Deutscher 1954b。

③ Coser 1954, p. 240。

亨利·莱巴希利(Henri Rabassière,即 Heinz Pächter)从另一角度构成他的批判。他不否认俄罗斯某种民主化的可能性,但认为存在着根本的结构局限性。与多伊彻和早期的批评家相反,莱巴希利提出了分析改革的一种循环模式。据称精英中存在着与特定集团即工业部门或文化利益集团相关的不同的部分,只要部分官僚找到了他为这样一个亚集团谋取特殊好处的理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就会评估相关措施是否与该计划的其他部分相兼顾。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民主化”;如果不是,那么该亚集团的官僚就被打上“叛国者”的印记。“宽松”和“紧张”阶段因此交替反复:

“宽松”和“紧张”的不断循环制造了派系小集团和对它们的否定,吸引新的管理人员进入这个行政漩涡并摧毁他们。……这非常不同于民主制或波拿巴主义——多伊彻单独为苏联在斯大林主义的短暂“复辟”之后设想的两种选择。<sup>①</sup>

既然这两种不同的循环都是从真正的社会变化中产生的,那么它们都不符合外交政策的特定内容。

皮埃尔·多列士(Pierre Tresse)在他的批判中,强调多伊彻在提出苏联体制有充分的灵活性去适应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渐进过渡时运用的标准问题。如何证明多伊彻推论的正当性,即这样一种和平的转化只可能在苏联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发生?

两个互相牵制的确定的社会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对立,并因此继续展开相应的社会斗争。这些斗争能够趋向于,或者说在事情的纯粹发展过程中自动地被克服吗?在这样一个转化过程中,这些要被克服的障碍在俄国要比在西方更大还是更小?这种体制是更灵活还是更严苛?这些是多伊彻先生在他能够如此愉快地提出斯大林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之前必须回

---

<sup>①</sup> Rabassière 1954, p. 246.

答的问题。<sup>①</sup>

最后,保罗·维林(Paul Willen)认为多伊彻归纳得太快,因而以荒谬告终。当然,把官僚制精英看成一个铁板一块的集团是不对的;在社会高度紧张的时代,人们的确不能排除精英中的个体成员——倘若他们就是危急形势所要求的领袖类型——转变立场和加入大众的可能性。但是,依据这样一种思想事实上能得出什么结论?如果一个人断定不是整个官僚制都一致反对改革,那他就肯定不会由此推断出官僚将引领民主化过程这个结论吗?换言之,多伊彻似乎太多地认同据说有好意图的精英,而太少地认同被压迫的大众。<sup>②</sup>

多伊彻用一个反驳总结了这场讨论,对其思想进行了另一种系统说明,<sup>③</sup>然而没有回应他的批评者提出的所有观点。他完全以托洛茨基的模式,把苏联官僚描述成一条“巨大的阿米巴”,不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而是从消费领域中获得它的特权。因此精英的权力基础是极其不稳定的:这些特权的价值(这些特权和它的强度将会得到精英的保护)仰赖于社会总体的富裕或贫困。因为苏联现在处于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似乎是多伊彻从普列奥布雷斯亨斯基(Preobrazhensky)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sup>④</sup>]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过渡中,所以消费品部门可以开始大力增长,精英和群众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可能缩小。多伊彻认为,如科塞所论证的,即使没有形成一个总体富裕状况的前提条件,人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样一种发展将会有平等主义的结果。很明显,收入分配在未来仍将会是倾斜的,但是比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倾斜较少。争取国民收入的争斗因此变得较不具有爆炸性,(随着)国民面包的增长,为了“分享”的竞争确实逐渐变得较不野蛮和更文明化;这些分享可能最终会变成“公平”。<sup>⑤</sup>

① Tresse 1954, pp. 402 - 3.

② Willen 1955.

③ Deutscher 1955a.

④ Preobrazhenskij 1926, pp. 86 - 152.

⑤ Deutscher 1955a, p. 27.

上述因素能减少压迫,并伴随着民主化。显然,工业化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联系,但是更富裕意味着社会矛盾将会变得不太尖锐,能够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统治,并允许更多的公民自由。无论如何,最持久的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美国和英国那些相对最富裕的国家,不是历史的偶然。苏联官僚是否会在社会矛盾的减少中看到放弃其特权的充分理由,是多伊彻不可能用确定的事实肯定的某种东西。对它将会在什么程度上促进改革,他特意将之留作一个开放的问题。然而,他的确认为,官僚制能有某种剧烈的改革这一事实,不可能像维林所宣称的,被解释为对精英的投降。多伊彻坚称,正相反,“我的第一位的忠诚——我需要说这个吗?——不是对那些官僚的,而是对那个世界的那些被压制、被迫害和被欺骗的人民的。”<sup>①</sup>

### 对伯纳姆的回应

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1941年发表于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后在西欧大陆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该书的法文版以 *L'ère des organisateurs* 为题、在德国以 *Die Revolution der Manager* 为题于1947年面世,公众反应空前热烈,而大量书评感人至深。<sup>②</sup> 我在这里约束我自己只讨论一些较突出的评论。

伯纳姆的著作包括两个主题:(1) 基于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垮台,那里已出现一个新的阶级社会;(2) 同样的阶级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或无论如何尽可能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复制自己。批评家们一般都同意第一个论题,即使不正确,至少部分正确。他们不赞成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发展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决裂,以及这个新阶级社会将迅速扩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观点。<sup>③</sup>

<sup>①</sup> Deutscher 1955a, p. 39.

<sup>②</sup> 参见,例如 Romano 2003。

<sup>③</sup> 我不考虑奥威尔(Orwell)1946年的文稿。奥威尔的论文更多地关注伯纳姆的“权力崇拜”,而不是他对苏联的分析。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月刊《未来》(*Die Zukunft*)发表了雅克·汉纳克(Jacques Hannak)在1947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文中部分支持了伯纳姆的看法。<sup>①</sup>就美国的批评者如何描述苏联已出现一个新阶级社会,汉纳克说,人们几乎都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想要为“管理的革命”也将在其他各地取胜的观点提供证据时,伯纳姆的推理就站不住脚了。汉纳克指出,只有在一个相当落后的社会背景下,企业领导和技术官僚才能够发展成统治者,而在资本主义更高度发达的范围它的权力似乎减弱了。恰恰在美国,与罗斯福新政相比经理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事实,在这方面是极有启发性的。汉纳克因此认为,伯纳姆的宿命论无法确证,而且他过多地从管理者必须扩张他们权力的社会前提出发去进行概括。

德国议会共产主义者威利·汉恩(Willy Huhn)为伯纳姆的理论提供了一篇长文。汉恩的主题基本上是:伯纳姆已经正确地说明了管理者们正在增长的权力,但是伯纳姆不正确地从那种权力中推演出资本主义的消亡。汉恩接受如下观点:管理者的崛起唯一描述了马克思曾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废除”的表现——作为财产所有权的资本和作为实际存在的企业管理的资本之间的分离。如果国家篡夺自治的所有制功能(并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总体资本家”),并在高层次上实现与企业领导层的融合,这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的决裂,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汉恩提出,人们可以赞同伯纳姆的如下观点,“跟随在资产阶级之后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管理阶级”,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之直接有关。因为伯纳姆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被迫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头足颠倒。定义一种生产方式,毕竟是一个确定经济结构的问题,而这决定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在苏联正像在西方一样被异化了。而伯纳姆肯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宣称,管理社会的这一不同类型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

---

<sup>①</sup> Hannak 1947.



有制。但在这样做时,上层建筑标准被称作决定性因素:国家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法律关系被认为比基础、经济结构更为根本。汉恩的结论是清楚的:“伯纳姆的确给许多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印象,但恰恰没有采取马克思的独特视角。”<sup>①</sup>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劳工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月刊《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上发表了评论伯纳姆的观点。布鲁姆也相信,管理社会并没有超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工人并没有在其中得到解放,各种工资劳动法规仍然禁锢着工人,只是他们的雇主不一样。资本主义的毁灭只有当它的一切相关方面都被消灭时才会发生,包括彻底消灭捆绑在私有制上的、表现于“人类行为全部形式中的不平等”之中的“道德关系”。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只不过证明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可能同时正在拥有被消灭的资本主义”。<sup>②</sup>

在美国,布鲁姆的著作发表在《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上,<sup>③</sup>彼得·迈耶尔(古特曼)对此作了回应,并利用这个机会批判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如果国家是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人们谈论资本主义能有意义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一旦通过资本的绝对集中,所有竞争已全部消失,那么价值规律在任何方面都不再适用:那时商品价格不再与价值相关联,跨经济部门的生产资料分配不再受利润调控,企业不创造利润也能生存,无政府主义的生产让路于有计划的协作。劳动力市场不复存在,因为工人们只能把他们的劳动力卖给唯一的雇主,即国家。其结果是,虽然如布鲁姆所正确地说明的,继续存在剥削和不平等,但不能说存在(国家)资本主义。

不同的阶级社会总是以**特定的方式**——统治阶级以这种方式

<sup>①</sup> Huhn 1950a, p. 22.

<sup>②</sup> Blum 1947a, p. 7. 原文为意大利语。

<sup>③</sup> Blum 1947b.

迫使生产者生产他们的剩余产品——相区别。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定方式是,通过自由的工人为了劳动力的价值出**卖劳动力**;新阶级社会的特定方式是,通过国家**奴役**工人。<sup>①</sup>

最广泛的辩论发生在一本引人注目的法文月刊《国际杂志》(*La Revue Internationale*)的专栏中,曾有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各种不同的左翼思潮的代表全都在这里发表过他们的观点。编辑们[以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的笔名]在1947年6月发起了这场讨论,称伯纳姆为剽窃者,他的著作没有任何东西超出对里齐的《世界的官僚化》的复制。<sup>②</sup>

经济学家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一马当先,他的成熟观点稍后将在本研究中受到检验。他拒绝承认伯纳姆关于雇主权力衰落和经理权力上升的分析,因为它极其肤浅。贝特尔海姆认为,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曾经虚构的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相似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希特勒政权下的国有企业要比伯纳姆所说的起着更不重要的作用;而如果采纳管理革命的理论,人们将如何解释德国人在已占领的苏联地区解散集体农庄(kolkhozy)和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而且,贝特尔海姆发现了伯纳姆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一个不能容许的修改。按伯纳姆的方式,阶级不是根据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定义的,而是作为接受了不同部分的社会收益(一种分配标准)的集团来定义的。对于伯纳姆,苏联存在不同社会阶层有截然不同的报酬层次这一事实,是讨论“阶级”的充分理由。不过,伯纳姆根本不与人分享这一解释;他发现在收入较好的群体中仅仅部分工人阶级相对得到了较好的报酬。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和随之产生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已无情地导致了由大多数工人承担的“(收入的)重大牺牲”和对受高等教育者的“经济刺激”。苏联大部分有特权的职能人员也正是该计划的执行者,而他们随时可能从他们的位置上被解职。伯纳姆视为一个新阶级社

① Meyer 1947, p. 319.

② Naville 1947. 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这是第一次曝光“Bruno R”的真实名字。

会的表现,正是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无法预料的方面:虽然反抗阶段具有平等主义的特点,但是历史教导我们,长期的非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使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成为必要。<sup>①</sup>左翼社会主义者吉尔·马尔蒂内(Gilles Martinet,生于1916年)把伯纳姆纳入这些辩护腔调中。<sup>②</sup>

老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埃梅·帕特里(Aimé Patri)曾在别处表露过他对伯纳姆的钦佩,<sup>③</sup>他新阶级社会理论辩护。他从提出如下这一问题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上是否根本上可以存在一个“管理者”统治阶级(一个沃洛和杜娜耶夫斯卡娅早期曾已明确阐述过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国家与生产机构(如在私人资本主义中)分离的情况下,国家的官僚制始终是一个上层建筑因素,并因此不可能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但是,在国家与经济完全相融合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一样了,生产和交换是集体组织的过程。那么,公共服务人员可能转变为政治经济统治阶级。

与私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一种不同的积累结构支配着这个“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计划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事情都依赖资本之类的增长,并因此仰仗经济发展。因为生产者、市场依赖和来自劳动组织的反抗之间的竞争,增长过程低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事情都围绕着消费即全部创造物运转。在一个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中,正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管理者进行统治,但是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那些束缚。在这个意义上,管理者社会是一个“‘有自由的’资本主义”。<sup>④</sup>

如贝特尔海姆所称,在苏联,身居高位的官员可能一夜之间失去他们的地位这一事实,并不是一个否认新精英的阶级性质的论据。毕竟,这些长期的巨大的矛盾不也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下的老板们之间吗?正如一个资本家可能破产,经理就有可能被他自己本阶级的成员所取代。

---

① Bettelheim 1947.

② Martinet 1947.

③ Patri 1947b.

④ Patri 1947a, p. 100.

皮埃尔·贝塞涅特(Pierre Bessaignet)把他的火力对准了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他在两人身上发现了两个必须反对的观点:财产一旦被国有化,社会主义就存在了;而且,国家机器能够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服务。按贝塞涅特的看法,这两个观念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断裂”。作为对第一个观点的否定,贝塞涅特用沙特曼提示的表述公式,提出了生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之间的区分。生产资料被国有化的事实,至多说出了关于社会产品被(国家)独占的方式问题,而不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联合的生产者(他们自觉地和有目的地控制社会过程)。

针对第二个观念,贝塞涅特作出了下述在他自己看来是正统的推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框架内,工人阶级需要国家机器巩固它对旧统治阶级的专政。随着这一巩固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建立。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化,使得必要的独立国家越来越多余:“如果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工人国家——仍然存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国家必须是国家消亡的场所。”<sup>①</sup>在社会主义关系下,国家为了统治部分工人阶级反而得到强化,将会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一旦贝特尔海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捍卫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特权,那么,因为这一理由,国家就是有特权者反对无特权者的工具。总体上,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曾通过将这个统治阶级表述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社会阶层,来试图证明苏联的官僚经济是正当的。

在对批评者的集中答复中,<sup>②</sup>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区别。在过渡社会,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工作过程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差别,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但是,这一劳动分工目前全面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并因此与阶级对立无关。此外,在一个过渡社会,生产不可能立即变成纯粹以消费为

① Bessaignet 1947, p. 108.

② 超越了在《国际评论》中引用过的文稿,同时也参见 Martin 1947 的一篇仍然很少表现出理论重要性的短文。

导向；首先，生产机构需要进一步扩展。即使这个过渡社会并不需要对付外国侵略，这种扩展仍将是必要的。把这看作新阶级社会的“证据”——帕特里用过的方式——是错误的。

强制性的积累和这种劳动分工意味着，在过渡社会的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不同层次的酬劳。特别稀缺的资质必须得到更好的收入。很明显，这造成了滥用和腐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些现象发生，这就是社会的寄生病，而不是制度性的剥削。

在定义一个社会的本质中，相关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财产关系，贝塞涅特的这一论题，被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斥为“乌托邦”。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不可能立即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的社会。首先，必须改变财产关系。而只有当工人国家掌握它的经济时，它能够开始改造生产关系。贝塞涅特的第二个观点（国家作为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工具）也受到了反驳。不用说，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个最纯粹的压迫机器。但是，同一理论也规定，国家具有第二个任务：调节统治阶级和那些统治阶级之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无论如何也可能需要国家机器。

贝特尔海姆和马尔蒂内用呼唤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推出他们的反批判，以致得出“当代共产主义的危机”有可能被战胜的结论。他们认为，非同寻常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承认他们的分析受制于一个历史观点：革命后的社会在国际上的孤立。斯大林用国际孤立为其国家的过度膨胀辩护；托洛茨基把国际孤立视为蜕化的原因。当然，国际孤立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过渡社会内生的运作规律。这是一个超越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方向的问题。必须揭露斯大林对之保持沉默的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但是对这一社会的分析，不能只满足于托洛茨基的“固化的制度”，而需要一种积极的态度：

在现实环境中，继续进行对苏联制度的批判分析，而不突出苏

联成就的重要性和它所包含的演进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 曼德尔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批判

在1946至1951年期间,著名的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观点。他从很早开始已作为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出现<sup>②</sup>,他后来又在许多文本中重申和不时扩充这些观点。

他在这一领域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为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起草的题为《今日俄国问题》(1947)的决议。<sup>③</sup>在这一文本中,曼德尔怎样采纳一些对立面的观点去反对另一些对立面,一目了然,当时它们似乎对捍卫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是有用的。为了公正地举出一个例子,我们重新发现了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即纳粹德国和苏联在结构上相互区别,因为希特勒政权感到有必要在占领后的俄国地区改变生产关系所有制,曼德尔把贝特尔海姆的这一观点描述为当代“修正主义”的“最完美的‘前斯大林主义’表述”。<sup>④</sup>

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提出的主要否定理由是,该观点是先验的。第一,它假定俄罗斯是资本主义的,于是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种种相似性就被用来支持这一预设的正确性。曼德尔认识到,一些与苏联相似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特别是,生产资料

① Bettelheim and Martinet 1948, pp. 41—2.

② 曼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的社会主义抵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1945年后成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最重要的领导人和最重要的理论家。从1945年起,他作为记者和通讯记者为多个报纸(*Het Parool*, *L'Observateur*, *Le Peuple*, *La Gauche* 及其他)工作。他从1954至1963年还担任比利时工会联盟FGTB的经济顾问。他在1963至1967年期间在索邦大学研究经济学,并在1972年以著作《晚期资本主义》(*Der Spätkapitalismus*)获得博士学位。见Gorman 1986, pp. 209—11; Stutje 2004.

③ 注意在曼德尔的草稿文本和第四国际采用的决议之间显著的相似性。见Germain 1947b和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④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p. 272.

日益增长的阶层,国家经济的专制倾向,走向计划的和“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这不构成证据。毕竟,这里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过渡经济之间的种种类似,像这样一种过渡经济将存在于每一个工人国家,直到阶级完全消失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sup>①</sup>

在每一个过渡社会,价值规律都仍在运行,因为仍然生产商品。但是这一规律在那些社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行:价格不再取决于平均利润率,货币不可能再被转化为资本。这一思想的正确性还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矛盾来解释。因为这些不可能说明,首先官僚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同时,这些理论允许从资本主义的毁灭中形成的那种所有制关系持续下去,并又镇压了一个新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此外,这一理论不能解释,所有制关系如何能够没有一场相伴随的社会革命就被推翻。但是,对于“国家资本家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苏联之外的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按照这一理论,它们一旦在某处夺取权力,就将立即从工人政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这一信条是对该理论最显著的批驳”。<sup>②</sup>

针对官僚集体主义论,曼德尔反对把它变成“通常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根本基础”的问题。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是一个“阶级”,那么它缺少历史上其他阶级的全部特有特征:

1.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是以在生产过程中——在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的独立的和基础的功能,并以它自己植根的社会经济结构为特征的。

2.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代表历史进步的一定阶段,包括那些崛起于历史衰退时期的阶级,它们的任务是保护技术成果等。每个阶级代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一个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演进中的特定阶段。

3.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看,都是履行必要功能的必要的历史元件。

---

<sup>①②</sup>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p. 272.

4.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提出它对权力的候选资格——而每一个统治阶级更是如此!——都意识到它的作用,具有它自身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特点;并在其社会构成中获取最低限度的稳定性,一种它努力传承给后来数代人的稳定性。

5. 依照马克思,显然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能够单一地基于它的更高收入、它的政治特权和它(对教育等的)的垄断成为一个阶级。<sup>①</sup>

所有这些特点都不适用于苏联官僚制。这一官僚制并不植根于生产领域,而是分配关系的寄生的副产品;它不孕含任何历史进步,而是相反去阻碍它;它不代表任何新的财产关系,而是维持从十月革命产生的那些关系;它并不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并缺少一种稳定的社会构成。但是最重要的,是与阶级社会的常规状况相对比,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以特权来表达,是直接与有效的经济作用相反的。

“官僚集体主义”(人们从不讨论任何有关他们虚构的这种社会类型的运动规律和各种矛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产生了全面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威胁。如果他们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毕竟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提上当下的议程,而且在现实中工人阶级不可能统治自己。

这一早期文本对官僚集体主义的批判,似乎比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更系统,对后者,这种经济观点仍然是相对发展不足的。四年以后,当曼德尔发表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详尽辩护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sup>②</sup>

<sup>①</sup>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pp. 272 - 3.

<sup>②</sup> Germain 1951a, 1951b, 1951c. 该文在德国激起了一场讨论。曼德尔的对手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海因茨·迈耶尔(Heinz Meyer),德国共产党老负责人恩斯特·迈耶尔(Ernst Meyer)的儿子,他以 Oeconomicus 或 Öconomicus 的化名写作:见 Öconomicus 1951; Germain 1951d; Öconomicus 1952; Germain 1952, p. 48. 对曼德尔的另一回应是 Huhn 1951. 迈耶尔的分析,在许多方面让人从根本上回忆起波迪加:1. 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特点的定义过于宽泛(然而, Meyer 本人相信三个标准是充分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劳动者是工资劳动者;劳动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2. 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不是一个统治阶级或占有阶级,而只是一个完全匿名的资本托管人;3. 国家资本主义在那些能够被看做国际资本主义薄弱链条的国家中只有一次机会。



大量来自南斯拉夫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被否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得到了辩护。<sup>①</sup>曼德尔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下述相反的观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下,货币同时执行了三个功能:它是一种流通方式,一种价值手段和潜在的资本。在资本主义中,每一笔货币都具有该特点,在被贷出时,它以一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利息)增值。在苏联,正如在任何过渡社会,货币保留了前两个功能,但已经大部分丧失了它的利息功能(利息仅仅作为非法的高利贷或作为由计划建立的国家贷款的条件而幸存)。<sup>②</sup>

第二,在资本主义内部,价格在盲目运行的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垄断价格等)的影响下围绕价值上下浮动。在苏联,这些波动取决于计划,而价格是积累最重要的调节者。

第三,在资本主义中,积累完全被定向为利润最大化,一种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中达到了极限的状况。这一规律意味着,资本趋于向利润率比例最高的那些经济部门转移;它因此历史性地从基础工业转移到外围。在苏联,正好相反,仍然是重点强调重工业。

第四,在资本主义中,技术创新并不是有规律地运用于工业,因为这些创新以贬值(资本的破坏)对垄断部门的大量资本产生了威胁。在苏联,创新被尽快地在工业中实行。

第五,在资本主义中,工业化国家资本输出的产生,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后果。苏联不产生任何资本输出;相反,该官僚政权从它的附属国输入(公开地,或通过掠夺)工业和农业资本。

第六,在资本主义中,作为生产的生产和由利润追逐所引导的消费产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发生了循环危机;在苏联,不存在这种形式的经济运动。

依据曼德尔,所有这些情况证明,在苏联运行的并非单一的资本主

---

<sup>①</sup> Djilas 1951.

<sup>②</sup> 曼德尔用托洛茨基的一个早期评论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见 Trotsky 1933b, pp. 222 - 3.

义运动规律。但是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同样的观点正当可信：

恰恰是苏联能够持续 25 年以上建设了世界上第二最大工业体这一事实，应当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充分证明了俄国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特点。由于资本的压力在世界规模上积聚，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一种发展。只是因为俄国，由于它对外贸的(国家)垄断、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断裂，才能外在于“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影响，产生俄国工业的空前增长。<sup>①</sup>

## 第六节 总结

苏联出乎意料的稳定性和缓冲区国家的结构趋同，把一种艰难的选择强加给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支持者：或者他们不得不修正托洛茨基的观点，或者他们继续支持它，同时放弃那种暂时的因素。许多人选择第一个选项。

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的思潮内部，“异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发挥突出的作用，大范围的理论变体出现了。这些理论变体不仅涉及产生于资本主义的那些原因，而且涉及归结于资本主义的那些特点：

第一，当克利夫、詹姆斯和杜娜耶夫斯卡娅认为苏联是一个大资本时，波迪加发现了大量较小的资本。

第二，当波迪加、格兰迪若和佩瑞特相信苏联不存在任何统治阶级时，克利夫、卡斯托里亚迪斯和莱福特采取反对意见。

第三，当克利夫、格兰迪若和佩瑞特把苏联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时，波迪加认为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在新生产方式理论家中间，明显有两个相关的发展。第一，存在着古特曼描述“新的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动力机制的尝试；第二，德国

<sup>①</sup> Germain 1951b, p. 113.

存在着“不贴标签”分析苏联的各种尝试。在后者涉及的范围中,形形色色的作者强调各种不同的方面。斯泰因伯格和弗勒利克试图通过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革命前的中国的类似,改进他们的观点;赛康尤其专注于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初生状态的新统治阶级;而科夫勒则强调官僚“阶层”成为原始积累过程的合作者。

## 第五章 从苏共二十大到镇压“布拉格之春”

(1956—1968)

1956年标志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转折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甚至不到十岁，就再次被解散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他的著名的秘密报告，他在其中激烈地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在布达佩斯，造反的群众推倒了死了三年的独裁者的雕像，而在波兰城市波兹南，也爆发了一场叛乱。在匈牙利和波兰，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在这个多瑙河共和国（指匈牙利，这一年那里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事件”——译者注），俄国人用坦克恢复秩序。

这些演变丝毫不令人吃惊地在西方共产党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如，英国共产党遭遇了大批知识分子离去的浪潮，包括像爱德华·P. 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和约翰·萨维莱(John Saville)等一批人脱离英共，随后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脱颖而出。在丹麦，在共产党前领袖阿克塞尔·拉尔森(Axel Larsen)离开该组织去建立一个新党时，丹麦共产党分裂了。在法国，法共议员埃梅·西塞尔(Aimé Césaire)与罗杰·威尔兰德(Roger Vailland)、克劳德·罗伊(Claude Roy)、雅克·弗朗西斯·罗兰(Jacques Francis Rolland)等知识分子一起，离开了法国共产党。

“新左派”的核心因此在国际上产生了，而它们在1960年代的进程

中长大成熟。1962至1964年的中苏分歧、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发动的革命游击活动中心的尝试、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美国反对“Jim Crow”(对黑人的贬称——译者注)的黑人群众运动——所有这一切最终促使新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考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他们在伯克利大学、巴黎南特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柏林自由大学的校园起来造反了。

不过,这些发展对关于苏联的理论解释所造成的冲击,一开始是有限的。起初,“新左派”的思考还主要是依据较陈旧的参考框架。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 围绕克利夫的思潮

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克利夫(Gluckstein)称应把苏联定义为一个大资本,它在世界市场上运作,并且它首先是通过军备竞赛与西方进行竞争。

这一解释在1950至1960年代得到了最后的修饰,还补充了一个“长期军备经济”的理论。对苏联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这一理论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同样是由军事化动力引发的。这一由迈克尔·基德隆(Michael Kidron)重点提出的<sup>①</sup>的理论补充,在1960年代导致苏

---

<sup>①</sup> 虽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 1942, 第17章)曾主张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理论(即军国主义在衰落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它自己的扩张主义动力)进行详细解释,但是这个“长期军备经济”理论的真正创建者是美国人伊德·萨尔德(Ed Sard),他使用笔名Frank Demby, Walter S. Oakes和T. N. Vance(Drucker 1994, pp. xv, 218; Hampton 1999, p. 38)写作。在一篇发表于1944年的在某些方面可被认为是有才气的文章(Oakes 1944)中,萨尔德预言了战后的军备竞赛,当时“二战”仍在进行。尤其是,萨尔德认为美国将保持战争经济的特点;甚至在和平时期,美国的军备开支仍将会相当大,即在100亿和200亿美元之间,除了别的东西以外,带来了失业人口与30年代相比剧烈减少的结果。几年以后,萨尔德进一步扩展了他的分析(Vance 1950)。他着重强调,一般资本主义与特殊的美国和“官僚集体主义”的苏联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斯大林主义的帝国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输入的’帝国主义,它的侵略性政策是建立在持续地获取新的劳动力资源包括熟练工人和奴隶,并增加它的生产和消费品库存的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之上,而只有当它将工人(转下页)

联更加重视其内部和外部发展的相互依赖性。当然,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改变原初理论的原则性。

##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出版物的典型特征,是反对重新检验和修正托洛茨基关于“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任何基本方面。如在前一章所述,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托洛茨基理论中的过时因素(关于斯大林现象的有限存续期的虚构)。其后,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他们最重要的理论任务,是在所有新发展中发现对旧有理论的肯定。在波兰和匈牙利暴动和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1957年第四国际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就宣称,苏联、缓冲区国家和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剧烈变化已在总体上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它带着明显的自满情绪指出,第四国际是工人运动中唯一预见斯大林主义的演变和正确解释它的思潮。<sup>①</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曼德尔提交的报告和有关结论。关于托洛茨基的陈旧的1939年的选择(“或者是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是重建苏维埃民主”),曼德尔现在认为,在1957年,这一选择不再以同样的方式适用。

---

(接上页)人口和生产的重要中心都整合到其官僚集体主义的制度之中时,它才会在政治上感到安全。……美帝国主义……是一种‘输出的’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最迅速的资本积累的无情推动下,用其一切形式以不断增加的数量输出资本。”(p. 325)在一系列文章中,萨尔德接着解释了这些含义,尤其是关于美国经济(Vance 1951)。托尼·克利夫(Ygael Gluckstei)取同样看法(Cliff 1957)。迈克尔·基德隆,克利夫的一个同志,当时试图重新解释这一理论,该理论在那之前是更符合凯恩斯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德隆的文章,正像Alasdair MacIntyre早期的一篇文章(MacIntyre 1961),是对Henry Collins“左翼改良主义案例”的回答。基德隆后来在他的书《二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Kidron 1968)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分析。然而,十年后基德隆批判了他自己的理论,得出了如下结论:“长期军备经济为长期繁荣提供动力这个观点是难以支撑的。正相反,这种开支肯定会导致停滞”。见Kidron 1977。有趣的是,基德隆的政治同僚继续捍卫基德隆此时自己已经否定的理论(见Harman 1977)。论Kidron(1930—2003),见Birchall 2003。

<sup>①</sup>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8.

据认为,这一选择的两个阶段与世界范围的力量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联。……选择的两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可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答案。当托洛茨基第一次精确地阐释这一观点时,正是在希特勒取得胜利的1933年之后,他被迫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关系的未来动力这一问题要点。革命将会再次提前发生,还是它将继续在世界各地被击败?在1935年,没有人能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南斯拉夫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殖民地革命的传播,随着苏联经济的大规模进步,力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转向有利于革命,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受到严重削弱,这意味着托洛茨基的一个选择(反革命)似乎不再是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似乎更现实:

革命的机会已在东方发生。……工人阶级已放弃了它的被动态度。它不再**容忍**不诚实的“守夜人”。正相反,工人阶级越来越顽强地追问他。工人阶级在工厂范围和原则领域发动斗争,迫使他放弃他的傲慢,并准备颠覆他的权力。<sup>①</sup>

这个预言事实上没有实现。托洛茨基主义自吹它是唯一一个能看透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思潮,反而是没有正当根据的。这也许解释了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为什么后来长期将托洛茨基的选择搁置一旁。

曼德尔起初把自己主要定位为对手理论的批评家,<sup>②</sup>他从1960年左右起赢得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最重要的“现代化思想家”的显赫声誉。在他全力关注苏联社会的分析的大量著作中,我将取这一本:他的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该书完成于1960年,第一次出版于1962年,其中一个重要章节提出了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正统的”辩护。<sup>③</sup>在这部著作中,曼德尔对托洛茨基的

---

① Germain 1958.

② 见前一章。

③ Mandel 1962, 第2卷,第15章,第208—273页。

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分配规范的矛盾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矛盾。因此，当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有社会中都成为确定特点时，苏联就反映了从官僚对国家和经济的控制中产生的特定的矛盾。这些特殊的矛盾分成三类。

第一，从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衰落（或停滞）的畸形关系这一事实中产生的矛盾。矛盾根源于如下事实：工业化起步得太晚，而全面农业集体化发生得太早，所以这样一场农业革命产生在不充分的技术经济基础上。

第二，从官僚制的物质利益是这一经济的真正驱动力这一事实中产生的矛盾：

社会主义计划和积累的正常媒介，是工业生产者部分意识到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创造性的首创能力。但是事实必须确证理论；生产力的每一增长都必须直接反映在群众消费的增长中。一旦这一驱动力由于过高的积累率将太多的牺牲强加到生产者身上而大大地缺乏，官僚阶层就成为积累的调节者和主要指导者，它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消费者特权（在货币、住房、奢侈品和其他稀缺消费品等方面）。<sup>①</sup>

由于担心被清洗和他们自己的地位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官僚被刺激去不断地扩大生产。

第三，从官僚行政机构中同样产生的矛盾：

在苏联经济的计划特点和据认为是完成计划的首要驱动力的官僚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经济体的主要矛盾，是引进这一经济体的特定的官僚管理的一个结果。这些后果将这一官僚管理产生的两个特殊矛盾相结合：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和消费品

<sup>①</sup> Mandel 1962, p. 240. 英译本, 第 584 页。



的匮乏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整体计划的各种需要和官僚制的高度集中化造成的损害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 吉拉斯

有一个时期,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被视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sup>②</sup>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分裂中,他提出了对苏联的尖锐批判。部分受托洛茨基相关著作的启发,吉拉斯确信,工人阶级在苏联已不再拥有任何政治权力。在他1950年的书《论社会主义新道路》(*On New Roads of Socialism*)中,他这样谈论苏联:

在苏联,不存在创造一个新阶级的经济基础。那里所发生的、我们看到的它的外在展示,不意味着和不可能意味着一种向资本主义的回归,这实际上大概是产生在社会主义自身结构基础之上和这一结构之内的新现象。<sup>③</sup>

尽管这段话仍然显示出与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的强烈联系,但在随后发表的一个文本中,这一点发生了改变,吉拉斯指责苏联是官僚“帝国主义”。此时他认为,该统治阶层(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正在增长的矛盾而陷于困境)依靠对外扩张,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奴

<sup>①</sup> Mandel 1962, p. 247. 英译本,第589页。

<sup>②</sup> 吉拉斯是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进行其文学研究期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在国王亚历山大的君主专制之下,他曾长期在监狱里度过。1930年代末期,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支持了铁托;1928年,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并在一年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从1948到1953年,他与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和鲍里斯·基德利(Boris Kidri)是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几个“建筑师”之一。1953年,他成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由于他的社会批判,他在1953至1954年一次党的非常全体会议上被剥夺全部权力。1956至1961年和1962至1966年,他再次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入狱。见Reinhartz 1981。

<sup>③</sup> Djilas 1950, pp. 12-3.

役,为它的内部问题寻找解决方式。<sup>①</sup>

在他的书中,吉拉斯提出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分析性的差别。虽然他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官僚政治倾向,但他认为这些倾向在那里不可能占上风,因为历史前提和权力平衡更趋于分解官僚制。<sup>②</sup>然而,后来他改变了这一评价,并于1953年开始发表对南斯拉夫本身的原则性批评。在造成他被驱逐出党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指出了南斯拉夫制度的严重不足和一种苏联类型的专制主义的危险。与此同时,他还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影响广泛的修正。在匈牙利民众起义的灾难性事件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其中称,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都正在形成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的官僚。<sup>③</sup>

在他的出版于1957年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中,吉拉斯详尽解释了他关于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已经确立的理论。他的分析回顾了里齐、伯纳姆、沙特曼和其他人的思想,而并不伪装是原创的(“这本书中的每个提法,几乎都在别处被说过了……”)<sup>④</sup>,中心是关注所谓的政治官僚。他认为,这个阶层同样不应该与那个官僚制相等同:

只有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组成统治官僚和我的术语所指的新阶级的核心,那些人并不是行政官员。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个党或政治官僚阶层。其他官员只是这个新阶级控制下的机器。<sup>⑤</sup>

这样,一方面,该官僚阶层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它只是该党机器的一小部分。党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核心,但并不是所有党员组成这一政治官僚阶层。只有那些具有特殊特权的官僚,作为他们行政垄断的结果,属于这个新阶级。

在吉拉斯看来,这个统治性的“政治官僚”区别于以前的统治阶级。

① Djilas, pp. 16 - 8.

② Djilas, 作品。

③ Djilas 1956.

④ Djilas 1957, p. vi.

⑤ Djilas 1957, p. 43.

他指出了其与传统统治阶级类型的三个根本区别：第一，以前的统治阶级是在经济变革已在旧的社会关系内部发生后，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政治官僚阶层只是在革命已经成功时创建它自己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在掌权后实现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确立它自己，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sup>①</sup>第二，以前的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革命前已然存在，而苏联不是这种情况。在那里，这个新阶级绝对只是在它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形成的。新阶级的先锋队意识因此走在各种事件前面；它在实际获得权力之前，已经具备了其阶级权力的理念。<sup>②</sup>第三，紧接着这一超前意识的是第三个区别：与以前的统治阶级相对比，这一新统治阶级只可能在一个特殊的组织化形式，即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sup>③</sup>

联系政治官僚的这些“出生缺陷”，他说明了它与其他统治阶级的更多区别。这个新精英阶层阶级意识异常薄弱；这些普通的政治官僚甚至没有意识到它属于一个新统治阶级，尽管它知道它属于一个有着明确理念、目标和地位的群体。<sup>④</sup>而且，政治官僚阶层是比其他统治阶级更紧密、更严格地组织起来的，伴随的结果是，它的权力在历史上是不平等的。

当代共产主义是由三个控制人民的基本因素构成的极权主义类型。第一个因素是权力；第二个因素是所有制；第三个因素是意识形态。……没有一个历史上的极权体制，甚至没有一个当代的极权体制——除共产主义以外——已成功地将统治人民的所有这些因素同时结合到这种程度。

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历史可被分为三个阶段：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和1950年代中期以来表面上集体领导起重要作用的非教条的共产主义。三个时期之间的区别可用图表

---

①② Djilas 1957, p. 38.

③④ Djilas 1957, p. 39.

概括如下：

时 期	领导层	权 力 关 系
“革命时期”	列宁	夺取权力；建立新阶级统治的基础
“教条时期”	斯大林	以“社会主义”的口号启动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新阶级的权力因此得以巩固
“非教条时期”	集体领导	以“合法化”的口号，没有大规模的清洗等，实现了阶级社会“静悄悄的”维持

不过，吉拉斯强调，不应将这个三重划分只看成一张粗略的和抽象的图表。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明确描述的阶段；列宁领导下也有教条主义；斯大林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还认为，集体领导的非教条状态是相对的。然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已发生种种明显的转变。权力，最初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它的目的本身。在特定的意义上，苏联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通过工业化，新阶级现在已经稳固地掌握了权力，并因此达到了它的目的。在历史上，仍然继续出现的只可能是平庸和停滞。<sup>①</sup>

显然，吉拉斯为官僚集体主义理论添加了新因素。与里齐比较，他并不把工人大众描绘为奴隶。与里齐和伯纳姆比较，他相信官僚阶层是一个纯东欧或苏联的现象。最后，与里齐、伯纳姆和沙特曼比较，吉拉斯对旧统治阶级和这一政治官僚阶层赋予了更密切的关注。正是吉拉斯理论更大量的细微差别表明，这一新统治阶级理论是根本难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相容的。毕竟，如果这个党是一个新统治阶级的核心，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它把政党解释为社会各阶级的代表，而不是其起源）不是被颠倒了么？吉拉斯承认这一困难，提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但只是说道：“在历史上，谁去实现一个过程不重要，唯一重

<sup>①</sup> Djilas 1957, p. 168.

要的是被实现的那个过程”。<sup>①</sup>

## 库伦/莫扎列夫斯基

早期的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中间,被设定的官僚集体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往往是没有详细说明的,<sup>②</sup>波兰的异见者亚采克·库伦(Jacek Kuron,1935—2004)和查尔斯·莫扎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生于1937年)在1964年做了一个尝试,重点关注这一难题。<sup>③</sup>他们在《致党的公开信》(他们因为被捕而未能写完此信)中,提出了一个他们称作“垄断官僚”的动力学理论。这些作者把苏联和他们自己的国家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工业化尝试。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决裂的时刻,俄国和波兰都是不发达国家。它们只有发育不良的工业,和与此同时许多以城市失业者和农村剩余人口的形式出现的过剩的工人。两个国

---

① Djilas 1957, p. 41. 在围绕着吉拉斯的巨大名声之后,里齐(Bruno R.)也在1958年被重新发现,当时一本由老布尔什维克鲍里斯·苏瓦(Boris Souvarine, 1895—1984)编辑的杂志《契约社会》(*Le Contrat Social*),发表了一篇关于“Bruno R等人的‘新阶级’”的稿件。Henein 1958. 该标题看起来参考了在同一杂志上的一篇早先的文章。(Lazitch 1957)。这里,埃及的超现实主义乔治·海奈(Georges Henein, 1914—1973)将“Bruno R”错误地表达为“Bruno Rossi”,并提到他被遗忘的著作《世界的官僚化》(*La Bureaucratization du Monde*):“吉拉斯在一个幻想破灭的个人经验的末期所发现和经历的, Bruno R. 在18年前已经以一种用生命抗争的方式宣示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里齐复兴的开始,这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导致了他的著作的新版本和新译本(也见 Paragraph 6.3)。在他的稿件中,海奈称“R”在1942年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永远地消失了,或许成了哪个有权阶层侵害的牺牲品回不来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猜测,因为它很快被推翻了。在那以后不久,《契约社会》收到了里齐的一封个人来信,他在信中显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沙特曼的支持者德雷珀(Hal Draper, 1914—1990)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封附有里齐的传记细节的信。也见 Bell 1959。

② 曾在第四章中讨论的约瑟夫·古特曼(Peter Meyer)是个例外。

③ 受1956年反斯大林抵抗运动的鼓舞,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战后波兰第二任外交部长之子)寻求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因此,他们保持与波兰托洛茨基主义历史学家拉德维克·哈斯(Ludwick Hass)的联系,阅读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被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采纳的决议《斯大林主义的兴衰》。两个材料直到1964年仍为华沙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助教们和波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ZMS的积极分子所用。他们因为他们的“公开信”分别受到被判处三年和三年半监禁的惩罚。见 Wagner 1968; Raina 1978 pp. 82—95; Jedlicki 1990; Soltysiak 1992; Lugowska 和 Grabski 2003, pp. 195—208; Gaudillière 等人, 2005。

家的经济都被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所控制。在这些条件下,工业化进程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因而,新统治者将此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但是他们不可能指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相反,假如要取得工业化的成功,那么必须抛弃主宰资本主义的那些机制。<sup>①</sup> 因为大量保留了积累的劳动力,工业化获得了粗放的特点。然而,由于低水平的原始积累,迅速增长的工业就业岗位无法与消费品数额按比例的增长相结合,所以生活标准下降了。为生产而生产成为中心目标。

对于这些新权贵,工业化是“生存目的”和根本任务。他们无视那些余留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无视他们这些人,开始落实这一根本任务:反对农民,用武力剥夺它的剩余,通过集体化胁迫其丧失财产;反对工人阶级,把他们的工资压到尽可能最低的水平,甚或减少;反对知识分子和技术管理层。这样一种工业化过程的有效实现,需要剥夺一切阶级和阶层试图阐明他们的不同利益、争取实现和维护这些利益的各种方式。<sup>②</sup>

这样,全部权力不得不集中于这个垄断官僚阶层的最高层。其结果是一党制度将同样的地位授予全部社会机构(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实行大众传媒和宣传部门的垄断化,取消公民自由,实行中央指导经济。由于这一工业化进程,因此,垄断官僚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苏联类型社会的剩余产品被一分为三:(1)大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积累,也就是扩大生产;(2)另一部分用作维持国家权力:军队、政治警察机关、法院、监狱;(3)最后,另一部分剩余用于不直接关系到阶级社会存在的各种活动,诸如科学、教育、卫生、文化等。精英花费在奢侈消费品上的部分剩余产品的数量是相当微不足道的。

一旦工业化过程大体完成(至1950年代末),根本性的失衡就出现

---

<sup>①</sup> Kuron/Modzelewski, 英译版, 第44页。

<sup>②</sup> Kuron/Modzelewski, 英译本, 第36页。

了。因为该垄断官僚阶层想要(即使这不再是历史的需要)继续更大地扩张资本—动产部门(“重工业”),继续损害生活水平。

结果,出现了低水平的消费和生产潜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采取了长期危机的形式。尽管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投资在增长,但这些矛盾问题从经济增长的衰退中表现出来。毕竟,第二部类(消费品)比第一部类增长更慢,结构性比例失调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

建立在官僚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损害该国生产力的桎梏;随着这种情况日复一日地持续发展,危机不断深化。因此,解决这种经济危机需要推翻这些生产关系和消灭官僚阶层的阶级统治。<sup>①</sup>

#### 第四节 各种“无标签”理论

##### 魏特福格尔及其批评者

1957年,汉学家卡尔·魏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 1896—1988)<sup>②</sup>发表了他的以《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为书名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他以一种几乎是摩尼教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的双线图式,其中西方“民主的”传统与东方“专制的”传统相互对立。为了解释这一假设的对比,魏特福格尔特别引证了地理和气候的观点。他申明,在东方,农业由于庞大的灌溉系统的建设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和专制统治者的基础:“农业统治的专制君主行使着对军队、警察和智能服务的不受限制的控制;他拥有他支配的狱卒、提审官、行刑者,以及对臣民进行抓捕、剥夺权力和杀害所需的一切手段。”<sup>③</sup>

<sup>①</sup> Kuron/Modzelewski, 英译本, 第48页。

<sup>②</sup> 一个在1920到1939年间的共产主义者,并从1927年起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专家。魏特福格尔在1930年代期间已经因为他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出版物获得了国际声誉。在1934年移民到美国之后,魏特福格尔演变到反共方向,尽管他继续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见 Ulmen 1978。

<sup>③</sup> Wittfogel 1957, pp. 420 - 3.

魏特福格尔也把他的理论运用于俄罗斯和苏联。为了做到这一点，魏特福格尔制造了一个看似正当的理由，即“东方专制主义”也可以被输出到非压力型的地区。<sup>①</sup> 他说明，这样一种转化曾发生在蒙古人入侵时期俄罗斯的例子中；<sup>②</sup>从那时起，东方专制主义巩固了自身。因此，从伊凡三世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是以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的专制政权为特色的。<sup>③</sup> 即使这样，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反抗的力量形成了。在1917年初的几个月，当沙皇军队在世界大战后软弱无力之际，反抗势力最终成长壮大，足以形成一个短期的反专制的民主政府。因此，“一个真正开放的历史形势”短暂地出现了。<sup>④</sup> 然而，新的民主领袖犯了重大错误；他们延续那场战争，即使他们缺乏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并且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之后，他们仍然拖延土地改革，始终不解决这个问题。<sup>⑤</sup> 民主政策中的这些缺点给了布尔什维克以机会；因此，苏联，一个将东方专制主义提升到更高水平的社会得以建立，并且降生了一个工业基础上的全面的(国家)奴隶制。<sup>⑥</sup>

魏特福格尔关于俄国历史的解释直到1980年代仍继续具有某些影响(见第六章)。然而，各种各样的专家指出其值得怀疑的科学有效性。在1963年与魏特福格尔在《斯拉夫人评论》(*Slavic Review*)上的一场辩

① 在大纲中，魏特福格尔早已提出了这一观点(Wittfogel 1950)。在《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以后，他进一步详细说明了理论(Wittfogel 1960 and 1963a)。

② Wittfogel 1957, p. 174; 也见 p. 225。

③ “专制国家机器的主人们以变化的态度回应了变化的历史形势，但是直到1917年他们并未放弃他们的独裁权力。” Wittfogel 1957, p. 179。

④ Wittfogel 1957, p. 437。

⑤ Wittfogel 1957, p. 438。

⑥ Wittfogel 1957, p. 441。魏特福格尔受普列汉诺夫这一理论的启发。(Bertram D. Wolfe, 1896—1977)他曾在1948年提及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表述；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明确表示，土地国有化将再次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造成“亚细亚”传统的复活。沃尔夫夫人补充道：“……如同普列汉诺夫曾预言的，它是个人专制、劳动管制、各种清洗、强制劳动、官僚特权、警察统治的一种‘复辟’的真正的经济政治基础——一种相比起来将会使沙皇制看上去像是一个有限国家的国家膨胀。”(Wolfe 1948, p. 468。)在这一评论的影响下，魏特福格尔在第二年得出了他的工业专制论。Ulmen 1981, pp. vii - viii。



论中,利埃森诺夫斯基(Riasanovsky)否认俄罗斯存在过东方专制主义。这种社会形式毕竟是通过发展孱弱的和四分五裂的私有制来定义的。不过在俄罗斯,不同形式的私有财产长期存在,此外它已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成长和分化。而恰恰是蒙古人曾试图倒转所有制的这种分解化。利埃森诺夫斯基从基础上指责魏特福格尔没有对历史本身进行研究就把图式强加于历史。因此,魏特福格尔的解释仍然是“外在表面的”。根据利埃森诺夫斯基的观点,蒙古占领军对俄罗斯帝国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不可否认,他们引进了一些新制度,但这不应当加以夸大:

例如,蒙古人的财政政策在俄罗斯经常失败。因此,这些侵略者根本不考虑人们的纳税能力,而用更粗放、更简单的人头税取代了“烟草”税和“耕作”税。但是,当俄罗斯王子们从蒙古收税人那里接手作为中介之时,这一改革就消失了,甚至邮政系统也回归到基辅人的时代,尽管蒙古人扩大和改善了它。

利埃森诺夫斯基更为一般地质疑,像这种蒙古人类型的部落社会怎么能够持续影响一个像基辅那种类型的发展水平更高的共同体。<sup>①</sup>

迪特里希(Dittrich)也指出,声称蒙古人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带到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信的主张。在他看来,魏特福格尔的理论提出了比它回答的问题更多的问题;他把这归结于这一理论的片面性、简单性和事实错误,而这与一种僵化的、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有关。<sup>②</sup>

## 马尔库塞

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对苏联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这经常在他的圈子里造成对他的错误解读。典型的是卡尔·柯尔施在1930年代末期对有关早期法兰克

---

<sup>①</sup> Riasanovsky 1963. 在他对利埃森诺夫斯基的回答中,魏特福格尔否认蒙古人是游牧民。在他看来,他们的社会本质上是农牧式的,并由一个强大的城市中心带领(Wittfogel, 1963b)。

<sup>②</sup> Dittrich 1966.

福社会研究所成员的评论：“在内部，他们全体毫无例外都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反斯大林主义者。马尔库塞生来就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可能恰恰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sup>①</sup>批评者对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 1958, 是他关于苏联的最重要的著作<sup>②</sup>)的回应，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困扰：当某些人污蔑他是卫道士的时候，另一些人视他为“冷战分子”。<sup>③</sup>

马尔库塞认为，俄罗斯在1917年不存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而他将苏联分析为一个由官僚阶层统治的社会，它在一个“指令性的专政下”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sup>④</sup>一个官僚阶层已经发展起来，它一方面不是一个阶级，因为“经济实力的传统资源对苏联的官僚阶层不利”；但另一方面，“它虽然不拥有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但如果不用所有制而用掌握生产资料作为标准，苏联的官僚阶层是一个阶级。<sup>⑤</sup>

该官僚“阶级”“不是一个单一同质的集团”，因为该统治集团的最高层“自身是变化的，包括经济、政治等官僚部门如管理、军队、党的‘代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利益和对社会统治的追求。”<sup>⑥</sup>两种力量凭借对权力的垄断而运行：

一方面，尽管中央计划突发奇想、漏洞百出并经反复修改，但基本代替和整合了那些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阶层，直到最高层，都臣服于竞争性的恐怖，或者在这种恐怖缓和之后，臣服于被极度运用的种种政治性和惩罚性的措施，直至被剥夺权力。<sup>⑦</sup>

① 柯尔施致保罗·马蒂克的注明1938年10月20日的信，此处引证在Buckmiller and Langkau 1974之后，第183页。

② Marcuse 1958. 斯库尔曼(Schoolman)合理地指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几近于马尔库塞后来的《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的一个精确的理论副本。在这第二本著作中，其观点有时几乎逐字复述了其早期研究。”(Schoolman 1980, p. 150)也见 Söllner 1987-1。

③ Kellner 1984, pp. 197-8.

④ 此概念见 Marcuse 1964, p. 40.

⑤ Marcuse 1958, pp. 109-10, 116.

⑥⑦ Marcuse 1958, p. 111.

整个苏联社会,包括官僚阶层,都服从于生产力即“‘和平共处’条件下苏联国家的生存前提和竞争实力”加速发展的绝对命令。<sup>①</sup>由于这一原因,官僚阶层缺少一个作为“反对该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总需求,争取其特殊利益有效存续”的社会基础。<sup>②</sup>即,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命令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属于其社会内部结构,贯彻这些基本原则与那些竞争性的权力和明显的利益包括强调重工业的优先性相矛盾,因此,要实行普及全国的社会主义所有权,并通过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努力创造一种“缓和”。<sup>③</sup>

总体上,苏联官僚阶层以一种实体化的形式代表社会利益:

没有中介因素,国家直接成为生产机构的政治组织、国有经济的总经理和实体化的集体利益。因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功能差异趋向于被湮没:由于剥夺了上层建筑超越和对抗基础的功能,上层建筑系统地、制度性地与基础相雷同。<sup>④</sup>

## 罗斯道尔斯基

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曼·罗斯道尔斯基(Roman Rosdolsky, 1898—1967)<sup>⑤</sup>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在1950年代得出了关于苏联的异端观点。在罗斯道尔斯基的讣告中,恩斯特·曼德尔陈述道:

---

① Marcuse 1958, p. 118.

② Marcuse 1958, p. 116.

③ Marcuse 1958, pp. 115 - 6.

④ Marcuse 1958, p. 124.

⑤ 罗斯道尔斯基是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始人,并从1926年起一段时间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在1920年代末演变成左翼反对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奥斯维辛、雷文斯布希克和奥拉宁堡的集中营遭受关押。1947年,他移民到美国。他因为他的著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失去历史的”人民的问题》(*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less' Peoples*, 见 Rosdolsky 1964)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见 Rosdolsky 1968)而闻名。参见 Radziejowski 1978; Melville 1992。

他与第四国际的差异显然与他对像朝鲜战争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等重大事件的解释相关。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中,他将这些差异具体化为正确的国家定义,即:资本主义已被推翻,无产阶级尚未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他采取了这种观点:蜕化的工人国家的公式……现在不再与现实相符,而且人们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也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被延宕,官僚阶层将会成为一个阶级。有时,他使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式描述这些国家的特征,但是伴随着大量的缄默和委婉的陈述。<sup>①</sup>

1959年,罗斯道尔斯基写了一篇关于“工人国家”问题的短文,在他去世后的1978年才发表。<sup>②</sup>如曼德尔的悼词指出的,他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只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为人所知。总之,这令人吃惊,因为罗斯道尔斯基被所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非托洛茨基主义者。

在他的这篇文稿中,罗斯道尔斯基以下述理念为出发点: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表明,它与这个革命进程最早的背负者的意图几乎没有任何类同之处。他追随恩格斯的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历史必然性在没有被历史行动者承认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假如俄国革命与改变了参加者头脑的最初事变如此相似,假如通过它的代言人的如此之多的行动导致的结果最终仍然与曾经期望的那些结果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在这一事实背后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以捕捉到它潜藏的内在运动规律。

这里暗含的观念是:革命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罗斯道尔斯基,这一必然性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毕竟,革命前的俄国曾面临一种选择:

---

<sup>①</sup> Mandel 1968b.

<sup>②</sup> Rosdolsky 1959.

通过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克服几个世纪之久的落后状态,或者长期沦落到外国(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

当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时,它不可能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就已一目了然了。因此,这一迫切任务必须由另一种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来实行。但这一权力设想以铁的逻辑实现自身,因为这场革命已经在国际上被孤立。而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1920年代发展起来,其中一个独裁的官僚阶层决定了有关生产资料、生产发展速度、分配关系等。根据罗斯道尔斯基,该官僚阶层“还不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阶级”,在其总体性上,俄国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相当不确定的“暂时的构建物”,人们既不能将它定义为资本主义,也不能将它定义为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

将这一新社会形态定义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如我们所知,不是每个阶级层次都必定是资本主义的,并且另一方面也因为,资本家阶级与众不同的定义特征——利润动机——是缺位的。称这一形态为“工人国家”或“蜕化的工人国家”似乎也不合适的,因为在苏联工人本身极少有话语权,并因为统治官僚阶层尽其所能和必然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防止国家所有权转变成真正的大众所有制!

罗斯道尔斯基在一个脚注中说,他意识到,坚持这一观点,使他自己保持了与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距离。

## 博泽

196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和解。在这一发展背景下,社会党内发生了一场(非常适度的)关于苏联的辩论,该党当时是仍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党国际最后的成员之一。这是法国自1930年代以来第一场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争论。

最突出的观点是由法国籍罗马尼亚裔社会主义者加斯东·博泽

(Gaston Boeue, 1894—1969, 化名“Ôerban Voinea”)提出的。<sup>①</sup> 他合理地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几乎没有尽力去分析由共产党专政控制的那些社会的性质”。<sup>②</sup> 博泽主张,苏联既非社会主义的(因为继续存在剥削和压迫),也非资本主义的(特别是因为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并因此能够逃避市场规律),因此,他将苏联及其缓冲区国家描绘为以国有化、计划化和剩余价值生产为特征的“特殊的社会”。

当时,作为批判“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sup>③</sup>博泽提供了关于其解释的更多细节。他在一个非常宽泛的(而它看起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剩余价值”概念,即将它作为“物质化的剩余产品”。但是,博泽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这些官僚阶层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它没有阶级意识;<sup>④</sup>而且剥削仍然发生,因为工人大众创造了它无法控制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一种剩余产品)。<sup>⑤</sup> 博泽试图给这个新社会形式起一个名字,这样,他就把自己明确地放在了斯泰因伯格和希法亭的传统之中。

## 第五节 总结

就有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受到的关注而言,1956至1968年可被评价为缺乏重大创造力的时期。“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复自己,这意味着,相对来说,最重大的进展发生在各种关于新生产方式的理论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领域的几乎全部新的理论贡献,包括“新阶级”的理论家(吉拉

① 法理学家博泽从1914年起成为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学生组织的积极分子,并在1921年当社会民主党寻求与共产国际联姻时离开了该党。他于1948年移居巴黎,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流亡者中心的积极分子。见 Haupt 等人 1986, pp. 387-8。

② Voinea 1965a, p. 43.

③ Le Corre 1965a.

④ 一种已经得到辩护的解释,载于 Voinea 1955, pp. 197ff.

⑤ Voinea 1965b.

斯·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和“无标签”的理论解释的支持者(罗斯道尔斯基和博泽)撰写的那些著述,都源自东欧。这样,人们可以说,1956至1968年这一时期记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几乎全面的理论停滞,一种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反转成为“暴风雨前的寂静”的停滞。

## 第六章 从镇压“布拉格之春”到改革

(1968—1985)

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在左翼圈子中造成了普遍的震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怀疑,这种由莫斯科定向的共产主义已经对自己在西方的影响给予了致命一击:“捷克危机标志着莫斯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告终的开端”<sup>①</sup>。

西方学生运动的大规模兴起(较早时期已经开始,在1968年5月的巴黎达到了巅峰),意味着广大(未来)知识阶层的激进化。虽然学生们常常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对苏联及其缓冲区国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采取了独立的立场。几年间,学生运动中爆发了一场关于苏联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辩论,这是前所未有的。正如1960年代初那样,运动参与者最初回归较陈旧的理论,但是很快增添了新的理论变体。现存的“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官僚集体主义”等理论再次得以重申,同时,大量关于“新生产方式”理论的原创性文献大大地增加了。

---

<sup>①</sup> Sweezy, 1968, p15.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 克利夫思潮

克利夫的理论在 1956—1968 年期间尚未体现出这种新方式的发展,一般还停留在重复层面。克利夫追随者的讨论集中在一个要点上,即苏联工人的社会地位。

1948 年,克利夫阐明苏联的工人不同于竞争性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工人,因为前者与后者相比,无法选择其雇主;它只能有一个雇主,即国家:“主人的变动”是不可能的,而“周期性地出售自己”变成唯一一件正经事。<sup>①</sup>但是到了 1970 年代,克利夫的支持者彼得·宾斯(Peter Binns)和邓肯·哈洛斯(Duncan Hallas)修正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看起来似乎存在着许多可让工人们出卖其劳动力的不同的企业,苏联工人在现实中是“普通的”工资劳动者。因此,苏联工人不管是作为国家煤炭集团还是不列颠铁路的雇佣者,都处在同样的处境下:“简言之,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包括,作为基本特征的工资劳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意义上的工资制度……但是工资劳动包含有资本,正如奴隶制包含着对奴隶的占有。”<sup>②</sup>

彼得·宾斯(Peter Binns)与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在这一时期合著的后期文献中,还是再次抛弃了这个观点。此时争论的问题是,苏联的劳动力不可能是商品,由于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不可能存在“在马克思该词意义上的工资劳动”。然而,这并没有提出严重的理论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其他类型的劳动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相容的,例如

<sup>①</sup> Cliff, 1948a, 第 95 页; 2003 年重印本, 第 88 页。

<sup>②</sup> Binns 和 Hallas, 1976 年, 第 23—24 页。这一文章是对 Purdy 出版于 1976 年的一本书的一个回答, 是对攻击克利夫的分析的致歉声明, 并且在这样做时, 运用了恩斯特·曼德尔阐述的观点。关于 Purdy, 也见 Law 1976—1977。

美国南部的早期种植园奴隶制。<sup>①</sup>

新命题遭遇了强大的抵制。邓肯·哈洛斯声称,命题威胁到摧毁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这里争论的完全是在苏联是否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抑或它不存在。……如果劳动者在苏联不是商品,那么就不存在无产阶级。而且,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那么不可能存在工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资本,所以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存在。……没有交换,就没有资本。交换需要工资以及因而而来的货币(一般化的商品)和商品生产——为销售而生产物品。<sup>②</sup>

为了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哈洛斯主张,将苏联的劳动定义为工资劳动因此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推理的好例子,认为结论要比伴随获得这一结论的过程更重要)。<sup>③</sup> 亚历克斯·科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sup>④</sup>也在考虑提出一个相似的观点:

无论如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阐明,工资劳动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被认为存在着重大争议。

### 马蒂克

在1960年代时期,德裔美国人、议会共产主义者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1904—1981)<sup>⑤</sup>在鲁尔、魏格纳、汉恩及追随者的传统中扩展了上述理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得出了一种至少在苏联问题范围

① Binns and Haynes 1980.

② 事实上,哈洛斯在这里与克利夫观点相左。克利夫写道:“如果俄罗斯是一个直接从一个中心进行管理的大工厂,如果所有劳动者实际上直接接受了必需的产品,那么法律在企业之间和劳动者与雇佣者—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本质上将会没有任何不同”。Cliff, 1948a, 第97页;2003重印本,第89页。

③ Hallas, 1980.

④ Callinicos, 1981.

⑤ 传记细节见 Dingel, 1981;巴克米勒(Buckmiller)在1981年写了一个全面的传记。

内接近托尼·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理念的观点。在他出版于1969年的书《马克思和凯恩斯》(*Marx and Keynes*),即一篇他七年前已经写就的同名文章的扩展本<sup>①</sup>中,马蒂克试图发展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在它表现的所有不同形式中)的分析。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形式之一,就是苏联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确实从根本上与混合资本主义不相同,因为不再存在市场,<sup>②</sup>但是,与此同时,二者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

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它们对劳资关系的维护和对资本主义商业方式的运用中,都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现在,政府取代资本家,掌握生产方式。前者设定了关于生产性资源的某种价值(用货币术语),并期待随后的生产过程中的更大价值(用货币术语)。货币工资被付与工人,其功能正是创造一种比他们的工资所代表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这一剩余由政府来决定分配。它供养非劳动人口,保障国防安全,照顾公众需求,并被重新投入到扩充的资本中去。所有的经济交易不是兑换交易,就是类似的交易。劳动力被出卖给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在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和另外一些企业的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准商业交易,正像在大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所实行的交易一样,它也在完全集中化的国家经济中得以完全实现。在形式上,除了后者对剩余产品进行集权化控制以外,私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经济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sup>③</sup>

他认为,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决不应掩盖如下事实:它们二者由于一个深刻的分裂而彼此分离,一种制度决不可能和平过渡到另一制度。

资本主义将不可能自行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一场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其实正像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是困难的。因

---

① Mattick, 1962.

② Mattick 1969, p. 283.

③ Mattick 1969, p. 289.

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预示着,剥夺私人资本,将混合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一个革命的而不是演进的过程。<sup>①</sup>

马蒂克因此用这一理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仅在从一个生产方式向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中,而且在一个生产方式的内部,一场激烈的社会经济革命对于一种内在的改造也是必然的。

与克利夫相比,马蒂克强调,尤其是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有机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那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是资本形成的前提。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后者被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工人所有制。作为诸如苏联的那些社会,其统治表明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是以政府支配取代了整个社会的支配”。<sup>②</sup>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蒂克所使用的极其有限的资本主义的定义(工资劳动和没有工人的自我管理)。当一个作者,如克利夫,仍然试图使那种理念(即苏联遵从马克思阐明的所有运动规律——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利润最大化原则,等等)看上去正当合理的时候,马蒂克不再相信这是必然的。因而,他对关于剩余产品在苏联不必理解为利润的说法不再深信不疑。<sup>③</sup>

### 毛主义的变体:霍姆伯格;贝特尔海姆及其批评者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引起了苏联和中国之间冲突的公开化。在其后数年中,这一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导致中国领导层从1967年起坚持如下观点: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并非没有正当理由,事实已经表明:这一“理论”(从来没有被中国人自己真诚地证实过)首先具有使外交政策的变化合法化的作用。<sup>④</sup>

① Mattick 1969, p. 284.

②③ Mattick 1969, p. 290.

④ 在后一阶段,中国领导层通过宣布美国是一个腐朽的、正在衰落的资本主义,而苏联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将该理论精炼化。依据这一基础,同美国合作在几年后被合法化了(见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和与苏联的敌对状态)。1974年,伴随着“三个世界”理论,据此莫斯科的“霸权主义”是人类的主要敌人,中苏关系达到最低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状态给他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典型的是著名的美国杂志《每月评论》的编辑们的思想倾向。由利奥·赫伯尔曼(Leo Huberman)和保罗·斯威齐撰写的1961年12月号的社论声称:当中国人和俄国人的观点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俄国人仍然拥有正确路线:

中国人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教条的左翼观点的典型例子。这种观点可能被认可的两个不同特点,是低估了民族主义和集中了无差别的反动大多数中的所有反对观点。它总是洋溢着超级的战斗力,并且宣布没有妥协余地。就其政策转变来说,其结果在极大程度上是适得其反的。<sup>①</sup>

一年半以后,评价变得根本不同了。再次由赫伯尔曼和斯威齐撰写的1963年5月号的社论这样宣告:先前所定义的观点已经变得站不住脚。现在,它声称,中国人大体上拥有正确的路线。然而,中国人依据苏联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俄国人进行的指控,被抛弃了。<sup>②</sup>

但是这一观点晚些时候再次被修正。几年以后,《每月评论》开始认可中国对苏联的大部分批判。<sup>③</sup>但是,在支持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评价中国批判的理论意义之前,有一段漫长的时期。艾尔·谢曼斯基(Al Szymanski,一个美国的旧毛派,这样写道:

尽管中国人自1967年以后一直称苏联是资本主义,我们几个人在当时全面接受了这些说法。我们并不是机械地去接受中国的(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层说成真理的每一件事。直到1970年代早

① Huberman & Sweezy 1961.

② Huberman & Sweezy 1963.

③ 关于斯威齐,Clecak(1973年,第130页)论及一个“从一种主要起源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式,到主要从毛主义的和古巴的观点中提炼出来的第二种范式的运动”。第一范式——他直到1956年匈牙利起义时都一直以极大的信心使用的范式——在怀疑、觉醒和重新评价的间隔期——大约是从1957至1960年土崩瓦解了。在1960年春天访问古巴之后,斯威齐开始发展第二范式。

期,其中1973年成为关键的一年,新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幸存者才开始严肃地面对现实的中国观点,即苏联已经真正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sup>①</sup>

在西欧,在毛主义的圈子里,一本标注着1974—1975年由瑞典人尼尔斯·霍姆伯格(Nils Holmberg, 1902—1981)撰写的著作《和平的反革命》(*Peaceful Counter - Revolution*),在第一轮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被译为德文和荷兰文。<sup>②</sup>在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翻译者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撰写的《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USSR*, 1975)发挥了类似作用。<sup>③</sup>霍姆伯格的著作鲜明地阐述了毛主义的思维方式。它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声称,即使在此时,一个官僚集团可能已在党内孵化。这一官僚集团不断走向强大,唯一可能被斯大林本人掌握的权力所阻挡。当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时,这个对官僚们的最后障碍已经消失,然后他们以迅疾的发展速度,运用国家机器复辟资本主义。工人们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决策权。他们此后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国家,而他们的工会变成了新资本家的工具。结果是苏联不再像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在一切基本方面曾经存在过的那个社会:

脱离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由单一的工资劳动者组成的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官僚主义精英运用国家权力窃取了生产资料与在生产中创造的商品总量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自那时起,它已经运用这一权利去剥削工人和窃取他们创造的

① Szymanski 1979, p. 7.

② 霍姆伯格1924年成为瑞典共产党(SKP)党员。除了别的工作以外,他是共产国际驻英国代表和瑞典共产党党报《工人报》(*Arbetartidningen*)的创办者。1950年,他登记成为该党不受限制的党员,并因儿童读物的生动写作而出名。1960年前后在中国逗留两年之后,霍姆伯格成为瑞典的毛派先锋。1967年,他与他的夫人共同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导向的组织,并随后领导了毛派报纸《火星报》(*Gnistan*)。见“作者简介”,载于其德文版(Holmberg 1974b, pp. 160 - 161); Anon. 1981b.

③ Nicolaus, 1975. 也见《革命联盟》(*Revolutionary Union*), 1974年。

剩余价值。<sup>①</sup>

依据霍姆伯格,资本主义社会由两个特点来定义:(1) 利用生产资料剥削工人,(2) 工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对工资的交换。由于认为这两个定义的特点可运用于苏联,霍姆伯格使用“复辟了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sup>②</sup> 简言之,通过说明斯大林在他的环境下不知不觉地容忍了资产阶级官僚,我们可以对霍姆伯格的理论解释进行总结。这一“政变”观无可否认是毛主义的一个相当庸俗的变体。<sup>③</sup>

一个更充满智慧的版本是法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贝特尔海姆的理论。他的解释基础在他的短小而精炼的《经济计算和产权形式》(*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Forms of Property*, 1969)<sup>④</sup>一书中得以详细说明。他的里程碑式的、多卷本的《苏联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实质上只是一个对其早期著作的深入的精心阐释。<sup>⑤</sup> 正像霍姆伯格那样,贝特尔海姆假设,一个和平的反革命(或正确地说是一场政变)已经产生,但是他试图将这一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内。因此,他拒绝一切过分简单的政变论。

其中心问题是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后者假称,人们可以以少数个人的特点为基础定义一种社会形态,或基于发生在国家机器顶层的几个人的分裂和操纵来“解释”一个历史过程。极端的案例(它是特别典型的)是那种“政变”论:它假定,在一小撮顶层实行的阴谋,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政变是最后阶段,它发生在基于阶级关系的革命过程(自身的一个预定达到高潮的过程)的政治舞台最前沿。由于在前面已经发生的那些革命,这种政变才可能显现在政治舞台的前

---

① Holmberg 1974b, p. 141.

② Holmberg 1974b, pp. 141 - 2.

③ 也见 1976 年 Frühling 的批评。

④ Bettelheim 1970a.

⑤ Bettelheim 1974, 1977, 1982, 1983.

沿。依靠政变“解释”种种社会变化的尝试,来源于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sup>①</sup>

这样,贝特尔海姆并不把用主观因素揭露资产阶级官僚视为他的任务。相反,他想要揭示资产阶级权力在苏联复辟的客观根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描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贝特尔海姆拒绝他标示为“经济主义”的东西(将社会关系的改造片面归属于生产力发展的那种主张),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首要前提不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在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在《苏联的阶级斗争》一书中,贝特尔海姆捍卫以下论题: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不是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中,而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与法律形式的垄断无关),并操纵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在这一意义上,并只有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专政。相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只能由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权力才能建立。因此,社会主义必须以**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术语来定义。一旦工人阶级最终将国家政权掌握在它的手中,那么它就能削弱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但是,就这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尚未完成或尚未取得成功这一点而言,一个新资产阶级还会产生出来,它将试图重新夺取国家权力。

这个新资产阶级将会相当可能包括老的共产党干部和负责的官员,因为所有这些人在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地位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体系中占据了位置,他们将组成一个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资产阶级。如果在一个企业中老的资本所有者已经死去,或已经被驱逐,但是生产过程的那种等级制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如果在等级制更高层级中的负责官员可以签署命令和享受有特权的待遇,那么,那个企业中的领导人就将成为那个资产阶级的成员。因此,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苏联,

---

<sup>①</sup> Bettelheim 1979, p157.



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最初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负责官员群体的破坏,他们在根本上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敌对的。由于这些官员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和处于行政机器的顶端,并由于他们所传承的资产阶级方法和实践,这种抗衡是有可能的。

共产主义者尚未充分认识到这种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于是他们忽略了动员群众去反对它(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渐渐地,新资产阶级的权力由此可以扩展其自身,而随着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复辟得以实现。<sup>①</sup>这种蜕化最终的证据,是新资产阶级对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制度性背叛。

《经济计算和产权形式》包含了这种解释的根本的经济学原理,它与波迪加的观点不同,并且也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由企业构成的。

“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主要在工业中,它是具体的“生产单位”,在那里,国家所有权作为一般规则,在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发挥其效力)是基于企业结构呈现出**双重分离**的形式这一事实:**工人阶级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正如企业占有的生产资料,事实上即是由企业经理们所占有);**企业之间相互分离**。这一双重的分离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sup>②</sup>

第二,只要企业以这一双重分离进行运作,它们就必须是资本主义的,它们延续市场关系的存在,并构成计划的反向一极。在贝特爾海姆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最新的1965年9月改革以来(当时苏联企业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就决定了对后者有利。在1965年,最终达成以下观点:计划机构允许企业“自由”(至于是形式的自由还是现实的自由,关系不大),由它们自己完成它们的计划要点。因此,投资不再取决于计划,而是取决于该企业的指导者。计划

<sup>①</sup> Bettelheim 1974, pp. 7 - 56.

<sup>②</sup> Bettelheim 1970a, Vol. II, p. 8.

因此不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市场关系的“导向”。

最后,市场替代计划进行统治,价值规律的运行得以恢复。由于这个原因,权力不再由工人阶级掌握。计划只作为一个具有计划编制的简单的、欺骗性的外表得以保留。在这一外表的伪装下,存在一个与直接生产者相异化的新支配力量。当资本家的作用由领导者来呈现的时候,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已在计划组织内部成长起来;这个国家所有制的真正阶级内容取决于工人阶级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如果国家机器是在现实中和整体上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取代高居于工人之上和支配工人的机器),那么,国家所有制将会是工人的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但是,如果相比之下,工人并不掌握国家机器,并且如果这一机器逃脱了工人群众的控制和领导,由一个负责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实体所支配,那么,这一负责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实体就成为了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由于生产资料一方和工人一方存在的关系,可以说这一实体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国家资产阶级)。<sup>①</sup>

在写于1970年代后半段期间的后期著作中,贝特尔海姆在伯纳德·沙旺斯(Bernard Chavance,生于1947年)的帮助下添加了一些观点。<sup>②</sup>因此,两位经济学家称,苏联已经变成一个“新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可以从下述八个标准中推演出来:

1. 因为1965年的经济改革,利润已被引入作为工业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标准。
2. 经济活动是极端集中的,并由国家控制。
3. 同时,企业争夺原材料、雇员等。因此,竞争仍然存在。
4. 剩余价值由国家独占,即由上面提到的国家资产阶级来主宰。

<sup>①</sup> Bettelheim 1970a, Vol. II, pp. 26 - 35.

<sup>②</sup> 贝特尔海姆本人在1970年代末还是与中国保持了距离。(见Bettelheim, 1978年)在1985年,贝特尔海姆认为,资本主义普遍存在于整个世界。(Bettelheim, 1985年,第44页)这并不影响他对苏联的分析,至多它是指,对这个国家所提出的图式,现在还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虽然有一些修正。

5. 经济发展展现了周期性特征和积累危机。

6. 存在扩张趋势。

7. 工人阶级完全是被雇佣的,等等,但远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中的那种权利剥夺。

8.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修正主义的;它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在现实中是资产阶级的。<sup>①</sup>

渐渐地,贝特尔海姆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了他的观点。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中,他声明他不再将十月革命看作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看作是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启动了一个“开放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到1929年才“极力为一场可能导致合作结局的农民革命创造机会”。<sup>②</sup>

**批判.** 贝特尔海姆的表述引发了许多回应。最知名的是保罗·斯威齐的众多评论,这些论文是美国作者和法国批判者之间一个很漫长的辩论的组成部分。<sup>③</sup> 此外,许多其他作者也声明了他们的支持和反对。<sup>④</sup>

贝特尔海姆的“反经济主义”从许多侧面受到激烈的批评,不是因为他的批评者赞成经济主义,而是因为贝特尔海姆将“社会关系”概念狭窄地应用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sup>⑤</sup> 与这一批评意见相关的是,贝特尔海姆用“偏离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作为衡量资本主义复辟的终极标准,并把阶级斗争简化为意识形态的战斗。

除了政府和党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贝特尔海姆没有提供任何评判无产阶级是否掌权的标准。作为具有解释价值的理论,应当有一个确立无产阶级掌权的特征的独立方法,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吗?

---

① 这些个人观点是在几本不同的著作中形成的,见 Chavance, 1977 和 1983; Bettelheim, 1983 和 1985。

② Bettelheim 1982, p. 14.

③ 这场辩论从 1968 年斯威齐评论开始,到贝特尔海姆的回应,一直持续到 1980 年代下半期。

④ 一些重要的著作是: Mandel 1970b, Chattopadhyay 1972, Dallemagne 1972, Miliband 1975, Ticktin 1976, Damkjær 1979a.

⑤ Callinicos 1979.

还有……新的国家资产阶级成长的各种形态和阶段是哪些?也许首先最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期望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是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sup>①</sup>

贝特尔海姆根据存在着实行工资劳动的独立企业去推演苏联的资本主义特征,受到了方法上的批评。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达勒马涅(Dallemagne)声称,事情现在迅速向前推进:如果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企业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母体”。在其他情况下,企业不会是这一母体。独立企业的存在因此不能证明任何东西。<sup>②</sup>

另外,关于双重分离(工资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自身之间相互分离)的论题引发了许多异议。第一,这个论题不能有效地说明苏联的企业是独立的:“企业不可能决定价格、工资、它的供应方和买主。由于这个原因,企业不可能真正由它自己决定它将生产什么”。<sup>③</sup> 第二,这个论题认为,尽管存在着工资劳动,但是因为几个原因劳动力在苏联不是商品:(1)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劳动市场;(2)不是实行按比例分配工资;(3)从劳动中挣来的货币不是获取生活消费品的唯一方式。<sup>④</sup>

在这部著作中,贝特尔海姆和沙旺斯提到的八个定义特征全都受到了质疑。主要有两种质疑观点:第一,一些特征的事实精确性存有争议。比如,这一争论恰恰发生在1965年后有关引进企业利润的问题上。斯威齐称,与阐述工业生产率这一最重要的标准相比,这里正发生某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利润的确是最重要的变量,那么,不仅生产成本,而且投资、价格等,都将取决于它。但是,并不是这种情况:“在苏联体制下……关于居于企业层面之上的各种变量的基本定义,由行政性的计划体制来制定,其中利润最大化只发挥着次要的和较小的作用”。<sup>⑤</sup> 至于企

① Sweezy 1970。也见 Stuurman 1979, pp. 80 - 3。

② Dallemagne 1972, 段落 II - A - 2; Nair, 1972。

③ Ticktin 1976, p. 23. Mandel 1970b。

④ Ticktin 1976, pp. 32 - 4。

⑤ Sweezy 1977c, pp. 11 - 2。

业之间假设的竞争,也被认为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产生,而是以占有使用价值的方式产生。<sup>①</sup>

第二,关于特殊的特征也有争议,对于一个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些特征是不恰当的。那种被假设证明的东西,据认为是先验的。经济活动由国家集中控制这一事实,并不证明资本主义的存在。<sup>②</sup>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有关企业之间的竞争,或扩张主义和周期性危机的存在。<sup>③</sup>

贝特尔海姆(和沙旺斯)因此受到几个阵线的攻击: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资本主义定义和他们的经验主义观点全都遭到了批判。

### 工人主义的变体

毛主义的影响还可以在那些所谓“工人主义”思潮的著述中找到。工人主义起源于1950年代的意大利,当时来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圈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从“工人的观点”分析劳工运动中的许多战略问题,也就是通过从工厂层面的观点观察形势。<sup>④</sup> 工人主义者最初围绕在《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月刊周围。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六期(1961—1965),但是它仍然在意大利后来在西德有影响。在《红色手册》停止出版以后,工人主义思潮继续存在。尤其是,经济学家丽塔·迪利奥(Rita di Leo,生于1940年)将工人主义的方式运用于苏联,从“下面”分析社会。她也得出了与贝特尔海姆相同的结论,即那里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因为工人和生产资料是相互分离的(也是贝特尔海姆使用的两个标准之一)。在她出版于1970年的书《工人和苏联》中,迪利奥因此写道,正像在西方一样(它是以另外的形式),剩余价值在苏联产生了,而且活劳动、机器和原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那里找到。<sup>⑤</sup>

---

① Mandel 1970b.

② Mandel 1970b, p. 16.

③ Sweezy 1985b.

④ 对意大利工人主义思潮历史的叙述,载 Rieland 1977 和 Wright 2002。

⑤ Leo 1970。也见 Leo 1977。

##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 各种阐述

正像克利夫提出这个理论一样,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理论普遍原封不动。1968年以来,对这一理论的两种相关阐释仍然可以鉴别出来,这些阐释都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矫正。首先,由于欣赏“过渡社会”这一术语,因此“蜕化的工人国家”概念被抛弃了。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如下解释(该解释符合托洛茨基主义哲学家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的观念,他在1968年第一次陈述了这个观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许多享有某些抽象的所有权的“过渡形态”:从狩猎和群居到农业生产的过渡;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从公社财产到私有财产的过渡;从罗马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最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sup>①</sup>

其次,苏联的过渡社会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一个独特的、能使自身永存的社会类型,假如“暂时的蜕化”持续超过半个世纪,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论。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曼德尔,他在1968年仍将苏联和类似的社会说成“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sup>②</sup>,而在1973年则宣称:“这个过渡社会是以独特的生产关系为特征的;这些生产关系不仅是已被替代的和逐渐展开的伟大的历史性生产方式的结合。”<sup>③</sup>几年以后,他更精确地表述了同样的思想:

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并不代表任何社会主义形式,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结合”。它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而这些生产关系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些

① Novack 1968.

② Mandel 1968a, p. 276. 在第 283 页,有对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经济”所做的参考注释。

③ Mandel 1973a.

生产关系,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些生产关系。<sup>①</sup>

当然,该理论的这些变化,几乎没有被看作是实质性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事实上正倾尽全力对付其他政治理论思潮的代表的批评,那些批评往往是中肯的。

### 各种批判

曼德尔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统治阶级理论的尖锐批判者的形象之后,一个不亚于前者的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尖锐批判在1968年启动了。确实,在那以前,已经对托洛茨基的苏联观提出了相当多的不同意见,但是这些异议主要围绕着两个(并非不重要的)观点反复斟酌:(1)如果工人们自身不能统治国家,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工人国家?(2)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缓冲区国家”(东欧缓冲地带)怎样才能形成一个工人国家?

从1968年起,“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批判者提出的观点越来越多,而以前提到的不同意见在争论中仍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反复浮出水面。争论集中在曼德尔对托洛茨基理论的阐释上。如我们先前所见的,这位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排除了托洛茨基理论的过时因素,并且他已把苏联社会解释成一个“混合”社会,其中结合了三个因素:“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计划的)、生活消费品领域的资产阶级分配和一个寄生的官僚制。

这些批判攻击曼德尔理论的所有这些不同观点。斯威齐质疑其过时因素。

这一官僚制统治持续得越久,人们就越不信服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其根本性质的理论。统治阶级的概念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工人永远得不到统治,但必须永远忍受一个官僚管理者政权的虐待和勒

---

<sup>①</sup> Mandel 1979-80, p. 117.

索。如果不是第二次革命到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就是革命不可能到来,该理论不得被抛弃和被另一种理论取而代之。……我们必须注意并切实强调,这一结论与托洛斯基本人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曼德尔从来一刻也不相信,苏联的官僚政权决不是一种极其短暂的现象。<sup>①</sup>

该官僚制的寄生特点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认为:

这一隐喻意味着,伴随着一个完整的和健康的不同机体的,是一个勒索贡物的分离机体。然而,显而易见,苏联社会中没有形成任何这种明显的分离。官僚同工人阶级一样,同样是苏联社会有机体的构成部分。它不仅对该经济体的产品征收税赋,它还组织生产本身,并独立规划经济过程。当然,有一些官僚部门独自使用其社会阶层的总体统治所必需的各种非经济功能……而这表现出资源的巨大浪费。……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官僚不仅运用暴力勒索贡物,而且有一个在生产本身中直通工厂层面的基础。<sup>②</sup>

由此,哈曼(Harman)推论,如果人们把这个官僚机构看作寄生虫,就无法理解苏联社会的动力。毕竟,如果官僚机构只靠寄生的(并因此是消费的)动机所驱动,那么赋予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相对于第二部类(生产生活消费品的部门)的优先地位,就仍然是无法解释的。

除了“官僚的消费需要”之外,在强制性的经济发展背后明显有某些东西。显然不是官僚的特权决定了30年代和40年代数以亿吨计的钢铁需求。也不是这些特权引发了农业集体化和1929年以

<sup>①</sup> Sweezy 1978, pp. 7-8.

<sup>②</sup> Biro 1969, pp. 5-6.



后生活消费品生产濒临停滞的状态。<sup>①</sup>

对苏联“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准确本质的分析,构成了第三种批判观点。毕竟,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宣称,苏联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的(即自由联合的生产者民主地制定计划),反倒是一个以有缺陷的计划为特色的后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它是社会主义的前驱。然而这一论证包含了两个困难。首先,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我们拥有一个其经济由计划形式调节的社会,但是它的生产关系没有体现联合的生产或社会主义的形式。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一个难以忍受的矛盾。<sup>②</sup>

其次,据说这个矛盾引发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生产领域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非资本主义的,那么该生产领域本身是一个混合形式。但是,迪克亭否认说:

如果生产是一个混合体,那么他(也即曼德尔)没有指明在生产中呈现出的那些因素。而且,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混合体,那么在生产自身内部的价值和计划两种逻辑之间,肯定存在冲突。如果存在这种冲突,那么该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分配关系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是根本矛盾。如果在生产中不存在这一冲突,那么曼德尔必须说明这种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的。他在这里被抓住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更糟的,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sup>③</sup>

最后,对存在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也产生了怀疑。在苏联可以借由货币毕竟只是消费者获取生活消费品的一种方式。

首先,某些人看作是处于价值规律之下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

---

① Harman 1969—1970, p. 38. 该段中的引文取自 Mandel 1969, p. 14. 克利夫的学生哈曼提到“对抗俄罗斯外部的统治阶级的压力”是一个可以解释苏联社会动力的因素。

② Meikle 1981, p. 110. 这一批评其实反映了托洛茨基自己的一个意见,“今天的苏联经济既不是一种货币经济,也不是一种计划经济。”Trotsky 1933b, p. 224.

③ Ticktin 1979—80b, p. 132.

是直接的。由当地工厂和城镇社会分配的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的。由当地工厂和城镇社会分配的住房(有着几近于零,因此无关紧要的租金),实际上是由于某种例外而处在价值规律的运行之外。至于食物,那些有钱的并能使用钱的人是幸运的。对于最大的城市之外的大多数人口而言,两个东西比钱更重要:时间(排队等待)和获得食物的良好社会关系。……其次,因为国家制定的价格与成本无关,并且在当时许多耐用消费品如此廉价地存在却又不让多数人购买的情况下,他们的钱没有多少价值。……第三,作为社会群体之间的实际分配差异是以直接和自然的形式制定的。……换句话说,分配通过国家安排或通过直接联系,直接与社会群体发生关系。<sup>①</sup>

### 莫汉的修正

英国经济学家西蒙·莫汉(Simon Mohun,生于1949年)的理论出发点是“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不太全面”<sup>②</sup>,他认同曼德尔和追随者所使用的“过渡社会”概念,并基于一种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相似性,提出了对苏联的解释。莫汉承认,这样一个解释一开始就注定是不适当的,但是它可能提出了一个理论方向。即,正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只有在资本主义稳固之后才能够得以理解,因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只有在共产主义建立之时才能得到彻底认识。不到共产主义时代,任何分析都将是不适当的;“因为只要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它就只能根据以资本主义范畴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为基础的推理来描述”。<sup>③</sup>这一难题也发生在关于苏联的讨论中:“苏联也许是一个过渡形态,但是只有关于它是从什么过渡而来的分析。”<sup>④</sup>

① Ticktin 1973, pp. 36-7.

② Mohun 1980, p. 282.

③ Mohun 1980, p. 240.

④ Mohun 1980.

《探索的导轨》(*heuristic parallels*)尽管带有这一思想局限性,但仍然具有吸引力。<sup>①</sup>毕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已在两个阶段中发生了。第一阶段,已有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式统摄,其中运用了“继承下来的生产方法”,并且“仍然保存着劳动过程自身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实质性统一”。<sup>②</sup>在第二阶段,这种统一被打破,而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实际统摄产生了。<sup>③</sup>当形式统摄的侧面增长结束时,实际统摄成为可能,因为:(1)相应的地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是民族国家)已被用尽;(2)如此多的工人被吸收进入生产过程,所以进一步的积累不可能靠增加劳动力和强化劳动来实现。与之相似,莫汉也描绘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产生了。

存在一种在集体的工人和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之间产生的结合;但是这一结合只构成了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形式统摄,因为生产资料只有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展开时才存在,而资本主义的技术有一种内在的权威性——它的设计原则被建立在劳动从属于资本统摄的优先性之上。<sup>④</sup>

第二阶段,仍是假设的步骤,是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实质统摄,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了进行第二步,需要“革命的不断扩展”,包括地理的扩展(“最终使世界经济一体化于各种社会化关系的网络之中,并且

---

① Mohun 1980(p. 242)介绍了他的比喻:“暗示性的而不是同构的,为了达到对一种全新历史过渡的内容的理解,涉及某些矛盾的形式”。

② Mohun 1980, p. 240.

③ 与马克思相比: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资本发现劳动时资本统摄劳动过程,更确切地说,它接管一个现存的劳动过程。……通过不同的和更陈旧的生产方式展开了(也就是,形式的统摄)。……如果劳动被资本统摄以后,这些传统既成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过是个那个统摄的渐进的后果。在那些感兴趣的资本家眼中,劳动可能变得强度更大,其持续时间可能延长,它可能变得更连续和有序,但是,在它们本身,这些变化并不影响实际劳动过程、实际工作方式的性质。”(Marx 1976, p. 1021)实际的统摄意味着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建立,和同时“在各种生产代理人之间和首先在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相应的生产关系”。(Marx 1976, p. 1024)

④ Mohun 1980, p. 241.

第一次实现了融合的和合作的世界经济的利益”)和民主的扩展(“通过民主持续不断的扩展,无产阶级控制社会过程”)。<sup>①</sup>

莫汉的中心论题是,苏联仍然被“滞留”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在1917年革命三年之后,由于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历,布尔什维克已经失去了人口中大多数的支持。如果在当时举行自由的选举,肯定会以列宁及其支持者的失败告终。这就是共产主义者越来越限制政治自由的主要原因。共产党替代了工人阶级,结果伴随着腐败和蜕化。官僚制的发展,一方面将其动力归于德国革命的失败,另一方面归于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这种双重的政治孤立成为了“官僚特权生存和扩展的一个必要条件”。<sup>②</sup>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观念是从这一总形势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而这个新社会仍然局限于对生产资料的形式统摄,和与之相联的“工人阶级与其创造的产品相分离的不断再生产”。<sup>③</sup>

由于中央计划产品数量爆发性的增长(1952至1968年期间增长了八倍),在苏联经济随后的深入发展中,这一形式统摄的种种局限开始不断显现出来,伴随的结果是计划编制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向实际统摄的封闭式的过渡导致了无效率的增长。苏联缺乏内在的动力,“官僚制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毫无客观必然性的作用,因此它对剩余产品的控制依赖于维持政治控制。”<sup>④</sup>工人们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即使他们为了钱出卖他们的劳动。

更确切地说,由于没有产生生产力激励和就业威胁的市场过程,工人们在工业劳动过程中受生产资料束缚的情况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农业中甚至更明显),由此对个人劳动过程的局部控制被扩展到个体工人身上。这种局部控制,在异化和原子化的情况

---

① Mohun 1980, p. 241.

② Mohun 1980, p. 268.

③ Mohun 1980, p. 273.

④ Mohun 1980, pp. 283 - 4.

下,显现在低劣的质量和大范围的无效率上。这一具体现实反映了两方面情况: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形式统摄,和以官僚控制为其媒介的这个统摄的异化形式。<sup>①</sup>

莫汉用这一分析在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和迪克亨的理论之间搭了一座桥(见第六章第四节)。同时,他的方法意味着对曼德尔的批评。曼德尔的分析中,没有把对(以官僚制为媒介的)生产资料的形式统摄放在中心地位,而是反过来强调(非资本主义的)计划和(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计划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而市场与资产阶级分配相联系……那么,为什么这是根本的和中心的矛盾,仍是不清楚的,除非这些分配关系被容许对生产关系产生一些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如果排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现象(资本和商品过剩的危机),那么就要通过制定计划的那些人的贪婪来实现唯一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对消费特权的心理期盼,在计划与市场矛盾的中心显示了官僚的特色。……如果产生官僚制的正是计划和市场的矛盾,那么这种官僚制只能根据它的心理动机来定义。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计划和市场的矛盾正源于官僚制的存在,那么显而易见,定义这一过渡期的就不应是计划和市场的矛盾,而应是围绕着官僚统治的起源和延续的矛盾。<sup>②</sup>

### 第三节 官僚集体主义诸理论

#### 斯托扬诺维奇

在吉拉斯逝世后,1960年代下半段南斯拉夫出现了第二个新阶级社会理论家:维托扎尔·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c,生于1931

---

① Mohun 1980, p. 282.

② Mohun 1980, pp. 285 - 6.

年),作为批判性的《实践》(*Praxis*)杂志的幕后策划人之一而扬名国际的哲学家。<sup>①</sup> 斯托扬诺维奇在写了几篇关于新阶级社会这一题目的早期文章<sup>②</sup>之后,于1969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在理想和现实之间》(*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sup>③</sup>。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的伦理问题,同时也包括关于东欧社会的几章。与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相信官僚统治的建立是必然的观点,斯托扬诺维奇则认为存在着历史选择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并不存在诸如革命必然蜕化的“铁律”。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建立能够被意志统一的革命力量的坚决斗争所阻止。<sup>④</sup> 因此,在原则上,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两种可能性都被展现出来: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sup>⑤</sup>

在中央集权主义(斯托扬诺维奇应用于苏联而不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概念)的情况下,国家机器是剥削工人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与吉拉斯相比,斯托扬诺维奇不去描述官僚制内部的区别)。这很难不被视为原创观点,而斯托扬诺维奇理论的新东西,本来就存在于他提出的关于“中央集权制阶级”的许多思考中。

首先,斯托扬诺维奇指出,“中央集权制阶级”在一个本质方面与传统统治阶级有差别,因为它的经济权力是由政治权力而来,而相反的情况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评论取自于吉拉斯的结论,即这个新统治“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步是首先作为一个政治阶级而产生的。

其次,斯托扬诺维奇试图(比“官僚集体主义”论的早期支持者更清晰)证明将“阶级”概念运用在政治精英身上的正当性。“统治社会等级(ruling caste)”这一术语,托洛茨基曾偶然使用过,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是错误的,因为“统治社会等级”是一个基于其遗传特质再生产其自身的

① 关于斯托扬诺维奇,见 Stojanovic 1973“译序”。关于“实践派”集团,见 Markovic 1975; Markovic 和 Cohen 1975。

② 见例如 Stojanovic 1967; Pe uli 的回应,1967; 和斯托扬诺维奇的回答,Stojanovic 1968。

③ Stojanovic 1973, 1969年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次出版。

④ Stojanovic, pp. 40-1.

⑤ Stojanovic, p. 39.

排他的社会集团,并不适用于苏联官僚制。同时他认为“社会阶层”术语也不适用,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神秘化。能现实地描述这些关系的唯一适用的术语是**阶级**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建立在直截了当的对称的基础上,定义如下:“中央集权制阶级—工人阶级”。<sup>①</sup>看来,斯托扬诺维奇的假设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只能受一个统治阶级的压迫。与这个假设一致,他甚至准备把一个集团定义为一个阶级,由他自己陈述的这个阶级,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经济上确定的。

### 批判的里齐支持者:卡罗和梅洛蒂

在重新发现布鲁诺·里齐<sup>②</sup>和出版吉拉斯、库伦/莫扎列夫斯基的批判著作之后,新的可能性至少是里齐的《世界的官僚化》中关于苏联分析的那些部分也将被再版。这个机会确实出现在1967年,当时新的意大利文版面世了。<sup>③</sup>大约从那时起,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卡罗(Antonio Carlo,生于1941年)和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生于1940年)提出了在本质方面与里齐的思路一致的理论。

与里齐相比,社会学家卡罗否认官僚已构成一个同质的和统一的集团的观点。他也没有发现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历史趋势。在他的1971年的论文《苏联的社会经济本质》中,卡罗同意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的观点,虽然他并没有非常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正如后两人一样,卡罗发现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的工业化进程与一个“统治阶级”的出现之间的联系。这一中心命题是,官僚集体主义社会只可能出现在生产力仅处于相当低下水平的国家。无可否认,该制度也可能运用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但在短期内必然导致严重的危机。原因是官僚制的计划只有在在

<sup>①</sup> Stojanovic, p. 49.

<sup>②</sup> 见第五章,本书第166页注<sup>①</sup>。

<sup>③</sup> Rizzi 1967. 在1960年代初,里齐再次得到了自己听说的几本书。除其他外请参阅 Rizzi 1962。

不发达国家才是现实可能的。一旦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并达到了可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相比拟的水平,官僚制的计划就会变得难以驾驭。卡罗认为这一点已在苏联被清楚地证明了。因此,如果说在官僚制计划的最初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量需要考虑的因素还相对较小,那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者就陷入了困难,因为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提高的生产力已经造成了数据的巨大膨胀和需要认真计算的各种情况。

一个贫穷的、农业占优势的国家的经济结构,肯定不可能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结构相比。即使产品范围一直十分狭窄,生产的简单增长也在运输、维护、储藏和分配部门中引发了一系列需要调节的问题,合并和增加了前期选择的复杂性。<sup>①</sup>

从前的计划目标一经实现,总体的经济结构就获得了一个更复杂的特点。

显而易见,计划者面临着计算和预测经济方向的庞大工作。倘若生产力正在以当前的速度发展,那么即使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也不可能克服他们的难题。<sup>②</sup>

卡罗的观点是,社会的复杂性和官僚的计划计算是不协调的。即使人们设想苏联有数百万台高度发达的计算机的帮助(情况远不是这样),人们得以计划每一个工人进行的每一项操作,但执行这样一个极其详尽的计划在实践上仍不可能。

在这样的范围内,这样一个机制变得非常复杂,它将必须像一个庞大和复杂的数字模型那样运作,所以无法进行日常检查和重新调节。这样一个体系将意味着一部有无限广大的维度和力量的官僚机器,以便追踪每一个工人的每一个行动,接下来意味着加大非

---

① Carlo 1971. 我对这个版本不理解,因此,我引用同一标题的重印版,1975年,第85页;英文版,第55页。

② Carlo 1975, p. 85;英文版,第56页。



生产成本和浪费。因此,假设计算机能解决的主要的功能障碍,将再度重新浮现。<sup>①</sup>

因此,在某一点上,计划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刹车闸。这个体系一旦达到这一点,那么在理论上就只保留了两种可能性:或者转向市场导向的生产,它将“自动地”解决种种计算问题;或者采取别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

因此,官僚制计划的危机是官僚集体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最重要的表现。其他表现是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早先确定的第一部类(资本品部分)和第二部类(消费品部分)之间的比例失调;以及由于苏联体制中的工人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中没有任何直接利益而导致的低劳动生产力和低劣的产品质量。

苏联工人感到工厂不属于他们,计划的目的是不是他们的目的,因此采取了一种完全冷漠的态度。……这种工人的拒绝态度和管理决策相结合。因此,可以生产出过度沉重的拖拉机,因为计划依据重量建立目标,如果超过了这一规定目标,经理们能够得益,而无产阶级看不到有什么好理由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去扩大官僚制的财富。……他们知道,因为需要劳动力,当没有任何后备军去取代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可能被解雇。对于被否定的权力、自由和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他们以尽可能低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进行反抗。<sup>②</sup>

正像斯托扬诺维奇同样说过的那样,卡罗相信,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外追求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具有两种可能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在他看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说明,对于非工业化国家,官僚集体主义明显不是唯一的道路。

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结构出现的主要条件,是官僚机器能够取得与所有

---

<sup>①</sup> Carlo 1975, p. 86; 英文版,第 56 页。

<sup>②</sup> Carlo 1975, p. 95; 英文版,第 63 页。

社会阶级抗衡的独立性。苏联恰恰表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在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陷入困境(国内战争等)之后,国内资产阶级没有充分的实力去恢复其统治,而被剥削阶级还没强大到足以将一种社会主义观付诸实施(卡罗也附带认为,埃及已经发生了这种官僚自发作用的过程)。<sup>①</sup>

以卡罗之见,官僚集体主义在许多国家鲜有机会确立自己。首先,帝国主义越来越不愿意让事情走得那么远;其次,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自觉,有了“来自下面”的抵制力量。因此,卡罗这里所真正声言的(尽管他没有说得这么明白)是,官僚集体主义只是在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低水平阶段才有其机会(在这方面,与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现象在历史上的短期性的判断之相似,是相当惊人的)。

政治科学家翁贝托·梅洛蒂认可卡罗关于官僚集体主义的分析,但是对他关于这一官僚集体主义产生条件的评价却持不同意见。梅洛蒂批评了卡罗,并说明,除非人们讨论统治的生产方式——某种卡罗并未论及的东西,否则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别就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替代假设,梅洛蒂提出:“事实上,如历史所说明的,官僚集体主义并不是植根于不发达国家本身,而是植根于已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国家。”<sup>②</sup>

这并不意味着“亚细亚”国家只能朝官僚集体主义的方向发展。印度的例子就表明:有可能向(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过渡。

进一步提炼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断定,官僚集体主义是那些以亚细亚的和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的典型发展形式,那种生产方式尚未隶属于具有持续和深入的外部影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sup>③</sup>

卡罗拒绝这一批评,并坚持认为俄国在1917年已经是资本主义的,

① Carlo 1975, pp. 107-9; 英文版,第71—72页。

② Melotti 1971, pp. 146-7; 英文版,第149页。

③ Melotti 1971, p. 147; 英文版,第150页。

所以村社并未幸存到19世纪。而在1925至1927年,亚细亚的关系在中国也只剩一点残余,中国在那时已经被纳入帝国主义的竞争之中。<sup>①</sup>

### 范赞/迈奇奥瓦

在1970年代,“大火焰”(Big Flame)在利物浦,其后也在英国其他城市建立。这是一个受具有自发主义倾向的意大利组织“继续战斗”所鼓动的政治小团体。<sup>②</sup>“大火焰”积极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sup>③</sup>,并在1970年代末开始提出它自己的苏联分析。

对这场辩论做出最重要贡献是一本书《无法预见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Unexpected*)。<sup>④</sup>撰写者是数学家莫伊舍·迈奇奥瓦(Moshé Machover,生于1936年)——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左翼作者——和他的合作者约翰·范赞(John Fantham)。在该书中,两位作者叙述了他们的各种理念,呈现出与卡罗和梅洛蒂的著作的紧密联系。他们从以下观察事实出发展开他们的分析:那个他们称为“国家集体主义”的官僚政权,并没有在全世界到处传播,而是仍然局限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殊部分。

当世界**不发达**部分的一个又一个国家归入国家集体主义之时,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国家集体主义实质上仍然是免疫的。……历史事实说明,斯大林的俄国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却是一个仅仅在世界不发达部分传播的形式。<sup>⑤</sup>

从这一观察事实中,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国家集体主义呈现在排

---

① Carlo 1972, pp. 85 - 6.

② 对其背景信息,见:Howell 1981。

③ 特别是见:Thompson and Lewis 1977。

④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⑤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 3. 这一段可能是安东尼奥·卡罗撰写的,但范赞和迈奇奥瓦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的确明确地批评过梅洛蒂,依据范赞和迈奇奥瓦的“纯粹的形式”,他们与那些意大利人的理论相似性在于,他们并没有设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前存在”。(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 6)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与梅洛蒂相反,他们把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那些国家而不是伊朗和埃及看作是**国家集体主义**的。

除了具有“常规的”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地区,当时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它能够通过计划和国际合作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国家集体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生产方式,并已经把生产力在那些国家(资本主义在那里不再有可能这么做)中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sup>①</sup>

正像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一样,范赞和迈奇奥瓦把以使用价值形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积累视为国家集体主义的“发动机”。然而,他们比两位波兰作者更进一步,因为他们也试图解释,为什么在第一部类(资本品部门)的优先性和官僚制的自身利益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依照范赞和迈奇奥瓦,该官僚制为什么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更根本,有三个原因。第一,工业化同等证明了国家集体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官僚在这一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第二,官僚通过试图再生产其自身权力,利用了他的中央权力手段,即最终留在积累基金中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积累基金越大,官僚制就越强大和越成功。第三,资本主义的包围施加的压力,必然使国家集体主义国家机器的军事部门被迫扩张,同时包括工业“硬件”的扩张。<sup>②</sup>而且,正像卡罗那样,范赞和迈奇奥瓦将官僚制的“计划”的局限性与它没有能力驾驭一个复杂工业社会看成一回事。<sup>③</sup>

范赞和迈奇奥瓦的观点提出了他们使用有关国家集体主义官僚制的“阶级”概念的正当性,是令人感兴趣的。下一个是我们已在斯托扬诺维奇的理论中遇到的范畴的对称性,他们提出:精英的社会地位是稳定的,并且再生产了自己。此外,他们相信,人们必须在宽泛的意义上解释“阶级”概念。

阶级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畴。不是正好每一生产方式都有相

<sup>①</sup>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 11.

<sup>②</sup> 关于第三个观点(资本主义的压力),范赞和迈奇奥瓦提出了一个与克利夫相似的观点:“的确,该观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和有用的见解。然而,我们感到,当它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论题的基础观点时,它所有的观点都土崩瓦解了。”

<sup>③</sup> Fantham and Machover 1979, p. 15.

对于它自己的特定阶级。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概念,根本区分在于生产方式。换句话说,不管是阶级本身还是阶级的真正范畴,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因此,当这一术语被用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时官僚不可能是一个阶级,但把它挪到国家集体主义的意义上时,它仍然能够是一个阶级。<sup>①</sup>

## 斯威齐

如上所述,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马洛·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 1910—2004)<sup>②</sup>已对196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批判表示了同情。但是,与像贝特尔海姆这些人相反,斯威齐继续坚持某些保留。<sup>③</sup>当中共领导层在1963年宣布南斯拉夫已经通过一场和平的反革命<sup>④</sup>以资本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斯威齐不同意(在他看来,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确实认可,大体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修正可以在没有暴力的反革命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发生”。<sup>⑤</sup>紧接着1968年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斯威齐试图证明,铁托的南斯拉夫和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及其盟国,正在以不同的步调逐步回到资本主义。<sup>⑥</sup>

在1970年代,斯威齐写道,反革命的萌芽已在1920年代初播种,当时工人阶级通过国内战争和外国侵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布尔

---

① 在“大火焰”内部,就范赞和迈奇奥瓦作品的出版,爆发了辩论大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立场,从支持(Bill Campbell)、部分赞同(国家集体主义不可能出现在发达国家——保罗·汤普森),到来自致歉视角的否定(Gavin MacLean)。见 Big Flame 1980。

② 经济学家斯威齐,熊彼得的学生,在度过最初的“全部哈佛生涯:本科生、研究生和经济系讲师”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演变成左派,随后使自己投身于经济学界;1947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直到1960年代,斯威齐在政治上都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见 Jacoby 1987, pp. 177-8; Foster 2004; Howard and King 2004。

③ 也见第六章第一节。

④ Anon. 1963.

⑤ Sweezy and Huberman 1964, p. 588.

⑥ Sweezy 1968.

什维克党在那时已经失去了其组织的阶级基础,因此,必须以替代的方式进行战斗。

该党建立了一个专政,由此实现了工业化的伟大壮举,并对帝国主义大国的不可避免的进攻做好了准备,但代价是政治和经济官僚的滋生,它们压制了而不是代表了新的苏联工人阶级,而逐渐确立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新统治阶级的掌权地位。<sup>①</sup>

关于这个新统治阶级的准确本质,斯威齐保持了沉默;然而,他在那场讨论中所写的几篇文章中,对他不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各种理论做了解释。<sup>②</sup> 在1976年,他写道:

我想我是相当认真地去解释,我无法接受贝特尔海姆轻易地将苏联鉴定为“资本主义的”,而更愿意在我们目前的认识中,悬置在苏联已发展的剥削阶级社会的准确本质这一问题。<sup>③</sup>

这个关于阶级的不可知理论(局限在有关“一个新类型的……统治阶级”<sup>④</sup>的意义上),后来让位于一个略微详尽地阐述的概念。依据斯威齐后来的解释,苏联是一个缺乏表现了资本主义特征的那类经济运动规律的社会。

由此得出结论:这个统治阶级缺乏一个结构框架,在内部履行其自我加强的管理社会总资本的责任。统治阶级必须产生它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不可能把一种根本上是自发起作用的经济的那些目标简单地内在化并受其指导。<sup>⑤</sup>

驱动该官僚制的唯一动机,是保持和强化其特权阶级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点,官僚制统治必须做两件事:(1) 维持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剥

① Sweezy 1970, p. 19.

② 他与贝特尔海姆的冗长争论出了名,而它的组成部分重印于 Sweezy and Bettelheim 1971.

③ Sweezy 1976b, p. 16.

④ Sweezy 1978.

⑤ Sweezy 1985a, p. 108.

削关系,这意味着对逐步改善生活水平的压制和尝试;(2) 坚称是由于资本主义包围所引起的持久威胁,导致了被迫的积累、机会主义的外交(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和约)等。两个需要是相互矛盾的,因为高积累率对于“和平共处”是必需的,而它破坏了维持资本与劳动关系所必需的政策。然而,同时,很明显,苏联社会缺乏资本主义那种典型的、走向扩张的内在驱动力。<sup>①</sup>

#### 第四节 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当三种传统方法(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工人国家、官僚集体主义)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越来越需要一种新构想。过去的尝试几乎已被忘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在理论上一无所。同时,因为单线图式的有效性处处被质疑,<sup>②</sup>许多人想要自由地思考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小径”和没有预测过的社会形态。此外,一些人可能至少想要使他们自己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狭窄解释中解放出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历史过程的动力“最终”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先驱者:阿瑟·纳维尔、阿尔法特/纽索斯

在1970年代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新方法的第一次尝试,仍然是有些不明确和相对模糊的。创建新概念的早期主动行动,应归于英国青年哲学家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退休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以及西德经济学家埃尔马尔·阿尔法特(Elmar Alvater)和克里斯特尔·纽索斯(Christel Neusüss)。

<sup>①</sup> Sweezy 1985a, pp. 109 - 11.

<sup>②</sup> 如在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 1961年创刊)和法国杂志《思维》(*La Pensée*, 1964年创刊)上刊登的《在其他的事物中》所展示的共产主义者关于生产方式演进替代的辩论。

阿瑟(Arthur,生于1940年)保持了相对最接近托洛茨基观点的言论。他的观点是,在国有化经济中,政治和经济领域不再可能严格分离,而官僚制精英出于这个理由,不仅占有政治权力(如托洛茨基所称),而且占有经济权力。官僚组织了生产和分配,并作为只为它自己服务的独立权力进行这种组织。那么是否能够将官僚真正看作一个阶级,这对于阿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定义一个阶级”。<sup>①</sup>因此,他不愿就这一问题发言,反而寻求对这种官僚的社会历史地位进行描述:

官僚(尤其是一旦在社会中掌权)是在工人组织和后革命时期制度功能分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阶层,一个迅速地发展出其自身利益的阶层,它正在变成扼杀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一股保守势力。然而,恰恰是因为它起源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差别是比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者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差别更不明显和更不确定的。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空间”,有可能被几乎无限多样的过渡形式所充填,在这一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超出单一维度的各个方面:在收入、权力分配甚至在可能有助于确定变化方向的意识形态标准等方面的不平等。<sup>②</sup>

这一描述已经一目了然,阿瑟将苏联看作是后资本主义的,因此是比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的。<sup>③</sup>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1993)<sup>④</sup>则采取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更不肯定的苏联观。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工资》(*Le salaire*

① Arthur 1972, p. 185. 阿瑟的这篇文章是 Biro 1969 的修订版。

② Arthur 1972, p. 190.

③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中他完全把苏联看作是虽有缺点但仍然值得保卫的国家(Arthur 1972, p. 190)。

④ 社会学家纳维尔在1920年代属于著名的法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家。他从1925年至1928年是共产主义者,然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直到1939年。他是1938年第四国际和1960年统一社会党的联合创建者。见 Naville 1987 年自传的片段,以及 Düll 1975, pp. 235 - 352 和 Eliard 1996 之中关于 Naville 思想的总的看法。



*socialiste*, 其中一些观点让人想起罗拉的那些观点)一书中,他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形态。事实上,这一社会的本质是工人阶级剥削了它自己。

实际上,遵循一系列由资本主义遗传下来的并通过官僚制的野蛮支配集中地共同规制的法律,国家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具有合作功能的组合类型。在那里,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剥削“他们自己的劳动”。因此,他们将会再生产那种由价值规律支配的、具有不平等特征的关系,虽然保障这种再生产的不再是私人占有者。<sup>①</sup>

这就是纳维尔所称的“相互剥削”,其中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他们自己的阶级。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功能”<sup>②</sup>这一制度保留了资本家,但不再存在资本家阶级。由于这一论题,纳维尔使自己处在“托洛茨基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半途中”。<sup>③</sup>

受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埃尔马尔·阿尔法特(Elmar Altvater,生于1938年)和克里斯特尔·纽索斯(Christel Neusüss,1937—1987)第二年在《新批判》(*Neue Kritik*)即社会主义学生运动的理论机关报上发表了一个分析。这一分析旨在“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这种由军事干预而高度集中的矛盾”。<sup>④</sup>由于他们做出这一分析时所处的背景,他们特别使用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数据来证实他们的观点。该文所指的更广泛,而捷克斯洛伐克是整个东欧集团的“样板”。

阿尔法特和纽索斯将这些东欧集团国家解释为“过渡社会”,其中官

---

① Naville 1970, p. 152.

② Naville 1970, p. 180.

③ 那至少是恩斯特·曼德尔的描述,载 Mandel 1970b, p. 21.

④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 p. 19.

僚机构在社会上完全是自主的,并且不对任何阶级负责。因此,官僚组织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突发奇想指导经济过程。同时,这一统治精英尚未能获得“一般统治阶级”具有的社会合法性。这使他们的掌权地位不确定;这种官僚制被迫不断以生产力的强制发展来证明其权力的存在和扩张的正当性。

社会主义的官僚比资本主义的官僚更多地被迫去证明他们在全社会的相关效能:他们的成绩报告涉及高经济增长率、快速工业化、人口所有阶层的教育机会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功,等等。在官僚制简化的效率计算中,经济效率和社会主义结构的平衡,也即这些革命目标的结合(群众为此推翻了资本主义),体现了官僚们企图逃避从它的革命起源产生的那些危险。<sup>①</sup>

经济效率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在较长时期中只有通过生产生产资料的经济部类的发展才能实现。

经济增长率依赖于投资资金的资本生产力,和/或投资的返还率。前者越高,返还率越小;但是返还率和/或资本率(对缺少时间维度的返还率的唯一表述)依赖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部生产资金的结构。由此可以推断,不可能考虑与返还补偿项目无关的个人项目的生产。当在高层次的工业化基础上这种生产结构的补偿充实已不存在的时候,那么首先必须产生出补偿的综合结构。然而,这需要那种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的发展。<sup>②</sup>

这样,从统治官僚的社会地位中逻辑地引伸出依赖于重工业扩张的优先性。

然而,到工业化进步的这种程度上,官僚制本身日益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减速器。在过渡社会中存在两个特殊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它们

<sup>①</sup> Altwater and Neusüss 1969, p. 22.

<sup>②</sup> Altwater and Neusüss 1969, pp. 28 - 9, note 17.

在这一背景中有消极后果。其一，中央计划体制中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在更长的时段，官僚指令的计划目标变得更不现实。没有生产者民主(工人自我管理)的中央计划，意味着设立那种尽可能限制企业自主权的总目标数字。经济结构的扩张及其日益复杂的性质，反过来导致了由中央确定的计划和现实世界之间上升的矛盾；因此，经济资源越来越受到方向误导，阻碍了增长进程。<sup>①</sup>其二，生产资源的浪费增加了，越来越不可能阻止其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依靠越来越多的量化指标和细节来限制浪费的尝试，往往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相反后果；因为这一制度变得更复杂和更不实用，控制功能更难以形成。<sup>②</sup>

这两种趋势给该官僚制造成了困难，因为它不再可能坚持它固有的合法性标准，即高效率。如果这种形势变成明显的对立，那么这个官僚制将会尝试改革自身。这就是阿尔法特和纽索斯所说的1960年代期间许多东欧国家实行结构调整的真正背景。然而，因为坚持官僚统治，这些改革在较长时段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这个官僚制试图通过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决策(一种以生产者民主为取向的让步)的可能性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在苏联变成为公共问题的这类冲突就可能出现”。<sup>③</sup>

### 《联合》月刊上的辩论

阿瑟·纳维尔以及阿尔法特和纽索斯各自在英国、法国和西德独立地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每个人在他们自己国家境内各自为战的这种实践，在后来的年代中已不太出现，但没有完全消失。在联邦德国，1973至1977年间《联合》(*Links*)月刊上的争论，对于激发西方对苏联的思考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

这场讨论从约翰·埃盖特(Johann Eggert)的一组文章开始，他写到

---

①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 p. 22.

②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 p. 31.

③ Altvater and Neusüss 1969, p. 51.

了一种其运动规律几乎仍不为人所知的新的社会类型。他建议称这种社会类型为“中央集权制”，并认为不可能再以传统的所有权概念去理解它的根本性质。

如果人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看作是决定性的阶级标准，那么今天的苏联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因为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私有制和/或社会的所有制不提供资本积累，全体人口由事实上的工资劳动者组成。然而，如果人们把统治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那么苏联就是一个由种种利益矛盾所形成的对抗性社会。

依据埃盖特的说法，在法律所有制和领导精英的真正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然而，多数人口和精英之间的矛盾，不是传统的阶级矛盾，因为它并不主要以财产关系为基础，而是另一种社会对抗形式。这解释了为什么埃盖特用比如“准阶级”、“阶级部分”和“领导社会集团”这些概念来描述那些精英。这个统治的“准阶级”的权力是通过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划分而产生的，这是到现在为止所有工人组织和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原因。<sup>①</sup>

埃盖特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应。在这里讨论所有回应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正在改变讨论的性质，而没有发展这一讨论。因此，有一些作者从明显的对立观点出发加入与埃盖特的争论<sup>②</sup>，而另外一些作者（尽管是对立不太明显的）比埃盖特更激烈地强调资本主义的畸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将苏联说成是一个“过渡社会”。<sup>③</sup>

汉斯格奥格·康诺特(Hansgeorg Conert, 1933—2004)做出了一项创新性的贡献。他更明确地讨论了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命题——在每一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达到某一点就与生产关系发生

① Eggert 1973.

② Haumann 1974; Meyer 1974.

③ Schmiederer 1973 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后效应”，而 Altvater 1973 说，称苏联为过渡社会是“根本正确的”。

冲突——出发,康诺特试图以生产关系在苏联正迅速成熟来阐明变化的那些条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紧张状态产生的矛盾中,他点出了对于“节省个人的和社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支出”的无能状态。加之,他提到了由此产生的改善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特性的困难,以及生产过程上升的社会化和决策过程缺少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依照康诺特,现代苏联根本的功能性失调尤其是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即无效率和不民主的管理结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sup>①</sup>

大约两年半以后,由于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引渡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这件事的推动,《联合》月刊上的争论有了结果。曼弗雷德·谢瓦尔(Manfred Scharrer)<sup>②</sup>的一本很有争议的著作发动了新的辩论,其中一些参与者用比在第一阶段差异更小的方式进行争论。因此,施米德雷尔现在显然更具批判性,他在早期的四年曾依然坚持资本主义的影响对于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继续让我们自己受传统——第三国际的传统——的阻碍,它认为人们不应当忘记俄国革命的敌对环境;资本家们承担全部的罪责;改造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需要时间;这个社会正在建设社会主义。<sup>③</sup>

与这一观点完全一致,施米德雷尔不再谈论“过渡社会”,而是谈论一种独立形态。在这个新社会中,社会团结(其凝聚力)的创建,不是通过断言存在于生产者背后的那种经济规律(像资本主义那样),也不是通过直接的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者是社会过程的目的。这同样

---

<sup>①</sup> Conert 1974.

<sup>②</sup> 为了引发讨论,编辑们在《联合》月刊第84期(1977)重新发表了Scharrer 1976,尽管其中对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不公平的批评部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谢瓦(Scharrer)的中心论题是,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是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解释的牺牲品,导致“对计划的合乎逻辑的迷恋”,即使该计划对工人的压制比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更野蛮。

<sup>③</sup> Schmiederer 1977.

产生统治。”<sup>①</sup>

像施米德雷尔一样,康诺特还尝试着手研究作为独立形态的苏联社会。他指出由于过去用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不适合分析苏联社会,因此存在着尚未解决的方法问题。他因此赞成首先研究经验的社会现实,并赞成放弃太轻率地贴上去的标签。<sup>②</sup>

两个文献再次提出了埃盖特最初的短文谈到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分工的主题。一批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官僚统治的最终根源是否存在于泰勒制劳动过程的持续中:“在降低为机器附庸的工人与统治的官僚制中,不可能出现直接的社会化和/或经常提到的‘自由的联合体’。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吃惊。”<sup>③</sup>

政治科学家汉斯·凯泽(Hans Kaiser, 1935—1979)和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艾希维德(Wolfgang Eichwede, 生于1942年)明确地承认这一思想。他们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想,既包含有基于既定的劳动分工的一种等级制组织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包含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列宁主义的权力理论恰恰内在于这一结合中。毕竟,党的先锋队的意图与该生产过程的等级结构是极其协调一致的。这能够使该党全面取得对工人议会的胜利,而工会则全面取得对遍及整个社会的工厂委员会的胜利。历史的成果是一个具有双重特点的官僚精英:一个对劳动过程执行功能的领导,和一个政治领域的相对自主的统治者。<sup>④</sup>

### 杜契克及其批评者

受1950年代末以来复兴的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试图用与较陈旧的社会类型的对比来改善他们对苏联社会的洞察分析。尤其是魏特福格尔,如我们早先看到的,他在《东方专制主义》(1957)一

① Conert 1977.

② SZ Tübingen 1977.

③ Eichwede and Kaiser 1977.

④ 更多的自传信息载 Chaussy 1983,并载 Miermeister 1986.

书中建立的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联系,是灵感的起源。

有一个时期,1960年代的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 1940—1979)<sup>①</sup>在他1974年的论文和随后的文章中提出的理论成了论战的主题。杜契克相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揭秘俄国历史和苏联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杜契克赞同魏特福格尔的观点(他在他的著述中赞扬了魏特福格尔<sup>②</sup>),他注明俄国“亚细亚化”的起点要回溯到13世纪鞑靼人征服时期。他说明,自那时以来,这个已在地理和农业上受到亚洲强烈影响的国家,使自己越来越与欧洲拉开了距离。革命前的俄国被杜契克描绘为“准亚细亚生产方式”<sup>③</sup>(一个未加进一步详细说明的标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显示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点,但是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杜契克承认,由于这一命题,他触及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种冲突”<sup>④</sup>,但是,他十分异端,并不把这当作一个问题。

杜契克划分了旧俄国两个发展阶段的界线:从彼得大帝治下开始的一种半亚细亚封建化和在19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一种半亚细亚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半亚细亚国家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停滞,因为它的半亚细亚基础仍然是决定性的,而以资本主义为模式的工业可谓“散漫分布”在其顶层。<sup>⑤</sup> 农业仍旧是其经济基础,而工业是一种上层建筑。<sup>⑥</sup> 在这些环境中,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观点,必定会是利用农民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业化的反抗作为跳板,实现以农村公社(obshchina)为基础的农业共产主义。<sup>⑦</sup> 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采纳西欧文明为其样板,并推动了原先曾是“散漫分布”的工业化全面加速

① Dutschke 1974; Dutschke 1977; Berghahn and Dutschke, 1977-8; Dutschke 1975.

② 魏特福格尔“属于极少数的那种以一种有局限性的方式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亚细亚概念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Dutschke 1974, p. 27, 注释 15.

③ Dutschke 1974, p. 55.

④ Dutschke 1974, p. 55.

⑤ Dutschke 1974, p. 77.

⑥ Dutschke 1974, p. 116.

⑦ Dutschke 1974, pp. 122-4.

发展。这一选择并不是一种历史必然；客观给定的这种发展可能性的几率曾经很低，而且从不存在选择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任何**绝对**必要性。<sup>①</sup>无可否认，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的确意味着与各种旧有关系的最初决裂，但是在1930年前后，“亚细亚专制主义”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确立了自己。<sup>②</sup>由于所有这些“亚细亚特征”，统治阶级巩固了它的掌权位置。这样建立的“亚细亚帝国主义”<sup>③</sup>有侵略趋势，因为它可以通过扩张，部分地超越它的种种内在虚弱性而生存。<sup>④</sup>

杜契克的著述吸引了许多回应。批判尤其集中在五点。第一点，它注意到，杜契克没有更严格地定义他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仍然是不清晰的，特别是他提出的“半亚细亚生产方式”术语。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密特(Wolf-Dietrich Schmidt)正当合理地指出，杜契克“与其被当作新社会形态的研究者和揭示者，不如被看作它的发现者”。杜契克的回应，也即用半亚细亚所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低形式”——这种“农业‘婴儿期形式’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结合——在这一语境中是既不明确也不令人满意的一个回答。<sup>⑤</sup>

第二点，几位作者提到，杜契克并没有真正分析俄国和苏联，而只局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俄国的某些著作的简单接纳。这引发了下述指责：他用“第二手引文”从事研究，并采取了“非历史的”和“教条的”研究方式。<sup>⑥</sup>

第三点，半亚细亚生产方式(无论被理解成什么)的封建形式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构建是极其可疑的。瓦利(Vali)指出，每一种资本主义的形成，最初都是**特殊地**发生的和非组织性的：

① Dutschke 1975, p. 269.

② Dutschke 1977.

③ Dutschke and Berghahn 1977-8, p. 82.

④ Dutschke 1977.

⑤ Schmidt 1975, p. 992; Dutschke 1976, p. 97.

⑥ Kössler 1979, pp. 116-7. Schmidt 1975 进行了如下批判：杜契克把“对该问题的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变成了“一种正统的解释”。



饥荒、衰败等,正好是原始积累的伴随现象,正像今天发生在巴西、智利和印度尼西亚一样,它曾恰好同样发生在英格兰、比利时和西里西亚。如果杜契克宁愿从资本主义在俄国并非“有组织地”发生的设想出发说明问题,那么他难以理解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确**处处都不是“有组织地”出现的。**<sup>①</sup>

第四点,问题仍然是,1917年之前和之后,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部,到什么程度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成为可能,毕竟,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停滞为其特征的。<sup>②</sup>

最后,布洛伊尔(Breuer)的批评是,杜契克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旧农民公社的复兴)的选择,完全是非历史的和非理性的。布洛伊尔谈及一种未被确证的浪漫主义:它“只能通过不断排除真正的历史来抓住主体绝对的历史权力”。<sup>③</sup>

## 季敏

如同杜契克一样,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敏(Alexandr Zimin)也加入了这场复兴的关于生产方式的辩论。季敏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卫士,他在1920年代曾属于联合反对派(the United Opposition),后来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度过了许多年。<sup>④</sup>他在1970年代发表了许多地下出版物样式的文章,在其中尝试定义苏联社会的性质。<sup>⑤</sup>与杜契克不同,季敏的目的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作为研究手段使用。因此,季敏并不寻求关注苏联社会中的“亚细亚成分”——尽管他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而选择关注一种在他看来存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欧

① Vali 1975, p. 72.

② Vali 1975, pp. 69-73.

③ Breuer 1974, p. 591.

④ Laetitia Cavaignais,“前言”,载 Zimine 1982, pp. 7-24.

⑤ 这些文章许多是在法国发表的:Zimine 1982。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这篇论文,是 Zimin 1977。更新的著作包括 Zimin 1984。

形态之间的类似。

这种类似产生于季敏本人对历史单线论解释的改变。他假定在人类发展中存在一条“主要道路”，即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经典序列。这一主要道路的确有种种变化、偏离和例外，但是作为整体的运动存在着。它的发展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其中一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导向下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原因，季敏坚持他所称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三个阶段特点的一般理论”。<sup>①</sup> 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适合于这一图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停滞特点意味着，这种类型的社会不会成长为任何东西和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它不具备能使它摆脱束缚它的局限性，可以使之前进到一个更高社会阶段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力量。<sup>②</sup>

依照季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特点，是从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一种失败的过渡的产物。

因此，季敏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澄清了许多问题：

(1) 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从一些单线发展的国家中发生一种根本的偏离。

(2) 作为这种偏离的结果，有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根本不与单线序列的任何阶段相同，并不构成该序列各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样一种偏离的生产方式仍然能够持久而稳定地存在。

(3) 这种偏离的生产方式缺乏能使一种发展回归到历史发展主要道路的内在力量。

(4) 这种偏离的生产方式在一段时间可以在这个星球的大片地区确立自己。

(5) 这一偏离的生产方式第一次产生在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发生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样一种过渡可以说还不存在任何经验，因

<sup>①</sup> Zimin 1977, p.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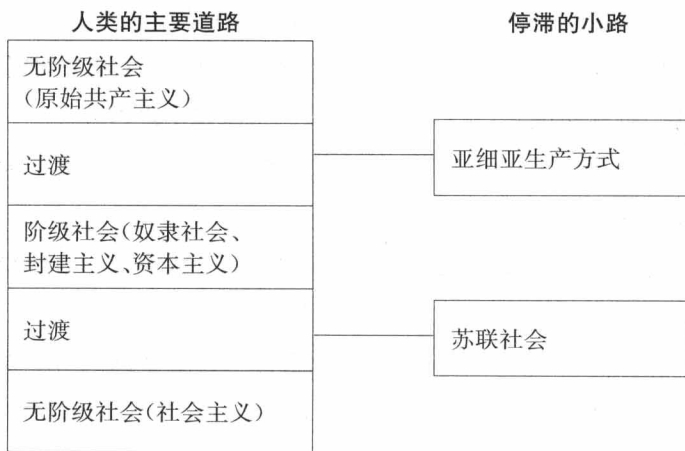
<sup>②</sup> Zimin 1977, p. 127.

此历史只能创造一个没有内在动力的“混杂的和奇特的社会形态”。

这些结论将季敏引向他的主要观点,以此,他把苏联放置在对历史的广泛清理之中。

正如发生在由前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之间的人类历史的伟大变革一样,在由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在那些变革开始了的国家中,变革可以通过对人类历史进步已经准备好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成熟的自然过程的一种违背来实现。这种违背是用对这个形态的一种根本扭曲,从而建立取代它的一种社会制度来表达的;这种社会制度虽然稳定,但处处都不导致它的成长和发展,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是停滞的;这种社会制度相信社会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而且如果这一道路不向历史进步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演进更替开放,该社会制度就必须被摒弃。而在第一次大变革年代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占据的地位,相当于在第二次历史大变革的当今时代斯大林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占据的地位,这种社会主义已经覆盖了地球的六分之一,并伴随着微小的变化扩展到其他几个国家。<sup>①</sup>

季敏的愿景归结于下图:



<sup>①</sup> Zimin 1977, pp. 130 - 1.

苏联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是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它陷入了历史的僵局,一个“停滞中”的社会,那里的经济增长显著地低于在当代资本主义或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并且在那里,所有的领域(社会心理领域、知识领域、道德领域,等等)中也都没有实质性的内在发展。

季敏否认阶级这个词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严格意义上存在(他谈到“功能性阶级”),因为如他所言,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没有清晰的可定义的对抗状态。至于苏联,季敏提到一种精英,他将其描述为“一个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准国家代理人的类阶级社会阶层”。<sup>①</sup>

在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苏联社会之间的类似之后,季敏还关注已运行的这两种没有出路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历史境遇。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起源于有许多分裂的和彼此孤立的农村公社的环境,而苏联社会兴起于曾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整体的社会阶段。因此,苏联生产方式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一环境的强烈影响。

第二,由于全球相互依赖的缘故,世界不同部分的发展相互强化。部分地由于这一点,社会转型之间的间隔变得更短。

时下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像从前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那样是自然而然的,当时一个国家可以维持其社会制度的基础牢不可破长达数百年和数千年,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甚至邻近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相隔绝,而且不受外部的任何影响。这样的自我隔绝现在只能持续极其短暂的时段。<sup>②</sup>

第三,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能从外部而不能从内部被瓦解,但苏联社会的确能够被内部的社会主义趋势所影响,特别是受工人阶级革命

<sup>①</sup> Zimin 1977, p. 132.

<sup>②</sup> Zimin 1977, p. 139.

意识的影响。<sup>①</sup>

季敏因此觉察到这一主体因素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迅速成长的意义。他并不相信其他一些作者的那种历史必然论：

在斯大林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停滞不前的那个稳定的社会，虽然处处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出现和蔓延，干扰和扭曲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正常顺序，尽管这个顺序被证明是可能的；在历史上，它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它产生的那个地区。<sup>②</sup>

然而，季敏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评论。

其他例子：索恩-雷特尔、汤马斯和“社会综合体”

在关于苏联的较新辩论中，“社会综合体”的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概念是德裔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 1899—1990)提出的。在他的研究《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一个认识论批判》(*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1970 年首次出版, 1972 年修订并于 1976 年出英文版)中, 这个概念被定义如下：

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通过他们的行动开始产生的网络。他们如何行动对于该社会网络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他们想什么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为了适应一个社会，他们的行为必须相互关联，而且如果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必须包含至少最低限度的一致。这种一致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但是它必须存在，否则社会将终止其可行性，而且作为他们彼此之间多重依赖的结果，各个个体都会受到伤害。以极其一般的术语所表达的

---

<sup>①</sup> Zimin 1977, p. 140.

<sup>②</sup> Zimin 1977, p. 141.

这种一致,是每一社会类型生存的先决条件,它构成我所称的“社会综合体”。<sup>①</sup>

索恩-雷特尔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类社会综合体。一类是生产社会,它至少是潜在的无阶级社会,通过劳动过程在生产领域组成了一种综合体;另一类是占有社会,它通过生来就不同的以及现世中与劳动过程相脱离的各种活动,形成了一种综合体。在这种社会中,不劳动的代理人占有了劳动产品。这可以通过单方的占有(抢夺、盗窃、贡品,在主动的基础上)或双方的占有(商品交换)发生。<sup>②</sup>索恩-雷特尔尤其让自己致力于对后一变体的研究。在他看来,建立在相互占有基础上的社会群体的特点,是货币的存在,它是抽象交换的化身(即交换与所交换的东西对等),它构成这一社会综合体。<sup>③</sup>

西德政治学家雷娜·汤马斯(Renate Damus,生于1940年)在几本分析东欧社会形态的出版物中使用了索恩-雷特尔的社会综合体概念。虽然她尤其关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她经常表示,她的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其他东欧社会和苏联。她的出发点是,这些形态不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sup>④</sup>毕竟,这种社会综合体不再通过交换发生。因此,存在两种可能性:统治的世袭,和因而同时发生的现实的社会化;或一种新形式的统治,以直接压迫为特征。

在东欧形态中,后一选项曾实现过。它由中央计划组成,经济活动曾由此被发动、掌控、阻滞,等等,这说明东欧形态是没有出现过任何资本主义交换的综合体,然而另外也证明它没有真正存在过工人阶级的统治。核心问题是:

① Sohn-Rethel 1972, pp. 19 - 20.

② Sohn-Rethel 1972, pp. 123 - 4.

③ 与他的社会理论相关的相应作品见 Sohn-Rethel 1971。对索恩-雷特尔思想的总结性概括,由 Kratz 1980 的著作提供。有影响的还有 Dickler 1978 的著作。Brokmeier 1974 的著作,用辩护的方式将索恩-雷特尔的理论应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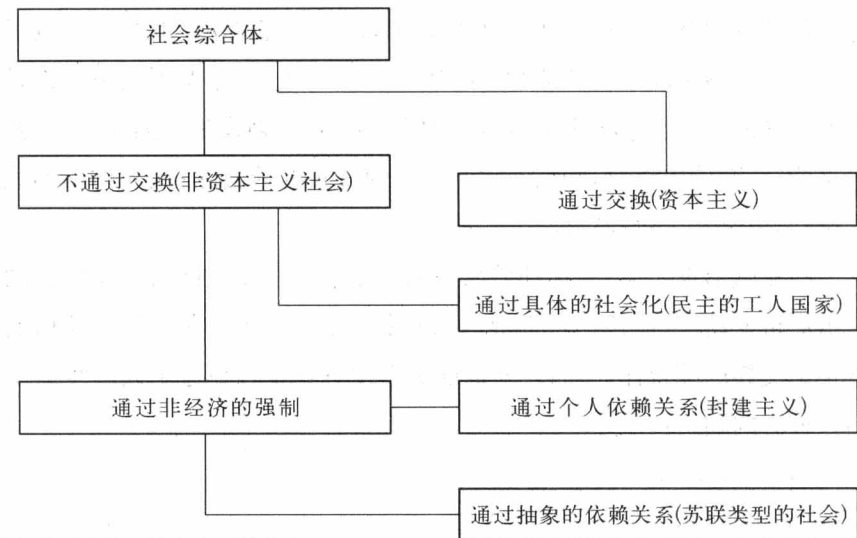
④ 见汤马斯和“国家资本主义者”布德贝格(Buddeberg)之间的辩论: Buddeberg 1976 和 Damus 1976。

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中央集权化、中央计划,还是商品生产被部分废除,新的统治结构都已经形成了,这一类统治结构意味着,政府只是**作为生产者实行统治**,而不是**通过生产者**在这些已有的可能性框架中实行统治……<sup>①</sup>

直接统治只能通过个人依赖性或通过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式”来执行。在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中,统治的“联合形式”是指如下这种情况:

直接统治,不采取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式,就只能构想成用个人相互依赖性来表示。因此,资产阶级的联合形式在这种场合必然与直接统治相联系,因为它凸出了被定位在他的私人领域的、生活水平与私人消费相等的被动的公民。<sup>②</sup>

因此,即使不够清晰,汤马斯也区别了社会结合的四种形式,我以图表将其概括如下。<sup>③</sup>



① Damus 1973, p. 29.

② Damus 1974b, p. 99.

③ 在后一本书中,汤马斯更明确地定义了直接的、具体的和直接社会化的概念:“直接(社会化)将意味着它将会被超过资本主义的其他机制的个人所驱动。直接(社会化)将意味着它将由有意识的行动和社会成员的关系来实现”。Damus 1978a, p. 132.

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工人在东欧表现为两类人(*homo duplex*),托马斯像马克思那样指认了这两类人,即**中产阶级**(*bourgeois*)和**市民**。在现存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依靠交换的社会综合体已被消灭,但是在它的位置上,社会化尚未出现。个人因此是这种权力直接行使的对象。这确实会导致冲突,还会阻碍技术进步,因为民主矫正机制的缺席容易导致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膨胀的后果。<sup>①</sup> 因此,事实上,托马斯将东欧社会描绘为**混合形态**,其中计划经济、超经济强制和抽象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种社会综合体曾被自觉地实现过,但不是民主的。<sup>②</sup>

### 巴罗及其批评者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 1935—1997)<sup>③</sup>的代表作是《东欧的选择》(*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1977年第一次出版,其中历史单线论概念衰落的影响引人注目。这位东德异见者的著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他尝试把他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与更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观相联系。巴罗明确抵制任何单线发展顺序,并声称,在前殖民时代,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地区(如墨西哥、秘鲁、中美洲、印度、中国、非洲和中东)表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特征。<sup>④</sup> 在这里再次看到了魏特福格尔的影响,尽管巴罗在《东欧的选择》中并没有引用他的观点。<sup>⑤</sup>

根据巴罗的观点,世界历史将可以用**三线索**的图式以广泛的轮廓进

① Damus 1974a, pp. 181, 190.

② Damus 1978b.

③ 巴罗,最初是作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官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他先是在 Oderbruch 作为“党的宣传者”做研究,然后成为大学报纸 *Greifswald* 的编辑,后来在科学工会任指导者和 FDJ-journal 论坛的总编助理),自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写作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书。1977年8月,他因“间谍”罪被捕,并于第二年被判八年关押。1979年10月在西方的一次运动之后,他被释放,其后移居西德。Herzberg and Seifert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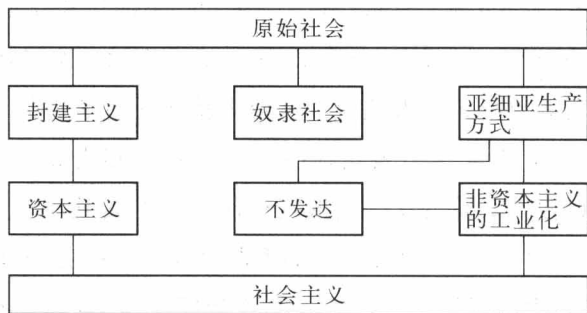
④ Bahro 1977, pp. 72-3.

⑤ “1979年在杜塞尔多夫与魏特福格尔和杜契克的一次讨论中,巴罗承认了他在他的书中没有公开声明的魏特福格尔的影响”。Senghaas 1980b, p. 134.



行概括,其中,在多样化环境条件的影响下,一种原始文明将自身区分为三种社会类型。这三种次生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主义)并存存在,全都直接脱胎于史前社会。封建主义内源地地为资本主义对它的替代创造了条件。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对停滞,并在佛教学说永恒转动的轮回中找到了它的象征。奴隶社会的核心地区被封建主义废除之后,封建主义已发展出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的社会在世界范围相互对抗:资本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面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亚细亚的”国家只有两种可能性:屈服于不发达状态和加入“第三世界”,或者采取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发展道路,从而以一种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sup>①</sup>

这一理论可在图表上表现如下:



为了更深入的研究,巴罗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他的出发点是,私有财产的废除,如苏联发生的,显然不是万应灵药,因为存在着比资本主义更古老和更持久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城市对农村的统治,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始终视为经济关系的这三种现象,已经提供了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国家**这些基本成分,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之前的整个时代就形成了它的历史面貌。废除私有财产与克服劳动分

<sup>①</sup> Bahro 1977, pp. 59 - 78.

工和国家这两个方面,现在才可能被最终极端赞同资本主义的整个时代所分割。<sup>①</sup>

当一个国家废除了私有财产时,旧矛盾再度变成最有影响的。既然如此,那么,尤其是“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早期因素再次作为阶级形成的自主因素出现,并且只要这种劳动分工根本还在再生产,就仍然如此”。<sup>②</sup>

巴罗试图运用苏联的例子证实这一解释。他划分了三个阶段的界线:作为一个外围工业化国家的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作为工业化的一个阶段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义时代,和后斯大林主义阶段。

巴罗把革命前的沙皇俄国的生产关系主要解释为农业专制,即带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地关系。他提出,在这种架构内,封建社会的关系仍然存在,这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决没有被清除干净,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特别是在城市中。巴罗视野中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像杜契克认为的那样,是在主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相对边缘的现象。巴罗用一个地质学比喻详细说明了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在20世纪初,三种形态在俄国社会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

(1) 在其底部,亚细亚生产方式:沙俄帝国官僚制和东正教的国家教会与小农阶级。(2) 自从废除农奴身份以来,在它上面,唯有一个半废除的封建形态,然而它从来没有使自己从早期的第一种形态中(即前地主和前农奴处在控制土地的斗争中)完全摆脱出来。(3)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对于少数城镇的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工业资产阶级和工资劳动者。<sup>③</sup>

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根本消灭了资本家和半官僚、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遗留下来的主要是沙皇制度的农民基础。因此,十月革命主要

① Bahro 1977, pp. 54-5; 英文版,第47页。

② Bahro 1977, p. 91; 英文版,第77页。巴罗阐述的主题忽视了男性和女性的矛盾,这一点由 Plogstedt 1979 指出。

③ Bahro 1977, p. 104; 英文版,第88页。

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

首先是在仍为一个前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第一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即使它曾经开启了一个带有半封建半“亚细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sup>①</sup>

因此,革命的作用,甚至主要不可能是建设社会主义。反之,它的真正作用是俄罗斯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快速工业化,这实际上是亚细亚的。各种关系的中央集权化、党和国家的融合、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所有这形形色色的一切,只意味着将一种农业专制改造为一种工业专制:构建工业基础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整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国家权力,不可能导致超过现存结构的任何其他社会结构,而人们越是试图彻底思考苏维埃历史的各个站点……适当描绘一条只要没有最可怕的暴行的界限,并说明指向另一侧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就变得越是艰难。<sup>②</sup>

巴罗提出四个因素,他称这些因素使这些发展在苏联不可避免。除了俄罗斯(半)亚细亚的过去之外<sup>③</sup>,他还确认了其他三个:(1)帝国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技术霸权对这个国家施加的外部压力。由于它制造的“包围神经病”,这一持续的外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斯大林主义的暴行。(2)原始积累的必要性,这显然不得不涉及许多暴力。(3)生产力自身的敌对特点。生产过程的机械系统不可能已现成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必须从资本主义复制泰勒主义的技术。

当工业化过程完成之际(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东欧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矛盾变得显而易见。最晚自“布拉格之春”以来,所有

<sup>①</sup> Bahro 1977, p. 58; 英文版,第 50 页。

<sup>②</sup> Bahro 1977, p. 106; 英文版,第 90 页。

<sup>③</sup> 巴罗关于革命前的俄国的描述是相当不精确的;他时而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而又是“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罗用于东欧形态的术语)如何停滞不前已经显而易见。

对生产机器、对剩余产品最大和最好的部分、对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对分配和消费配置的全面垄断,已经导致了一个官僚机制,它有一种消灭一切主体能动性和将之私人化的倾向。这个新社会的陈腐的政治组织,深深地侵犯了经济过程本身,钝化了它的社会动力。<sup>①</sup>

巴罗勾勒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历史轮廓,然后试图通过他在东德经历的指引,描绘出这种社会形式更详细的画面。他极其重视作为其分析出发点的“社会综合体”,因此区分了社会劳动内部的两种活动:把社会综合体同等当作目的的劳动(“一般劳动”),和不把社会综合体当作目的的劳动(“特殊活动”)。<sup>②</sup>

巴罗说,这一区分可以应用于体现劳动分工特点的一切社会,其中一个群体支配另一群体。实际上,每一个阶级形成过程都以一般劳动和特殊劳动这对矛盾为中心。在很古老的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已等同于社会领导阶层的活动。但是,即使在古代生产方式中,大量的智力劳动已不再由统治精英来履行,而是由奴隶们来履行。统治者为他们自己所保留的是社会综合功能。渐渐地,在更复杂的社会中,智力劳动的范围已经渗透进所有类型的社会部门,以致最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劳动”完成的那种社会综合,只构成了全部智力劳动的一小部分。

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总体社会劳动内部,巴罗区分了五种不同的功能层次:

1. 简单的示意图所划分的和辅助的工作。

<sup>①</sup> Bahro 1977, p. 12; 英文版,第 11 页。

<sup>②</sup> 见巴罗的书(1977, p. 174)。巴罗对于社会综合体概念的兴趣指向汤马斯的影响。而巴罗的确称汤马斯维护“一种与我的观点接近的理论概念”(同上,第 453 页)。相反,汤马斯把她的书《现实社会主义》(*Der reale Sozialismus*)献给巴罗,并在前言中说明,“读巴罗的书为我确认了我的分析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2. 复杂的有专业经验的工作。
3. 科学中复制的专业工作。
4. 科学中创造性的专业工作。
5. 自然和社会总体性的分析和综合。<sup>①</sup>

这些功能层次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阶层形成的基础。当在资本主义和更早期的阶级社会中财产关系决定社会阶层形成时,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形式和局限性消失之后——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样地来自劳动分工。因此,社会阶层的形成起源于劳动过程本身的结构,也起源于社会中管理劳动的结构,就像它被制度化在国家内一样。造成社会阶层形成的同样不是劳动功能本身的差异,而是个人对这一层次化的服从。

通过技术经济和教育政策被制度化的和不断再生的多样领域的划分(主要趋势是走向限制和约束各种特殊功能层面的个人),是在根据劳动分工所组织起来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集体劳动者的那种金字塔组织。<sup>②</sup>

虽然这样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从多样的社会阶层中建立了起来,但这种社会层化也包括了对抗性。两种矛盾分割了社会。第一,官僚和经济机构顶层与直接从事生产的那些人(巴罗以此包括了大多数技术经济和技术科学专家)之间存在的矛盾。第二,生产工人和专家们之间存在的矛盾。

技术、工艺和对物质、机械与劳动时间进行经济控制的需要一起,对抗处在国家资本的地位或功能中的工人,结果,所有的技术经济职员包括专家和甚至最末端的管理雇员,都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和值得怀疑的。<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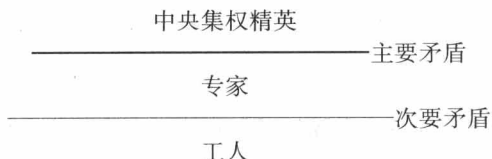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Bahro 1977, p. 197; 英文版,第 194 页,表 1。

<sup>②</sup> Bahro 1977, pp. 192 - 5; 英文版,第 165 页。

<sup>③</sup> Bahro 1977, pp. 196 - 7。

根据巴罗,人们可以简略地说,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这个生产机构中的中央集权制精英和工人之间,但是,在这个被压迫人口部分的更大群体内部,还存在着专家(功能层面2、3和4)和普通工人(功能层面1)——(见图表)之间的次要矛盾。



巴罗认为,东欧社会形势的种种根本变化,只能从中层即专家群体中发生。隐藏在这一想法后面的是如下理念:在所有历史背景中最低的社会阶层都基本上受限于他们的行动范围,因为依靠必然性的这些阶层不可能或不具有综合的社会观。“较低阶层和阶级的直接需要总是保守的,并且从来不积极地期待一种新的生活形式。”<sup>①</sup>

根据巴罗的看法,工人只可能获得工会意识(在这一点上他转向列宁主义)<sup>②</sup>,并且其利益集团并不期待任何新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可能靠它自身的动力解放自己的原因:“如果在一场更全面的社会危机中,一小部分上层阶层或阶级(或一个新‘中间阶级’)更有效地组织被压迫群众进行一场改革或革命,才会产生新观点。”<sup>③</sup>

因此,不是工人,而是专家,构成了历史变化的新主体。专家,尤其是工程师,注定将在下一个阶段掌握社会领导权。诚然,工程师的这种劳动在本质上也还不是“综合性的”。

但是,工程师对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的征服已经赋予了他一种进行抽象的能力,即使这一能力本来只适用于非人类的“纯粹客观存在”,而不是以社会方式思考的自然和技术对象。尽管受机械主义、

<sup>①</sup> Bahro 1977, p. 174; 英译本,第 148 页。

<sup>②</sup> Bahro 1977, p. 229.

<sup>③</sup> Bahro 1977, p. 175; 英译本,第 148—149 页。

实证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限制,这种抽象能力后来还是被运用为主体反思的工具,并因此也成为历史反思的工具。<sup>①</sup>

具有最高自觉的人(主要是专家)应当被重组在一个新政党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会尝试在所有群体和社会阶层之中,以普遍的解放观建立整体行动趋势的显著优势。<sup>②</sup>在工人们认识到对他们自我实现的制约本质上是社会制约这一条件下,他们肯定也会被允许加入这一同盟。工人一经获得这种见识,他们就会像知识分子那样行动。<sup>③</sup>一旦掌握政权,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通过发展中的阶级与特权阶级中非寄生因素的生产性受雇群体的加速融合”,让这种阶级斗争变得“令人容易接受”。<sup>④</sup>

通过“从上层到底层”的伟大的社会重建,可以实现一种情形,即全部人口都能变成综合的、全面的劳动者。<sup>⑤</sup>

批判. 巴罗视野的宽度和他在被东德当局关押后所获得的名望,确保了他的解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激起了一场广泛延伸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关于东欧社会本质的辩论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在左派中)只对巴罗的书稿进行的公开论战。甚至他最强烈的批评者也承认,他的《东欧的选择》一书即使仅仅因为它所具有的政治影响,也是一块最重要的地标。因此,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情巴罗的许多观点的希勒尔·迪克亨,也举例称“关于东欧的这场讨论一度将可能不得被划分成前巴罗时期和后巴罗时期”<sup>⑥</sup>。

1977年以来已出版的巴罗的文献是如此广泛,因此,很难做任何简短的概括。在回应与批评的纠结中,无论如何,看起来辩论的确好像集中在许多特定的论题上。首先,巴罗采用的方法是一个讨论点。于尔

① Bahro 1977, p. 206; 英译本,第 175 页。

② Bahro 1977, p. 430; 英译本,第 361 页。

③ Bahro 1977, p. 433.

④ Bahro 1977, p. 307; 英译本,第 260 页。

⑤ Bahro 1977, p. 371.

⑥ Ticktin 1978 - 9, p. 133.

根·米亚迈斯特(Jürgen Miermeister)正确地观察到,巴罗在方法论层面上反复变化,并且没有任何中介地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一个层面,显然混淆了这些层面。最初,他从俄罗斯、苏联和它们的半亚细亚基础、沙俄官僚制的历史及其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延续性出发。然后,他突然转到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代现实的讨论,这样做显然是假设从俄国历史推演出来的结构分析观点,可以在“一国的这一半”中直接被认同。然后,巴罗依照这一陈述,把他推演出的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贫困的普遍化中”的结论,运用来推断出他关于“原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替代物。<sup>①</sup> 作为必然结果,巴罗也受到了根本的批评,即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苏联社会的超历史类比是从以下这一事实中产生的:他从人类历史的一般哲学观出发,没有特定历史分析的“中介环节”,就得出了直接的政治结论。<sup>②</sup>

尤其是那些未接触到巴罗思想中更深刻的经济学反思的批评者,提出了对“遗漏环节”进行经验分析的批评意见。迪克亭在这一点上提到了“除了那些赞成市场的人之外所有东欧左翼的致命弱点”。<sup>③</sup> 正是因为巴罗想要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多多少少重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sup>④</sup>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没有冒险越过一些零零散散的虽然有一定启发性的论述。<sup>⑤</sup>

第二,巴罗关于世界历史过程的总体解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正如薛斯勒(Kössler)曾责备杜契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粗疏使用,施波恩(Spohn)指责巴罗基于一种相当轻率和不充分的思考,将亚细亚生产

① Miermeister 1977.

② Anon. 1977.

③ Tickin 1978-9, p. 133.

④ Bahro 1977, p. 14; 英文版, p. 12:“马克思后来将他 1859 年关于《资本论》的初稿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即使我将我自己的书名模仿这一伟大的原型,并称我的文本为‘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我也充分懂得,我对这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仍然与马克思在写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不到 20 年的详尽阐述和完美一致的那种程度相距有多远”。

⑤ Erbe 1978, p. 60.



方式提高到历史过程的普遍力量的地位。施波恩还认为,巴罗的非资本主义工业化概念意味着,当私有财产退避时,新工业仍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连接为一体。巴罗的这一概念应当受到质疑。

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专制国家形式能够从它们历史性的落后中也即发达的世界市场背景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它表现出独特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历史上非常多样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一种特定结合。走向非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范畴在历史上也是不明确的,此外,它假设一种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立性和一种原则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实际上这在历史中是不可能成立的。<sup>①</sup>

第三点批评是,巴罗把斯大林主义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中,这一观点引发了强烈异议。巴罗关于斯大林主义专政在十月革命中已经以萌芽形式出现的观点受到曼德尔的指责,他指出,这一理论正像“从1919年1月以来或最迟从1929年华尔街崩溃以来希特勒和奥斯维辛都是不可避免的”那种观点一样,是不科学的。<sup>②</sup>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的观点沿袭了类似思路。<sup>③</sup>丹尼尔·本萨迪(Daniel Bensaïd)更进一步采纳了这一观点。他说,如果巴罗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1917年10月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新类型的革命(在经典意义上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打开了通往一个新的过渡期的道路。”在这样一种观点中,他直接发现了“官僚集体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旧遗产。<sup>④</sup>工人可以成为一场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努力的社会历史结果却不是必然地肯定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种可能性对本萨迪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相对而言,早先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成员的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sup>①</sup> Spohn 1978, p. 13. 同时见这一线索中的 Givsan 1978。

<sup>②</sup> Mandel 1977.

<sup>③</sup> Frank 1978.

<sup>④</sup> Bensaïd 1980, pp. 58 - 9.

Fleischer)明确地为巴罗的观点辩护。巴罗的历史必然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仍然未讨论革命后俄国的客观关系严酷性的根源,以及在那些条件下“主观因素”能够具有什么效力。<sup>①</sup>

第四,在社会主义者圈子中通常的一种批评是,巴罗忽视了东欧工人阶级战略上的能力,因为他期望的文化革命的驱动力是知识阶层。很多作者都赞同,以这种方式设计一个“自来上层的战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污蔑巴罗是一个技术专家统治论者,而技术专家的制度如果实现,将会导致更多的异化和非人性化。

资本主义管理的执行者,在每个角落和缝隙中破坏我们生活的秩序。那些人是巴罗想要提升为担任领导角色的革命精英的那些特殊的人。这些人是城市计划的专家,他们在交通、步行区、购物中心已经把我们的日常城市生活整理成为脱离生活现实的机器。正是与巴罗同类的劳动组织者本身,他们现在还提议在信息工厂中消灭雇员资格的最后残余。在巴罗诉求于各种专家的资格时,他恰恰提出了对管理资格的诉求。<sup>②</sup>

另一些人否认,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驱动力,就能够超越一个工业的等级制社会,并因此把巴罗视为一个无能的反对派,认为他不能看穿当前历史时期的动力学。<sup>③</sup>但是,仍然可以把巴罗描述为要么是“技术专家统治论者”,要么是“改良的共产主义者和策略家”(曼德尔)式的“革命者”,他在总体上强调了工人阶级的极大重要性。

最后,人们对巴罗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析存在着种种保留,而对他关于当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功能分析更普遍地存在着种种否定。贝基霍尔斯(Bögeholz)特别批判了巴罗的如下观点,即能够从生产力结构中推演出职位任命的金字塔(以及最高层次的一般劳动),而且最高职位的任命已被迫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总体化。贝基霍尔斯认为,

<sup>①</sup> Fleischer 1978.

<sup>②③</sup> Ticktin 1978-9, pp. 138-9.

这一理论意味着,在现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明显有一群人,他们已经以自觉的方式驾驭了社会。这种解释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一方面有人认为,它因此排除了不受任何人为控制的社会关系的“天然”现象,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可以从这一推理中逻辑地总结出:现存精英的“恶意行为”成为了所有不公正的唯一根源。<sup>①</sup>

### 施米德雷尔

西德政治科学家厄休拉·施米德雷尔(Ursula Schmiederer, 1940—1989)批判了汤马斯在争论中提出的综合理论,认为它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它所产生的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是相当薄弱的。<sup>②</sup> 尽管如此,汤马斯的方法的确影响了它的批评者。与汤马斯相比,虽然批评者较少抽象地和绝对地提出这一难题,但是,这个综合性问题(什么保证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团结?)明显再现于施米德雷尔等人的著作中。<sup>③</sup> 施米德雷尔等人的基本设想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在一个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一般化的商品生产和工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总体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才是可能的。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场导致一个由(社会主义)生产者的自觉意志所支配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变革,才是可以想象的。

在俄国(或中国)存在的革命前的社会形势,无论如何不是这种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因此,“在包括主体和客体的所有人团结的总体性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性概念的意义上”,社会(*Gesellschaft*)并不存在。<sup>④</sup> 由于世界市场的压力,俄罗斯更多地是一个结构畸形的社会,它在国际上拥有相当可观的实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相当脆弱的经

① Bögeholz 1978. 贝基霍尔斯特对 Erbe 1978 的回应。

② Schmiederer 1980b, p. 408.

③ 第一本有关作品就是 Rotermundt et al. 1977, 随后而来的是 Rotermundt et al. 1979 和 Schmiederer 1980a.

④ Rotermundt et al. 1977, p. 14.

济。一方面,始于19世纪初的工业化创造了一个与过度膨胀的国家有强大联系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它不具备执行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即建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能量和自主意愿。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这一既定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sup>①</sup>

这样,十月革命成了一个有点两面性的事件,因为,一旦忽视了资本关系,就没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因此,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团结因素(一种综合性状况)的历史必然性,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基于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团结因素不可能是经济的(如资本主义中的市场),但必须是政治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成为了这一因素:“既然社会化的必然性不是天然地也不是有意识地存在于生产者当中,那么,该党承担团结和领导社会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地产生了。”<sup>②</sup>

生产能够沿着直接的和权威式的路线实现社会化,而其他的私人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继续存在。因此,苏联劳动者在双重意义上不具有资本主义所传承的自由特征。一方面,因为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掌控(然而与此同时,也不存在对那些生产资料的任何集体占有),故而没有掌控生产资料的自由。另一方面,因为每一个人都直接地和共同地依赖国家,工人不再得到摆脱个人依赖性的自由。

特别是,施米德雷尔等人仍然最终认识到了巴罗和汤马斯所指出的苏联精英的同样特性,他们提到了一个“统治阶层”。他们也相信,这一精英层以自觉的方式领导社会发展,不受个人兴趣的指引,“而是为了走上一条崎岖不平 and 始终摇摆不定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③</sup> 因此,最终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是精英的自觉意识。赫林(Herein)解释了,为什么施米德雷尔等人用苏联精英与中国精英相比较,并认为中国精英的确比苏联精英“更好”。尽管如它所强调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结构条件是

① Rotermundt et al. 1977, pp. 16-9.

② Rotermundt et al. 1977, p. 22.

③ Rotermundt et al. 1979, p. 43.

可比较的,并且两个国家都必须对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统治优势和“社会个体”的不发达状态,但是人们可以由此获知,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解释如何能够与不同的发展观相结合。<sup>①</sup>

施米德雷尔等人的文稿并未得到值得注意的回应。

### 迪克亨及其批评者

汤马斯、巴罗和施米德雷尔等人的研究都已说明,经济过程的自觉调节在苏联是“从上面”发生的。正如一位支持他们的作者对此所进行的简洁阐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走向消灭经济的决定性统治的第一步。……社会化行动启动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首要地位向政治学的首要地位的转变”。<sup>②</sup>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希勒尔·迪克亨(Hillel Ticktin,生于1937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sup>③</sup>从1973年起,他尝试根本不假定有任何计划这样一种先验性来分析苏联经济。从当代苏联经济的特征是人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巨大浪费这一发现出发(他用开篇文章<sup>④</sup>大篇幅说明的一个现象),他问自己,这种浪费,这种看起来不可阻挡和因此深深扎根的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当即反对许多东欧和西欧专家的观点,即这一现象是缺乏各种市场导向力量的直接后果。相反,迪克亨在市场力量的强化和重新引进中觉察到一种反民主的趋势,它可能会恶化工人阶级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sup>⑤</sup>

---

① Rotermundt et al. 1979, p. 29.

② Altvater 1981, p. 2.

③ 迪克亨,生于南非,在开普敦、基辅和莫斯科受教育。从1965年起,他在格拉斯哥的苏联研究所教书,并从1973年起成为《批判·苏联研究和社会主义理论月刊》的主编。迪克亨致该作者的信,1982年11月11日。

④ Ticktin 1973.

⑤ 尤其见迪克亨和“市场社会主义者”W. 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的辩论,载 Ticktin and Brus 1981。

因此,他对无效率的解释建立在与正面的市场推理完全相反的基础之上:无效率的存在,恰恰是因为苏联不民主的计划,它导致了浪费,并在事实上导致了所有此类计划的不可能性。关于苏联,迪克亨提及一种不是按计划而是“行政管理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精英拖了发展的后腿,并且对社会生产最多只有很微弱的控制。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编制”“实际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议价过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个警察管辖的过程”。<sup>①</sup>

按照迪克亨的分析,这个制度的种种根基奠立在1920年代,由于该国的经济落后状况和该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这种孤立状况,当时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明显出现了矛盾。因为计划编制和市场趋势加剧的紧张状态,克服这一矛盾成为当务之急。强制的集体化和强制的工业化成为其解决方案。当时,官僚体制将自己提升为一种超越这些矛盾的“波拿巴主义”权力,同时将各种矛盾封闭在体制内。

它把自己构造为新的权力精英,把各种行政管理手段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有效地摧毁了所有反对势力,如此彻底和如此深入的直接肉体消灭和间接原子化过程,致使该政权独享了它凌驾于全民之上的权力。<sup>②</sup>

新精英行使驾驭经济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无可否认是浪费的,因为所有计划都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而在许多执行层面上出现了瓶颈。

该生产组织形式的各种绝对优点压倒了发生在其早期的庞大浪费。而且,榨干了工人阶级的那种持续高水平的剩余,掩盖了这种增长的浪费性质。<sup>③</sup>

---

① Ticktin 1978a, p. 46.

② Ticktin 1978b, p. 43.

③ Ticktin 1978b, p. 47.

在经济通过工业化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精英对整体形势保持细心关照的能力减弱了。

更密集和更复杂的,是这种经济较长的指挥链条,而更不被理解的是这些管理者的工作,因此,各种扭曲失真及其所占比例的分量也更大。<sup>①</sup>

因为计划必须建立在多数(即工人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因而苏联的“计划编制”只能导致一系列的冲突,结果导致中央计划制定者的指令,只有当它们结合了个体的个人利益时才会得到遵从。因此,苏联社会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只有一个运动规律起重要作用,而是两个运动规律发挥作用:一个是“组织规律”,另一个是“私人利益的规律”。<sup>②</sup>

精英阶层和工人阶级都被原子化、碎片化为无数的个体。因为他的角色,精英被迫在两条前线进行战斗。一方面,精英作为社会集团必须为再生产它的特权地位而战,而另一方面,精英集团的成员作为个人必须在内部作战,以维护他们的个人地位和确保被提拔。工人阶级也被原子化了,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工会和任何其他权威性政治组织。工人阶级只能以消极方式(通过产出很少,或者通过提供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产品)影响生产。因为每一个人,包括精英和工人阶级,首先追寻他们自身的利益,任何有效的政策都无能为力。事实上,社会剩余产品不为任何人所真正掌控。工人们对于剩余产品只有消极的影响力,而精英具有部分的积极影响力。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

这种剩余是什么,它在什么地方和它有多大,没有任何方式能使精英们给出能完成的指令。就像必须要确保服从各个部委的最初意图那样,要顺着这一服从关系的链条把全部指令下达给形形色色的个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

① Ticktin 1973, p. 34.

② Ticktin 1973, p. 36.

③ Ticktin 1978a, p. 50.

结果,生产领域的矛盾主要不再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构成,而是包含于使用价值本身。

矛盾存在于使用价值本身。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在许多方面是有缺陷的,因而它本身属于一种特殊类型。一部分产品是如此差劣,因而它实际上是无用的。另一部分是可接受的,但是因为各种故障,缺少备用零件,或不管由于什么原因,额外成本不断产生。第三部分也许它本身没有缺陷,但是由于它运作的方式它很快地与其他剩余产品相雷同了。<sup>①</sup>

这种控制剩余产品的无能,恰恰是迪克亭认为称那些精英为一个“统治阶级”毫无意义的原因。私人利益和组织之间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有决定性意义,也在精英自身内部表现出来,因此造成了这个精英社会集团的高度不稳定。更为特别的是,迪克亭将这种精英形容为:

一个被卷入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并对所榨取的剩余产品具有局部支配权的社会集团,但它唯有用政治措施的形式,包括运用国家作用,才能维持其剥削。<sup>②</sup>

因此,苏联社会在总体上是一个不稳定的和混合的结构,一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错误起点”。

它没有作为生产方式的生存能力,但是执行特殊的任务,并拥有自己的剥削统治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认为,这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然而工人国家论者认为,它们是处在社会主义的最低的和畸型的阶段;官僚集体主义论者认为,它是一种新生产方式,统治集团在其中有效地拥有生产资料。这些观点无一能提供一个关于这些社会发展的理论。它们总的来说没有超过对一种政治类型的

---

① Ticktin 1976, p. 32.

② Ticktin 1978a, p. 55.



简单陈述。<sup>①</sup>

对于为什么十月革命最终成为一个“错误起点”的问题,也即整个发展所发生的世界历史背景问题,迪克亨的著述仍未回答。

对迪克亨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两个内在相互联系的要点上。各种各样的作者都认为迪克亨夸大了苏联的浪费。曼德尔说,如果情况真像迪克亨所说的那么惨,那么,苏联如何能够在一代人的历史空间中把自己从一个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认为“苏联的中央经济特色”是增长加浪费,将会更正确,无论是(“增长中的”)浪费的增长,还是除了增长中的浪费以外的真正的增长。……这种观点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与基本上是浪费的和所剩无几的停滞蜕化的社会(比如衰败中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某种社会。<sup>②</sup>

另外已提到,两个经济部门在苏联实际上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与资本主义相比,军事工业部门的确提交了“高质量”的产品,而民用部门被浪费所困扰。这样,苏联经济被认为既有效率又无效率。<sup>③</sup>

根据克林格(Klinger)的说法,苏联以有效率和无效率的两种部门为特色,本身就是其精英可以绝对驾驭社会进程的迹象之一。因此,社会发展成了有意识的定向过程,而人们不再可能清晰地谈论“在生产者背后的后面”形成的“运动规律”。该制度具有的唯一动力,是中央层面的决策和指令。如果缺乏这些指示,经济就会慢慢停顿。总体性机能的主要前提是人口大多数的忠诚。如果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精英的行动领域仍然只受“它自身作为决策中心的权力界限”所限制。<sup>④</sup>

随着真知灼见的不断提出,可简单归纳有关苏联的最新争论的核心

---

① Ticktin 1978a, p. 61.

② Mandel 1974, p. 25.

③ Klinger 1981, pp. xxiv - xxv. 克林格根据他自己对 Zaslavsky 1978 的论述。

④ Klinger 1981, pp. xx - xxix.

主题:如果精英不是一个阶级,并因此不受基于阶级矛盾的社会形态的传统规律的制约,那么,这意味着精英阶层自动自觉地掌控这一经济进程(指那种可被归咎为“错误政策”或“恶意行为”的令人反感的发展),还是意味着精英阶层受制于与这一事实(即精英因其固有趋势,构成了彻底官僚化社会的唯一顶层)有关的其他“规律”?

### 匈牙利的“新左派”

在1960年代期间,围绕乔治·卢卡奇形成了一个以“布达佩斯学派”而知名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圈子。这一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安德列斯·希基达斯(András Hegedüs)、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乔治·马尔库斯(György Márkus)及其他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东欧社会主义的批评都是相当温和的。<sup>①</sup>在1970年代,他们许多人的生活仍然处于艰难状态,所以在1977年前后他们暂时地或永久地移民西方。

然而同时,年轻一代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崭露头角,他们有些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反对派。

哲学家乔治·本斯(György Bence,生于1941年)和约翰·基斯(János Kis,生于1943年)在上述知识分子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布达佩斯学派决裂,支持“激进改革”战略。<sup>②</sup>本斯和基斯作为苏联的批判者在西方出名,当时他们以“马克·拉科夫斯基(Marc Rakovski)”为共同笔名,在《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月刊<sup>③</sup>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批判的文章。<sup>④</sup>其后不久,他们又以《走向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① 见例如 Hegedüs 1976 和 Hegedüs et al 1976a。背景信息载 Lukács 1973; Rivière 1974; Szelényi 1977; Becker 1978。

② Bence and Kis 1980。

③ Lomax 1982。

④ Rakovski 1974。这篇文章是西方刊物的系列出版物的一部分。见例如在 Rakovski 1976 中对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的批判和高兹用同样题目的回答,《对生产力的批判——答 M. 拉科夫斯基》。

(*Towards an East European Marxism*)为题,发表了对东欧社会更大范围的批判。<sup>①</sup> 在后一本著作中,他们为如下主题辩护,即苏联类型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二者的结合,而是独特的阶级社会。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社会,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单线论)图式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

有必要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传统结构。……无论哪一种历史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了关键作用,他都没能避免主宰他那个时期的社会科学的单线进化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傳統结构内部,没有一个现代社会制度的任何地位,它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演进轨迹,不仅是沿着同一路径的一个较早或较晚的阶段。<sup>②</sup>

显然,那个时期前后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渴望,也影响了其他匈牙利知识分子。1974年,经济学家伊万·索尼(Ivan Szelényi,生于1938年)和小说作家乔治·康拉德(György Konrad,生于1934年)已完成了一部手稿,他们试图对苏联类型的社会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但这部著作的出版受到了阻碍。1979年,《走在通往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一书才真正与广大公众见面。<sup>③</sup>

康拉德和索尼在他们的研究中比较了三种社会形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处指苏联类型的社会)。然而,他们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这些社会定义为生产方式,而宁可借助卡尔·波

---

① Rakovski 1978.

② Rakovski 1978, p. 15. 本斯/基斯分析苏联社会的尝试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他们的贡献集中在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上;至于其他,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发现了一个没有资本和劳动的阶级社会,其中对抗阶级具备了低水平的阶级意识,而统治者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

③ 在1978年,其匈牙利文版在维也纳以“*Az értelmiség útja az osztályha talomhoz*”的题目出版了。我使用了英文版: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在这一版的前言中,索尼叙述了作者的经历和他们的手稿。

兰尼(Karl Polanyi)的经济融合模式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sup>①</sup>如我们所知,波兰尼区分了四类经济制度:家庭经济制(专制的)、互惠制(均衡的)、再分配制(中央集权的)和基于(市场的交换)制度。<sup>②</sup>康拉德和索尼采用了这些区分,然后区分了再分配制度内部的两种变体:传统制度,通过传统将分配重心合法化;现代制度,合理地证明分配重心的正当性。<sup>③</sup>他们将第一种再分配制度等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将第二种等同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用图表将康拉德和索尼所区分的社会形式表示如下:

	亚细亚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经济模式	再分配	交换	再分配
合法性	传统的	理性的	理性的
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融合的	分离的	融合的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分享了其他两种制度的特点,但是,用本斯和基斯的术语,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社会。<sup>④</sup>在这一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内,每一件事都依赖于知识。无论谁想要归属于再分配精英,他必须具备专家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地实行这一能力,他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赫林提出了为什么苏联类型的社会是以两分的阶级结构为特征的理由:

在一极是一个占据再分配者地位的正在进化的知识分子阶级,

① 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 p. 48.

② Polanyi 1957, 第4章和第5章。

③ 传统的和理性的合法化的区别明显唤起了人们对韦伯关于传统支配和官僚统治的区分的回忆,其中前者是基于“‘始终存在的’、作为它们从过去传下来的统治秩序的神圣性和相伴的权力”,后者是“基于知识的统治的行使”(Weber 1972, pp. 129, 130; 英文版第311、313页)。

④ 康拉德和索尼的确注意到了传统的和现代的再分配之间的某种历史连续性。看上去他们都受到了魏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旧式(中世纪)统治者“使(社会组织的亚细亚模式)适应欧洲的条件”。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这种半亚细亚制度适应于这一变化中的环境,并最终被现代的分配所包含。Konrad and Szelényi 1979, pp. 88 - 142.

在另一极是一个生产社会剩余而却没有配置它的权利的工人阶级。……人口总数始终较大的一部分必须被归属于中间阶层。<sup>①</sup>

虽然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已存在,但知识阶层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和成熟的统治阶级。康拉德和索尼(附带说说,他们并不总是始终如一地使用他们自己提出的范畴)区分了其成员能够自己进行重要决策的“统治精英”和一个更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斯大林统治下,所有权力都建立在已提到的第一个集团的基础上,但是随后这些精英也尝试拉拢大部分知识阶层。

然而,在将全部权力不正当地归属于自己的过程中,统治精英把存在于知识分子阶级内部的冲突内在化了;……如果它想要稳固它的权力,统治精英必须达成与知识分子阶级的妥协,放弃它的垄断权力,并满足于分享统治制度中的权力霸权。<sup>②</sup>

这样,知识分子在工作地位(*in statu nascendi*)中是统治阶级。<sup>③</sup>

在1970年代中期移居西方的“布达佩斯学派”的著名成员,适时地阐明了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批判,这些批判比他们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时期所进行的批判更激进。在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her)<sup>④</sup>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之后,费赫尔、赫勒和马尔库斯<sup>⑤</sup>于1983年共同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对需要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sup>⑥</sup>这是一本合并了许

① Konrad and Szel  nyi 1979, p. 145.

② Konrad and Szel  nyi 1979, pp. 186-7.

③ Se also Szel  nyi 1978-9.

④ F  her 1978 and 1980.

⑤ 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生于1929年),哲学家,卢卡奇的学生,由于“错误的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被党革出教门。然而后来她被复职,并被接纳进入科学院。在她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再次被开除。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她与她的丈夫、文学研究者费伦茨于1977年离开匈牙利。费赫尔(Ferenc F  her,生于1933年)也是卢卡奇的学生。教过本斯和基斯的哲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y  rgy M  rkus,生于1934年)曾经在莫斯科的罗蒙诺索夫大学学习,并像赫勒一样于1973年被开除出匈牙利科学院。见“传记评论”,载 Riviere 1974和 Heged  s et al. 1976, pp. 183-7.

⑥ F  her, Heller and M  rkus 1983.

多早先尝试的著作,阐述了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这些作者不仅关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关注法律、意识形态和哲学。在这里,我只去检验两个第一次提到的问题。

费赫尔等人明确地否定蜕化的工人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等理论。虽然他们认为,这些精英已将自己强化为一个独立的、同质的集团,<sup>①</sup>然而他们仍然关注这一集团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部机器的成员不受约束地依靠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据的地位,以一定的方式行动;他们必须自觉地遵从该机器先前设定的那些规则和目标,否则他们将会受到制裁。……这种社会构成类型(与阶级的情况完全相反)建立在绝对组织化的集团[“公司(企业)”]超越个人的首要地位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一点使得阶级分析的核心目标——处于相同的客观地位中的个人如何实现共同的意识和组织的问题——对于这些社会的统治阶层而言是无目标的。<sup>②</sup>

费赫尔等人因此相信,组织的概念能够取代阶级的概念,履行有用的分析功能。正如里齐和一些人所称,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不是官僚的集体财产,但同样是官僚组织的财产。这些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就类似于封建制欧洲的教会,两者的财产都是共同所有的。<sup>③</sup>

正像迪克亨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费赫尔等人着重强调了由这个组织导致的经济的“无政府”特色。他们指出,计划是完全没有效率的,并且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命令经济包含了计划经济的“真正的对立面”。<sup>④</sup> 在他

①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p. 112, 114.

②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p. 116 - 7.

③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p. 68 - 9. 因此,对强制性社团 *Anstalt* 的参照,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利用的概念:一个共同的集团已确立的秩序,即在既定的活动范围内已成功地施加于每一个符合某种特定标准的人”,Weber 1972, p. 28;英文版, p. 138.

④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 78.

们看来,整个制度在根本上可以幸存,尤其可归因于除了官方经济以外,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它通过(小)私有企业和一种通过联系、友情等的关系经济组成,这些经济体非正式地“调节了”所期待的物品供应(包括生产资料)。结果,一种“灰色的”二次收入再分配产生了,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是生产资料的再分配。<sup>①</sup>

面对共同的统治集团,存在着一个非组织化的、不定形的直接生产者集团,与精英相比,事实上,现在他们不可能被描述为一个“阶级”。这个较低的阶层已清楚地表明,他们有可能在爆发的反叛中起义,但似乎重要的是,在镇压这种反叛之后,表面上几乎完全崩溃的统治机器能够再度迅速恢复它的权力。<sup>②</sup>

总而言之,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代表了苏联类型社会的本质特征:这部机器依照“自我想象”去塑造社会的尝试(精英的同质化),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分裂,以及由劳动的社会分工构成的多维度的集团利益。<sup>③</sup>

## 坎佩亚努

1980年,用笔名费利佩·加西亚·卡萨尔斯(Felipe García Casals)写作的一个东欧异见者发表了许多极其抽象的“论融合社会文集”(‘Theses on the Syncretic Society’),其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提到当时关于生产方式“接合”的争论思潮。<sup>④</sup>后来才发现,隐藏在笔名加西亚·卡萨尔斯后面的是罗马尼亚人保罗·坎佩亚努(Pavel Campeanu,

①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p. 99 - 103.

②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 127.

③ Féher, Heller and Márkus 1983, p. 130.

④ García Casals 1980a. 一篇伴随这一文本的社会短评中提道:“这篇文章据称是由某一东欧国家一个相当显赫的官员用笔名写的。……我们不去鉴别这个东欧国家的出处;相反,我们因为它对于西欧学者的内在价值正在独立地发表这篇稿子。”这些“论文”与一个新的“导言”同年发表。见 García Casals 1980b.

1920—2003)。<sup>①</sup>

如同卡罗等人所做的,坎佩亚努将不发达现象作为出发点。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发达国家,主要存在三种“选择”:默许,这意味着不发达的继续;通过确立一个新帝国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例如德国和日本);或者列宁主义的革命,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正如历史所教诲我们的,人们集中关注最后提到的这个列宁主义战略的任务。

它推动了对国际帝国主义统治和国内资本主义统治的持续消灭;它推动了加速的工业化;但是,它没有推动向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有效转变。<sup>②</sup>

坎佩亚努的列宁主义道路是“融合的”:结合了来自不同社会类型的因素。革命的社会结构被强制灌输到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导致了“脱节”,即社会和经济的矛盾。一个第三因素即承载这一矛盾后果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必要的。因此,社会总体上缺少一种有机的内在结合:“未成熟的社会主义体现为一种非体系,其目标是通过使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而不是其他方式的进展)和谐化而成为一种体系。”<sup>③</sup>这就是在当时为什么通过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能获得真知灼见的原因。尤其是在那些环境下,能否有针对性地应用“生产方式”概念,是令人怀疑的。

① See Campeanu 1986—1988, I, p. ix:“几年以后,我把一篇我正在写作的论文送给一些美国的学术伙伴看。我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指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安排让它发表了……”关于坎佩亚努,该书在其中说道:“他 193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40 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从 1941 年直到 1944 年,他因为反法西斯主义活动被监禁。坎佩亚努于 1960 年获得斯特凡·乔治科学院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从那一年到 1980 年是罗马尼亚电视民意监测部的负责人。……他是发表于罗马尼亚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章的作者,并出版了 10 本书。……他一直担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的专家。坎佩亚努在 1964 年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奖,1977 年再度获奖。”(p. 187)也见 Campeanu 2003 中半自传式的反思。

② García Casals 1980a, p. 234.

③ García Casals 1980a, p. 235.



坎佩亚努通过指明这些因素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中的结合,阐明了他的论题。对于社会主义因素,他逐条说明,其中,缺少一个统治阶级;还缺少诸如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和娱乐设施等相当多的因素;缺少伟大融合的能动性;等等。对于资本主义因素,他概括为:强迫出卖劳动力,工资形式,日用消费品的市场分配,工资劳动者对决策影响的缺位,等等。对于前资本主义(封建制度的)因素,他列举出,缺少有效的工人组织;与技术可能性相比低下的劳动生产力;个人依赖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因素在进入一个过程时产生了:

各式各样的生产方式……连接在一个独立的经济过程中。因此,经济的融合性不在于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反在于单独运行的生产方式的异质性。<sup>①</sup>

## 第五节 总结

1968年以后的时期见证了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关于苏联本质的最广泛、最多样和最激烈的辩论。虽然围绕格卢克斯坦(Cliff)和托洛茨基-曼德尔的旧思潮的理论发展停滞了,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构想提出来了。受毛主义鼓舞的作者如霍姆伯格、尼古劳斯、贝特尔海姆和沙旺斯,为国家资本主义解释的一个新观点辩护,这一新观点特别是在两方面与较旧的变体不一样:(1)苏联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日期不再被确定在1917年或1929年左右,而是大约在1956年;(2)苏联的资本主义不再被定义为某一大资本,而是定义为许多受国家保护的小资本的集成。

“官僚集体主义”的几个新版本也得到描述。他们比里齐、伯纳姆、沙特曼等人更激烈地强调所谓的新统治阶级的独特特征。比如,据称官僚集体主义拥有一个并非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基础(斯托扬诺维奇),据称它在资本主义所构建的阶级的意义上不是一个阶级(范赞和迈奇奥瓦),

---

<sup>①</sup> Garcia Casals 1980a, p. 237.

并且据称它并不具备一种内生机制(斯威齐)。

然而,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强力复兴了那些把苏联描述为一个独特社会的理论解释,尽管据称那里缺乏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不属于一个阶级的”解释思潮包括了许多变种,发展出许多观点,可以部分地包括在新一代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中。因此,许多作者描述了沙皇俄国的不发达(被一些人确定为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和这一“新制度”的崛起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个理由,后者可以被视为一种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权力(卡罗、梅洛蒂、杜契克、巴罗、施米德雷尔等人和坎佩亚努)。

第二,许多作者把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或矛盾的一个方面,强调为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埃盖特、S. Z. 图宾根、艾希维德和凯泽、汤马斯、巴罗、康拉德和索尼)。

第三,注意力聚焦在苏联经济的结构不平衡上:据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增加的无效率和浪费之间存在着一种上升的矛盾(卡罗、阿尔法特和纽索斯、康诺特、迪克亨、费赫尔等)。一些作者竟然将苏联的特色描述为历史的绝境(季敏、迪克亨)。

然而,关于政治精英是否有意识地引导了该社会过程(汤马斯、巴罗、施米德雷尔等)和精英的领导能力是否由于结构原因受到严重制约(迪克亨、费赫尔等)的问题,各种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 第七章 解体及其后果：从 1985 年至今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S. 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的任命预示着苏联的终结。就职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公开对苏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了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官方批判。在 1987 年 6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他发表了她的“基本论点”,并号召经济改革(*perestroika*)。他随后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制订如国有企业法(1987)、合资法(1987)、合作组织法(1988),然而,这一努力也伴随着经济的加速衰退:产量水平(出口水平)下降,价格上扬。同时,新的开放(*glasnost*)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和道德的抗议的表达,使西方暂时对戈尔巴乔夫抱有积极的幻想。

1991 年 8 月,失败的保守主义政变给予了戈尔巴乔夫预期的改革计划致命一击。在该政变后的几周,越来越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1991 年 11 月,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俄罗斯共和国颁布解散苏联的法令;12 月,苏联正式解体,此后最初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三国共同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的以无管制的市场资本主义为走向的“自由落体”在后来数年继续下降。车臣的经济危机和一场“肮脏的战争”时而引发抗议和反叛,但更通常的是导致了全民的道德败坏。2000 年,叶利钦由他的被保护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继任，普京政策集中在恢复一个能对经济力量保持国家控制的“强大国家”，促进劳动的道德规范，采取对抗分裂主义的强硬行动，并突出新军事的崇高地位。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 围绕克利夫的思潮及其批评者

苏联的垮台必然导致了向托尼·克利夫及其支持者理论的大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未被明确认识到的重要转变。毕竟，克利夫等人曾独创性地设想，国家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比西欧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因此，克利夫在 1948 年曾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能够达到的最后的理论限度”，并且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方面”。<sup>①</sup>在 1940 年代，这一解释还具有某种可信性，因为苏联经济看起来比西方经济更有动力。但是，在后来数十年间苏联经济明显已陷入结构性僵局时，克利夫及其支持者不再强调他们理论的这一方面，可是并未对这一修正进行明确的辩护。<sup>②</sup>起初他们几乎无法想象国家资本主义的破产，以及破产所意味的向私人资本主义“更低的”阶段的倒退。晚至 1987 年，迈克·海恩斯还批评了所有认为苏联社会的危机是晚期的而且危机植根于苏联的独特性质的人。海恩斯明确说明：

(1) 历史表明，苏联经济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

(2) 这种经济的活力产生于它与西方的竞争性的相互作用中。

(3) 这一活力在苏联内在化，并在其更广泛的联系中再现。

(4) 苏联经济已显现出充分的动力，不仅防止扩大与发达的西方的鸿沟，而且绝对地和相对地缩小这一鸿沟。<sup>③</sup>

<sup>①</sup> Cliff 1948a, p. 62; 重印本 2003, p. 58。

<sup>②</sup> 也见《扬弃》(Au fheben) 1997, p. 34。

<sup>③</sup> Haynes 1987, p. 13。

海恩斯并不否认苏联经济正经历着困难,但是他强调,“危机是个相对的概念”<sup>①</sup>,而且“经济困难和紧张影响着所有世界主要经济体”。<sup>②</sup>“现存的刚性的和僵化的结构”无疑已经延缓了苏联的积累过程,并且与许多“拖延因素”<sup>③</sup>一起,造成了“利润率的下降”,但是不应夸大那种发展的后果。尽管苏联经济有其特殊性质,但正因为它像其他许多经济体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我们能够考虑在我们到达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前整个过程中的一系列停靠点。”

但是,1990年前后,苏联经济无法再抵挡来自西方竞争的状况已日渐明显。因此,1990年夏,克里斯·哈曼认为,斯大林统治下飞速的工业化能够从1930年代产生坚持到1960年代,是因为那些年间外贸关系已被缩减至最小值;后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断增长的国际化,这一政策已达到极限。最后,苏联无法避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产生了“常规的”积累危机,它迫使苏联官僚体制“尝试改变它的方式”。<sup>④</sup>

这一说法逐渐变成主流解释。因此,迈克·海恩斯和皮特·格莱特(Pete Glatter)在1998年说明,经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后,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从全球的观点看,俄罗斯在错误的地点建立了错误的工业类型;工厂过大,用比其他世界经济体更低效的设备生产了过多种类的产品”。<sup>⑤</sup>对这一体制的激进干预已势在必行,即使这些干预已造成苏联统治阶级的严重分裂。<sup>⑥</sup>因为实质上是过去统治苏联的那些同样的人仍在掌权,改革的暂时结果是:“处处显现瘫痪性的混乱”,市场、国家资

① Haynes 1987, p. 14.

② Haynes 1987, p. 15.

③ Haynes 1987, p. 27. 海恩斯说出四种拖延因素:(1) 该经济的成熟性,(2) 其发展的低水平,(3) 武器的负担,(4) 该经济体的相对孤立。

④ Harman 1990b, p. 154.

⑤ Haynes and Glatter 1998, p. 49.

⑥ Haynes and Glatter 1998, p. 49. 克利夫在1991年早已指出,将“真正的市场经济”引进苏联必将意味着大规模的失业,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脱离了“统治阶级始终在转变中的所有各种方法”。

本和黑手党行为混杂结合。

**批判。**对克利夫及其支持者这一立场的大量批评涉及方法论问题,基本上可归结于如下观点:他们只用下述几种疑似命题推理,就可把苏联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

- (1) 在资本主义的 X 类型中, Y 产生了。
- (2) Y 在苏联产生了。
- (3) 因此, 苏联是资本主义的。

弗兰克·弗雷迪(Frank Furedi)举了几个被他视为这种观点概括形式的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克利夫的“发现”:在资本主义内部曾有使用价值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例子(即战争经济)。“既然使用价值也是苏联生产的目的,那么再次由此得出结论,两种制度是同样的。”<sup>①</sup>弗雷迪认为这一类比不仅在逻辑上有缺陷,而且在经验上也是错误的;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战争经济中,使用价值的生产也从来不是它自身的目的。

使用价值的生产仍然极大地服从于价值规律。英国统治阶级才最清楚地知道,它并不是免费得到它的步枪。价值规律的戒律通过重大的外资流失最痛苦地施行了自己的影响,英国不得不廉价卖出它,以偿还围绕美国迅速积累的债务。<sup>②</sup>

曼德尔评论道,例如,克利夫等人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从未发生过任何生产过剩危机。<sup>③</sup>当然,前苏联曾经经历了“一场特定的制度性危机”,但这种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在本质上是很不相同的:“你不可能解释说,空空如也的商店只是(过度)充裕的商店的变体,从而把使用价值生产不足说成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变体。”<sup>④</sup>

① Richards 1987, p. 101.

② Richards 1987, p. 102.

③ Mandel 1992, p. 141.

④ Mandel 1992, pp. 141 - 2.

## 达姆及其批评者

1990年,数学家沃尔特·达姆(Walter Daum)通过位于小纽约的“争取革命政党联盟”发表了一个早年提出的资本主义新理论。<sup>①</sup>达姆部分地受詹姆斯/杜娜耶夫斯卡娅和库伦/莫扎列夫斯基的启发,<sup>②</sup>在他的《斯大林主义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Stalinism*)一书中提出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分期和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新定义。他指出,1930年代中期,当时托洛茨基已经分析了这些观点,但是,在后来数年中(1936年是其转折点),一场反革命已经发生,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顶点。这个转折是两种发展的结果:在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极度紊乱:“产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工厂缺乏材料和工人;通货膨胀暴涨贯穿整个1933年,而那一年的投资出现了急剧的和无计划的下滑。”<sup>③</sup>在国外,德国工人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发展给了苏联沉重一击。为了回应这一双重危机,斯大林官僚体制实行了一个新转折。从此时起,外交政策明确地变为反革命的政策,例如,表现在蓄意破坏西班牙反弗朗哥主义的抵抗斗争,以及到处推行“人民阵线”政策。1934—1935年,“苏联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扮演着保守角色,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合作和冲突中捍卫它自身的利益”。<sup>④</sup>在国内战线上,发生了急剧的向右转:在镇压少数民族的同时,推行俄罗斯民族主义,而“大清洗”成为建立对党、军队和工业官僚的严酷政治控制的工具。鼓励工人之间的竞争(斯达汉诺夫运动),逐渐普及计件工资,逐步严格劳动法规。

在形式上,苏联经济在这些年中通过计划体制进一步实现了中央集权化;在实际上,计划体制意味着“依法管理”。<sup>⑤</sup>但是,这种计划编制在

① “争取革命政党联盟”是在1976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联盟”的一次冲突以后成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联盟”是在1973年与美国“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分裂后紧接着出现的。见Landy 1997。

② Daum 1990, p. 22.

③ Daum 1990, p. 165.

④ Daum 1990, p. 171.

⑤ Daum 1990, p. 176.

现实中大力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去集中化——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忽略了一个事实。”<sup>①</sup>1936年企业经济责任制(khozraschet)的引进至关重要,苏联公司由此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实体。

经理们成为资本经济规律的代表,其经济筹码是在他们自己公司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他们寻求驯服工人并实现资本的积累、集中和现代化。这不是按照国家的需求,也肯定不是按照工人的需求和权利,而是为了在他们的支配下将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大化。这种代表统治者整体利益的中央官僚制,必须反对其地方代理人的特殊利益,以平衡它自身的需求。<sup>②</sup>

达姆称以这种方式出现的体制为“冒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或“中央集权化的资本主义”。<sup>③</sup>如克利夫所说,这种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不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相反是为独裁专制、“一国资本主义”而奋斗。与曼德尔相比,克利夫及其支持者和达姆都不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将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定义为“积累的动力,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工资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实际剥削”。<sup>④</sup>一旦在个经济体中“通过工资劳动榨取剩余劳动”,那么,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sup>⑤</sup>竞争只不过是积累剩余劳动这一动力的“外在表现”。<sup>⑥</sup>

这种致力于专制积累的努力是“原来殖民的和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统治者的自然选择,因为这种积累有助于他们把剩余价值留在国内;它能使这个国家永续长存,那里不再可能产生传统的资本主义。”<sup>⑦</sup>这种制度生产的首要社会目的,是“将总体的国家资本也即在其国家边界内的国有资本保留和最大化”<sup>⑧</sup>。

---

① Daum 1990, p. 177.

② Daum 1990, p. 180.

③ Daum 1990, p. 197.

④ Daum 1990, p. 50.

⑤ Daum 1990, p. 27. “这种工资劳动关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

⑥ Daum 1990, p. 51.

⑦ Daum 1990, p. 197.

⑧ Daum 1990, pp. 196 - 7.



这个首要目的“要结合地方和部门官僚的狭隘目标(把他们负责的公司和部门的价值最大化)共同运作(经常是有分歧的)”<sup>①</sup>。这毕竟存在着竞争,但只是在国内经济内部(参考贝特尔海姆)。这一体制的表现就是“伪计划(也就是来自顶层的官僚管理)”、生产高于消费的优先地位和自1930年代以来(不算战后恢复年代)下降的积累率,这些都是由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产生的现象。

**批判。**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支持者批判了达姆的分期和他关于苏联资本主义的描述。关于第一点,如果苏联在1936至1939年的确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折,那么,国家结构和独裁者怎么可能在转折前后都原封不动?奥尔·理查森(Al Richardson)写道,“在对其工作方法、剥削、劳动法、大清洗和恐怖进行的认真检验中”,达姆“没能解决下述问题:实施上述做法的这个国家,在转折前后是同一个国家吗?即那个自1917年以来通过不间断的各个阶段已经向前发展了的国家。”<sup>②</sup>

彼得·梅因(Peter Main)和克莱尔·希思(Claire Heath)特别批评了达姆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他们不仅因为他采取了一种“规范的”方法而指责他构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并用这一“理想类型”的种种因素与苏联进行比较;而且指出,达姆的资本主义理想类型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毕竟,工资劳动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之下,而且发生在那个后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虽然它的内容改变了。在过渡经济中,“工资仍然是其形式,剩余劳动在其中被抽象化”,但是“工资形式不再表达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sup>③</sup> 达姆

① Daum 1990, p. 197.

② Richardson 1991, p. 36.

③ Main and Heath 1994, p. 146. 两位作者在这里让他们自己以马克思的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为基础,在该纲领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写道:“我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Marx 1989, pp. 85-6.

似乎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工资劳动者在1917至1936年时期仍然很重要，然而达姆并没有把这一最早的时期定义为资本主义。<sup>①</sup>

梅因和希思很快确定了这一概念，即苏联存在着企业和部门之间的资本竞争：“如果存在真正的竞争就会有输家，那么无效率的公司将会垮台，而它们所代表的资本将会被消灭。但这恰恰是在苏联发生的事情。”<sup>②</sup>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马列主义支持者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批评了达姆的自相矛盾。毕竟，达姆说过，假定的“去中央集权化”从1930年代开启的过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他说这个同样的过程在“被称为‘竞争’时，是‘一个次要的、表面的现象’”。“他一边提供给读者(承认苏联经济中的竞争现象)，一边又收回(贬低竞争理论的重要性)”<sup>③</sup>。

### 萨皮尔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法国的前毛主义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Jacques Sapir, 生于1947年)发表了许多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他研究了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提出的观点，即苏联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经济”。<sup>④</sup>

我认为，苏联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战争经济。这种战争经济方式对于社会主义不是特有的，因为它们也被运用于战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类似方法在战争期间也被使用。……它清楚地表明，

① Main and Heath 1994, p. 153.

② Main and Heath 1994, p. 157.

③ Green 1998, p. 34.

④ 兰格确实写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管理的第一个时期，至少依照我们现在的经验，总是由基于中央确立的优先地位基础之上的资源的行政管理和配置体现其特点的。在这一时期，对工人的道德和政治要求、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的要求，取代了经济刺激。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经济，包括它所利用的关于计划管理的方式和经济刺激。”Lange 1970, pp. 101 - 2.

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和管理方式并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战争经济的方式。困难始于这些战争经济方式被视为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致,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之时。<sup>①</sup>

受贝特尔海姆、沙旺斯和所谓调节学派的启发,<sup>②</sup>萨皮尔把苏联解释成一种在例外形势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动员》(*L'économie mobilisée*, 1990)一书,即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著作中,他强烈地否认苏联经济是“一个大企业”;反之,他认为它更加像一个长期的战争经济,其中国家通过保证对产量的需求指导工业和农业。这种“动员经济”在十月革命以前的1915至1916年就曾出现过,并且,尽管形式上出现了几次政治转折和变化,动员经济仍持续到1980年代末。<sup>③</sup>

人们在使用“动员经济”这一术语时,实际上提到了生产商品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那里是分离的,而且是非商业性的,其中生产的有效性并不通过相关物品的销售(或缺乏销售)而产生。<sup>④</sup>

因为国家确保以固定价格购买产品,这种体制获得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动力。个别企业通过生产规模最大化来争取利润最大化。企业不是在销售中而是在投入成本中互相竞争,因为它们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尽可能多的雇员和生产资料。企业利润不再作为客观的控制手段发挥作用,所以有必要用其他手段去监控企业。<sup>⑤</sup>

在这一体制中,“常规的”投资周期<sup>⑥</sup>形成了,但是最后,这种动员经济的总危机同样仍存在可能性。这表现为三种方式:

在增长节奏上,动员经济必须优于其潜在对手的增长节奏,以

① Lange 1970, pp. 101 - 2.

② Sapir 1997, pp. 102 - 3. 对调节学派的一个简要概括,见 Boyer 2004。

③ Sapir 1997, p. 32.

④ Sapir 1997, pp. 38 - 9.

⑤ Sapir 1997, pp. 45 - 7, 59 - 89.

⑥ Sapir 1997, pp. 120 - 4; 也见 Sapir 1989。

确保赶超,克服人类发展水平上的落后状态(达到一两代人或更多代人的正常发展状态);在生产的技术层面,它必须确保统治者不会被排除在一切买卖特权之外;最后,依赖于国内社会冲突的发展阶段。<sup>①</sup>

在苏联,1980年代的总危机导致了**改革和开放**,导致了这一经济体的“民主化”,也就是“重新引进商业的实践和功能”<sup>②</sup>

### 查托帕迪亚伊及其批评者

查尔斯·贝特尔海姆的代表作《苏联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的发表,激发了印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Paresh Chattopadhyay)<sup>③</sup>历经数年的关于苏联的新反思,并体现于他于1994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和苏联的经验》一书中。最初,在1980年代早期,查托帕迪亚伊仍将十月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比,更直接地把目标对准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sup>④</sup>。那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起初总是导致一个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全面否定,它不过是对这一否定的自觉准备。资本(连同商品生产一起)在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是由于以下根本原因:直接生产者不可能一夜之间集体支配生产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恰恰是通过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确保这一支配。<sup>⑤</sup>

只有在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工人阶级开始支配客观的生

① Sapir 1990, p. 129; see also Sapir 1980.

② Sapir 1990, p. 142.

③ 出生年份不详(2005年6月10日与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的通信)。

④ Chattopadhyay 1981(Ⅱ), p. 1104.

⑤ Chattopadhyay 1981(Ⅰ), p. 1066;(Ⅲ), p. 1157.

产条件——被改变时,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才可能开始。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在1930年前后资本已经得以巩固它的权力。在后面数年中,查托帕迪亚伊无疑矫正了这一观点,并开始否定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含义,因为,“首先,夺取政权不是劳动大众(他们自己)的自我解放行动……第二,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十月诞生的这个政权不是工人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真正的第一步)”<sup>①</sup>。第二点是他的书中阐明的矫正过的解释,即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引进了一个前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斯大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只不过表现了社会形式的变化。

发生的主要事情是,工资劳动被极其迅速地和大规模地普及,它把这种经济体的强制和特殊的运作形式结合起来,与一个资本主义“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并不矛盾,尤其是因为在经济技术落后的背景下“赶超”资本积累的紧迫性。<sup>②</sup>

与克利夫及其支持者形成对比,查托帕迪亚伊认为,苏联可以被“作为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体”来进行研究,虽然他并不否认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sup>③</sup> 为了证明作为孤立分析单位苏联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查托帕迪亚伊必须说明,工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他通过指出“自由的”工人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分离说明了这一点<sup>④</sup>);他还必须合理地证明:即使苏联是一个大联合企业,在苏联内部同样发生了资本之间的竞争。他通过诉求于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和“多数资本”的区别达到了这一观点。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曾写道:“每一个别资本只构成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即获得了独立性并被赋予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正如个别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组成成分”。<sup>⑤</sup>

① Chattopadhyay 1994, p. 154. 也具体参见这篇文章,载 Chattopadhyay 2004, pp. 117 - 23.

② Chattopadhyay 1994, p. 158.

③ Chattopadhyay 1994, p. xiii; 2004, pp. 112 - 3.

④ Chattopadhyay 1994, pp. 13, 50.

⑤ Marx 1978, p. 427.

查托帕迪亚伊从这一观点推导出，“每个资本在**绝对的**意义上都不是独立的”。<sup>①</sup> 在苏联，社会总资本集中于国家，而个体企业形成了个人资本。社会总资本是“**本质的现实**”，而单个资本是“**现象的现实**”。<sup>②</sup>

依照查托帕迪亚伊的说法，资本竞争是存在的。

当社会总生产过程被分割于每一个**相互**自治的生产单位中时，基于其生产者的双重自由，劳动产品以（货币）商品形式与其他单位的交换，无论如何都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特殊法律**形式**或商品（包括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交换的特殊**形式**。<sup>③</sup>

个别资本之间的竞争被“生产资料的交换所证明，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苏联企业之间采取了这种商品形式”<sup>④</sup>。

通过这一竞争所形成的积累过程建立在粗放增长的基础上。由于“干部和熟练工人的缺乏，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可利用率，以及该国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自然财富”，首先靠动员未使用过的能量和原材料的粗放增长，是容易理解的选择。<sup>⑤</sup> 在这一积累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增长具有超越消费品生产的绝对优先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明显遭遇了“无法克服的资源障碍”，在第七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已经显而易见。<sup>⑥</sup> 然而，走向密集积累的步骤没能实现：“苏联资本主义继续作为一种动员经济运行，并且不可能伴随新形势下遵从扩大再生产需要的经济组织的相应变化，让自己解除动员。”这样，一种**绝对的过度积累危机**形成了，在该制度的晚期危机中达到极点。<sup>⑦</sup> 这种崩溃只意味着资本主义形式的变

① Chattopadhyay 1987, p. 7; Chattopadhyay 1994, pp. 20, 42-4.

② Chattopadhyay 1994, p. 12; Chattopadhyay 1992, pp. 77, 114.

③ Chattopadhyay 1994, p. 54.

④ Chattopadhyay 1994, p. 50.

⑤ Chattopadhyay 1994, p. 86.

⑥ Chattopadhyay 1994, p. 88.

⑦ Chattopadhyay 1994, p. 40. 查托帕迪亚伊遵循了马克思的教导（1981, p. 260），马克思指出，“资本绝对的过度生产”产生于利润率的下落伴随着“利润积聚中的绝对衰减时……于是剩余价值的积聚，也不可能增加。”

化,正像“‘工人们’对通常由‘上层’发起的这些变革严重的漠不关心所显示的那样”。<sup>①</sup>

**批判。**1981年,查托帕迪亚伊提出了他的一些观点。当时,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盖伊·戴斯奥尔利(Guy Desolre)在几个方面批评了他。戴斯奥尔利不仅针对在苏联存在的一般商品生产和企业之间竞争的各种看法提出了经验性的论据,而且批评查托帕迪亚伊把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概念“转化”到苏联社会。戴斯奥尔利认为,这只是在玩弄辞藻,而不是对马克思的严肃解释:

马克思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到了**社会总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那种资本)。因此,即使某个人试图让他说这二者可以合并为某个唯一的资本,也无济于事。由此,该官僚制的成员都将会以某种方式成为这个集体的股东。<sup>②</sup>

## 费尔南德斯

尼尔·费尔南德斯(Neil Fernandez,生于1964年)曾活跃在1980年以来英国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组织中,诸如《共产主义尝试》月刊(*A Communist Effort*, 1984—1985)和以伦敦为基地的“红色恐怖”团体(1989—1990)。<sup>③</sup> 在著作《苏联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1997)中,费尔南德斯尝试提出一种自治主义的分析。<sup>④</sup> 根据对自己早期著作的详细阐述,<sup>⑤</sup>费尔南德斯寻求说明,他看到的资本主义的三个定义特征(即商品、工资劳动和为利润而生产)在苏联都已存在。

① Chattopadhyay 1994, p. 159.

② Desolre 1983, p. 229.

③ 费尔南德斯 2005年6月致该作者的个人通信。

④ 正像 Michael Lebowitz(1992)特别是 Felton Shortall(1994)的两本著作,本书是对“同一领域批判的一个贡献”。同上。

⑤ 特别是见 Fernandez 1989.

为了证明苏联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础上，费尔南德斯研究了该经济体这些方面的每一项。关于消费领域他列出了几个问题，因为“基本关系是买和卖的关系”。<sup>①</sup> 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分配的证明是更困难的，这些分配毕竟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实物交换与竞争以及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批发和各种交易所产生的。费尔南德斯不过是将这些分配确定为交换关系，并因此确定为已更新的资产。<sup>②</sup> 关于生产领域，讨论变得更为复杂。费尔南德斯认为，工人受剥削，而经理们运用“操纵、谈判、讨价还价和官僚权威命令的特有混合手段”，为了耗材和人员进行相互竞争，并与中央的官僚精英阶层展开竞争。<sup>③</sup>

当然，这一竞争不以市场方式运作；官僚们也不可能将他们统治的部分传递给他们自己选择作为继承人的那些人。反之，统治是通过官僚制的任命和非官方的“blat”分配两方面的混合来传递的，包括通过特权遗传和“教育”制度。<sup>④</sup>

不管这些观察结论如何，费尔南德斯仍然在这一范围确定了各种资本主义关系。

（因为）存在着私人占有，还存在着每一个拥有对生产资料的部分控制（因此榨取剩余产品）的官僚（后占有者）之间的竞争，那么很明显，这一竞争恰好是其自身的那种制度——这类私人占有统治的各个部分进行交换的制度。而所交换的（和通过劳动中介的）任何东西都被解释为商品。<sup>⑤</sup>

劳动力在苏联是商品，因为“作为对劳动力的报偿所给予工人的工资袋是真实的，而不是名义上的”。<sup>⑥</sup> 并且，苏联最终也是以持续努力地

① Fernandez 1997, p. 117.

② Fernandez 1997, pp. 118 - 22.

③ Fernandez 1997, p. 126.

④⑤ Fernandez 1997, p. 127. “Blat”是利用个人的关系、影响或行贿去获取物品和服务。

⑥ Fernandez 1997, p. 129.



积累用于扩大生产的剩余为特征的。

费尔南德斯相信,这样已证明,苏联不仅是建立在普遍化交换的基础之上,而且还以对积累的普遍追逐为特征,他总结道:“由此得出结论,它是资本主义”。<sup>①</sup>但是,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费尔南德斯认为没有正确使用概念),因为“私人占有在苏联始终享有充分的影响”<sup>②</sup>;也不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对以货币为主的积累的考虑”在苏联是至高无上的。<sup>③</sup>不如说,它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类型。

其中对劳动力、劳动、产品和一般生产力进行控制的部分,也即采取权限、法规和“blat”形式的部分,是买卖的、交换的和有积累目的的至关重要的生产投入。<sup>④</sup>

在这一制度中,货币已采取了“官僚权限的形式,或更普遍的‘blat’形式”<sup>⑤</sup>。

### 《扬弃》(*Aufheben*)

自治主义的《扬弃》(*Aufheben*,取自黑格尔使用的德文“扬弃”概念的这本杂志,是英国的一份马克思主义月刊。——译者注)团体起源于布莱顿,英格兰人在1990年代末提出了一种试图整合出自迪克亭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迪克亭最后错误地描述了苏联的性质,一方面因为他根据价值规律的运作看到其资本主义实质,而另一方面因为他并没有看透其种种政治经济类型的具体性质<sup>⑥</sup>,但是迪克亭仍然“给出了关于苏联衰落和垮台的最值得相信的解释和描述”。<sup>⑦</sup>迪克亭的著

① Fernandez 1997, p. 132.

② Fernandez 1997, p. 140.

③ Fernandez 1997, p. 137.

④ Fernandez 1997, pp. 136 - 7.

⑤ Fernandez 1997, p. 142.

⑥ *Aufheben* 1998, pp. 40 - 1.

⑦ *Aufheben* 2000, p. 32.

作阐明,对苏联的任何理解,必须“解释它所造成的制度性的浪费和无效率。如果苏联是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它肯定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sup>①</sup>。

《扬弃》团体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即把资本主义简单地视为一个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利润驱动的制度。”<sup>②</sup>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异化劳动的自我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变成一种异化力量的人类活动的创造性的和生产性的能力,包含对其本身自主扩张的人的意志和需求”。<sup>③</sup> 苏联工人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分离的事实,使苏联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完全不存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但是,这一结论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如果苏联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它体现了很多明显不是资本主义的特点?<sup>④</sup>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扬弃》把取自迪克亨和波迪加的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观念融合理论。该团体建议“遵循迪克亨,把苏联看作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并且遵循波迪加和意大利左派的见解,我们建议不把苏联理解为已经处在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而是处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社会形态”<sup>⑤</sup>。由于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导致任何东西,并且新的国家官僚制已夺取权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搁置在议事日程上。由于俄罗斯经济不发达的本质,这首先需要生产性资本储备的增长。由于直到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已限制了工业发展的时候,新精英才被迫去限制市场的自由运行。这样,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生产主义的”变体出现了。对货币资本的相关抑制意味着,货币被降低为“一种纯粹的暂时的流通手段”。<sup>⑥</sup> 资本价值不能以货币而只能以使用价值来表达。

在这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制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

① *Aufheben* 1998, p. 38.

② *Aufheben* 2000, p. 30.

③④ *Aufheben* 2000, p. 30.

⑤ *Aufheben* 2000, pp. 33, 46.

⑥ *Aufheben* 2000, p. 44.

确具有商品形式,而且商品流通的唯一一种有限的形式出现了,却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形式。“由每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并不是通过它们转化为货币而得到确认和实现的,而是由于它们被国家承认为价值而得到预先确认的”。<sup>①</sup>因此,货币作为生产性资本尤其是功能性的,并不是价值的一种普遍的独立表达。这导致两个结果。第一,货币的购买力仍然是有限的。

虽然每个人都需要货币,但它不足以适应所有人的需要。作为结果,非货币的社会关系不得不保留下来。对处在有权地位的或受庇护关系等条件(即被认为是“blat”的那种制度)之中的那些人的偏向和宠爱,成了苏联官僚制作为获取有权使用特权物品的方式和摆平事物的方式的突出特色。<sup>②</sup>

第二,有限的货币功能意味着工资几乎发挥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用额外收入买到任何东西,他为什么应当更卖力地工作?由于强制性的积累过程愈发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经理们既没有“胡萝卜”也没有“大棒”去控制工人。

一则面临以强行通过中央计划增加生产的形式去占有剩余价值的命令,另则面临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权力,国有企业的经理们用为数量牺牲质量来解决这一两难局面。这是可能的,因为物化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技术和社会需要,并不是来源于将要使用这些商品的那些人,而是由中央计划独立地规定的。<sup>③</sup>

其结果就是一种特有的有缺陷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它达到了不断增加“无用产品的持续生产”的程度,以至于来自一个生产部门的有缺陷的使用价值被利用于其他部门。<sup>④</sup>

<sup>①</sup> *Aufheben* 2000, p. 43.

<sup>②</sup> *Aufheben* 2000, p. 44.

<sup>③</sup> *Aufheben* 2000, p. 45.

<sup>④</sup> *Aufheben* 2000, p. 46.

总体上,苏联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其中资本以使用价值形式进行主导性的积累,虽然使用价值本身的缺陷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因此,鉴于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中,靠近生产的阶级冲突通过周期性的剧烈经济危机的浪费来解决,从而恢复了工业常备军和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力量,那么在苏联,这些冲突则通过有缺陷的生产的持续性的和制度性的浪费来解决。<sup>①</sup>

### 桑德莫塞

挪威哲学家于尔根·桑德莫塞(Jørgen Sandemose,生于1945年)在他的著作中,将汤尼·克利夫、莉塔·迪利奥(Rita di Leo)和希勒尔·迪克亭的见解合并在一起,从1970年代起,他继续探索了他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sup>②</sup>这一理论首先系统地呈现在他的《国家、宗教、经济》(*Stat, religion, økonomi*, 2002)一书中,它展示了对变化多样的“资本主义形式”的雄心勃勃的总体分析。桑德莫塞认可克利夫的论题,即苏联构成了“一个大资本”。但是,他并不赞同克利夫关于这个被认为孤立的资本是“一个大工厂”的观点。相反地,他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实际统摄从来没有在苏联取得过成功,只存在过形式统摄。<sup>③</sup>苏联资本展现出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些工厂的同样特点,其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是……专业化工人的结合”。<sup>④</sup>在这两种情况中,“工人都具有一种非常伟大的自主性,而资本不断被迫去努力争取工人的服从性。”<sup>⑤</sup>

与生活消费品不同,因为大部分生产资料在苏联不是可交易商品,桑德莫塞把总剩余价值和来自消费资料折返税的国家收入等量齐观。<sup>⑥</sup>

① Aufheben 2000, p. 46.

② 尤其见 Sandemose 1976.

③ Sandemose 2002, p. 203. 也见莫汉的理论,在第六章第2节中讨论过。

④ Marx 1976, p. 508; Sandemose 2002, p. 223 - 4.

⑤ Sandemose 2002, p. 490; pp. 202 - 3.

⑥ Sandemose 2002, pp. 209 - 10.

接着,他试图运用经济再生产图式证明,苏联资本的制造业特色只准许“绝对剩余价值”,因而达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表现为不可能有任何向实际统摄的过渡,因为生产性投入将缩减工人阶级的规模并造成利润率下降,也因为工人阶级权力的固有地位阻碍了这种发展。这意味着,“非再生产”部门的军事工业的增长能够提供短期出路,但是,这根本无法阻止该制度的最终危机。<sup>①</sup>

### 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及其批评者

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赖斯尼克(Stephen Resnick,生于1938年)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生于1942年)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杂志《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sup>②</sup>联手,在《阶级理论和历史》(*Class Theory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对苏联“资本主义”性质的描述。他们把自己建立在一种独特的阶级理论的基础上,依照这一理论,社会必须被看成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过程总体,也即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全部过程“取决于每个构建那个社会的所有其他过程”。<sup>③</sup>探究这一总体性存在无数的“进入点”,而没有一个进入点能够被认为是“该社会中任何其他过程的基本原因或决定因素”。<sup>④</sup>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进入点是阶级,在这里被定义为“生产和占有剩余劳动的经济过程”。<sup>⑤</sup>

在赖斯尼克和沃尔夫的理论中,存在两类阶级过程:基础和统摄的。基础的阶级过程涉及一个阶级争夺另一个阶级的剩余产品的生产。统摄的阶级过程包括这种剩余产品在其他阶级之间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工人和工业资本家是基础的阶级过程的人格化,而地主、

---

<sup>①</sup> Sandemose 2002, pp. 450 - 65.

<sup>②</sup> 也见他们的预备性研究:Resnick & Wolff 1993、1994a、1994b、1994c、1994d.

<sup>③</sup> Resnick & Wolff 1987, p. 2.

<sup>④</sup> Resnick & Wolff 1987, p. 26.

<sup>⑤</sup> Resnick & Wolff 1987, p. 20.

非生产工人和高级经理是统摄的阶级过程的人格化。<sup>①</sup>

因此，赖斯尼克和沃尔夫通过突出剩余的社会组织状态，称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被他们定义为两个过程的存在和相互作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占有和剩余的分配过程；另一方面，是使国家官员（不如说是私人个体）处在这些剩余的占有者和分配者的阶级地位的过程。<sup>②</sup>

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假设苏联不存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反而存在一个剥削的阶级结构，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和分配的存在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他们声称只存在三种“根本不同类型的剥削的阶级结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而且它们之中的两个，奴隶制和封建主义，肯定在苏联不占统治地位，剩下的资本主义是唯一不同的可能性。<sup>③</sup> 其次，苏联工人面临一种非常类似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构性强制，“除了在剥削条件下受雇于国有企业，工人们从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中‘获得自由’，导致他们‘选择’去出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sup>④</sup>

基于这些思考，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对苏联的历史性崛起和衰落进行了精心的推理演绎。在他们看来，国家资本主义起始于 1917 年的那场革命——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次改良——是从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向另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过渡。<sup>⑤</sup> 正像贝特海姆那样（他的著作曾鼓舞了这些作者），<sup>⑥</sup>他们通过论及领导权意识，从主观上解释了这一发展。

不会去建立阶级概念，不允许传播阶级（作为剩余劳动）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导人是不会去利用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社

① Resnick & Wolff 1987, pp. 109 - 63; 也见 Resnick & Wolff 2002, pp. 51 - 81.

② Resnick & Wolff 2002, p. 85.

③ Resnick & Wolff 2002, pp. 88 - 90.

④ Resnick & Wolff 2002, p. 90.

⑤ Resnick & Wolff 2002, p. 151 - 2.

⑥ Resnick & Wolff 2002, p. xiv, 注释 6.

会中现实地创造的这一真正的革命变化的。在阶级问题上,他们像那些他们寻求去管理的据认为是落后的农民一样,在理论上是欠发达的。<sup>①</sup>

这一新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 1930 年代平均共产主义的阶级结构,和“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持续普遍的私有化阶级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结合起来”<sup>②</sup>。“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下,这个新国家和共产党成功地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更多的工业输出量,工人和产量。”<sup>③</sup>然而,这一发展的出现充满了矛盾冲突:“当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全面压倒了它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和为苏维埃的生存而积累资本的利益时,新经济政策到来了。当新经济政策的矛盾全面压倒了它因为同样目的的利益时,农业集体化到来了”<sup>④</sup>。这是一个尽管短暂,但是“共产主义的阶级结构”逐步明朗化的过程。<sup>⑤</sup>

在后来几十年的过程中,新的积累结构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阻碍生产过程自动化(由机器取代工人)的劳动岗位保障和大量非生产工人(职员、经理等)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对剩余产品的不断增长的迫切要求。“甚至到 1980 年代末,苏维埃国家既无法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攫取足够的剩余,也不可能从其他的阶级结构中汲取足够的剩余,还找不到足以保障其自身生存的其他的国家税收。”<sup>⑥</sup>其结果是在 1917 年已消灭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从根本上表现了 20 世纪的一个更广泛的潮流:

20 世纪上半叶展现了从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

---

① Resnick & Wolff 2002, p. 247.

② Resnick & Wolff 2002, p. 164.

③ Resnick & Wolff 2002, p. 229.

④ Resnick & Wolff 2002, p. 230.

⑤ Resnick & Wolff 2002, pp. 245-7.

⑥ Resnick & Wolff 2002, p. 310.

潮流。其下半叶转向相反的方向。私人资本主义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特殊难题，包括了私人资本主义在占有足够剩余以保障其非阶级的生存条件方面不断增长的困难。这些难题终于导致了危机，解决这些危机经历了从国家调节、国家管理及至国家所有和国家运作的各种资本主义解决方式。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帝国主义日本的右翼版本是专注于军事侵略。在左翼方面，1917年后的苏联则具有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有全球影响的中央集权国家解决方式。在国家调节、国家管理和国家运作的资本主义的1970年代危机引发的相反运动中，国家统制经济的各种解决方式接受了向更多私人资本主义多样形式的转折。后苏联向私人资本主义的转变是最极端的样板。”<sup>①</sup>

**批判。**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认为，赖斯尼克和沃尔夫的研究在方法上是薄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重视生产力，以及因为

马克思的分析不是集中在**谁**占有了这种剩余上，而是在剩余的生产和占有的**社会形式**这一首要问题上，这个问题不可能脱离占有剩余的权力的社会基础问题。剩余不可能独立地形成关于其生产和占有的社会形式的概念，于是，除了分析其生产的社会形式(赖斯尼克和沃尔夫没有提供)，不可能确定是**谁**占有这种剩余。<sup>②</sup>

克拉克强烈否认资本主义是苏联生产的主导社会形式，除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1920年代有这种可能以外。他提出了一系列经验论据：

物品和服务不作为价值生产出来，这样，生产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企业和组织被要求在特定的时间把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发送给其他企业和组织。它们被要求按照中央决定的规范，向它们的工人提供集体消费资料和工资。价格被

<sup>①</sup> Resnick & Wolff 2002, p. 310.

<sup>②</sup> Clarke 2004, p. 357.



附加在物品和服务上,因此,企业和组织能够在名义上形成利润和损耗,但是这些是反映中央计划中物资配置的账面价格,而货币的平衡纯粹是账面的平衡。货币只在支付工资和工人的成本中起重要作用,因为工资、价格和税负再度被调整,以确保物资的平衡。劳动者不能自由迁移,生产部门之间的工资和劳动强度相当多样化,同时,企业和组织之间没有任何竞争,因此,没有产生将劳动时间化约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必要劳动时间依据所装配的特定装备,由中央制订的技术规范来决定,以适应生产力非常不均匀的发展。<sup>①</sup>

亨利·赖希曼(Henry Reichman)依据领导阶层政治意识的缺乏(他们“顶多具有有限效能,肯定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唯物主义者”),思考了对十月革命“失败”的主观解释。<sup>②</sup>然而,

如果共产主义的胜利依靠其领袖命令(赖斯尼克和沃尔夫论证的那类理论诡辩),那么共产主义将只能在比列宁的制度更精英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取得胜利:“懂理论”的那些人将会是柏拉图的哲学王。<sup>③</sup>

##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1933年,托洛茨基已经警告说,“官僚主义不受阻碍的进一步发展”在苏联“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停止,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向下沉沦”。<sup>④</sup>这一预言似乎被1989至1991年的种种事件充分证明。但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家仍然发现,随着苏联的崩溃,他们自己处于艰难的困境中。当时,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

---

<sup>①</sup> Clarke 2004, p. 359.

<sup>②③</sup> Reichman 2004.

<sup>④</sup> Trotsky 1933a, p. 8; 英文版,第115页。

斯大林主义已证明了比托洛茨基曾期望的更持久的稳定，与“正统”观点的认可相比，“蜕化的工人国家”论者认为苏联有更长的生命延续期。为了证明这一修正的正确，大体上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偶然出现的历史发展莫名其妙地延迟了苏联的崩溃，二是苏联的结构比托洛茨基曾经想象的更富有活力。由于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其后苏联经济显著的迅速增长的强烈影响，第二种观点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典型的是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观点，他多年来声称，由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中央计划和国家的外贸垄断，苏联能够发展到可能更高的经济层面。但是，即使他长期以来继续坚持说，在整体上，有计划的苏联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sup>①</sup>他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部分是在迪克亨作品的影响下)“可怕的浪费和不平衡”<sup>②</sup>。因此，在1987年，他把苏联描述为“活力和停滞结合的产物”。

该运动从经济社会的这种成长中产生，即使年复一年地减缓，它仍然在超长时期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它产生的1940年代、1950年代甚至1960年以来，这种增长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停滞是从总体上束缚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制中产生的。这是未来增长的一个障碍。……这是今天主宰着苏联的矛盾。<sup>③</sup>

曼德尔至死都坚持这一历史性的评价。<sup>④</sup>为了解释改革，他用“苏联经济错过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之船”的推理，指出苏联官僚制没有能力推动粗放增长向精密增长转变。后果是戈尔巴乔夫与资本主义更紧密的

① Mandel 1979a, p. 135.

② Mandel 1978c, pp. 147-8. 这是曼德尔著述中的一个长期主题。20多年以前他已经写道：“苏联维持一种或多或少平均节奏的经济增长，计划跟着计划，十年跟着十年，没有过去对未来可能性的重重压制的那种进步……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有规律……被消灭了。”Germain 1956, p. 17.

③ Mandel 1987, p. 8.

④ Mandel 1992, p. 144. 官僚制的管理“劫持了整个经济的一切经济合理性形式”(Mandel 1991a, p. 35)。

合作。<sup>①</sup>

从1980年代中期起,曼德尔也用更广阔的历史比较视角,开始发现了苏联经济的衰落。尤其是,他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古代中国等地)告示一种相似性:

在每个王朝的初始阶段,为了准许扩大再生产(水利灌溉工作、剩余产品的社会化、保障村庄中足够的劳动生产力,等等),这种官僚制的客观作用是保护国家和小农阶级抵制土地贵族的侵犯。……这样,官僚仍然**仰赖于这个国家的专横**,从来不对其地位高枕无忧。……

因此,在每个王朝周期的下半期,往往产生了土地贵族(贵族们)和官僚的融合。官僚们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成为金钱、财富以至土地的老大。……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国家官僚们与土地贵族联姻,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中被破坏;国家权力被削弱;对小农阶级的压迫加剧。小农阶级的收入减少;农业劳动生产力下降;农民成群逃离土地、农民造反、盗贼蜂起、起义变成常态。最后,该王朝垮台。<sup>②</sup>

按照曼德尔的说法,苏联发生了某些相类似的事情。最初,在1929至1950年时期,存在“日用消费品的绝对匮乏”。但是,当时这种短缺被克服了,该官僚制的一个上升部分开始奋力争取“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集中控制”。<sup>③</sup> 因此,中央计划被破坏,而“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增强了。

总之,苏联和同类社会正经历着部分官僚向一个“统治阶级”转

---

① Mandel 1992, p. 145. 在1980年代后期,曼德尔过往的一些支持者(类似于1950年代的伊萨克·多伊彻)开始相信,戈尔巴乔夫领导的部分苏联精英将能够实现一种不需要工人阶级担负中心作用的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因此,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叙述道(Ali 1988, p. xiii):“戈尔巴乔夫代表了苏联精英内部的一种进步的、改良主义的思潮,他们的纲领如果成功,将代表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世界层面的一个极大的成就。……为了保护苏联,戈尔巴乔夫必须完成这场政治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建立在废除苏联官僚制权力赖以安身立命的整个权贵特权制度之上。”

② Mandel 1985, p. 240.

③ Mandel 1985, p. 241.

变的开端，它不是“新官僚统治阶级”，而是老的、众所周知的资本家阶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sup>①</sup>

然而这样一种复辟只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的一次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失败之后，但是，他认为，“这种失败尚未发生。”<sup>②</sup>

彼得·梅因和克莱尔·希思选择了一个与曼德尔不同的视角，引证偶然性的历史性发展，说明为什么托洛茨基的预言仅仅延后半个世纪，就似乎已经实现了。梅因和希思指出，在1936年写完《被背叛的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再也没有作过任何详尽的、系统的苏联分析。但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也就是在1937至1940年时期，“一个控制该经济体的制度”已经实现了“能使斯大林主义比托洛茨基的预言生存得更长久的制度”。<sup>③</sup> 这个制度，正如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描述的：<sup>④</sup>

是以到处创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全权代理人的网络为基础的，这些代理人被授权采取他们认为必需的一切行动，去完成已由政治领导层区分了优先次序的各种计划。这个同样的制度有助于在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得以维持战时生产，在1943年大反攻之前创建了令人震惊的西伯利亚新战争工业。从那以后，在重建阶段，该政权能够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以及通常的现实蓝图），用比1930年代更低的“企业一般管理成本”重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换言之，托洛茨基的构想（官僚制的计划编制所引起的经济混乱最后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经济崩溃将造成苏联政权的垮台），被他似乎一无所知的那些发展抵消了。<sup>⑤</sup>

查托帕迪亚伊辨析了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变异。如

---

① Mandel 1985, p. 241.

② Mandel 1985, p. 242.

③ Main and Heath 1994, p. 159.

④ Harrison 1985.

⑤ Main and Heath 1994, p. 159.

果苏联经济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复辟怎么可能会在“没有生产者的任何大规模抵抗”的情况下产生?<sup>①</sup>

### 第三节 官僚集体主义诸理论

主张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们也开始把这个官僚制的权力和效率视为相对物。虽然先前里齐、伯纳姆等人将苏联解释为一个运行良好、功能顺畅的社会制度,能够在一切方面与资本主义竞争,而现在他们重点强调国内矛盾。

#### 卢恩

1990年,爱沙尼亚哲学家伊洛·卢恩(Eero Loone,生于1935年)指出,苏联是“某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sup>②</sup>其生产力的微弱动力(因此苏联进口了比其出口更多的新技术)和恶性道德冲突同样能说明问题。而且,可在苏联找到大量的前资本主义问题,比如在古拉格(集中营)的奴隶制、在苏联集体农庄农田的徭役(*corvée*)劳动,和与生产资料不相称的封建地租。<sup>③</sup>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种种因素完全可能仍然表现出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即围绕着政治局、党和政府的统治集团。卢恩并未明白无误地说明在他看来应当怎样描述苏联的特点,但是对他来说无论如何是明白无误的:“向资本主义前进在苏联将会是一件好事”。<sup>④</sup>

#### 布伦纳及其批评者

在发表于1989至1991年的一些著述中,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

---

① Chattopadhyay 1994, p. 159.

② Loone 1990, p. 789. 请参阅 Loone 1992, pp. 215 - 31.

③ Loone 1990, pp. 782 - 3.

④ Loone 1990, p. 791.

伦纳(Robert Brenner,生于1943年,他早先因其路径破坏论对那场关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辩论的贡献而闻名)<sup>①</sup>也把苏联描绘为一个表现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性的社会形式。在他看来,相较于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相似,它更像是一个基于强权和腐败混合的旧政权社会”。<sup>②</sup>因此,在政治上他与约瑟夫·卡特等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结盟,后者也曾把苏联的性质描述成反动的。

依照布伦纳,苏联制度的逻辑将会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建立,其中剩余产品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官僚统治阶级努力将社会总剩余最大化,因为“它可利用的社会剩余越大,它就越容易获取它想拥有的任何特殊目标”。<sup>③</sup>为了实现最高产量,这个官僚制被驱动去利用每一个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你拥有生产资料,并且你正要使产量最大化,就不会对剩余的失业大军感兴趣。”<sup>④</sup>其结果是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某一种依附(如莫汉所假定的)。

虽然工人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他们已有就业保障。苏联官僚制常常发现它不可能依它自己的兴趣让人们离职或解雇他们。因此,官僚制不可能像资本所能做的那样,成功地利用工人对失业的依赖,致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该官僚制。

正相反,官僚制必须寻求严格地控制劳动力流动,以至于工人们不可能利用官僚制贪得无厌的要求,使他们的工资由竞争性企业哄抬。因此,工人本来就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融合,官僚制发现难以使他们臣服于管理的统治。反之,苏联官僚制最后必须通过它对武装力量和警察机关的整体控制,迫使这些力量从工人中榨取其剩余。

---

① Aston and Philpin 1985.

② Brenner 1991a, p. 29.

③ Brenner 1991a, p. 27.

④ Brenner 1989, p. 28.

因为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市场,劳动力也不是商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半封建社会”应将它的动力归于它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这个环境迫使统治者对剩余再投资和进行积累。与此同时,这一积累过程在结构上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和它们的经理没有受到激励去响应要求进行革新和生产,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对于这些剩余没有任何发言权,也更不可能从他们的工作中焕发激情。在一个时间段,实质性增长可以靠促使人们从乡村进入城市来实现,但是这种可能性在某一极限上被耗竭穷尽。后来,这个政权又依靠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谋求进一步发展,但是因为在这个制度中实现这种创新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一进程“至多是十分缓慢”地发生了。<sup>①</sup>

同时,由于与资本主义的军事和政治竞争在继续,并由于这一竞争最后依赖于经济生产力,改革最初必然是用尝试“在非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内部学习市场社会的长处”的形式进行的。<sup>②</sup>一旦改革被证明不成功,其替代方式就是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批判。**阿历克斯·科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提出四个观点来回应布伦纳。<sup>③</sup>第一,他认为布伦纳对苏联停滞的解释仍然过于一般化。在这样一个超短的时期(仅仅70年)中恰好发生了什么,从而造成了所谓官僚生产方式的兴旺和衰亡?第二,布伦纳低估了苏联工人自由的匮乏,因为在斯大林主义全盛时期,劳动力的周转是巨大的,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已然存在,工人被配置在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第三,布伦纳低估了斯大林主义的无效率。长期以来,苏联具有的高增长率而生活消费品生产滞后的事实,归因于军事工业的第一优先地位。最后,布伦纳声称运用了一种“抽象的和规范的资本主义理论”,<sup>④</sup>这意味着他不可能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内部可能产生

---

① Brenner 1991a, p. 29.

② Brenner 1989, pp. 28-9.

③ Callinicos 1995, pp. 136-8.

④ Callinicos 1995, p. 139.

“为了军事竞争目的的经济体的国家导向”<sup>①</sup>。

## 芬格

巴里·芬格(Barry Finger)在苏联崩溃以后提出了一个与布伦纳相似的分析。芬格是沙特曼的前支持者尤利乌斯·雅各布森(Julius Jacobson)创立的《新政治学》杂志编辑部的成员。<sup>②</sup> 芬格从以下观点出发：“官僚制的命令经济必然是一个单一通道的制度，由于阻塞了来自下面的一切反馈，它妨碍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sup>③</sup>。这个结构性的缺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制度性的特殊障碍。

因此，只有当巨大的、多重的障碍阻滞了这个制度时，比例失调才会被察觉。但是，归根结底，该经济体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关键依靠能够有效地再利用的大量剩余劳动。没有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官僚计划编制缺乏预见和发现潜在破坏的敏感性。<sup>④</sup>

由此看来，赋予重工业发展持续的优先性是可解释的。

为了弥补这一点，需要大量储备零件、存货、中间产品和半成品，一句话，在一个小时的剩余劳动之前，需要实际消耗大量的社会一般管理费用中的必要劳动。这种情况折射在生产资料部类的膨胀性过度增长中。<sup>⑤</sup>

其含意是经济增长损害了自身基础。经济体发展得越大，“潜在的破坏点”出现得越多，因为“在生产力中出现的每一个实际的百分比增长，结果都比在资本主义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终产值增值更少”。<sup>⑥</sup> 考虑到大部分产品是“低标准的，甚至不能使用的”，显而易见，官僚集体主义

① Callinicos 1995, p. 137.

② 见尤利乌斯·雅各布森纪念文集(1922—2003)，载《新政治学》的“新丛书”，9-3(2003年夏)。

③ Finger 1995, p. 173.

④⑤⑥ Finger 1995, p. 174.



蕴涵了走向危机的趋势。这一危机可能会通过劳动的强化和每年工作时数的增加延缓一些时日,但是这些延伸的扩张形式有其局限性。

不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产量增长是根本脱离和真正关键性地独立于劳动生产力的改善的。当达到集体工作日增加的绝对界限时,剩余劳动的榨取主要是一个被有效地榨干的延伸过程。<sup>①</sup>

抵达这些界限的临界点,依赖于其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农村人口的输入以及经由“帝国主义”方式从其他国家吸收劳动力和物质输入的可能性。在苏联,这一结局已在1980年代被洞悉。特别是中间阶层(包括工厂和企业的经理)造反了,因为他们缺乏政治权力和收到了无法付诸实践的指令。中央部委越分裂,经理们的权力越大。但是,由于缺少一个可行的货币体系和一个具有有效功能的市场,他们不可能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平稳过渡。

在没有来自西方的大规模经济干预的情况下,掌握权力的新人会发现,如果没有对官僚制支柱的严重依赖,他们自己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双腿继续前行。<sup>②</sup>

#### 第四节 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 弗雷迪

英国社会学家、革命共产党<sup>③</sup>的领导人弗兰克·弗雷迪(Frank Füredi,

① Finger 1995, p. 176.

② Finger 1995, p. 178.

③ 革命共产党(RCP),1981年脱离革命共产主义运动(RCT)后组建,后者是在1976年从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RCG)中分裂出来的。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是在被社会主义者国际(现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号称“革命的反对派”的团体开除之后,在1974年建立的。见Freeman 1986, pp. 52-3。在1990年代,革命共产党使自己摆脱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该组织在1997至1998年间正式解散。

生于1947年),在他1986年的《被解秘的苏联》(*The Soviet Union Demystified*)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受希勒尔·迪克亨著作启发的苏联分析。不过,当迪克亨的著作还是由许多零碎的片段组成的时候,弗雷迪提供了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综合分析,试图整合迪克亨的经验观察(关于浪费、阶级,等等)。<sup>①</sup>

在1917年10月以后,革命后的政府曾面临如何才能调节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由于毁灭性的内战和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变得十分尖锐的问题。1921年,政府曾在更多的市场经济体中寻求这个答案,但是新经济政策迅速成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威胁。由于其自身生存的缘故,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从1929年起被迫降低价值规律的影响。统治精英通过消灭市场,获取了统治社会资源的地位。但是,由于贫乏的信息流和不充足的专业技术,这一统治是非常有限的。

苏联工业化取得了成功,不是通过有效率的经济管理,而是通过扫除一切阻挡其道路的社会政治障碍。……按照合理的计划编制,工业化动力缺少了自觉的方向,并显现出更像一种有计划的无政府状态的形式。<sup>②</sup>

“尽管有计划目标,但不是因为这些目标”,出现了生产力的增长。<sup>③</sup>

这里的关键是,废除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恰恰是苏联官僚不断进行较量的问题。

当缺乏经济调节时,苏联社会形态没有走向社会化劳动和引发国内劳动分工的内在趋势。在商品交换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扩大社会劳动分工的机制时,苏联没有对劳动分工进行配置的机制。……

试图使计划经济和成功指标的运用达成一致,只是建立了生

①《扬弃》集团谴责了迪克亨,因为他没能提供一本“苏联的制度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认为这“并非偶然”(Aufheben 1998, p. 32)。弗雷迪的书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批评的反驳。

② Füredi 1986, p. 98.

③ Füredi 1986, p. 99.

产者之中的一种技术统一。不同的生产者作为一种特定的产品相互依赖,赋予苏联的劳动分工一种一致性的外表。但是,技术关系不能代替社会劳动分工。它解决不了社会劳动有效利用的问题,它也不必然导致和谐与合作。这就是为什么从30年代到现在,苏联有一种劳动的技术分工趋于停顿的趋势。<sup>①</sup>

因为没有市场和真正的计划,劳动时间的分配大部分是自发地产生的,这意味着“成功的国家政策是例外,而不是规律”。<sup>②</sup>

个别企业只有成功地削弱了自发性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它们试图取得自身效率的最大化:“所有企业经理的目标都是把他对全面劳动分工的依赖减到最小值,以获得达到中央强制的业绩目标的最好机会。”<sup>③</sup>因此,地方的经理与其他企业签订关于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的不正规协议,实物交易、盗窃和黑市交易是其逻辑结果。

企业根本的好运气依赖于它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投入,而不是依赖于其产出目标的成绩。因此,生产单位趋向于尝试以最小的努力实现目标。企业的整体组织机构以这种保守的方式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实行依靠企业主动性的经济实验。<sup>④</sup>

自发性力量还导致储藏资源、浪费原材料和生产劣质产品:“个别企业的目的是去实现形式上的目标,它不负责销售其产品。”<sup>⑤</sup>

因此,尽管经理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来自中央压力的结果,创新还是产生了。中央官僚体制还可以通过它对物质资源的控制,通过从资本主义的西方进口新技术,通过引进某种物质创新,并通过暴力强制的威胁来影响发展。但是,这样,引导性的经济发展可能性趋于下降,因为从

---

① Füredi 1986, p. 102.

② Füredi 1986, p. 115.

③ Füredi 1986, p. 124.

④ Füredi 1986, p. 117.

⑤ Füredi 1986, p. 127.

1950 年代末以来,经济的增长显然在不断递减。

因为工业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的增加在维持增长中越来越没有效果。更多的投资再也不能取代内在发展动力的缺乏。不仅苏联的投资变得更无效,而且生产的高成本影响到对投资资源利用率的制约。苏联官僚制不可能无限地依靠动员新资源去进行工业投资。除非工业本身产生出进行投资的资源,否则,这种导致危机的趋势将不断加剧。<sup>①</sup>

中央官僚制用改革和执行纪律的措施扭转形势的反复尝试失败了。

在这一制度逻辑中,官僚精英应被视为一种“政治秩序”、一个社会团体,他们的权力具有**直接政治**的性质,而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阶级,因为苏联的社会形态本身阻碍了这种发展。相比而言,工人的确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阶级,但是,这一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因为劳动力不在劳动市场中买卖,并因为工资和生活水平偏离了它们在资本主义下的状况。<sup>②</sup> 弗雷迪提出称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的无产阶级一样,苏联工人除了他们的劳动能力一无所有。然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比,这种劳动能力在苏联不采取商品的形式。”<sup>③</sup>

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发展的专政,并因此可能最容易在不发达国家安身立命。“在资本主义处于其发展进程最落后的地方,斯大林主义似乎是最合乎时宜的”,而“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越发展,斯大林模式就被证明是越不适用的”。例如,“尽管苏联制度可能在中国取得某些成功,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在斯大林主义者接管之前曾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新制度造成了经济衰退”。<sup>④</sup>

在 1989 年,弗雷迪达成了他的结论,即这一官僚制度面临一个致命

---

① Füredi 1986, p. 121.

② Füredi 1986, p. 179.

③ Füredi 1986, pp. 179 - 80.

④ Richards 1989, p. 102.

的两难选择：“除非发生根本变化，苏联体制将面临经济崩溃”，但是，“如果它引进更广泛的市场关系，它将冒四分五裂的危险”。<sup>①</sup> 依照弗雷迪的说法，无论可能产生什么后果，都是无法预料的。

苏联制度的反复无常意味着，该官僚制自身几乎控制不了它自己的命运。不过，如果目前的潮流继续下去，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复辟资本主义和加强效忠于这一资本主义选择的各种势力。潜在的潮流极少直接转化为现实，但是它们指示着种种事件的总方向。<sup>②</sup>

### 迪克亨及其批评者

在 1987 年的文章中，迪克亨维持了他以前的结论，认为苏联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阶级。在他看来，工人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只是使之异化。

首先，工人只有在注册成为受雇者的基础上才能事实上得到他的生活资料，而且每个人必须受雇佣，违者以流亡、监禁和更坏的方式论处。他的教育、医疗、住房、公用设施、公共交通，都是免费的或几乎无成本的，而他的食物和日用消费品，实际上都是直接通过配给形式或间接通过排队获取的。工资只是根据熟练程度名义上有所不同。因此，与他们的成就甚至他们劳动的性质无关，工人得不到奖金，甚至于不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其次，工人保持对其劳动的控制，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出卖对其劳动力的控制。

总之，其结果是工人不得不按照国家指令劳动。他没有是否出卖他的劳动力的选择。他可以在严格规定的界限内转移其雇佣位置，但是，这种移动比对工作本身的不满更不需要劳动力的竞争性出卖。不存在任何失业，所以工人在找工作中也没有真正的竞争。<sup>③</sup>

---

①② Richards 1989, p. 106.

③ Ticktin 1987, p. 17.

因为每个工人“争取他自己的个体价格”，“不可能存在任何抽象劳动”。<sup>①</sup>而且，如果抽象劳动缺位，原子化的“直接依赖”就取而代之。<sup>②</sup>一旦“生产的社会性质通过社会推行它的方式，工人的权力就将是无中介的”，而精英的权力就会被打破。<sup>③</sup>换句话说：

工人能够将他们自己建构为阶级运动的日子，就是那个社会将被推翻的那个日子。并不需要更多的战斗，因为作为这样一场运动的条件，秘密警察的衰落和社会的原子化状态都是为维护剥削的原封不动而存在的最好手段。<sup>④</sup>

迪克亨一再强调他自己的观点，即苏联处在长期危机中，但是，只有工人能够推翻这个制度。在1991年完成、1992年发表的《苏联危机的根源》(*Origins of the Crisis in the USSR*)一书中，他总结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明天就会崩溃。相反，苏联有它自己的能力有限的稳定形式以及它自己的溃败形式。苏联是一个不可能允许反对派存在的政权，因此，它的衰落只能采取该制度瓦解的形式。该制度的各个极点，以至于每个处于对立的和不合作形式的社会群体、派别集团、经济类别的撕裂，就是这种瓦解形式。最后，这种瓦解必须达到一点，即工人将构建他们自己的集体，因此成为一个阶级，并试图为他们自己获得权力。<sup>⑤</sup>

与这一观点前后完全一致，迪克亨并不把苏联的崩溃看作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因为那需要工人的同意，而唯有提出一个给他们更高生活水平的真正前景，他们才会予以同意。东德工人“只要穿越边境到西德”，就能体验到这种实际可能性，<sup>⑥</sup>但是，苏联工人没有这种前景。资本主义关系的实际引进将会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大规模的失业必将被引

① Ticktin 1987, p. 18.

②③④ Ticktin 1987, p. 19.

⑤ Ticktin 1992a, p. 14. “整个制度力量走向其自身的灭亡并被工人推翻。”Ticktin 1992a, p. 87.

⑥ Ticktin 1992a, p. 172.

人,即使苏联工人习惯于充分就业和控制劳动过程。工人显然将会强烈地抵制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竞争性的市场关系必将被建立,这在既定的环境下似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资本市场是假的,所谓自然垄断也将持续下去。公用事业、交通、医疗和教育将既在垄断部门中,也在国有部门中。除了在国际层面上,制造业也不可能形成竞争。汽车、飞机、造船、计算机、电子和消耗资源的工业,全都是西方存在的卡特尔工业的样板,在任何一个国家也只有极少的几个公司。这一观点再度说明,苏联需要真正的自由竞争,以建立质量控制、价格控制和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但是,一个垄断企业或卡特尔将只是保持该制度像现在一样正常运转。苏联不仅需要竞争,而且需要激烈的竞争,从而用它对工人的全面统治去重建资本主义。……不可能引进这样展示的市场,除了回到19世纪。换句话说,它不可能实现。<sup>①</sup>

在写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迪克亭认识到,苏联的瓦解已经产生出“一个软弱的潜在的资产阶级”,<sup>②</sup>但是同时,他坚持他的观点,即没有出现向资本主义的真正过渡。

因为使用物物交换和不对工人支付工资时,价格没有任何意义,而当工人不经常被支付工资并继续像他们在旧制度下一样劳动时,工人不可能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基石建立在有资本家和消灭中央集权计划的旧制度的基础之上。因为后者处于否定的状况,只为我们留下了私有化企业的所有者和金融资本的存在。在现实中,私有化企业和金融资本受到国家和官僚体制的紧紧纠缠。

---

<sup>①</sup> Ticktin 1992a, pp. 174 - 5. 也见 Ticktin 1993, pp. 123 - 30。

<sup>②</sup> Ticktin 2000, p. 28.

如果在纯形式的和表面的意义上看待货币、价格、资本、工资、工资劳动等概念，人们只能称前苏联为国家资本家。毫无疑问的是，全部概念只存在于一个不公平的、高度冲突的和矛盾的形式中。<sup>①</sup>

因此，苏联的崩溃仅只是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瓦解和混合——“进一步瓦解和另一场革命的序幕”。<sup>②</sup>

**批判。**迪克亨在几个方向上受到国家资本主义论支持者的批判。克利夫的支持者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 Molyneux)断言，迪克亨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如果真的如迪克亨断言的，“社会阶级的整个理念不适用于苏联……那么，他正在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苏联”。<sup>③</sup>而如果苏联不存在阶级，也不可能存在阶级冲突。这样的话，那么迪克亨怎么才能够解释一个庞大的压制机器的存在？

按照他的分析，他能够给出的唯一答案是，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多种社会集团(精英、知识分子、工人，等等)之间冲突的产物。但是，如果这一解释对苏维埃国家是有效的，那么，它就打开了通往其他国家无阶级理论的那扇门。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偏离了马克思主义。<sup>④</sup>

① Ticktin 2000, p. 40. 迪克亨的支持者唐纳德·菲尔泽(Donald Filtzer)在1991年已经预测：“苏联经济的任何市场化都将被迫在现存结构的基础上产生，在那里，大规模垄断企业有扭曲计划标准以改善它们的财政形势的长期历史，它们将继续把这一习性简单地带进新经济制度中去。由于生产单位的规模和短缺的可怕持续，将没有任何事情能防止这一点。在这一形势下，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调节者)将会受到严重扭曲和侵蚀。将不存在由独立的、竞争性的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任何‘纯粹的市场’和任何‘纯粹的资本主义’。相反，新私有化企业的腐败及对管理和行政占有的趋势，仍然可能继续下去。”(Filtzer 1991, p. 1002)

② Ticktin 2000, p. 41. 迪克亨将这个失败的过渡置于全球转型期的更广阔背景之中，描述了“旧形式的衰落，既不是被资本主义也不是被社会主义的形式所取代”的特点。也见 Ticktin 1992a, pp. 182-7。

③ Molyneux 1987, p. 131.

④ Molyneux 1987, p. 132.



此外,迪克亨的分析没有摆脱含糊性。他并没有清晰地解释他用“苏联的剥削”指什么,并且没有说到结构上与苏联相似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从东欧到柬埔寨)的性质;他的分析也没有提供“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判定苏联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标准”。<sup>①</sup>最后,迪克亨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因为如果苏联有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现存的全部理由都期望,处于不同情况下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按照一个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运动规律”去发展。

如我们所见,比莫利纽克斯更缺乏批判性的是《扬弃》集团。它同情迪克亨的观点,但是,指责他在某一点上放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迪克亨已说明,苏联工人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他们维持了对使用他们的劳动力的实质性控制。<sup>②</sup>但是,按照马克思,在劳动力(劳动能力)的出卖和在出卖之后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劳动能力的消费)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

苏联工人可以声称对劳动过程有相当大的控制这一事实,并不必然说明他们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是有必要说明,既然国家保障充分就业,工人享有对管理的极其有利的地位,并可以抵制把劳动力完全统摄在劳动过程内部的商品形式中。<sup>③</sup>

## 考克斯

政治科学家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生于1945年)从1974年起就已参加了迪克亨的《批判》月刊,他提出的主题是外交政策——一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本质的理论中几乎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的问题。考克斯的理论出发点是,苏联社会在结构上是不稳定的。他认

---

<sup>①</sup> Molyneux 1987, p. 132.

<sup>②</sup> *Aufheben* 1998, p. 36.

<sup>③</sup> *Aufheben* 1998, p. 40;也参见《扬弃》2000年,第45页。

为，苏联精英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看作“反资本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不如看作是一个基本原理的弱点的后果。

只要它继续遵循它已经追赶不上和无法压倒西方的、有缺陷的经济体制，苏联精英就会始终必须采取实际上已然存在的特别的国外(和国内)措施。一方面，苏维埃的弱点已经迫使苏联精英去寻求与西方的适应融合。这是和平共处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同样的弱点已经推动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减少这一体系努力对抗苏维埃社会制度的诱惑和压力。<sup>①</sup>

只有依托这一背景，才能理解这种明显矛盾的苏联政治。这种政治通常涉及“提前防范”。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惯常支持，应当被看作对西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方式；东欧共产党的“防疫封锁线”旨在削弱西方对苏联的压力；而对反帝运动的惯常支持旨在形成对抗西方的联盟。在一切场合，主要的目的归根结底不是破坏，而是削弱全球资本主义。<sup>②</sup>

## 阿瑟

哲学家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曾在1960年代的第一场争论中认为，苏联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2000年，他把迪克亨和弗雷迪的观点相结合，提出了扩展这一最初分析的分析。<sup>③</sup>阿瑟从形式决定性和实质决定性的差异与辩证联系出发，认为，在苏联，“‘资本’的新陈代谢还没有一个已被确立的替代就被打断了”<sup>④</sup>。一个稳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有机系统，因为，资本形式(“自我定价的价值”)构成对资本内容(一个有其特有的劳动分工的工厂制度和作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的统治等级制)的完美补充。在苏联，资本主义形式被

①② Cox 1987, p. 158.

③ Arthur 2000.

④ Arthur 2000, p. 121.

消灭了,但是其内容仍然保持了下来。

就所涉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在苏联被消灭了。把这个制度说成还拥有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着价格形式和工资形式,但是,这决不代表某些价值的外在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在一个完整的管理制度中是相对固定的。……

然而保留下来的,是**资本的物质化**,即工厂制度。……资本技术的整个人和物的结构被复制了。但是,没有价值标准的客观经济调节器。……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在于,缺少客观的价值调节器,留下了没有弹性的机制,也即没有任何追逐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sup>①</sup>

依照阿瑟的说法,结果是(如布伦纳早已提出的)出现了封建类型的劳动关系:“严格地说,不存在工人与生产条件的分离——苏联的经理与工人的固有联系,正如封建阶层携有它的农奴补偿物。”<sup>②</sup>因此,该制度包含了对资本的否定,而不是对资本的取代。不存在任何有机的社会结合,因此,也不存在任何生产方式。

## 贝伦斯

弗里茨·贝伦斯(Fritz Behrens, 1909—1980)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sup>③</sup>作为1950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统计局局长,他在东德的早期经历已使他洞悉了命令经济的无效性。1956年,他在这一背景下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但是,后来他在东德共产党的压力下部分地放弃了他的观点。然而,他在私下一直在撰写持不同观点的手稿。由于政治镇压,他在许多不同的隐匿地点之间转

<sup>①</sup> Arthur 2000, p. 98-9.

<sup>②</sup> Arthur 2000, p. 115.

<sup>③</sup> Steiner 1990, 1992.

移。1990 年代初，贝伦斯去世后十年，他的几个文本才被发表。<sup>①</sup>

受托洛茨基主义、议会共产主义和魏特福格尔的影响，他在研究中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旧的资本主义竞争形式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瓦解，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接踵而来的危机，出现了两个完整的新社会形式：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和东方的国家垄断主义——“资本的集中化和因此对生产的决策权，是**资本主义者**掌握国家和超国家垄断，而社会主义者掌握由一党和国家官僚体制统治的国家；垄断制度和国家垄断制度”<sup>②</sup>。两种变体呈现出同样的等级制精英结构。<sup>③</sup>

苏联社会的这一结构植根于革命前的俄罗斯半亚细亚关系中，但是，同时也体现出现代特点：“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史前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从中可以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但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再是一个过渡社会，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sup>④</sup>

国家垄断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也不是（如巴罗所称）社会主义的准备，而是“向更坏制度的转变”，因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排除了民主化的可能性，把人民降低到婴儿的地位，没有他们自己的发言权。<sup>⑤</sup>

贝伦斯似乎已经对是否应当把这一统治精英定义为一个阶级产生了怀疑。在某一点上，他称精英“在旧的意义上还不是一个阶级”，<sup>⑥</sup>但是，在另一语境中，他谈到两个“基本阶级”，即统治官僚和被统治的生产者，并如此描述他们：

统治官僚有一个存在许多分工的**等级制精英**结构，并且是通过

① Behrens 1990, 1992.

② Behrens 1992, p. 62.

③ Behrens 1992, p. 36.

④ Behrens 1990— I, p. 89.

⑤ Behrens 1992, pp. 96, 245; Behrens 1990— I, p. 89.

⑥ Behrens 1992, p. 85.

许多特权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层化的,这些特权实际上不仅仅是纯粹的物质。长官的特权是对信息的垄断,这是用基于任命和选拔的教育培训制度制造和维系的。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适用“知识就是力量”的规则。……如果没有对为了预防统治权力金字塔内部的反抗倾向的自我控制,该官僚制就没有任何控制。它在所有场合和范围都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指定的。官僚制是非生产性的,它通过对生产者的剥削而生存,但是它的结构在根本方面与只有一个统治阶级的那种等级制精英结构是不同的。

生产者阶级被贝伦斯描述为工业集体工人。这个集体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有剩余价值的外观,它通过出卖劳动力被让渡给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在于,它以“政治权力的有声强制”取代了资本主义典型的“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sup>①</sup>

这种统治阶级或“战略精英”<sup>②</sup>曾经有革命的根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激进目标已经退化为卫道士主义:“列宁主义成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sup>③</sup>这个大转折有如下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上**,恰恰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孤立地存在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主观上**,恰恰因为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在沙皇俄国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而不是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后者对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是成熟的。<sup>④</sup>

这种“社会主义”官僚制权力的形成具有致命的后果。当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像癌瘤一样在整个社会蔓延时,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成就

---

① Behrens 1990—II, p. 41. 在后一页,贝伦斯再度怀疑他的阶级概念:“我们将该问题搁置在一边,即在一个国家建立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官僚是抑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无论如何它是一个……阶层,它有一个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包括那些不适当的权力和特权”(Behrens 1990—II, p. 42)。

② Behrens 1992, p. 35.

③ Behrens 1992, p. 239.

④ Behrens 1992, p. 78.

也被消灭了，正如“奖章的炫耀展览，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僚和军国主义者自己相互奖赏”。<sup>①</sup>与此同时，苏联精英对革命解放运动给予支持，尽管他们并不始终如一。<sup>②</sup>

这一整体发展在历史上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存在建立社会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一种不同的发展发生了。来自于革命主体观点的不良副作用变成了主要作用，并导致了最后的结果。<sup>③</sup>革命主体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贝伦斯看到了两种可能性：可能会产生一个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使官僚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统治阶级；也有可能产生一个基于议会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sup>④</sup>

### 坎佩亚努

坎佩亚努详细阐述了他在以前的三本书中已明确说明过的理论。这一理论成功地检验了苏联类型社会的起源、发展和衰落。<sup>⑤</sup>在这些书中，融合概念占据了中心地位，现在对这一概念描述如下：

在一个特殊社会的生产力和阶级结构之间，有一种稳定的脱节状况。特别的不是脱节，这在其他社会也可能发生，而是它的稳定性，一种独属于已诞生了预期革命的那些社会的特性。这种脱节，或联系中的断裂，发生在一个社会的最深刻和最基本的层面，但以其明显的形式公开表现为一种功能性障碍，它发生在这种联系的两个术语（所有权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预定调停人中。<sup>⑥</sup>

依照坎佩亚努，斯大林主义的融合，是两种连续的和相反的“非同步

① Behrens 1992, p. 84.

② Behrens 1992, p. 85.

③ Behrens 1992, pp. 62 - 3, 199, 228.

④ Behrens 1992, p. 85, 96, 149.

⑤ Campeanu 1986, 1988, 1990.

⑥ Campeanu 1988, p. 9.

性”的产物。首先,存在着落后状态和在帝国主义时期进行一场同时反封建主义、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尝试的非同步性。<sup>①</sup>其次,预期的非同步性,即列宁主义战略“聚焦于用前工业的社会主义取代反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sup>②</sup>两个过程的结合和稳定导致了斯大林主义之下的一种基于超经济强制的体制,其中经济服从于非经济权力,而生产关系被重构为服从性关系。<sup>③</sup>

这种体制危机仅仅是非同步性的一个新阶段:“预期行动最后慢慢地停止在停滞中”。<sup>④</sup>大量“明确的变化、失败和未解决的危机”渐渐积聚起来,<sup>⑤</sup>迫使该体制修正它的调节机制。这产生了各种新的非同步性,因为“旧结构正在以一种超过正在建构的那些替代结构的迅速步伐被摧毁”。<sup>⑥</sup>

## 第五节 总结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关于苏联的三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官僚集体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似乎都已经衰落了。这些方式都产生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当时苏联社会的国内矛盾不像后来的年代那么明显。像它们的那些在同样的年代酿造的非马克思主义摹本那样,这些理论往往将苏联描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苏联极其迅速的瓦解推动了直截了当的和未被公开承认的理论修正。

与曼德尔、沙特曼、克利夫等人的方法的相对停滞并行,新的解释出现了。一方面,“批判”思潮(迪克亨等人)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联资本主义理论再度复兴,这或多或少是继承了波迪加和贝特尔海姆

---

① 这是 Campeanu 1986 这本书的一个主题。

② Campeanu 1988, p. 7.

③ Campeanu 1988, p. 124.

④ Campeanu 1990, p. 11.

⑤ Campeanu 1990, p. 129.

⑥ Campeanu 1990, p. 134.

的传统，他们通常认为，苏联从来不存在任何**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变体。

在所有的思想潮流中，以下观点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苏联具体体现了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尽管最初成功地广泛运用了工业化和超经济强制的方法，但由于无效率的不断加剧和无法过渡到较程度的增长，它不可能维持它在与“走向全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的经济和军事地位。



## 第八章 代结论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体制中的其他地方进行充分激烈的调整,那么,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论述都可能是适用的。

W. V. 昆内

在前面的章节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光谱和理论片段都得到了检验。我在对苏联本质的理解上曾进行过大量的尝试,其中有些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而大部分缺乏经验基础;有些进行了非常连贯一致和认真审慎的彻底思考,有些则是不合逻辑的和浅薄无知的。它们所共同具有的,不是它们同样丰富的科学内容,这些内容在各种不同的文献中有极大的改变;而是它们共同努力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运用那些借助于(正确地或错误地)或归结于马克思的种种概念,去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者至关重要的一个现象。在随后的章节,首先,我将试图用我提出的历史概括,去确定重要的问题和主题。然后,我将极其详尽地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思想中理论发展整体过程的某些后理论观点。

为了对数年来关于苏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范围有一个(公认的、概括的)印象,我在下面的表格中提交了每个时期原始出版

物的数字：<sup>①</sup>

时 期	出版物数目	总百分比	每一时期年均出版物
1917—1928	28	3.6	2.33
1929—1940	53	6.8	4.42
1941—1956	130	16.6	8.13
1957—1968	63	8.0	5.25
1969—1985	402	51.3	23.65
1986—2004	107	13.7	5.63
总 计	783	100.0	8.90

这一表格并未告诉我们很多。由于一些限定条件，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争论的范围从1917年起逐渐扩大，在1957至1968年间略微衰减，在1968年以后呈爆炸式增长，并从1989年以后再次引人注目地下降了。

一个计算频率更密集的检测认为，在那些特殊时期曾有过发展顶峰。重要年份出现在1938年（关于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的辩论），1941年（沙特曼—伯纳姆—托洛茨基辩论），1947至1948年（围绕伯纳姆的《管理的革命》的辩论），1951至1953年（南斯拉夫论战），1958年（关于吉拉斯的《新阶级》的辩论），1974至1980年（当时许多论述该主题的作品陆续发表）和1990年（大崩溃）。

1917至1956年这一时期辩论范围的扩大初看上去是荒谬的。毕竟，正是在这一时期，本身关心这些问题的群体变得更少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最初曾参与了这一讨论，到最后只有“形形色色的更小的西方左派团体”<sup>②</sup>仍然以某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关心苏联。然而同时，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这个正在缩小的圈子内部，争论变得更激烈了。

<sup>①</sup> 这个表格是在自传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每一条目都使用了该出版物最早的年份。结集出版的文章和由几卷组成的书都作为单独一条收入。

<sup>②</sup> Fehér, Heller & Márkus 1983, p. 8.

在 1956 至 1968 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已经明确,而西方的政治形势并没有进一步推动创新的发展。然而,在 1968 年巴黎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以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相当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出现了,只有这个部分直接继续了那些更古老的思潮的传统。由于 1980 年代这种激进化退潮了,因而对有关苏联的争论的兴趣也衰退了。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看待各种问题。在导论中,我提到了影响关于苏联的理论建立的三个序列的因素:西方的理解、苏联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解释。我还尝试指出,这三种潮流的每一种都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一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两种潮流经历了不稳定的阶段,然后都经历了稳定的和富有活力的发展,而最后,再次经历了与日俱增的不稳定。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解释从一种有限的图式论,通过一种刻板的单线论,发展到一种不断拓宽的多线论。

如果我们在图表上把这三种潮流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大致上得到显示在下面表格中的结果:

时期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	对苏联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解释
1917	不稳定的(衰落)	不稳定的	有限范围的开放
1929		稳定的/有活力的	封闭的
1952	稳定性下降		越来越开放
1956			
1968	危机和崩溃		
1985			
1991	唯一有生机的制度		

认为批判理论的建立是由(1)马克思主义圈子内部的开放和;

(2) 参照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的不稳定所推动的,看起来不无道理。虽然第二个因素试图忽略不断发生的新事件,但恰恰因为那种不稳定性,这些事件才是无法预见的,第一个因素则有可能识别对这些发展进行解释的大量相互争执的假设。

从这一方式看,对于建立关于苏联的批判理论的前提最有利的的是在1917至1929年和1968至1985年,最不利的是居间的那些年。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在1917至1929年间尚未采取其本质上是新的、斯大林主义的结构,那么,恰好是在1968年以后有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变得最为密集,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从1917至2005年的理论发展在四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表现出衰落。

1. 1917至1929年时期,经典的单线论主宰了这一时期,它仅仅根据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是成功的,或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抑或注定是失败的),去分析后革命的社会。

2. 1929至1968年时期,其间紧跟斯大林主义的转型,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一种新社会类型已经在苏联形成。这些年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理论变体:(1)国家资本主义论。(2)蜕化的工人国家论。这二者都相当严密地坚持单线模式。(3)官僚集体主义论。依照这一理论,官僚作为一个新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另则,对第四种方式(“无标签的理论”)的谨慎尝试出现在1940年代初(佩德罗萨、希法亭),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的西德,但是这些尝试依然是相对孤立的,并且再度被遗忘了。

3. 1968至1985年时期,争论在这段时间极大地复兴了,第四种方式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三种旧方式趋于停滞。

4. 1985年后的时期,这期间争论的强度减弱了,而特别的是,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理论数量激增。

**后验性**,第一个阶段(1917至1929年)只是呈现为一个东方过渡时期,因为对于所有后来的辩论来说,这些阶段在1930年代就被确定了。在这个时期,像韦尔、托洛茨基、沃洛尔等人阐明了主导这一讨论的肯定的或否定的主要观点。

本书中所讨论的一些苏联的批判者

	(国家)资本主义论	官僚集体主义论	蜕化的工人 国家论	其 他
1917—1928	高尔特 潘涅库克 鲁尔 柯尔什			考茨基 卢森堡
1929—1941	米亚斯尼科夫 阿德勒 魏格纳 沃洛尔 波洛克	罗拉 韦尔 里齐 伯纳姆 沙特曼 佩德罗萨	托洛茨基	希法亭
1941—1956	格兰迪若/佩瑞特 詹姆斯/杜娜耶夫 斯卡娅 卡斯托里亚迪斯/ 莱福特 克利夫 波迪加	古特曼	曼德尔	斯泰因伯格 赛康 弗勒利克 科夫勒
1956—1968		吉拉斯 库伦/莫扎列夫 斯基		魏特福格尔 罗斯道尔斯基 博泽 马尔库塞
1968—1985	马蒂克 霍姆伯格 贝特尔海姆 迪利奥	斯托扬诺维奇 卡罗 梅洛蒂 范赞/迈奇奥瓦 斯威齐		杜契克 子敏 巴罗 施米德雷尔 迪克亭 /索尼 康拉德 费赫尔等 坎佩亚努
1985—2005	达姆 萨皮尔 查托帕迪亚伊 费尔南德斯 《扬弃》 赖斯尼克/沃尔夫 桑德莫塞	布伦纳 芬格	梅因/希思	弗雷迪 考克斯 贝伦斯

在前几章中,大量理论描述是在缺乏全面理论评估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可能是混乱的),现在,用它们自己的主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方法,看来是适当的。我希望说明,所有“经典”的变体在根本方面都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相冲突,另外,有时与事实背道而驰,或违反了逻辑原理。

首先,让我们来检验许多争论参与者已研究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这一事实,即这些理论家为苏联资本主义形态的建立确定了不同的日期,<sup>①</sup>那么,首先最令人震惊的是,在他们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解释中,他们的差异有多大。在图表上,我们可以区分四种不同的观点:

(1) 大多数理论家强调,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尚未统治社会的工人阶级存在的基础之上。对于一些人,这个特性本身实际上已足以把一个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的(詹姆斯、马蒂克、迪利奥),但是其他一些人补充了另外的标准。因而,沃洛尔提到作为第二个条件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霍姆伯格强调的事实是生产资料被应用于剥削工资劳动者的目的。

(2) 波迪加、贝特尔海姆、查托帕迪亚伊等人强调个别企业之间的分离,它们试图通过“市场合同”去实现它们之间的“利润”和交换物。波迪加认为,这是谈论资本主义的一个合格的条件;贝特尔海姆补充了工资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分离。

(3) 格兰迪若讨论了工资被最小化的资本主义,和被运用于投资和非生产性消费的剩余价值。

(4) 最后,克利夫在受利润最大化激励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格兰迪若的叙述无疑是偏离马克思的理论最远的。毕竟,谈到剩余价值已经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因此牵涉到一个预期理由(逻辑学中的一种逻辑错误,指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译

<sup>①</sup> 如所提到的日期:1929年(克利夫、詹姆斯等)、1936年(达姆)和1955年(早期的贝特尔海姆等人)。使用资本主义术语代替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鲁尔、高尔特、潘涅库克,后期的贝特尔海姆、查托帕迪亚伊、赖斯尼克和沃尔夫)试图回避把1917年看作起点。

者注)。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各种定义当时形成一种传统印象;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写道: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是以该事实为特征的,劳动力,在工人自己的心目中,采取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财产的商品形式;他的劳动经常采取工资劳动的形式。<sup>①</sup>

然而,人们如果将马克思的概念简化成这样一段,就是对他的不公正。毕竟资本主义对他而言是一个复杂的和有活力的制度,工资劳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马克思还提出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先决条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sup>②</sup> 他的观点的实质尤其是指在一个由竞争支配的市场中凭靠资本的商品生产(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普遍化。

依照马克思,竞争因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因而,他在《资本论》中提到“基本的竞争规律,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掌握的、支配一般利润率和由它所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规律”<sup>③</sup>。而在《大纲》中,他写道:

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真正发展。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符合资本本性的东西,被定位为个别资本的外部必要条件;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被定位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部必要条件。资本在其内部施加于彼此、施加于劳动力之上的强制(工人的竞争只是资本之间竞争的另一形式)是作为资本的财富的自由的<sup>同时</sup>是真正的发展。<sup>④</sup>

于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几个“环节”的统一体,其工资劳动只是环节之一。如果接受这一事实,那么,本书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资

---

① Marx 1976, p. 274.

② Marx 1976, p. 473.

③ Marx 1981, pp. 127 - 8.

④ Marx 1973, pp. 650 - 1.

本主义论者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证明苏联存在商业竞争,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摆脱该制度的固有逻辑而产生的商业竞争,因此,无法证明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某些“国家资本主义”解释的支持者通过对比,把工资劳动看作是资本主义定义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条件,这可能要归结于他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有限认识。工资劳动毕竟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讨论的,而竞争只是在**第三卷**中才被更广泛地涉及。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即是否在设想的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一个统治阶级。一些作者在这点上没有表达肯定的观点,而仅仅是否认存在私人资本家,但是,数量很多的作者明确否认俄国资本主义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因此,依照魏格纳、波洛克和波迪加,这样一个阶级完全是缺席的,沃洛尔称该官僚制行使着一个正在缺席的资产阶级的功能,而格兰迪若和佩瑞特提到一个“不成熟的”的资产阶级。这一切再次与马克思的正统理论背道而驰。在他的《大纲》中,马克思在其中论述:

资本和工资劳动者的生产因此是资本的定价过程的一个主要产物。……这被定位在资本的概念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是它自己的产物)给它披上了一件**人格化**的外衣,抑或相同,它们被定位为异化于工人的一种人格化的财产。资本的概念包含资本家。<sup>①</sup>

马克思因此清楚地表明,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必要条件**。

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只有两个代表人物即克利夫和贝特尔海姆采取了与资本主义的正统定义相匹配的方法。两人都认为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两个人都相信存在竞争。贝特尔海姆认为在其国内经

<sup>①</sup> Marx 1973, p. 512. 也见《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劳动的创造赋予了站在劳动对立面的、它自己的意志和人格。……如果人们消灭了资本家,生产资料就不再是资本。”(Marx 1972, p. 296)



济中存在这一竞争,而克利夫认为他可以在国际层面上确认这一竞争。

克利夫的方法迫使他把竞争在本质上简化为军备竞赛:一种关于军事能力的竞争。不过,那仍与正统相冲突。军备竞赛毕竟不涉及为公开的市场生产的主要商品,因此,不可能被认为是基于资本主义竞争的贸易。在马克思的观点中,每个资本都追求让所生产的商品通过商品交易出卖它们去实现价值,而仅仅通过展示它们(或破坏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sup>①</sup> 相比而言,贝特尔海姆的方法将其正统性建立在对现实的否定的基础之上。如斯威齐正确地观察到的,他的论题是与事实相反的,因为苏联的企业是不可能由它们自己决定价格、工资、供应商和接受者的。<sup>②</sup>

最后,我们被迫得出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成功地坚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又与事实相一致。

第二个主要的理论变体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论。我们先前看到,托洛茨基如何将苏联官僚制描述为一个寄生的社会阶层,它从分配领域中,已暂时篡夺了这个工人国家的政治权力。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里再次存在着几个相关的根本问题。

第一,存在着官僚制现象的暂时性质问题。托洛茨基在这个方面的想法展现了清晰的逻辑:俄国工人阶级,由于1917年的胜利在它的记忆中仍然鲜活,对试图掠夺其革命努力果实的精英主义副品将会不屑一顾。即使,万一这种情况当时没有发生,在一段时间以后,老革命的自信心将会渐渐衰退,那么精英将会获得把自己转化成新统治阶级的可能性。人们明显会质疑,在1930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内部,那种“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局”是否还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非常富

---

① “即使商品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超出其成本价格的超额价值,它只是在循环过程中实现的”;“凡是剩余价值资本已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榨干并表现在商品中,在这些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首先必须在循环过程中实现”(Marx 1981, pp. 134 and 966)。

科林尼科斯(Callinicos 1995, p. 137)在这里着重援引这个观点,说明“经济的国家导向是西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普遍特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的观点是,在西方(包括纳粹德国的极端例子),资本之间的竞争在其国内经济中持续延伸。

② 见第六章第一节。

有生命力。<sup>①</sup> 但是,如果曾有那种情况,人们肯定会把托洛茨基的命题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相一致。毕竟,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我们碰到了相似的理念。<sup>②</sup> 然而,问题出现在这时,托洛茨基的理论传人近期写道:“在历史的层面,该问题仍像托洛茨基在 1939 年提出它时一样。但是,其‘时代框架’是错误的。”<sup>③</sup> 因此,托洛茨基观点的力量并未实现,因为最初使《被背叛的革命》的作者意识到他的论题的那种明确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现在被悄悄地排除了,并被抽象的普遍性(“历史的层面”)所取代。

第二,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之间制造了差别。这一差别与马克思相冲突,他始终强调二者都应当被看作一个有内聚力的总体性的组成部分。

在最浅的概念中,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并因此表现为进一步游离和半独立于生产。但在分配以前它不可能是产品的分配,它是:(1) 生产工具的分配;(2) 它是同样关系的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即在不同生产类型中的社会成员的分配。

……为了分析生产而漠视在它内部明显是一个空洞抽象的这种内在的分配;而反过来,产品的分配从形成生产的初始环节的这种分配中理解它自己。<sup>④</sup>

第三个问题是由以下事实引发的:因为托洛茨基只把分配的和寄生的功能归之于该官僚制,并因此否认它有可能植根于生产领域。从正统观点出发,这一理念是不可能维持的。苏联官僚制毕竟领导了企业,并因此也领导了生产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到了这种并列的工作:

当直接生产过程采取社会结合过程的形式,不是简单地表现为

① Trotsky 1931, p. 11; 英译本,第 224 页。

② Rubel 1960.

③ Mandel 1980, p. 62.

④ Marx 1973, p. 96. 事实上,对马克思的正统性的背离不独属于托洛茨基。其他作者已注意到,分配领域自主化的概念,出现在许多受第二国际教诲的理论家中。参见比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的批判分析,载 Stephan 1974。

孤立的单个生产者的劳动时,监督和管理工作不可避免地处处发生。然而,它具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在许多个体合作的所有劳动场所,过程的相互联系和统一必然体现在一种支配意志中,一种不涉及细分的工作反而涉及车间及其活动的总体功能中,正像管弦乐队有指挥一样。**这就是在一切组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履行的生产劳动。**

另一方面……这种监管工作必然产生在以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这种对立越大,这种监管所起的作用就越大。<sup>①</sup>

领导阶层功能的这一双重特性明显也适用于苏联的企业管理,它一方面试图组织生产,同时另一方面含有对工人的压迫。但是很清楚,推理结果肯定是,至少苏联官僚制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是寄生性的,而且执行了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

最后的问题大概同样与正统性无关,但是与逻辑有关。它存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之中。这一分离是合乎逻辑的和理论上一致的,因为工人阶级被看作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但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尽管是这样,奇特的事情是,在一个计划经济中,政治和经济权力恰恰是**不可能**被这样分离的。无论谁解释和监管了计划的执行,并因此具有政治权力,他显然就同时主宰了这一经济体。

如果我们将这些批评意见结合在一起,就显现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部分是非正统的,部分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个变体是各种**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汇集(有一个统治阶级的一种新社会类型)。从马克思的正统性观点看,这一思潮也面临三个根本缺陷。

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困难显然是该理论在**总体上**不符合马克思的框架。大概无须再争论,马克思只构想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可能的类

---

<sup>①</sup> Marx 1981, p. 507(翻译有所更正,并加注黑体——本书作者马歇尔·范·林登)。

型：共产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类型。在资本主义以后可能存在着另一个额外的、完整的历史阶段的理念（韦尔、里齐和伯纳姆），完全是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的。同样，不发达的（“半封建的”或“半亚细亚的”）国家可能经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模式的论点，也不符合他的方法：“较发达的工业国家对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它自己未来的图景”<sup>①</sup>。

第二，这一思潮的主角们，把关于新社会起点的不同日期的讨论搁置一旁<sup>②</sup>，提出了对这一官僚阶级统治基础的相互矛盾的解释。一些人，如韦尔和伯纳姆，认为官僚的权力是基于**经济的**。一些人，如吉拉斯和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应当在**政治领域**寻求权力基础。官僚的权力来自它对国家机器的统治（国家机器在其运行中统治了企业），并不来自对企业本身的直接统治。这在集体的和个体的意义上都是正确的。最后的解释与马克思相违，它的捍卫者往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马克思是从经济权力中演绎出政治权力：

这一特定的经济形式，榨干了其中直接生产者的无偿的剩余劳动，因为它直接来自生产本身，并且反过来作为一种决定因素反作用于生产。然而，在此之上建立了经济共同体的整个形态，来自于生产关系本身，因而同时来自于它的特定的政治形式。它始终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一种始终天然地与劳动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因而与它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它揭示了那个最深处的秘密，即整个社会结构背后隐藏的基础和伴随着它的主权和依赖关系的那种政治形式，简言之，那种与之相应的特定的国家形式。<sup>③</sup>

① 马克思：“第一版序言”，载 Marx 1976, p. 91。马克思提到对于这一主题的一个重要例外：**农村公社**，它在特殊的条件下，能够使俄国跨越中经的资本主义阶段。但也是在这一例子中，马克思显然并没有设想一个向卡罗、梅洛蒂和范赞/迈奇奥瓦意义上的新类型的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是一个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② 发展出两种解释：1917—1921年（伯纳姆、斯威齐等人）和1929年（沙特曼等人）。

③ Marx 1981, p. 927.

第三个难题是,如果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家是正确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在它夺取权力之前并不存在的统治阶级。在马克思的所有相关著述中,假定最初对抗阶级产生于生产关系,然后这些阶级获得了政治意识并在广阔的层面上继续相互展开斗争,最后,在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以前的下层阶级被确立为新统治阶级。在获得权力之前,这个官僚“阶级”仍然包括了大部分知识阶层和“工人贵族”,并且几乎不可能认为已形成了一个与苏联工人阶级对抗的阶级。

因此,与其他两个主要变体相比,“新统治阶级”的理论无法伪装成与马克思的正统性相一致。

这样看来一目了然,苏联社会几乎根本无法用正统的马克思术语进行解释。如果接受苏联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一观点,就几乎无法进行这种分析:人们应当用哪些范畴来分析一个其中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却无法确定其中任何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无论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还是集体的官僚)?因而无法确认该社会的任何一个合乎逻辑的社会经济动力?

“第四种思潮”在这一背景下的出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无标签”的理论在1968年以后的迅速传播和精心阐释,大概不是对这些旧理论的强项和弱点进行系统分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这些新方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了必要的因素,不再争取全面的正统性。在这种意义上,也发生了与马克思的分裂。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旧理论在任何理论发展中都没有任何用处。我也不希望,发现了一种有意义的方向却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效用。在所讨论的这些理论中,亚理论主题和传统主题反复再现,不局限于一种视角。我可以确认其中十一种观点:

1. 布尔什维克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建构了一个**现代化专政**:由于1917年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初的强制性工业化和积累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社会强制,并导致了一个专政政权。我们在阿德勒、科夫勒、罗斯道尔斯基、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马尔库塞、马蒂克、卡

罗、梅洛蒂、范赞与迈奇奥瓦、施米德雷尔和坎佩亚努的著述之中遇到了这一传统主题。

2. 苏联出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相似物：斯大林主义不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体，但在一些方面确实与它强烈地相似。例如，对古典中国社会的分析，在研究苏联社会中最低限度有其启发价值。这一传统主题在斯泰因伯格、弗勒利克、季敏、康拉德/索尼和曼德尔的著述中被发现。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是高尔特、潘涅库克、魏格纳、魏特福格尔等人的观念，即俄国和苏联在传统上属于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

3. 苏联社会是沿着人类历史大道的一种“异化”形态，一种“非嫡出的”现象，一条死胡同。这一传统主题的代表是考茨基、季敏、迪克亭和弗雷迪，而同样的主题将完全也可能包括罗拉和沙特曼。

4. 布尔什维主义和/或斯大林主义是历史上有限的、暂时的现象：在大约数年内，它必须为另一种更持久的形态让路。这一传统主题（接近于刚刚提到的但不同于它的传统主题），是在考茨基、托洛茨基和佩德罗萨的著作中被发现的。<sup>①</sup>

5. 苏联社会包含了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并因此表现出类似于通往一个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传统主题是由里奇、季敏和巴罗连接起来的。

6. 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是同一社会形式的两个变体。这一传统主题（它在极权主义理论中显然也是众所周知的）是在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辩护者（鲁尔、波洛克）中和在一种新生产方式论的辩护者（罗拉、韦尔、里齐、伯纳姆）中被发现的。<sup>②</sup>

7. 在苏联，存在着经济对政治的从属性，或用不同的表述，存在着—

① 对立面——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延续的现象，实际上唯一在1950年代得到过更缺少理论兴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米歇尔·拉普蒂斯(Pablo)的辩护。

② 托洛茨基提到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许多“上层建筑的”相似性，但是同时强调两个政权（资本主义与工人国家）在经济基础中的差异性。见例如，Trotsky 1940a。

个完全自主的国家。这一**传统主题**的代表是希法亭和佩德罗萨、汤马斯和施米德雷尔等人。

8. 统治精英的权力建立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基础上(知识成为统治的基础)。我们在管理阶级理论(韦尔、伯纳姆)中,在赛康、埃盖特、S. Z. 图宾根、艾希维德和凯泽,以及康拉德和索尼的著述中遇到这一**传统主题**。一个有点儿偏常的变体(精英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的一部分)得到巴罗的辩护。

9. 工人在苏联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因为他们最后只能将他们的劳动力提供给一个雇用者,而加上又有劳动的义务,马克思的“自由”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在“不同的剥削者之间”选择的自由消失了。这种**传统主题**在里齐、伯纳姆、古特曼、莫汉和布伦纳等人的著述中被发现。

10. 苏联存在时间越长,低效率的增长越严重,或如一些作者提出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了矛盾。这种传统主题出现在 1970 年代(卡罗,迪克亨、康诺特、费赫尔等人)。<sup>①</sup>

11. 苏联的活力是通过它与西方的竞争而形成的;即使在和平时期,苏联社会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战时经济**(克利夫、萨皮尔)。

这样一些论点也许能够为一种“后马克思的”分析搭建基础。但即使不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仍可以用苏联的崩溃去检测那场崩溃以前已阐明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 1970 年代后期已指明,有关苏联的动力学和阶级性质的不同假设,只能通过“最后结局的**实践**”来最后证实或证伪。然而,他警告说:

当被导入未来历史学家的周密观察时,结局也许看来确认了某一假设,或也许完全是提出了一个新假设。任何这种“确认”,即使它应当产生,也从不可能是完全近似的:历史不是可支配的规律,它不知道任何充分理由。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以别的方式假设,他们

---

<sup>①</sup> 低效率这类主题,除其他人以外,当然更早已由托洛茨基、古特曼和曼德尔提出来了。

也会陷入“合乎逻辑的谬见”(posthoc ergo propter hoc, 原文是拉丁语, 原意是“在此之后, 因而因为此”, 指逻辑上一种可疑的理由类型。——译者注)的错误。<sup>①</sup>

---

<sup>①</sup> Thompson 1978, p. 49.



## 第九章 元理论注释

我现在将试图分析我在元理论层面所描述的这些理论发展；换言之，我将试图阐明一种关于这些理论形态的理论。在这样做时，我受到对科学的更新近的历时性解释的启发。<sup>①</sup> 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为工人运动史中政治话语的发展建立理论模式做一些贡献。

我的出发点是，在这一研究中讨论的这些政治理论类型，对于它们的社会承载者而言是**相对独立的**。这些政治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是**独立的**，即这些理论一经阐明，就受制于某种内在的逻辑。倘若政治理论也履行社会功能（例如它们可以对一个政治集团的社会团结做出贡献），而因此它们“活动的自由”受到限制，它们也是**相对独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是这些政治话语内在结构的外在特征？

和其他的每一种知识结构一样，建立在定义比较明确的概念基础之上的政治话语也同样是正确的。诸如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这些概念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是相当模糊的。我是指，一个既有概念的使用者承认那

---

<sup>①</sup> 当较陈旧的科学理论主要被静态解释的理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科学解释的常规模式）完全占领时，新的科学理论——大约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的产生同时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发展的动态性质。对这一“历时的”新方式的描述，是以 Diederich 1974 为基础的。

些肯定能够或者不能被该概念所涵盖的对象,也承认那些还不清楚是否它们能被包含在这一概念下的对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使用的许多概念直接取自于马克思的著作,虽然使用者归于它的内容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准确赋予它的意义。

概念可能是等价物,或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如果一个概念的能指称之物等同于另一概念的能指称之物,我称两个概念为“相等的”。如果概念 A 的所有能指称之物也是概念 B 的能指称之物,但不是反过来也一样,那么我称 B 比 A 更普遍。<sup>①</sup>

在一种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其概念可能以三种方式持续不断地被其他概念所取代:用一个相等的概念置换,用一个较不普遍的概念去替代(特殊化),或用一个更为普遍的概念去取代(普遍化)。这些变化的每一个都意味着政治理论的一种选择。例如,考虑用相等的“工人阶级”替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或以更具体的“苏联”置换“工人国家”。

由于或多或少的复杂话语得以建构,这些概念构成了基础成分。它们在与这一话语的对象——苏联社会相关的叙述中结合起来。另外,并不是所有属于该话语的叙述都在直接意义上涉及这一对象;也存在更普遍的叙述,这些叙述对该话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我将提出,每一种政治理论都由这些叙述的三个子部分组成,这样,这三个子部分必须而且足以将那种理论从所有其他理论中区分出来。这三个子部分包括:

1. 原理的设立。这属于有着高层次普遍性的各种叙述,被认为可应用于比这一理论所涉及的更多的对象。原理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的命题“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由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sup>②</sup>。这一叙述明显不仅可以运用于 20 世纪的苏联,而且可以运用于工人阶级已存在、存在和将存在的一切其他地方。原理的陈述表现了一个特定的情境,指出—

<sup>①</sup> 我将这个观点归功于 Nowak 1977, p. 101.

<sup>②</sup> Marx 1864, p. 14.

个特定的情境如何才能达成或消除。例如,马克思援引各种提法(假设是两个相关的概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一条件下原初的情境(一个未得到解放的工人阶级)可以被转换成第二种情境(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各种原理也是政治性的,性质上不是“价值自由的”。原理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sup>①</sup>它们在分析上和政治上(道德上)描述对情境的判断。正像原理可以由此得以构建的那些概念,当然也能够用更大或更小的普遍性来阐明,并在那个意义上,用等价物和更一般或更具体的叙述来替代。

2. 观察结论的设立,或在这一背景中同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这一设立,属于被认为去描述这一理论的社会对象的一个特殊观点的叙述。这里不涉及公开裸露的经验,而涉及政治上前虚构的解释。兹纳涅斯基(Znaniiecki)以正当理由写道,“一个凭借自身的事实”,“已经是一个抽象;我们割裂了该具体过程,即至少暂时适应或拒绝所有事实的不确定复杂性过程的某个有限的方面。”<sup>②</sup>因此,不同的政治话语采取不同的观察结论和事实,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当一种理论声称“生产资料在苏联是商品”时,另一种理论会认为这一叙述是与现实相冲突的。

3. 政治内核的设立。这一设立由取自各种观点和原理的结论组成。它们共同构成关于社会目标的叙述,这一目标是该理论的本质。在这个政治内核内,能够比较明确地区别那些解释性叙述。因此,比如毛主义理论的政治内核(如贝特尔海姆的详细阐述)可以总结为三个结论:

(1) 苏联自 1950 年代以来服从于种种资本主义关系,企业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分离,而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2) 苏维埃国家自 1950 年代末以来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

---

① 倘若甚至在“不关心政治的”纯科学理论中能产生这种混合,这就不是例外的。正好提到一个例子: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批评了因为其“表达的模糊性”而被库恩提到的著作:“我们在这里是在用告诉科学家怎么去继续工作的方法论原则来提问吗?或者我们被赋予了一种描述性,一般被称作‘科学的’那些活动,不存在任何价值因素吗?”在我看来,库恩的著作并没有导致一种直截了当的答案。Feyerabend 1970, p. 198.

② Znaniiecki 1919, p.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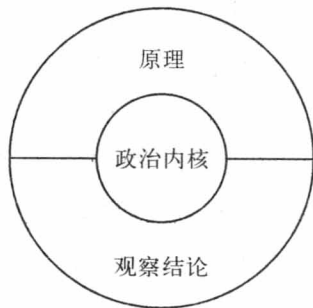
机构。

(3) 一场社会革命必然在苏联发生。

在“理想的”情况下,某一政治话语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各种概念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运用,其论证推理是严密的。显然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在这里这种情况并不比在其他类型的争论中更多:

逻辑一致性(部分的和总体的)也许存在,也许还将继续被忽视,或因为种种理由得不到响应,因为一个人头脑中的所谓相互矛盾,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通过在不同的情境下到处转化这些矛盾,通过对例外、包容和排斥形成特殊的、有时是更普遍的标准,并通过用避免认知困难的种种方式对一种情况的定义提出令人惊异的足智多谋的伦理诡辩,有许多矛盾的个人能活得相当好。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时间和环境通常的安全舱口已被封闭,个人被迫去应付他的种种矛盾。把握科学理论也同样;我们已经学会与科学理论的矛盾共存,这些矛盾部分已经通过解释消除,或者也许还将继续被忽视,或大多数时候不受关注。仅仅是在例外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才变得相互关联,而且差异也彼此相关……<sup>①</sup>

然而假设某种话语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么,其批评者将只可能以间接方式攻击其政治内核。通过这些概念,各种原理和观点因此形成一个环绕其政治核心的防护林带,如下述图表所表征的:



<sup>①</sup> Nowotny 1975, pp. 39 - 40.

想要消灭一种理论的政治内核的批评者,可以采取下述任何一种攻击策略:

1. 质疑该话语中使用的某种概念的适当性。
2. 造成该话语的观点中的明显矛盾。
3. 质疑某些对于该话语来说重要的观察结论的有效性。
4. 引进了新的或替代性的观察结论,但它们无法在该话语中相互兼容和融合。
5. 质疑某些对于该话语来说重要的原理的适用性。
6. 引进新的和替代性的原理,但它们无法在该话语中相互兼容和融合。

如果他们准备好以政治内核的原理去替代或放弃部分观点,处于威胁下的这一话语的支持者将很可能持续地抵御这些攻击。(因此,这种话语的可信程度可能会被质疑,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将在后面讨论。)两种辩护策略向话语的支持者开放:(1)直接免疫性。说明攻击者只是运用不同的概念,和/或宣布新原理和观点是无关的和无效的,借此全部旧话语得以维护。(2)间接免疫性。借此在防护带中的各种叙述被消除或取代。两种策略显然能够结合起来。如果攻击者不挑战话语的一致性,那么直接免疫性是唯一可能的。如果他们(有效地)这么做,那么间接免疫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辩护者看来,如果攻击者正当地挑战某些原理和观点,或用新的原理和观点补充它们,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一个例子可以极好地阐明这个抽象的解释。例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克利夫和第四国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两个原理受到质疑:

**原理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的必要条件。

**原理二:**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瓦解一个工人国家的必要条件。

这两个原理起初被认为互相包含于逻辑必然之中,并共同组成了托洛茨基正统性的一部分。在关于这些原理的争论中,对立的双方用同样的观察结论作为基础。

**观察结论一:**东欧人民的民主制不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结果。

**观察结论二:**东欧人民的民主制,已经变得与1947至1950年时期作为社会结构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观察结论三:**苏联在1917年后的最初年代是一个工人国家。

**观察结论四:**在苏联,1917至1950年时期没有发生过任何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现在,克利夫提出的观点如下所述:

1. 原理一是正确的。
2. 从原理一和观察结论一得出结论:东欧人民的民主制不可能是工人国家(结论一)。
3. 从结论一和观察结论二得出结论: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结论二)。

4. 从结论二和观察结论三得出结论:工人国家的瓦解在1917至1950年期间已经发生了(结论三)。

5. 从结论三和观察结论四得出结论:原理二是不正确的(结论四)。

第四国际的观点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的:

1. 原理二是正确的。
2. 从原理二和观察结论三、观察结论四得出结论:从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肯定是一个工人国家(结论一)。
3. 从结论一和观察结论二得出结论:东欧人民的民主制是工人国家(结论二)。
4. 从结论二和观察结论一得出结论:原理一是不正确的(结论三)。

第四国际通过牺牲原理一,成功地保护了其理论的政治内核(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sup>①</sup> 不过,对于克利夫,原理一要比陈旧的托洛茨基话语的政治内核更为重要。然而,他对原理一的维护导致了原理二的

<sup>①</sup> 与其说原理一并没有被第四国际明确否定,不如说,在工人国家可能通过“来自上层的”干预而建立的意义上(倘若这种干预是由一个工人国家执行的),原理一得以修正。因此,在“结构上同化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缺位,间接地得到了补偿。参见作为1951年第三世界大会上所阐明的第四国际“权威性的”官方立场(Fourth International 1951, 和 Frank 1951)。

牺牲,和一个新政治内核的明确表达(“从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当然,这是一个从对旧政治内核的否定中并非必然地得出的政治内核)。

显然,克利夫通过质疑这个或那个观察结论,也肯定遵循了另一种争论策略。如果是那样的话,某个人肯定坚持了两个原理。的确,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另一些人物而不是克利夫遵循了这一替代策略。<sup>①</sup>

这一策略和抛弃观察结论四直接相关;它声称,在1930年前后,以强制的集体化和强制实行五年计划的形式,的确发生过一次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这个新观点我称之为观察结论四\*。然后,其论证推理采取了下述形式:

1. 原理一**是正确的**。

2. 从原理一和观察结论一得出结论:东欧人民的民主制都不是工人国家(结论一)。

3. 从结论一和观察结论二得出结论: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结论二)。

4. 从结论二和观察结论三得出结论:工人国家的瓦解在1917年和1950年期间已经发生(结论三)。

5. 从结论三和观察结论四得出结论:原理二是正确的。

这些例子提出了为什么一些(一群)人显然无休无止地坚持一个政治内核,并再三准备取代或消除那些观察结论和原理;而另一些(一群)人在一个既定的时刻考虑到,在防护带中的这些牺牲搞得过火了,并因此准备消除这一政治内核本身。很清楚,政治话语的发展进程一方面不是纯偶然的(尤其是,如果争论具有决定性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固有的必然性。在每种情况中,都不存在任何被普遍接受的、能够强制决定一种话语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标准”。

这一结论不可避免地导致如下推理,即理论的发展过程必须同时被

---

<sup>①</sup> 这是1979年7月在伦敦的一次对话中我亲自与克利夫的合作者邓肯·哈洛斯的交流。

视为外部决定性的结果。外部影响能够产生政治内核,然而,被免疫看来不再可靠,并丧失了一切支持,或者导致一个在相对广泛的圈子里迅速流行的新内核。

在这一视角中,并没有产生一种直线的演变,反而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各种话语通过一系列的分支发展起来,其中选择进步的各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忘的方式(“逝去的分支”)在这里可以被重新引入,迄今相互分离的平行线在这里可以结合起来。<sup>①</sup>

为了更靠近地分析这种外部影响的运作,引进社会学概念“调节理念”似乎是有用的。此时是指那种比较明确地叙述的规范要求,即政治话语使用者对这些话语所施加的影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调节理念包括如下:

(1) 该话语必须符合使用者的观点(或在较弱的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冲突)。

(2) 该话语必须符合使用者的原理(或在较弱的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冲突)。

(3) 该话语在使用者心目中没有明显的矛盾。

(4) 该话语必须符合使用者高度评价的政治传统(例如“马克思主义”)(或在较弱的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冲突)。

(5) 该话语必须是在政治上有用的,也就是能够在日常政治现实中定向的。

这一总结并不伪称是全面的。我也不想用它说明,一种政治话语的所有使用者都认为这种调节理念的每一项都有同样的重要性。

调节理念可以沿着两条路线,导致话语的使用者放弃那种话语的政治内核:

第一,被接受的调节理念可能受该话语的免疫性的影响。持续的

<sup>①</sup> 作为一个在纯科学发展上密切关联的景象,见 Bohme, van den Daele & Krohn, 1972, pp. 302 - 16。



免疫性看起来有必要的理由,可能是由于各种理论攻击,或是由于各种新的经验(它们的存在使新的观察结论和原理合并进入这一话语成为必要)。

第二,该话语使用者提出的新调节理念看来是与那种话语(尽管那种话语的确符合早已被接受的调节理念)相冲突的。

## 参考书目

这个参考书目列出了两种类型的出版物。标记 \* 号的是本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它们涉及 1917 年以来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和荷兰语详尽阐述的关于苏联阶级本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种译本和重印本(包括选集)以及只涉及附带主题的出版物没有包括在内。我的目的是追求完整性,然而我明白要完全实现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不标记 \* 号的文本包含理解主要文献的重要信息。

\*Abendroth, Wolfgang 1978, 'Weder Strategie noch- insgesamt-richtige Analyse, aber eine wichtige Quelle zum Problem des gegenwertigen Entwicklungsstadiums des realen Sozialismus', *Das Argument*, 107: 60 - 6.

\*Abosch, Heinz 1970, 'Leo Trotzki und der Sowjetstaat', *Neue Rundschau*, DXXXI, 3: 564 - 78.

\*Abosch, Heinz 1975, *Trotzki und der Bolschewismus*, Basel; Ed. Etcetera.

\*Abramowitsch, R. 1930, '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Russland', *Die Gesellschaft*, II: 532 - 41.

\*Abramowitsch, R. 1932, 'Stalin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Die Gesellschaft*, I: 133 - 47.

\*Abramovitch, Raphael R. 1947, 'From Socialist Utopia to Totalitarian Empire', *Modern Review*, I: 249 - 65; also in *Left*, 130(August): 176 - 82.

Accornero, Aris et al., 1985, *Simone Weil e la condizione operaia*, Rome; Ed. Riuniti.

\*Adler, Alexandre et al., 1978, *L'URSS et nou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Adler, Frank 1985 - 6, 'Rizzi's Honor', *Telos*, 66(Winter): 105 - 9.

\*Adler, Friedrich 1932, 'Das Stalinsche Experiment und der Sozialismus', *Der Kampf*, 25: 4 - 16.

\*Adler, Friedrich 1933, 'Zur Diskussion über Sowjetrussland. Ein 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tsky', *Der Kampf*, 26: 58 - 69.

Adler, Les K. and Thomas G. Paterson, 1970, 'Red Fascism: The Merger of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Totalitarianism, 1930's - 195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 4(April): 1046 - 64.

Ahlberg, René 1976, *Die sozialistische Bürokratie*, Stuttgart: Kohlhammer.

\*Ahlberg, René 1979, *Sozialismus zwischen Ideologie und Wirklichkeit. Die marxistische Systemkritik seit Leo Trotzki*, Stuttgart: Kohlhammer.

\*Alfa[Amadeo Bordiga] 1946, 'La Russia Sovietica dalla rivoluzione ad oggi', *Prometeo*, 1(July): 24 - 38.

Ali, Tariq 1988, *Revolution from Above. Where is the Soviet Union Going?*, London: Hutchinson.

\*Altwater, Elmar 1973, 'Der sozialistische Nationalstaat. Etablierte Gesellschaft oder Übergangserscheinung', *Links*, 50(December): 15 - 8.

\*Altwater, Elmar 1981,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XIII, 1(Spring): 1 - 10.

\*Altwater, Elmar and Christel Neusüss 1969, 'Bürokratische Herrschaft und gesellschaftliche Emanzipation. Zur Dialektik sozioökonomischer Reformen in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 *Neue Kritik*, 51 - 52: 19 - 51.

\*Alvin, Milton 1941a, 'Russia-A Workers' State', *New Internationalist*, VII: 27 - 30.

\*Alvin, Milton 1941b, 'For the Defence of the S. U.', *New Internationalist*, VII: 184 - 7.

Ambrosius, Gerold 1981, *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s und der 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 und des staatsmonopolistischen Kapitalismus*, Tübingen: J. C. B. Mohr(Paul Siebeck).

\*Amin, Samir 1984, 'Expansion or Crisis of Capitalism? (Are the U. S. S. R. and China Capitalist?)', *Contemporary Marxism*, 9: 3 - 17.

\*Amodio, Luciano 1973, 'La rivoluzione bolscevica nell'interpretazione di Rosa Luxemburg', *Annali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89 - 325.

Anderson, Kevin 1988, 'Raya Dunayevskaya, 1910 to 1987, Marxist Economist and Philosoph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 1: 62 - 74.

Anderson, Perry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Perry 1983, 'Trotsky's Interpretation of Stalinism', *New Left Re-*

view, I, 139(May - June): 49 - 58.

\*Andreff, W. 1978, 'Capitalisme d'Etat ou monopolisme d'Etat en URSS? Propos d'étape', in *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planification en système socialiste*, edited by M. Lavigne, Paris: Economica.

\*Andreff, W. 1980, 'L'URSS et eux', *Critique socialiste*, 40: 53 - 67.

\*Andreff, W. 1983 - 4, 'Marxisme en crise cherche sociétés socialistes: à propos des thèses de P. M. Sweezy et de B. Chavance', *Babylone*, 2 - 3: 100 - 24.

\*Anon. 1947, 'The Russian Question Today', *Fourth International* VIII, 9(November-December): 259 - 73.

\*Anon. 1951, 'Answer of SWP to Natalia Trotsky's Letter', *The Militant*, 4 June.

Anon. 1954, 'Cronaca della riunione', *II Programma Comunista*, III - 21 (11 - 25 November).

Anon. 1955a, 'La riunione interfederale di lavoro a Napoli il 24 - 25 aprile', *II Programma Comunista*, IV - 9(7 - 21 May 1955).

Anon. 1955b, 'La grandi questioni storiche della rivoluzione in Russia. La riunione interfederale di Genova del 6 e 7 agosto 1955', *II Programma Comunista*, IV - 15(26 August - 8 September 1955).

\*Anon. 1958, *Milovan Djilas en de nieuwe klasse*, Amsterdam: Spartacusbond.

Anon. 1963, 'Is Yugoslavia a Socialist Country?', *Peking Review*, 27 September.

\*Anon. 1968, *How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Carry Out All-Round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USS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Anon. 1977, 'Bahros "Alternative". Analyse und Kritik', *Spartacus*, 38: 20 - 2.

Anon. 1980, 'Ein Technokrat im Gewand des Propheten: Bhagwan Bahro', *Autonomie*, New Series, 4 - 5.

\*Anon. 1981a, *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in einem unterentwickelten Land. Texte der Menschewiki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und zum Sowjetstaat aus den Jahren 1903 bis 1937*, Hamburg: Junius.

Anon. 1981b, 'Nils Holmberg-ett liv för socialismen', *Marxistisk Forum*, 3: 19 - 25.

Anon. 1987, 'Rae Spiegel (Raya Dunayevskaya) (1910 - 1987)', *Cahiers Léon Trotsky*, 31: 125 - 6.

\*Arato, Andrew 1978, 'Understanding Bureaucratic Centralism', *Telos*, 35 (Spring): 73 - 87.

\*Arato, Andrew 1985, 'Between Reductionism and Relativism: Soviet Society as

a World System', *Telos*, 63(Spring): 178 - 87.

Andrew Arato 1987, 'The Budapest School and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6:593 - 619.

\*Arato, Andrew and Mihaly Vajda 1980, 'The Limits of the Leninist Opposition. Reply to David Bathrick', *New German Critique*, 19(Winter): 167 - 75.

Ardelt, Rudolf G. 1984, *Friedrich Adler: Probleme einer Persönlichkeitsentwicklung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Vienna: Österreichischer Bundesverlag.

\*Ariat, André 1946, 'Le régime soviétique est-il socialiste?', *Masses-Socialisme et Liberté*, 2(15 March): 22 - 4 and 3(June): 20 - 2.

Aron, Raymond 1953, 'La Russie après Staline', *Preuves*, 32(October): 5 - 13.

\*Arthur, Chris J. 1972, 'The Coming Soviet Revolution', in N. Krasso (ed.), *Trotsky-The Great Debate Renewed*, St Louis: New Critics Press.

Arthur, Chris J. 1984, 'What Is Stalinism?', *International*, 9, 1(January-April): 11 - 14.

\*Arthur, Christopher J. 2000, 'Epitaph for the USSR: A Clock Without a Spring', *Critique*, 32 - 33: 91 - 122. [Slightly shortened version in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2.]

Aston, T. H. and C. H. E. Philpin(ed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fheben* 1997, 'What Was the USSR?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eformation of Value under State Capitalism(I)', *Aufheben*, 6(Autumn): 4 - 39.

\**Aufheben* 1998, 'What Was the USSR?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eformation of Value under State Capitalism(II): Russia as a Non-Mode of Production', *Aufheben*, 7(Autumn): 26 - 41.

\**Aufheben* 1999, 'What Was the USSR?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eformation of Value under State Capitalism(III): Left Communism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ufheben*, 8(Autumn): 24 - 44.

\**Aufheben* 2000, 'What Was the USSR?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eformation of Value under State Capitalism(IV)', *Aufheben*, 9(Autumn): 29 - 46.

Avrich, Paul 1984, 'Bolshevik Opposition to Lenin: G. T. Miasnikov and the Workers' Group', *The Russian Review*, 43: 1 - 29.

Badia, Gilbert 1974, 'Rosa Luxemburg und Lenin', in *Rosa Luxemburg oder Die Bestimmung des Sozialismus*, edited by Claudio Pozzol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Bahne, Siegfried 1962, 'Trotsky on Stalin's Russia', *Survey*, 41(April): 27 - 42.

\*Bahro, Rudolf 1977, *Die Alternative.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EVA.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Baran, Paul and Paul 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rot, Jean [Gilles Dauvé] 1972, *Le mouvement communiste (Essai de définition)*, Paris: Champ Libre.

\*Barrot, Jean[Gilles Dauvé] and François Martin 1974,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Detroit: Black & Red.

\*Bartsch, Günter 1962, 'Von Trotzki zu Djilas', *Die Neue Gesellschaft*, IX, 3: 216 - 20.

Bass, Robert and Marbury, Elizabeth(eds.) 1959, *The Soviet-Yugoslav Controversy, 1948 - 58 : A Documentary Record*, New York: Prospect Books.

Bathrick, David 1978,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Rudolf Bahro and Opposition in the GDR', *New German Critique*, 15(Autumn): 3 - 24.

\*Bauer, Otto 1919, 'Karl Kautsky und der Bolschewismus', *Der Kampf*, 12: 661 - 7.

Bauer, Otto 1936, *Zwischen zwei Weltkriegen? Die Krise der Weltwirtschaft, der Demokratie und des Sozialismus*, Bratislava: Eugen Prager.

\*Bayar, Ali 1992, 'La théorie de Marx et le mode de production partitique', *Revue d'études comparatives est-ouest*, 2 - 3(June-September): 211 - 27.

Becker, Gabriel 1978, 'The Left in Hungary', *Critique*, 9(Spring-Summer): 135 - 42.

\*Becker-Panitz, Helmut et al. 1977, "'Realer Sozialismus" und realer Sozialismus. Bedingungen und Chancen einer sozi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n Gesellschaften sowjetischen Typs',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5: 9 - 37.

\*Becker-Panitz, Helmut et al. 1979, *Die Sowjetunion und Europa. Gesellschaftsform und Aussenpolitik der UdSSR*,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Behrens, Fritz 1990, 'Der real existierende Sozialismus', *Utopie kreativ*, 2 (October): 85 - 9 and 3(November): 39 - 44.

\*Behrens, Fritz 1992, *Abschied von der sozialen Utopie*, edited by Hannamaria Loschinski, Berlin: Akademie-Verlag.

\*Bell, Daniel 1958, 'Ten Theories in Search of Reality: The Prediction of Soviet Behavior', *World Politics*, X, 3(April): 327 - 65.

Bell, Daniel 1959, 'The Strange Tale of Bruno R.', *The New Leader*, 28 September: 19 - 20.

Bell, Daniel 1971,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Evolution of an Idea', *Survey*, XVII, 2: 102 - 68.

Bell, Daniel 1988, 'The End of Ideology Revisited(Part I)',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3, 2, Spring: 131 - 50.

\*Bellis, Paul 1979, *Marxism and the U. S. S. R. The Theory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nd the Marxist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Bence, György and Janos Kis 1980, 'On Being a Marxist: A Hungarian View',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80: 263 - 97.

\*Bensaïd, Daniel 1972, 'Révolution socialiste et contre-révolution bureaucratiqu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116 - 49.

\*Bensaïd, Daniel 1980, 'Lecture de Rudolf Bahro-Trois incohérences théoriques et leurs conséquences politiques', *Critique communiste*, 30: 53 - 65.

Beradt, Charlotte 1969, *Paul Levi. Ei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EVA.

Bergman, Jay 1987, 'The Perils of Historical Analogy: Leon Trotsky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73 - 98.

\*Berkhahn, Günter and Rudi Dutschke 1977 - 8, 'Über die allgemeine reale Staatssklaverei. Die Sowjetunion in der russischen Geschichte', *L'76*, 6: 135 - 62 and 9: 64 - 90.

Berle, Adolf and Gardiner 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Bernstein, Howard R. 1981,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Programs', *Studies in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0]: 424 - 49.

\*Bessaignet, Pierre 1947, 'Réponse à une théorie de la bureaucratie nouvell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8(October): 103 - 11.

\*Bettelheim, Charles 1947, 'Une mystification: la "révolution directoral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6(June): 387 - 97.

\*Bettelheim, Charles 1968,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socialiste*, Paris: Maspero.

\*Bettelheim, Charles 1969, 'O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20, 10(March): 1 - 10.

\*Bettelheim, Charles 1970a. *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2 vols., Paris: Maspero.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Forms of Property. An Essay o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Bettelheim, Charles 1970b, 'More on the Society of Transition', *Monthly Review*, 22, 7(December): 1 - 14.

\*Bettelheim, Charles 1971,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Social Classes, and Proletarian Ideology', *Monthly Review*, 23, 6(November): 55 - 76.

\*Bettelheim, Charles 1974,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1917 - 1923)*, Paris: Maspero/Seuil.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First Period, 1917 - 1923*,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Bettelheim, Charles 1977,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1923 - 1930)*, Paris: Maspero/Seuil.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Second Period, 1923 - 193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Bettelheim, Charles 1978, *Questions sur la Chine après la mort de Mao Tse-toung*, Paris: Maspero.

[Bettelheim, Charles 1979], 'Interview mit Charles Bettelheim', in Kommunistischer Bund, *Texte zur Stalinfrage*, Hamburg: Jürgen Reents Verlag.

\*Bettelheim, Charles 1982,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1930 - 1941): Tome premier: Les dominés*, Paris: Maspero/Seuil.

\*Bettelheim, Charles 1983,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1930 - 1941): Tome deuxième: Les dominants*, Paris: Maspero/Seuil.

\*Bettelheim, Charles 1985, 'The Specificity of Sovie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37, 4(September): 43 - 56.

\*Bettelheim, Charles and Gilles Martinet 1948, 'Marxisme et démocrati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20(January - February): 33 - 43.

\*Beyerstedt, Horst-Dieter 1987, *Marxistische Kritik an der Sowjetunion in der Stalinära (1924 - 1953)*,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Big Flame 1980, *The Nature of So-Called Socialist Societies*, London: Big Flam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Binns, Peter 1975,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74(January): 20 - 5. [Revised reprint in Peter Binns, Tony Cliff and Chris Harman, *Russia: From Workers' State to State Capit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87.]

\*Binns, Peter and Duncan Hallas 1976, 'The Soviet Union. State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91(September): 16 - 27.

\*Binns, Peter and Haynes, Mike 1980, 'New Theories of Eastern European Class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7(Winter): 18 - 50.

Birchall, Ian 2003, 'Michael Kidron (1930 - 2003)',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99(Summer): 103 - 13.



\*Biro, B. [Chris J. Arthur] 1969, 'Workers' States-Problems of Transition', *Marxist Studies*, I, 4: 6-20 and 5: 5-17. [Abridged version: C. J. Arthur,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Radical Philosophy*, 3(Winter 1972): 2-9.]

\*Bleibtreu-Favre, Marcel 1951, 'Where Is Pablo Going?', in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I, edited by Cliff Slaughter,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4.

Blick, Karen 1995, 'Adam Westoby', *Revolutionary History*, 5, 4(Spring): 194-5.

\*Blum, Léon 1947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ou révolution directoral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7(January): 1-10. ['Socialist or Managerial Revolution?'], *Modern Review*, I (1947): 118-29.]

Bock, Hans Manfred 1969a,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der FAUD(S), der AAUD und der KAPD*,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Bock, Hans Manfred 1969b,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Holländischen Marxistischen Schule', in Anton Pannekoek and Herman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edited by Hans Manfred Bock, Frankfurt am Main: Neue Kritik.

\*Bögeholz, Hartwig 1978, 'Bahros Klassentheorie', *Prokla*, 33: 147-59.

Böhme, Gernot, Wolfgang van den Daele, and Wolfgang Krohn 1972, 'Alternativen in der 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 4: 302-16.

\*Boella, Laura 1979, 'Ea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Telos*, 41(Autumn): 59-75.

Boggs, Grace Lee 1993, 'Thinking and Acting Dialectically: C. L. R. James, the American Years', *Monthly Review*, 45, 5(October): 38-50.

Boggs, Grace Lee 1998, *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ongiovanni, Bruno 1979, 'Il destino della burocrazie e la dissoluzione del trotskismo', *AnArchos*, 3(Autumn): 221-39.

\*Bongiovanni, Bruno 1982, 'La natura sociale dell' URSS e l'impervia terza via', *Belfagor*, 37, 2(March): 223-32.

\*Bongiovanni, Bruno(ed.) 1975, *L'antistalinismo di sinistra e la natura sociale dell' URSS*, Milan: Feltrinelli.

\*[Bordiga, Amadeo] 1951, 'La controrivoluzione maestra', *Battaglia Comunista*, XIII, 18, 29 August-12 September.

\*[Bordiga, Amadeo]1952a, 'Dialogato con Stalin', *Il Programma Comunista*, I, 1, 10-24 October - I, 4, 20 November - 4 December.

\*[Bordiga, Amadeo] 1952b, 'Il Marxismo dei cacagli', *Battaglia Comunista*, XIII-8(7-30 April).

\*[Bordiga, Amadeo]1952c, 'Le gambe ai cani', *Battaglia Comunista*, XIII-II (20 May-9 June).

[Bordiga, Amadeo] 1953, *Dialogato con Stalin*, Milan: Edizioni Prometeo.

[Bordiga, Amadeo] 1954-5, 'Russia e rivoluzione nella teoria marxista. Rapporto alla riunione interfederale di Bologna', *Il Programma Comunista*, III, 21: 11-25 November 1954-IV: 22 April-6 May 1955.

\*[Bordiga, Amadeo]1955a, 'Struttur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a Russia d'oggi. Rapporto alla riunione di Napoli', *Il Programma Comunista*, IV, 10: 25 May-4 June-IV, 14: 28 July-25 August.

\*[Bordiga, Amadeo] 1955b, 'La Russia nella storia mondiale, nella Grande Rivoluzione e nell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Sintesi della relazioni di Bologna, Napoli e Genova', *Il Programma Comunista*, IV, 15: 26 August-8 September and IV, 16: 9-23 September.

\*[Bordiga, Amadeo] 1955-57, 'Struttur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a Russia d'oggi. Rapporto alla riunioni di Napoli e Genova', *Il Programma Comunista*, IV, 17: 23 September-7 October 1955-V, 4: 18 February-2 March 1956 and V, 11: 18 May-1 June 1956-VI, 12: 6 June-21 June 1957.

\*[Bordiga, Amadeo]1956a, 'Dialogato coi morti: il XX Congresso del Partito Comunista Russo', *Il Programma Comunista*, V, 5: 3-17 March-V, 10: 6-18 May.

\*[Bordiga, Amadeo] 1956b, *Dialogato coi morti*, Milan: Edizioni di 'Il Programma Comunista'.

\*[Bordiga, Amadeo] 1976, *Struttur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la Russia d'oggi*, Milan: Edizioni Il Programma Comunista.

Borgognone, Giovanni 2000, *James Burnham: totalitarismo, managerialismo e teoria delle élites*, Prefazione Bruno Bongiovanni, Aosto: Stylos.

\*Borillin, B. 1929, 'Lenin über die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III: 834-68.

Bornstein, Sam and Al Richardson 1986, *The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th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Britain 1937-1949*, London: Socialist Platform.

\*Boston Study Group 1981, 'More on *The Myth of Capitalism Reborn*', *Monthly Review*, 32, 10(March): 60-2.

\*Bostulo, Pablo 1981, 'Materialismo histórico y "socialismo real": Una critica

de Bahro', *Argumentos*, 41: 55 - 7.

\*Bourdet, Yvon 1969, 'Otto Bauer et la Russie soviétique. Quatre lettres inédites d'Otto Bauer à Karl Kautsk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V**: 468 - 78.

[Bourrinet, Philippe] 1981, *La gauche communiste d'Italie*, Brussels: Courant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

Boyer, Robert 2004,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1. Les fondamentaux*, Paris: La Découverte.

Braunthal, Julius 1965, *Victor und Friedrich Adler. Zwei Generationen Arbeiterbewegung*,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Braverman, Harry 1954, 'Russia and Socialism', *The American Socialist*, **I**, 9(September): 6 - 8.

Braverman, Harry 1967, 'The Successes, the Failures, and the Prospects', *Monthly Review*, 19, 6(November): 22 - 8. [Also in Leo Huberman et al., *Fifty Years of Soviet Pow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Bresciani, Dario 2001, 'Bordiga ou de l'attentisme?', *Cahiers Léon Trotsky*, 75 (October): 23 - 5.

\*Brendel, Cajo 1990, 'Wat voor samenleving schiep de Russische Oktoberrevolutie?', *Daad en Gedachte*, 26, 3(April): 3 - 8 and 26, 4(May): 4 - 8.

\*Brenner, Robert 1989, [no title], *Workers' Liberty*, 12 - 13(August): 28 - 9.

\*Brenner, Robert 1991a,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 The Roots of the Crisis', *Against the Current*, 30(January - February): 27 - 31.

Brenner, Robert 1991b,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I): Nature of the Transition', *Against the Current*, 31(March - April): 40 - 5.

\*Breuer, Stefan 1974, 'Utopie als Affirmation. Bemerkungen zu Rudi Dutschkes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Leviathan*, 2: 572 - 96.

\*Brokmeier, Peter 1974, 'Über die Bedeutung Sohn-Rethels für eine materialistische Theorie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in Osteuropa', in *Übergangsgesellschaft: Herrschaftsform und Praxis am Beispiel der Sowjetunion*, edited by Peter W. Schulz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Brossat, Alain 1980,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hez Rudolf Bahro', *Critique Communiste*, 30: 39 - 51.

Broué, Pierre 1982a, 'Le Mouvement trotskyste en Amérique Latine jusqu'en 1940', *Cahiers Léon Trotsky*, 11(September): 13 - 30.

Broué, Pierre 1982b, 'Sur l'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Tchécoslova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32: 270 - 4.

Brzezinski, Zbigniew K. 1961,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New York: Praeger.

\*Bubis, Mordecai Donald 1988, 'Débat sur la question russe en 1937', *Cahiers Léon Trotsky*, 35(September): 39 - 55.

\*Bucharin, Nikolai 1925, *Karl Kautsky und Sowjetrußland*, Vienna: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Buci-Glucksmann, Christine 1982, 'L'Austro-marxisme face à l'expérience soviétique. Aux origines d'une "troisième voie"?' , in *L'URSS vue de gauche*, edited by Lilly Marco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uckmiller, Michael 1973a, 'Marxismus als Realität. Zur Rekonstruktion der theoretisch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Karl Korsch's',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1: 15 - 85.

Buckmiller, Michael 1973b, 'Zeittafel zu Karl Korsch-Leben und Werk',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1: 103 - 6.

Buckmiller, Michael 1976, *Karl Korsch und das Problem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Historische und theoretische Voraussetzungen seiner ersten Marx-Rezeption (1909 - 1923)*, Hannover: SOAK.

Buckmiller, Michael 1981,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von Paul Mattick 1924 - 1981',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7: 197 - 224.

Buckmiller, Michael and Götz Langkau, (eds.) 1974, 'Karl Korsch: Briefe an Paul Partos, Paul Mattick und Bert Brecht, 1934 - 1939',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2: 117 - 249.

\*Buddeberg, Manfred Paul 1976, 'Wer herrscht in den "nach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und warum? Eine Kritik an Renate Damus', *Prokla*, 22: 125 - 48.

Buhle, Paul(ed.) 1986, *C. L. R. James: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Allison & Busby.

Buhle, Paul 1988, *C. L. R. James. The Artist as Revolutionary*, London: Verso.

\*Buick, Adam 1975, 'The Myth of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Critique*, 5: 59 - 70.

Buick, Adam 1997 - 8, 'Wh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n't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 *New Interventions*, 8, 2(Winter): 7 - 10.

Buick, Adam 2004, 'Introduction', in Rudolf Sprenger, *Bolshevism. Its Roots, Role, Class View and Method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Integer, Sawbridge-worth: Redline.

\*Buick, Adam and John Crump 1986, *State Capitalism: The Wages System under New Management*, London: Macmillan.

[Burnham, James and Joseph Carter] 1937,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Bulletin*, 2.

Burnham, James 1938a, 'From Formula to Reality',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Bulletin*, 5: 11 - 25.

Burnham, James 1938b, 'Roosevelt Faces the Future', *New International*, 4 (February): 43 - 5.

Burnham, James 1939, 'The Future of Roosevelt', *New International*, 5 (September): 26 - 3.

\*Burnham, James 1941,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Busino, Giovanni et al. 1989, *Autonomie et autotransformation de la société: la philosophie militante de Cornelius Castoriadis*, Geneva: Droz.

\*Bust-Bartels, Axel and Georg Stamatis 1975, *Zur Produktionsweise und Theorie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Giessen/Lollar: Achenbach.

Cabaud, Jacques 1960, *L'Expérience vécue de Simone Weil*, Paris: Plon.

\*Caillosse, Jacques 1989, 'La question du Thermidor soviétiqu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Léon Trotsky', *Cahiers Léon Trotsky*, 37 (March): 5 - 85.

\*Callinicos, Alex 1979, 'Maoism, Stalin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5 (Summer): 80 - 8.

\*Callinicos, Alex 1981, 'Wage Labour and State Capitalism: A Reply to Peter Binns and Mike Hayn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12 (Spring): 97 - 117.

\*Callinicos, Alex 1992, 'Rhetoric Which Cannot Conceal a Bankrupt Theory: A Reply to Ernest Mande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57 (Winter): 147 - 60.

Callinicos, Alex 1995,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llinicos, Alex 1996, 'State in Debat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73 (Winter): 117 - 26.

\*Calvin[ps.] 1975, 'Theories of State Capitalism',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1: 6 - 16, [Revised version in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19(1982): 8 - 31.]

\*Camatte, Jacques 1974, 'Bordiga et la révolution russe: Russie et nécessité du communisme', *Invariance*, VII, Second Series, 4.

Camatte, Jacques 1975, 'Introduction', in Amadeo Bordiga, *Structu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ussie d'aujourd'hui: II, Développement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après la Révolution bolchevique*, Paris: Ed. de l'Oubli.

\*Camatte, Jacques 1978a, *Capital et Gemeinwesen. Le 6e chapitre inédit et l'oeuvre économique de Marx*, Paris: Spartacus.

\*Camatte, Jacques 1978b, *Community and Communism in Russia*, London: David Brown.

\*Campeanu, Pavel 1986, *The Origins of Stalinism. From Leninist Revolution to Stalinist Society*, trans. Michael Vale, Armonk: M. E. Sharpe.

\*Campeanu, Pavel 1988, *The Genesis of the Stalinist Social Order*, trans. Michael Vale, Armonk: M. E. Sharpe.

\*Campeanu, Pavel 1990, *Exit. Toward Post-Stalinism*, trans. Michael Vale, Armonk: M. E. Sharpe.

Campeanu, Pavel 2003, *Ceausescu. From the End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Bill 1980,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rxist Theory', in Big Flame 1980.

\*Cannon, James P. 1954, 'Trotsky or Deutscher?', *Fourth International*, XV, 1(Winter): 9 - 16.

Cannadine, David 1984,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0 - 1980', *Past and Present*, 103(May): 131 - 72.

\*Cardorff, Peter [Peter Kulemann] 1976, 'Hegemonialbürokratismus gegen Nationalbürokratismus. Über einige Aspekte des "Internationalismus" der bürokratisierten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Die Internationale*, 9: 101 - 46.

\*Carillo, Santiago 1977, *Eurocomunismo y estado*, Barcelona: Editorial Critica.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Carlo, Antonio 1971, 'La natura socio-economica dell'URSS', *Giovane Critica*, 26(Spring 1971): 2 - 75; reprint in Antonio Carlo, *La natura socio-economica dell'URSS*, Milan: Centro Studi Terzo Mondo, 1975. ['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Telos*, 21(Fall 1974): 2 - 86.]

\*Carlo, Antonio 1972, 'Sulla natura sociale dell'URSS. Riposta a Rizzi e a Melotti', *Terzo Mondo*, 15: 74 - 86.

\*Carlo, Antonio 1980, 'The Crisis of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Telos*, 43(Spring): 3 - 31.

Carlo, Antonio 1989, 'Contradictions of Perestroika', *Telos*, 79(Spring): 29 - 46.

Carlo, Antonio and Umberto Melotti 1977, 'In Memory of Bruno Rizzi', *Telos*, 33(Fall): 142 - 3.

\*Carter, Joseph [Joseph Friedman] 1938,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Bulletin*, 5.

\*Carter, Joseph [Joseph Friedman] 1941,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New International*, 7: 216 - 21.

\*Cartwright, Perry 1980, 'Managerial Society-The Next Stage of Human History', *Monthly Review*, 31, 11(April): 58 - 60.

Castilho, José and Marques Neto 1996, *Mario Pedrosa e o Brasil*, São Paulo: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49, 'Socialisme ou Barbarie', *Socialisme ou Barbarie*, 1(March): 7 - 46. ['Socialism or Barbarism', in Castoriadis 1988.]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3, 'Introduction', in Castoriadis, *La Société Bureaucratique*, I :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n Russie*, Paris: UGE: 11 - 61.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Castoriadis 1988.]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5, 'An Interview with Cornelius Castoriadis', *Telos*, 23(Spring): 131 - 55.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8 - 79, 'The Social Regime in Russia', *Telos*, 38 (Winter): 32 - 47.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88, *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I : *From the Critique of Bureaucracy to the Positive Content of Socialism*, trans. David Ames Curt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hallinor, Raymond 1948, "'State Capitalism"- A New Order', *Left*, 140 (June): 137 - 41.

Challinor, Ray[mond] 1995,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ng Haul', *Workers' Liberty*, 21(May): 27 - 8.

Chattopadhyay, Paresh 1972,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Monthly Review*, 24, 4(September): 12 - 29.

\*Chattopadhyay, Paresh 1981, 'Rise of Social Capitalism in the USS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4: 1063 - 8, 25 - 26; 1103 - 20 and 27: 1157 - 61.

\*Chattopadhyay, Paresh 1983,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Socialism, Bureaucracy or Social Capitalism?', *Revue des Pays de l'Est*, 1 - 2: 199 - 224.

\*Chattopadhyay, Paresh 1987, 'On the Marxian Category of "Competition of Capitals"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Postrevolutionary" Econom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0: 3 - 25.

\*Chattopadhyay, Paresh 1990, 'La dynamique de l'économie soviétique à la lumière de l'analyse marxienne de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Economie appliquée*, 2: 5 - 32.

\*Chattopadhyay, Paresh 1992, 'Economics of Shortage or Specificit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Soviet Case-A Marxian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3: 75 - 121.

\*Chattopadhyay, Paresh 1994, *The Marxian Concept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Westport: Praeger.

\*Chattopadhyay, Paresh 2004, 'The Soviet Question and Marx Revisited: A Reply to Mike Hayn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 2: 111 - 28.

\*Chaulieu, Pierre[Cornelius Castoriadis] 1949,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n Russie', *Socialisme au Barbarie*, 2(May-June): 1 - 66.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Russia', in Castoriadis 1988.]

\*Chaulieu, Pierre[Cornelius Castoriadis] and Claude Montal[Claude Lefort] 1946, 'Sur le régime et contre la défense de l'URSS', *Bulletin Interieur: PCI*, 31 (August). ['On the Regime and Against the Defense of the USSR', in Castoriadis 1988.]

\*Chaulieu, Pierre[Cornelius Castoriadis] and Claude Montal[Claude Lefort] 1947, 'Le problème de l'URSS et la possibilité d'une troisième solution historique', *L'URSS au lendemain de la guerre. Matériel de discussion préparatoire au 11e congrès de la IV<sup>e</sup> Internationale*, III (February). ['The Problem of the USS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Third Historical Solution', in Castoriadis 1988.]

Chaussy, Ulrich 1983, *Die drei Leben des Rudi Dutschke. Eine Biographie*, Darmstadt: Luchterhand.

\*Chavance, Bernard 1977a, 'O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USSR', *Monthly Review*, 29, 1(May): 1 - 13.

\*Chavance, Bernard 1977b, 'Remarques sur la réponse de Paul Sweezy', *Les Temps Modernes*, 375(October): 34 - 9.

\*Chavance, Bernard 1980a, *Le Capital socialiste*, Paris: Le Sycomore.

\*Chavance, Bernard 1980b, 'Une alternative existant réellement? Notes sur le livre de Rudolf Bahro', *Les Temps Modernes*, 412(November): 794 - 808.

\*Chavance, Bernard 1981, 'La nature du système soviétique. Questions et enjeux', *Les Temps Modernes*, 419(June): 2198 - 213.

\*Chavance, Bernard 1983, *Le système économique soviétique*, Paris: Le Sycomore.

\*Chavance, Bernard 1983 - 4, 'Pourquoi le capitalisme étatique? Réponse à "Marxisme en crise cherche sociétés socialistes"', *Babylone*, 2 - 3 (Winter): 126 - 42.

\*Chavance, Bernard 1985, 'Economie et politique dans *La Dictature sur les besoins*', *Les Temps Modernes*, 468 - 469(July-August 1985): 103 - 33.

\*Ciaramelli, Fabio 1987, "'Socialisme ou Barbarie" e la questione sovietica', *MondOperaio*, 40,1: 100 - 6.

\*Ciliga, Ante 1938, *Au Pays du Grand Mensonge. Problèmes et documents*,



Paris: Gallimard. [Anton Ciliga, *The Russia Enigma*, Westport: Hyperion, 1973.]

\*Clarke, George[Bert Cochran] 1953, 'Stalin's Role-Stalin's Future', *Fourth International*, *XV*, 1(January-February): 5-13.

\*Clarke, Simon 1990, 'Crisis of Socialism or Crisis of the State?', *Capital & Class*, 42(Winter), 19-29.

\*Clarke, Simon 1992, 'Priv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New Left Review*, *I*, 196(November-December): 3-41.

\*Clarke, Simon 1993, 'The Crisis of the Soviet System', in Clarke et al., *What About the Workers? Workers and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Verso.

\*Clarke, Simon 2004, 'Resnick and Wolff's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A Research Annual*, 22-A: 355-63.

\*Claudin, Fernando 1978, 'Die Debatte um die Natur des "realen Sozialismus" und ihre politischen Konsequenzen', *Kritik*, 16: 123-7.

\*Clawson, Pat and James Keenan 1979, 'Economism Exposed - Bettelheim o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IX*, 1: 80-8.

Clecak, Peter 1973, *Radical Paradoxes. Dilemmas of the American Left 1945-1970*, New York: Harper & Row.

Clementi, Andreina de 1971, *Amadeo Bordiga*, Turin: Einaudi.

Cless, Olaf 1978, "'Bürokratie" - Anmerkungen zu einem Schlagwort', in *Beiträge zur Sozialismusanalyse*, volume *I*, edited by Peter Brokmeier and Rainer Rilling, Cologne: Pahl-Rugenstein.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47,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A Reply to Germain's "From the ABC to Current Reading: Boom, Revival or Crisis?"',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British Se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ternal Bulletin*, (September). [Reprint in Cliff, 2003.]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48a, 'The Nature of Stalinist Russia', trans. C. Dallas,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British Sec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ternal Bulletin* (June). (Duplicated text, available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Reprint in Cliff 2003.]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48b, 'The Theory of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A Critique', Duplicated document, [Reprint in Cliff 2003.]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50, 'On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in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 edited by Richard Kuiper, London: Pluto Press, 1971.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57, 'Perspectives of 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Socialist Review*, 6, 8(May): 5 - 6.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60,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he Class, or Trotsky on Substitution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2(Autumn): 14 - 26.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64 - 65, 'The End of the Road. Deutscher's Capitulation to Stalin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15(Winter): 10 - 20.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79, 'Tony Cliff Interview', *The Leveller*, September.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1991, 'Balance of Powerlessness', *Socialist Review*, September: 10 - 1.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2000, *A World to Win.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Bookmarks.

Cliff, Tony[Ygael Gluckstein] 2003, *Marxist Theory after Trotsky*,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3, London: Bookmarks.

Cohen, Stephen F. 1975,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 -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Collins, Henry 1961, 'The Case for Left 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6(Autumn): 15 - 19.

\*Colyer, Tom 1947, 'Cork on Russia', *Left*, 133(November): 247 - 50.

\*Colyer, Tom 1948a, 'What Remain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ft*, 136(February): 32 - 6.

\*Colyer, Tom 1948b, 'Our Attitude to Russia', *Left*, 138(April): 73 - 80.

\*Conert, Hansgeorg 1974, 'Zur Diskussion über die Sowjetgesellschaft', *Links*, 52(February): 10 - 3 and 54(April): 7 - 10.

\*Conert, Hansgeorg 1977, 'Zur Kritik der Sowjetgesellschaft', *Links*, 87(April): 15 - 18.

\*Conert, Hansgeorg 1979, 'Über Konstitutionsmerkmale nachkapitalistischer Gesellschaften', *Das Argument*, 117: 716 - 29.

\*Conert, Hansgeorg and Wolfgang Eichwede 1976,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und Arbeiterklasse in der UdSSR*, Hannov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Conférence de fondation de la IVe Internationale. Procès-verbaux de la conférence établis selon les notes prises par un délégué américaine et un délégué français' 1979, *Cahiers Léon Trotsky*, 1: 17 - 57.

Conner, Cliff 1973,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Cold War', in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Part I, New York: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Coolidge, David 1941, 'What is a Workers' State?', *New International*, VII:

116 - 9.

Corey, Lewis[Louis Fraina] 1934,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Covici, Friede.

\*Cork, Jim 1947a, 'The Russian Question', *Left*, 128(June): 134 - 9.

\*Cork, Jim 1947b, 'Ridley on Russia', *Left*, 133(November): 243 - 6.

\*Cork, Jim 1948, 'What Remain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ft*, 137 (March): 49 - 54.

Coser, Lewis 1954, 'But on other terms... ', *Dissent*, 1, 3(Summer): 234 - 41.

\*Cox, Michael 1987, 'Perry Anderson and Leon Trotsky on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Critique*, 20 - 1: 151 - 63.

Cox, Michael 1994, 'Trotsky—His Enemies and Friends and the Soviet Crisis', *Critique*, 26: 149 - 63.

\*Cox, Michael (ed.) 1998,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London: Pinter.

\*Craipeau, Yvan 1938,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et la Contre-Révolution Russe',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June), special issue: 81 - 5.

\*Craipeau, Yvan 1976, 'U. S. S. R. : Comment amorcer le dégel', *Critique socialiste*, 24: 85 - 90.

\*Craipeau, Yvan 1980, 'Trockij e la natura sociale dell'URSS', *Il Ponte*, 36: 11 - 12: 1440 - 61.

\*Croan, Melvin 1962, 'Prospects for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Otto Bauer', in *Revisionism.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edited by Leopold Labedz,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C[lycon], D[ieter] 1952a, 'Die innerpolitischen Tendenzen in Sowjetrußland: Der Sieg der "Neuen Intelligenz"', *Funken*, III, 6(November): 1 - 4.

\*C[lycon], D[ieter] 1952b, 'Klassenstaat oder "Übergang zum Kommunismus"', *Funken*, III, 7(December): 1 - 6.

\*C[lycon], D[ieter] 1953a, 'Wirtschaftliche Perspektiven der Sowjetunion', *Funken*, III, 9(February): 7 - 10.

\*C[lycon], D[ieter] 1953b, 'Russische Probleme', *Funken*, III, 10(March): 9 - 10.

D'Agostino, Anthony 1979, 'Ambiguities of Trotsky's Leninism', *Survey*, 24, 1(Winter): 178 - 203.

\*Dallempagne, Jean-Luc 1972, 'Charles Bettelheim ou l'identification des contraires',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17 - 46.

\*Dallempagne, Jean-Luc 1974, 'La dégénérescence de l'Etat ouvrier', in L. D. Trockij, *La nature de l'URSS*, Paris: La Brèche.

\*Damen, Onorato 1977, *Bordiga: validità e limiti d'una esperienza nella sinistra italiana*, Milan: EPI.

\*Damkjær, Søren 1979a, 'Bettelheim og teorien om overgangssamfundet', *Historievidenskab*, 17: 43 - 64.

\*Damkjær, Søren 1979b, 'Den tyske skoles socialismeanalyse', *Historievidenskab*, 17: 161 - 9.

Damus, Renate 1973, *Entscheidungsstrukturen und Funktionsprobleme in der DDR-Wirt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Damus, Renate 1974a, 'Vergesellschaftung oder Bürokratisierung durch Planung in nach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Leviathan*, 2: 179 - 98.

\*Damus, Renate 1974b, 'Ist die Arbeit im Sozialismus Lohnarbeit? Zum Charakter der Arbeit in den nach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Osteuropas', *Kursbuch*, 38: 92 - 102.

\*Damus, Renate 1976, 'Zur Reproduktion von Herrschaft in nach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Prokla*, 22: 149 - 59.

\*Damus, Renate 1978a, *Der reale Sozialismus als Herrschaftssystem am Beispiel der DDR*, Giessen: Focus.

\*Damus, Renate 1978b, 'Die Intelligenz als Potential des gesellschaftlichen Umwälzungsprozesses im "realen Sozialismus": nach Rudolf Bahro', *Prokla*, 31: 67 - 73.

Daniels, Robert V. 1960,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tta, Satyabratta 1981, 'Sovjetrysslands historiska förutsättningar. En diskussion av Rudi Dutschkes Rysslandanalys och Leninkritik',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XIV*, 3: 46 - 80.

\*Daum, Walter 1990,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alinism. A Resurrection of Marxist Theory*, New York: Socialist Voice.

David, Gérard 2000, *Cornelius Castoriadis: le projet d'autonomie*, Paris: Michalon.

Davy, Marie-Magdaleine 1956, *Simone Weil*, Paris: Ed. Universitaires.

Day, Richard 1973,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y, Richard 1975, 'Preobrazhensky and the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Soviet Studies*, 27, 2 (April): 196 - 219.

De Liagre Böhl, Herman 1973, *Herman Gorter. Zijn politieke activiteiten van 1909 tot 1920 in de opkomende arbeidersbeweging in Nederland*, Nijmegen: SUN.

De Liagre Böhl, Herman 1996, *Met al mijn bloed heb ik voor U geleeft. Herman Gorter 1864 - 1927*, Amsterdam: Balans.

\*Denitch, Bogdan 1979, 'Eurocommunism 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Telos*, 39(Spring): 180 - 91. [Shortened version in *Dissent*, XXVI (Summer 1979): 326 - 30.]

\*Desolre, Guy 1983, 'Commentaire de l'article de P. Chattopadhyay', *Revue des Pays de l'Est*, 1 - 2: 227 - 31.

Deutscher, Isaac 1949,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r, Isaac 1953, *Russia after Stali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Deutscher, Isaac 1954a, 'Réponse aux critiques', *Esprit*, 212(March): 350 - 67.

\*Deutscher, Isaac 1954b, 'The Future of Russian Society', *Dissent*, I, 3 (Summer): 221 - 34.

\*Deutscher, Isaac 1954c, 'Russia: After Lenin and After Stalin', *The American Socialist*, I, 11(November): 25 - 7.

Deutscher, Isaac 1954d,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 - 19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r, Isaac 1955a, 'Russia in Transition', *Dissent*, II, 1(Winter): 23 - 39.

Deutscher, Isaac 1955b, *Heretics and Renegade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Deutscher, Isaac 1959,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 - 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r, Isaac 1963,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 - 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r, Isaac 1967,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 - 19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r, Isaac 1969, 'The Roots of Bureaucracy [Ed. by Tamara Deutscher]', *Canadian Slavonic Studies*, III, 3: 453 - 72.

\*Devaux, Jean 1972, 'Lénine et Trotsky et la transition au socialism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6: 26 - 46.

\*Dévérité, Jules [Leo Kofler] 1951, *Marxistischer oder stalinistischer Marxismus?*, Cologne: Verlag für politische Publizistik.

Dhony, Farrukh 2001, *C. L. R. James; A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Dhoquois, Guy 1972, 'Per una critica dell'esotismo: a proposito di socialismo e di capitalismo di Stato', *Terzo Mondo*, 17: 72 - 8.

\*Dickhut, Willi 1974, *Die Restauration des Kapitalismus in der Sowjetunion*,

Stuttgart: Neuer Weg.

Dickler, Robert A. 1978,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 Alfred Sohn-Rethels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in *Symposium Warenform-Denkform. Zur Erkenntnistheorie Sohn-Rethels*, edited by Heinz D. Dombrowski, Ulrich Krause and Paul Roo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Diederich, Werner (ed.) 1974, *Beiträ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Diner, Dany 1977, 'Geschichtsbewusstsein und Sowjetkritik', *Links*, 91 (September): 16 - 17.

Dingel, Frank 1981, 'Paul Mattick (1904 - 1981)',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7: 190 - 7.

\*Dittrich, Z. R. 1966, 'Wittfogel and Russia. On the Origins of Russian Autocracy',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 53 - 66.

\*Djilas, Milovan 1950, *On New Roads to Socialism.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Pre-Election Rally of Belgrade Students, March 18, 1950*, Belgrade: Jugoslavenska knjiga.

\*Djilas, Milovan 1951, 'Thèmes contemporaines: I, Apparences et essence de l'Union Soviétique', *Questions actuelles du socialisme*, 1 - 2 (March - April): 3 - 78. [Originally: Savremene teme, Belgrado: Borba, 1950.]

\*Djilas, Milovan 1952, 'Class or Caste?', in Djilas, *Parts of a Lifetim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5.

Djilas, Milovan 1956, 'The Storm in Eastern Europe', *The New Leader*, 19 November.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Domanewskaja, Olga 1934 - 5, 'Der soziale Gehalt des Sowjetstaates', *Rote Revue*, 14: 267 - 7.

Draper, Hal 1959, 'Bruno R.', *New Leader*, 12 October: 29.

Draper, Hal 1962, '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Etudes de Marxologie*, 6: 5 - 73.

Draper, Hal 1999, 'Anatomy of the Rizzi Myth', *Workers' Liberty*, 57 (September): 29 - 31.

Drucker, Peter 1994, *Max Shachtman and His Left. A Socialist's Odyssey through the 'American Century'*,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Dubiel, Helmut 1975,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sche Ökonomie', in

Friedrich Pollock, *Stadien des Kapitalismu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Helmut Dubiel, Munich: C. H. Beck.

Ducombs, M. 1972, 'Le sens de réformes dans les économies de transition',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150 - 61.

Düll, Klaus 1975, *Industriesoziologie in Frankreich. Eine historische Analyse zu den Themen Technik, Industriearbeit, Arbeiterklasse*, Frankfurt: EVA.

Dulles, John W. F. 1973, *Anarchists and Communists in Brazil 1900 - 1935*,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Dulles, John W. F. 1983, *Brazilian Communism 1935 - 1945. Repression during World Upheaval*,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Dunayevskaya, Raya[Rae Spiegel] 1944, 'A New Revision of Marxia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3(September): 531 - 7.

Dunayevskaya, Raya[Rae Spiegel] 1945, 'Revision or Reaffirmation of Marxism? A Rejoind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3(September): 660 - 4.

\*Dunayevskaya, Raya[Rae Spiegel] 1958, *Marxism and Freedom. From 1776 until Today*, New York: Bookman.

\*Dunayevskaya, Raya[Rae Spiegel] 1960, 'Bureaucratie et capitalisme d'Etat', *Arguments*, 17: 45 - 7.

\*Dunayevskaya, Raya[Rae Spiegel] 1973, *Russia as State Capitalism*, Detroit: News & Letters.

\*Dunayevskaya, Raya[Rae Spiegel] 1992, *The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News & Letters.

\*Dutschke, Rudi 1974,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Über den halbasiatischen und den westeuropäischen Weg zum Sozialismus. Lenin, Lukács und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 West Berlin: Wagenbach.

\*Dutschke, Rudi 1975, 'Der Kommunismus, die despotische Verfremdung desselben in der UdSSR und der Weg der DDR zum Arbeiteraufstand vom 17. Juni 1953', in Dutschke and Wilke(eds.) 1975.

\*Dutschke, Rudi 1976, 'Antwort auf Schmidt und andere', *Das Argument*, 95: 92 - 106.

\*Dutschke, Rudi 1977, 'Zur Sowjetgesellschaft. Das politisch ungeklärte Problem der Metamorphosen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Links*, 89 (June): 15 - 16.

\*Dutschke, Rudi 1978, 'Wider die Päpste. Die Schwierigkeiten, das Buch von Rudolf Bahro zu diskutieren', in Ulf Wolter(ed.),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Against the

Popes; How Hard It Is to Discuss Bahro's Book',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Sharpe, 1980. ]

Dutschke, Rudi and Manfred Wilke(eds.) 1975, *Die Sowjetunion, Solschenizyn und die westliche Linke*, Reinbek: Rowohlt.

\*Ebbing, Hans 1975a, 'Plan, pris og "profit" i Sovjetunionen',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VIII, 4: 29 - 44.

\*Ebbing, Hans 1975b, 'Ridderne av den røde fane', *Kontrast*, 53: 9 - 27.

\*Ebbing, Hans 1976, 'Til spørsmålet om arbeidskraftens varekarakter', *Vardøger*, 8: 152 - 66.

\*Eggert, Johann 1973, 'Die Sowjetgesellschaft: eine sozialistische Gesellschaft?', *Links*, 45(June): 8 - 10; 46(July - August): 22 - 3 and 47(September): 14 - 9.

\*Eggert, Johann 1974, 'Über den sozialen Antagonismus in der Sowjetgesellschaft', *Links*, 57(July - August): 16 - 19.

Entschiedene Linke 1926, 'Resolution zur Politik und Taktik der KPD und Komintern', *Kommunistische Politik*, 2(April): 2 - 4.

\*Eichwede, Wolfgang 1977, 'Fragen die jeden bewegen. . . und auf die es keine eindeutigen Antworten gibt', in Wolfgang Eichwede, Peter Knirsch and Boris Meissner, *60 Jahre Sowjet-Russland*, Hannover: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Eichwede, Wolfgang and Hans Kaiser 1977, 'Sowjetgesellschaft. Zur bisherigen Diskussion in *Links*', *Links*, 93(November): 22 - 4.

\*Elfferding, Wieland 1979, 'Gibt es in den sozialistischen Ländern Herrschaftsverhältnisse?', *Das Argument*, 117: 730 - 4.

Eliard, Michel(ed.) 1996, *Naville: la passion de la connaissance*,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Toulouse.

\*Elleinstein, Jean 1975, *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ien*, Paris: Bernard Grasset.

Ellenstein, Jean 1979, *Staline, Trotsky, le pouvoir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Julliard.

Engels, Friedrich 1875, 'Letter to August Bebel' dated 18 - 28 March 1875,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5, Moscow: Progress, 1991.

Engels, Friedrich 1878,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5, Moscow: Progress, 1987.

\*Erbe, Günther 1978, 'Klassenantagonismus oder Schichtendifferenzierung. Bemerkungen zu Bahros Analyse der Sozialstruktur des realen Sozialismus', *Prokla*, 31: 57 - 65.

\*Fabrègues, Bernard 1976 - 7, 'Éléments sur les formes spécifiques du capital-



isme en URSS', *Communisme*, 25 - 6(November - February): 4 - 25.

\*Fagerlid, Olav 1974, 'Noen bemerkninger til Sæmund Fiskvik', *Vardøger*, 6: 152 - 8.

\*Fantham, John and Moshe Machover 1979, *The Century of the Unexpected. A New Analysis of Soviet-Type Societies*, London: Big Flame.

\*Farl, Erich 1973, 'The Genealogy of State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2, 1 (Spring): 18 - 23.

\*Farl, Erich 1974, 'Is the U. S. S. R an Imperialist Country?', *International*, II, 3(Summer): 23 - 6.

\*Fehér, Ferenc 1978, 'The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Telos*, 35(Spring): 31 - 42.

\*Fehér, Ferenc 1980, 'Paternalismo e dispotismo in URSS', *Mond Operaio*, XXXIII, 4: 107 - 14.

\*Fehér, Ferenc,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á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An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ejtő, Férenc n. d. [1952], *Histoire des démocraties populaires*, I, Paris: Maspero.

Felix, Vs. 1951, 'Soziale Gegensätze in der UdSSR', *Funken*, I, 11(April): 7 - 9.

Fenwick, J. [Hal Draper] 1948, 'The Mysterious Bruno R. ', *New International*, IV - XV(September): 215 - 18.

\*[Fernandez, Neil] 1989,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Subversion Discussion Paper 1], [Manchester]: no publisher.

\*Fernandez, Neil 1997,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A Marxist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Feyerabend, Paul 1970, 'Consolations for the Specialist',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 e, edited by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ltzer, Donald 1978, 'Preobrazhensk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oviet Transition', *Critique*, 9(Spring-Summer): 63 - 84.

Filtzer, Donald A. 1991,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Marketless Market: Self-Financing in the Soviet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86 - 90', *Soviet Studies*, 43: 989 - 1009.

\*Finger, Barry 1995, 'Russia Before the Deluge: Workers' State or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New Politics*, New Series, 5 - 2(Winter), 168 - 79.

\*Finger, Barry 1997, 'On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New Politics*, New Series, 6 - 3(Summer), 142 - 50.

\*Fisch, William L. 1973,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Monthly Review*, 24, 9(February): 48.

\*Fiskvik, Sæmund 1974, 'Til debatten om utviklinga i Sovjet', *Vardøger*, 6: 137 - 51.

\*Flaherty, Patrick 1990, 'The State and the Dominant Class in the Soviet Perestroika',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2: 253 - 94.

\*Fleischer, Helmut 1978, 'Rudolf Bahros Beitrag zur Philosophie des Sozialismus', in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ile & Wolter: 57 - 82. ['Bahro's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ism',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

\*Fontaine, J. M. 1980, 'Gouverner par la terreur: Staline et les "transitions autoritaires"', *Critique socialiste*, 40: 75 - 85.

\*Forest, F. [Rae Spiegel] 1942 - 3, 'An Analysis of Russian Economy', *New International*, VIII (December 1942): 327 - 32; IX (January 1943): 17 - 22 and IX (February 1943): 52 - 7.

Foster, John Bellamy 2004, 'The Commit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aul M. Sweezy(1910 - 2004)', *Monthly Review*, 56, 5(October): 5 - 39.

\*Fournier, Laurent 1973, 'Capitalisme en Union Soviétique', *Communisme*, 2 (January - February): 50 - 70.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6, 'The New Imperialist Peace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ie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Fourth International*, 9, 6(June): 169 - 83.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7, 'The Russian Question Today', *Fourth International*, 10, 9(November - December): 259 - 73.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9, 'The Evolution of the Buffer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Bulletin*, June.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1, 'Class Nature of Eastern Europe'[Resolution of the Third World Congress, introduced by Pierre Frank], *Fourth International*, 12, 6 (November - December): 198 - 200.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8,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talinism.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Fifth World Congress', *Fourth International*, 1(Winter): 56 - 75.

\*Fox, Michael 1991, 'Ante Ciliga, Trotskii, and State Capitalism: Theory and Tactics, and Re-Evaluation During the Purge Era, 1935 - 1939', *Slavic Review*, 50, 1: 127 - 43.

\*Foxcroft, Helen Charlotte 1938,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The Quarterly Review*, 535: 1 - 14.

\*Franck, Sebastian[Henry Jacoby]1953a, 'Russische Probleme', *Funken*, III, 9(February): 1 - 4.

\*Franck, Sebastian[Henry Jacoby] 1953b, 'Probleme einer marxistischen Analyse der russischen Gesellschaft', *Funken*, IV, 4(September): 57 - 61.

\*Franck, Sebastian[Henry Jacoby] 1958, 'Alte und neue Klassen', *Funken*, IX, 6(June): 86 - 90.

Frank, Pierre 1951, 'Evolution of Eastern Europe'[Report to the 3rd World Congress], *Fourth International*, 12, 6(November - December): 176, 213 - 18.

\*Frank, Pierre 1975, 'Problèmes d'Union soviétique vus d'Union soviétique',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New Series, 20 - 21(Spring): 37 - 44.

\*Frank, Pierre 1977a, "'Novateurs" et "conservateurs" dans la question de l'URSS', in Pierre Frank, *Le stalinisme*, Paris: Masper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supplement of the *Bulletin Intérieur*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July 1947.]

\*Frank, Pierre 1977b, 'Die Klassennatur der Sowjetunion im Lichte ihrer Krisen', in *Entstalinisierung. Der XX. Parteitag der KpdSU und seine Folgen*, edited by Manfred Crusius and Manfred Wil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Frank, Pierre 1977c, *Le stalinisme*, Paris: Maspero.

Frank, Pierre 1978, 'War der "real existierende Sozialismus" historisch notwendig?', in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Was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Historically Necessary?'],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Freeman, Mike 1986, 'The Road to Power', *Confrontation*, 1(Summer): 32 - 89.

\*Frölich, Paul 1952, 'Vom Wege zum Sozialismus', *Funken*, II, 11(April): 9 - 14.

Frölich Paul 1967, *Rosa Luxemburg: Gedanke und Tat*, Frankfurt am Main: EVA.

\*Frölich, Paul 1976, 'Beiträge zur Analyse des Stalinismus. Zwei unveröffentlichte Beiträge aus dem Nachlass',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4: 141 - 58.

\*Frühling, Pierre 1974a, 'Reflexioner kring analysen av övergångssamhällena', *Zenit*, 37: 47 - 61.

\*Frühling, Pierre 1974b, 'Synpunkter på M-L-forbundens "Sovjetanalys"',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VII, 7 - 8: 62 - 76.

\*Frühling, Pierre 1976, 'Nils Holmberg och sovjetanalysen',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IX, 4: 50 - 60.

\*Füredi, Frank 1986, *The Soviet Union Demystified. A Materialist Analysis*, London: Junius.

\*Gandy, Ross 1976, 'More on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7, 10(March): 11 - 14.

\*Gandy, Ross 1977, 'The East European Social Formation', *Monthly Review*, 29, 3(July - August): 82 - 8.

\*García Casals, Felipe [Pavel Campeanu] 1980a, 'Theses on the Syncretic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IX, 2(March): 233 - 60.

García Casals, Felipe [Pavel Campeanu] 1980b, 'Introduction', in García Casals, *The Syncretic Societ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Guy Daniels,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Gardoncini, Giovanni Battista 1978, 'Il sistema sovietica nel dibattito degli austromarxisti', *MondOperaio*, XXXI, 10: 77 - 82.

Garstka, Dietrich and Werner Seppmann 1980, 'Aus der Lebensgeschichte Leo Koflers', in *Marxismus und Anthropologie. Festschrift für Leo Kofler*, edited by Ernst Bloch et al., Bochum: Germinal.

\*Gates, Albert 1941, 'Burnham and his Managers', *New International*, VII: 144 - 8, 175 - 9.

\*Gates, Albert 1958, 'Djilas' Indictment of Stalinism', *New International*, XXIV, 1(Winter): 30 - 5.

Gaudillière, Jean-Paul et al. 2005, 'De l'autogestion ouvrière au mythe de Solidarnosc. Entretien avec Karol Modzelewski', *Mouvements*, 37(January - February): 109 - 18.

\*Geisslinger, Hans 1979,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 Fata Morgana oder historische Realität? Eine Antwort auf Florian Gellerts Essay "Rudolf Bahro und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1: 13 - 27.

\*Gellert, Florian 1978, 'Rudolf Bahro und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3: 26 - 39.

Gerber, John 1989, *Anton Pannekoek and the Socialism of Workers' Self-Empowerment 1873 - 1960*, Dordrecht: Kluwer.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47a, 'De l'A. B. C. à la lecture courante: boom, reprise ou crise?', *Bulletin Intérieur du Secrétariat International*, II, 16(July): 34 - 7.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47b, 'Projet de thèses de la 4e Internationale et le Stalinisme', *Bulletin Intérieur du Secrétariat International*, November.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51a, 'La théorie du "capitalisme d'Etat"',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IX, 5 - 7(May - July): 21 - 33.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51b, 'Zur 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 in

Sowjetrussland', *pro und contra*, 2, 7-8 (July - August) [German version of Germain 1951a.]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51c,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Fourth International*, III, 5 (September - October): 145 - 56 [English version of Germain 1951a.]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51d, 'Nochmals zur Theorie des "russischen" Staatskapitalismus', *pro und contra*, II, 11 - 12 (November - December): 172 - 6.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52, 'Diskussion in der Sackgasse', *pro und contra*, III, 3 - 4 (March - April): 48.

Germain, E. [Ernest Mandel] 1956, 'Le 6e plan quinquennal',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14, 1 - 3 (March): 17 - 21.

\*Germain, Ernest [Ernest Mandel] 1958, 'Prospects and Dynamics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gainst the Bureaucracy', *Fourth International*, 1 (Winter): 75 - 81.

Gilcher-Holtey, Ingrid 1986, *Das Mandat des Intellektuellen. Karl Kautsky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West Berlin: Siedler.

Gillman, Joseph M. 1957,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arx's Law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m*, London: Dennis Dobson.

\*Givsan, Hassan 1978, 'Eine Kritik an Bahros alternativ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A Critique of Bahro's Alternative Writing of History',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Goldman, Albert 1940, *Why We Defe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Goldner, Loren 1991, 'Amadeo Bordiga,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ritique*, 23: 73 - 100.

\*Golubović, Zagorka 1984, 'Why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is Not Socialism', *Praxis International*, 4: 322 - 34.

\*Golubović, Zagorka 1985, 'Logical Fallacies or 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s: Schaff's Arguments on the Socialist Character of "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Praxis International*, 5: 86 - 93.

\*Gomáriz, Enrique 1977, 'La discusión acerca de la URSS', *Zona Abierta*, 9 - 10: 151 - 71.

Goode, Patrick 1979, *Karl Korsch. A Study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Gorman, Robert A. (ed.) 1986,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West-

port: Greenwood Press.

\*Gorter, Herman 1920a, *Offener Brief an den Genossen Lenin*, Berlin KAPD. [*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 London: Wildcat, 1989.]

\*Gorter, Herman 1920b, *De wereldrevolutie*, Amsterdam, J. J. Bos. [*The World Revolution*, trans. H. Mcmillan, Glasgow: Socialist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Bureau, 1920.]

Gottraux, Philippe 1997, '*Socialisme ou Barbarie*': *un engagement politique et intellectuel dans la France d'après-guerre*, Lausanne: Payot-Lausanne.

Gottschalch, Wilfried 1962,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in der Lehre von Rudolf Hilferding*, Wes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Gouldner, Alvin W. 1977 - 8, 'Stalinism: A Stud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elos*, 34(Winter): 5 - 48.

Goutier, Jean-Michel et al. 1982, *Benjamin Péret*, Paris: Ed. Henri Veyrier.

\*Graham, V. 1980, 'Some Notes on Big Flame'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Soviet Type Societies', in *The Nature of So-Called Socialist Societies*, London: Big Flam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Gransow, Volker 1978, 'Jenseits des Stalinismus?', *Das Argument*, 110: 535 - 45.

Gramonte, Concha 1977, 'Esbozo biografico revolucionario de G. Munis', Appendix II in G. Munis, *Jalones de derrota, promesa de victoria. Critica y te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ilbao and Madrid: Edita Zero.

Gras, Christian 1971, *Alfred Rosmer et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international*, Paris: Maspero.

Grebing, Helga(ed.) 1981, *Fritz Sternberg (1895 - 1963). Für die Zukunft des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Otto Brenner Stiftung.

\*Green, Joseph 1998, 'On Walter Daum's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alinism". Competition Among Soviet Enterprises and Ministr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t Voice*, 4, 4(8 December): 31 - 44.

Greffrath, Mathias 1979, 'Die hydraulische Gesellschaft und das Gespenst der asiatischen Restauration. Gespräch mit Karl August Wittfogel', in Mathias Greffrath, *Die Zerstörung einer Zukunft. Gespräche mit emigrierten Sozialwissenschaftlern*, Reinbek: Rowohlt.

\*Grilli, Liliana 1982, *Amadeo Bordiga, capitalismo sovietico e comunismo*, Milan: La Pietra.

Grimshaw, Anna 1989, 'C. L. R. James (1901 - 1989)', *Revolutionary History*, 2 - 3(Autumn): 40 - 2.

\*Grogan, Brian 1971,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State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I, 6(September - October): 29 - 40.

Grossmann, Henryk 1929,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 Leipzig: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Guibeneuf, R. 1948, 'Remarques sur la méthode de J. Burnham',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20(January - February): 49 - 50.

Guillamón Iborra, Agustin 1993, 'Munis, vie et oeuvre d'un révolutionnaire méconnu', *Cahiers Léon Trotsky*, 50(May): 85 - 98.

Gumnior, Helmut and Rudolf Ringguth 1983, *Max Horkheimer*, Reinbek: Rowohlt.

\*Haber Kern, Ernest E. and Arthur Lipow(eds.) 1996, *Neither Capitalism nor Socialism. Theories of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Haferkorn, Katja and Peter Schmalfluss 1988, 'Für die Bolschewiki. Eine bisher unbekannte Arbeit Clara Zetkins vom Jahre 1918',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30: 620 - 31.

Hallas, Duncan 1980, 'Eastern European Class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9(Summer): 128 - 30.

Hallas, Duncan, Raymond Challinor, and Ted Crawford 2000, 'Tony Cliff: Three Appraisals', *Revolutionary History*, 7, 4: 183 - 94.

\*Hamon, Léo 1982, 'Rosa Luxemburg et la révolution russe', in *L'URSS vue de gauche*, edited by Lilly Marco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Hampton, Paul 1999, 'Trotskyism after Trotsky? C'est moi!', *Workers' Liberty*, 55(April): 37 - 9.

\*Hannak, Jacques 1947, 'Die Revolution der Manager', *Die Zukunft*, I: 360 - 4.

Hansen, F. R. 1985, *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arman, Chris 1969 - 70, 'The Inconsistencies of Ernest Mande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41: 36 - 41.

\*Harman, Chris 1977, 'Better a Valid Insight than a Wrong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100(July): 9 - 13.

\*Harman, Chris 1990a, 'The Storm Break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46(Spring): 3 - 93.

\*Harman, Chris 1990b, 'From Trotsky to State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47(Summer): 137 - 56.

\*Harman, Chris 1990c, 'Criticism which Does not Withstand the Test of Logic"',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49 (Winter): 65 - 88. [Also published as 'L'URSS: un capitalisme d'Etat',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37 - 38 (August - September 1990): 55 - 73.]

Harmel, Claude 1973, 'Le marxisme de Lucien Laurat', *Est & Ouest*, New Series, XXV, 515 (16 - 30 September): 15 - 29.

\*Harrer, Jürgen 1978, 'Anmerkungen zu Rudolf Bahro: "Die Alternative"', in *Beiträge zur Sozialismusanalyse*, vol. I, edited by Peter Brokmeier and Rainer Rilling, Cologne: Pahl-Rugenstein.

Harrison, Mark 1985, *Soviet Planning in War and Peace, 1938 - 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ug, Wolfgang Fritz 1979, 'Eurozentrismus bei Bahro und Dutschke', *Das Argument*, 116: 534 - 42.

\*Haumann, Heiko 1974, '5 Thesen zu Johann Eggerts Artikelserie über die Sowjetgesellschaft', *Links*, 53 (March): 17 - 18.

Haupt, Georges et al. (eds.) 1986, *Karl Kautsky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Südosteuropas. Korrespondenz 1883 - 1938*,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Hautmann, Hans 1971, *Die verlorene Räterepublik. Am Beispiel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Österreichs*, Vienna: Europa Verlag.

\*Haynes, Michael 1985, *Nikolai Bukhari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Croom Helm.

\*Haynes, Mike 1987, 'Understanding the Soviet Cri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34 (Winter): 3 - 41.

\*Haynes, Mike 1994, 'The Wrong Road on Russia',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64 (Autumn): 105 - 13.

\*Haynes, Mike 2002, *Russia 1917 - 2000: Class and Power*, London: Bookmarks.

\*Haynes, Mike 2002, 'Marxism 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the Wak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4: 317 - 62.

\*Haynes, Mike 2004, 'Rejoinder to Chattopadhya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 2: 129 - 48.

Haynes, Mike and Pete Glatter 1998, 'The Russian Catastrop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81 (Winter): 45 - 88.

Haynes, Mike and Romy Husan 2002, 'Whether by Visible or Invisible Hand: The Intractable Problem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Catch-Up', *Competition and Change*, 6, 3 (September): 629 - 87.



Hearse, Phil 1983, 'Perry Anderson on Stalinism', *International*, 8, 5 (November - December): 31 - 4.

Hegedüs, Andras 1976, *Socialism and Bureaucracy*, London: Allison & Busby.

Hegedüs, Andras et al. 1976a, *The Humanisation of Socialism. Writings of the Budapest School*, London: Allison & Busby.

Hegedüs, Andras et al. 1976b, *Die Neue Linke in Ungarn*, Vol. 2, Berlin: Merve.

\*Heidt, Ulrich 1979, *Arbeit und Herrschaft im 'realen 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Heidt, Ulrich and Elisabeth Mangeng 1974, 'Parteivergesellschaftung.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Transformationsprozess und nachrevolutionären Gesellschaftsstrukturen in den nachkapitalistischen Ländern sowjetischen Typs', in *Übergangsgesellschaft: Herrschaftsform und Praxis am Beispiel der Sowjetunion*, edited by Peter W. Schulz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Heinz, Rudolf and Jochen Hörisch 2006, *Geld und Geltung. Zu Alfred Sohn-Rethels soziologischer Erkenntnistheorie*,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Heiter, Heinrich 1986, 'Die Veränderung des Konzepts der Volksdemokratie infolge der Bipolarisierung Europas', in *Der Marshall-Plan und die europäische Linke*, edited by Othmar Nikola Haberl and Lutz Niethammer, Frankfurt am Main: EVA.

\*Hellmann, Henry 1953, 'Der russische Popanz', *Funken*, III, 11 (April): 5 - 8.

\*Henein, Georges 1958, 'Bruno R. et la "nouvelle classe"', *Le Contrat Social*, II, 6: 365 - 8.

\*Hennicke, Peter (ed.) 1973,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erer, S. 1978, 'L'URSS, Trotsky, le mode de production bureaucratique', *Dialectiques*, 24 - 25 (Autumn): 58 - 69.

Herrman, Friedrich Georg 1972 - 3, 'Otto Rühle als politischer Theoretiker',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December 1972: 16 - 60 and April 1973: 23 - 50.

Herzberg, Guntolf and Kurt Seifert 2002, *Rudolf Bahro: Glaube an das Veränderbare. Eine Biographie*, Berlin: Links.

\*Heuler, Werner 1977, 'Über Rudolf Bahros Buch "Die Alternative -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1 - 2: 117 - 40.

\*Heuler, Werner 1978, 'Für eine marxisti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ein Diskussionsbeitrag',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3: 4 - 25.

\*Heuler, Werner 1979, 'Zur Diskussion über den Charakter der osteuropäischen Klassengesellschaften',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120 - 43.

Hilferding, Rudolf 1937, 'Letter to Karl Kautsky', 5 November 1937, Kautsky archiv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Hilferding, Rudolf 1940, 'Gosudarstvennyj kapitalizm ili totalitarnoe gosudarstvennoe khoziaistvo?',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459: 92 - 3. ['State Capitalism or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y', *Modern Review*, 1(1947): 66 - 71. ]

\*Hirszowicz, Maria 1976, 'Is there a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 A Comment', *Soviet Studies*, XXVII, 2(April): 62 - 73.

\*Hobson, Christopher Z. and Ronald D. Tabor 1988, *Trotskyism and the Dilemma of Soci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Holmberg, Nils 1974a, *Fredlig kontrarevolution*, Uddevalla: Oktoberförlaget.

Holmberg, Nils 1974b, *Friedliche Konterrevolution*, I, West Berlin: Oberbaum Verlag. [German translation of Holmberg 1974a. ]

\*Horkheimer, Max 1942, 'Autoritärer Staat', in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Aufsätze, Reden und Vorträge 1942 - 1970*, edited by Werner Brede,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Fischer Taschenbuch, 1972.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edited by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t,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

\*Horner, K. [Anton Pannekoek] 1919, 'De groei van het kommunisme', *De Nieuwe Tijd*, VII: 489 - 502.

\*Hosfeld, Rolf et al. 1978, 'Bahros Kommunismus - eine Alternative?', *Das Argument*, 108: 241 - 50.

Howard, M. C. and J. E. King 2004,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Paul Sweez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4(October): 411 - 56.

Howell, John 1981, 'Big Flame: Resituating Socialist Strategy and Organisati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81*: 207 - 20.

\*Howl, Derek 1990, '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USS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49(Winter): 89 - 113.

[Huberman, Leo and Paul Sweezy] 1961, 'The Sino-Soviet Dispute', *Monthly Review*, 13, 8(December): 337 - 46.

[Huberman, Leo and Paul Sweezy] 1963, 'The Split in the Socialist World', *Monthly Review*, 15, 1(May): 1 - 20.

\*Huhn, Willy 1950a, 'Manager - keine soziale Revolution. Die Managergesell-

schaft bei Marx und Burnham', *pro und contra*, 3(January): 15 - 22.

\*Huhn, Willy 1950b, 'Karl Marx gegen den Stalinismus. Was Marx und Engels unter "Kommunismus" verstanden', *pro und contra*, 4(February): 5 - 11.

\*Huhn, Willy 1951, 'Lenins Staatskapitalismus 1917 bis 1922', *Funken*, II, 7 (December): 3 - 9.

\*Huhn, Willy 1952, 'Trotzkis Bonapartismus', *Aufklärung*, II, 2: 89 - 104.

Huhn, Willy 1952 - 3, 'Etatismus, "Kriegssozialismu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Literatur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Aufklärung*, II, 3: 162 - 80 and II, 4 - 6: 264 - 88.

\*Hunter, Bill 1949, 'Is Russia Moving to Communism?', *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 VIII, 1(January - February): 8 - 23.

\*Hussein, Mahmoud 1975, 'Sur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Les Temps Modernes* 346(May): 1608 - 25.

Ihlau, Olaf 1969, *Die roten Kämpfer.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Dritten Reich*,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Jacobson, Julius 1964 - 6, 'Isaac Deutscher: The Anatomy of an Apologist', *New Politics*, III, 4(1964): 95 - 121 and V, 2(1966): 47 - 85.

\*Jacoby, Henry 1969, *Die Bürokratisierung der Welt. Ein Beitrag zur Problemgeschichte*, Neuwied; Luchterhand. Revised editio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84.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trans. Eveline L. Kan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Jacoby, Henry [1983], *Davongekommen. 10 Jahre Exil 1936 - 1946*. Frankfurt am Main: Sandler.

Jacoby, Henry and Ingrid Herbst 1985, *Otto Rühle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Jacoby, Russell 1981, *Dialectic of Defe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oby, Russell 1987,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New York: Basic Books.

Jahn, Egbert 1974, *Kommunismus - und was dann? Zur Bürokratisierung und Militarisierung der Nationalstaaten*, Reinbek: Rowohlt.

\*Jahn, Egbert(ed.) 1975, *Sozioökonomische Bedingungen der sowjetischen Auß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Soviet Foreign Policy: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8.]

\*James, C. L. R. 1964, 'Trotsky's "Revolution Betrayed"', *International So-*

*cialism*, I, 6(Autumn): 25 - 9.

\*James, C. L. R. 1969, *State Capital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Detroit: Facing Reality.

James, C. L. R et al. 1972, *The Invading Socialist Society*, Detroit: Bewick.

James, C. L. R. 1980, *Spheres of Existence.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Allison & Busby.

James, C. L. R. 1980, *Notes on Dialectics*, London: Allison & Busby.

\*James, C. L. R. 198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33, 1(May): 54 - 5.

James, Harold 1981, 'Rudolf Hilferd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Journal*, 24, 4: 847 - 70.

Jay, Martin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 - 1950*, London: Heinemann.

Jedlicki, W. 1990, 'Ludwick Hass', *Revolutionary History*, 3 - 1(Summer): 11 - 13.

\*Jenssen, L. A. [Ludwig Jacobsen] 1951, *Um den Weg zum Sozialismus. II. Teil: Der Kampf um die Weltherrschaft und die Welteinheit*, Ulm/Donau: A.J. Schotola.

\*Jenssen, L. A. [Ludwig Jacobsen] 1958, 'Djilas und die "Neue Klasse"', *Funken*, IX, 2(February): 17 - 22.

\*Jerome, W. and A. Buick 1967, 'Soviet State Capital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Survey*, 62: 58 - 71.

\*Jobic, Bernard 1972,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sm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57 - 87.

\*Johnson, Alan 1999, 'The Third Camp as History and a Living Legacy', *New Politics*, New Series, 7 - 3(Summer), 135 - 65.

\*Johnson, J. R. [C. L. R. James] 1941a, 'Russia - A Fascist State', *New International*, VII: 54 - 8.

\*Johnson, J. R. [C. L. R. James] 1941b, 'Russia and Marxism', *New International*, VII: 213 - 16.

Johnstone, Monty 1968, 'Trotsky and the Debate on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New Left Review*, I, 50(July - August): 113 - 23.

\*Joko [Joseph Kohn] 1929, 'Die russische Frage. Einige Grundfragen des Leninbundes', *Fahne des Kommunismus*, 3, 34(13 September).

\*Joravsky, David 1980, 'Commentary on Casals: Toward a Marxist Argument over Stalinism', *Theory and Society*, 9: 261 - 7.

Jost, Annette 1977, 'Rosa Luxemburgs Lenin-Kritik',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5: 77 - 103.

Jünke, Christoph 2006, *Leo Kofler: Leben und Werk (1907 - 1995)*, Hamburg: VSA.

\*Kaiser, Hans 1980, 'Noch einmal: Zur Kritik der Sowjetgesellschaft', *Politikon*, 64(March): 28 - 31.

\*Kallscheuer, Otto 1976, 'Theoretische Aspekte der "Innenkritik" der sowjetischen Gesellschaften. Anmerkungen zur Analyse von Rakovski', *Politikon*, 50(February): 10 - 19.

Karl, Michaela 2003, *Rudi Dutschke: Revolutionär ohn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Katz, David H. 1977, 'Trotsky's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A Reappraisal', *Midwest Quarterly*, 18: 287 - 97.

\*Kaufman, Adam 1954, 'Who Are the Rulers in Russia?', *Dissent*, I, 2 (Spring): 144 - 56.

Kautsky, Karl 1904 - 5, 'Die Bauern und die Revolution in Russland', *Neue Zeit*, 23 - I : 670 - 7.

Kautsky, Karl 1917a, 'Die Aussichte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Die Neue Zeit*, 35 - II (6 April): 9 - 20.

Kautsky, Karl 1917b, 'Stockholm', *Die Neue Zeit*, 35 - II (31 August): 505 - 12.

\*Kautsky, Karl 1918,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Ignaz Brand & Co.

\*Kautsky, Karl 1919,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Ein Beitrag zur Natur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Berlin: Neues Vaterland.

\*Kautsky, Karl 1921,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Sklaverei.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Trotzki*, Berlin: 'Freiheit'.

\*Kautsky, Karl 1922, 'Rosa Luxemburg und der Bolschewismus', *Der Kampf*, 15: 33 - 44.

\*Kautsky, Karl 1925a, 'Die Lehren des Oktoberexperiments', *Die Gesellschaft*, I : 374 - 80.

\*Kautsky, Karl 1925b, *Die Internationale und Sowjetrußland*, Berlin: J. H. W. Dietz Nachf.

\*Kautsky, Karl 1930, 'Georgien und seine Denker', *Die Gesellschaft*, I: 241 - 58.

\*Kautsky, Karl 1931, 'Das bolschewistische Kamel', *Die Gesellschaft*, II: 342 - 56.

Kelly, Daniel 2002, *James Burnha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A Life*, Wilmington: ISI Books.

\*Kelly, Kevin D. 1985, 'Capitalism, Socialism, Barbarism: Marxist Con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7, 4(Winter), 51 - 71.

Kellner, Douglas 1975 - 6, 'Korsch's Revolutionary Historicism', *Telos*, 26 (Winter): 70 - 93.

Kellner, Douglas 1984,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Kendall, Walter 1962, 'Bruno Rizzi: Socialism and 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The Socialist Leader*, 3 November.

\*Kent, W. 1941a, 'The Russian State', *New International*, VII: 148 - 51, 179 - 84.

\*Kent, W. 1941b, 'What Is Capitalism?', *New International*, VII: 245 - 7.

Kern, Richard[Rudolf Hilferding]1936a, 'Die Kehrseite der Rüstungskonjunktur', *Neuer Vorwärts*, 136(19 January).

Kern, Richard[Rudolf Hilferding] 1936b, 'Grundlagen der auswärtigen Politik', *Neuer Vorwärts*, 179(15 November), Supplement.

\*Kidron, Michael 1961, 'Reform and Revolution. 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7(Winter): 15 - 21.

\*Kidron, Michael 1969, 'Maginot Marxism - Mandel's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36(April - May): 33 - 5.

Kidron, Michael 1968,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Kidron, Michael 1977, 'Two Insights Don't Make a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100(July): 4 - 9.

\*Kief, Fritz 1953, 'Und wo bleibt der Mensch?', *Funken*, III, 9(February): 4 - 6.

\*King, Francis 2003,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ommunist History Network Newsletter On-Line*, 14 (Spring), available at: <<http://les1.man.ac.uk/chnn/chnn14fra.html>>.

\*King, P. C. 1948, 'What Remain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ft*, 136 (February): 36 - 8.

Klemm, Bernd 1983, 'Paul Frölich(1884 - 1953). Politische Orientierung und theoretische Reflexionen von Linksozialist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9: 186 - 229.

\*Klinger, Fred 1981, 'Einleitung', in Hillel Ticktin et al., *Planlose Wirtschaft. Zum Charakter der sowjetischen Gesellschaft*, Hamburg: Junius.

\*Klinger, Fred and Boris Reinstein 1977, 'Bahro - am Rande des revolutionären

Marxismus?', *Was Tun*, 22 December: 13 - 18.

\*Kofler, Leo 1952a, *Der Fall Lukács. Georg Lukács und der Stalinismus*, Cologne: Verlag für politische Publizistik.

\*Kofler, Leo 1952b, *Das Wesen und die Rolle der stalinistischen Bürokratie*, Cologne: Verlag für politische Publizistik.

\*Kofler, Leo 1958, 'Bemerkungen über den Stalinismus', *Funken*, II, 2: 26 - 9.

\*Konrád, György and Iva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ornder, Hans-Jürgen, *Konterrevolution und Faschismus. Zur Analyse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Faschismus und Totalitarismus im Werk von Karl Korsch*,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Korsch, Hedda 1972, 'Memories of Karl Korsch', *New Left Review*, I, 76 (November - December): 35 - 45.

\*[Korsch, Karl] 1927a, 'Zehn Jahre Klassenkämpfe in Sowjetrußland', *Kommunistische Politik*, II, 17 - 18 (October).

\*[Korsch, Karl] 1927b, 'Die Zweite Partei', *Kommunistische Politik*, II, 19 - 20 (December).

\*Korsch, Karl 1932, '15 jaren Octoberrevolutie. Legendes en werkelijkheid van het socialisme in Sowjet-Rusland', *De Nieuwe Weg*, VII: 327 - 30.

\*Kössler, Reinhart 1979, 'Zur Kritik des Mythos vom "asiatischen" Russland', *Prokla*, 35: 105 - 31.

\*Kovar, A. 1972,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et l'idéologisme - réponse au camarade B. Jobic',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88 - 97.

\*Krader, Lawrence 1978,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Kratz, Steffen 1980, *Sohn-Rethel zur Einführung*, Hannover: SOAK.

Kreter, Karljo 1986, *Sozialisten in der Adenauer-Zeit. Die Zeitschrift 'Funken'*, Hamburg: VSA.

\*Krivine, Hubert 1992, 'Pays de l'Est: la nécessité d'un réexamen critique', *Critique communiste*, 113 - 114 (January): 31 - 4.

Krogmann, Angelica 1970, *Simone Weil*, Reinbek: Rowohlt.

\*Krygier, Martin 1978, "'Bureaucracy" in Trotsky's Analysis of Stalinism', in *Socialism and the New Class: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with-in Socialist Societies*, edited by Marian Sawyer, Adelaide: Austral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Monograph, 19.

\*Krygier, Martin 1979,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From Trotsky to the New Class', in *Bureaucracy -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edited by Eugene Kamenka and Martin Krygier, London: Edward Arnold.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lemann, Peter 1978, *Die Linke in Westdeutschland nach 1945*, Hannover/Frankfurt am Main: SOAK/ISP.

\*Kulkarni, Mangesh 1994, 'Theories of the Soviet System - A Retrospective Critiqu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9/31(30 July): 2036 - 9.

\*Kupferberg, Feiwei 1974a, 'Från Lenin till Brezjnev', *Zenit*, 36: 37 - 51.

\*Kupferberg, Feiwei 1974b, 'Kommentar om övergångssamhället', *Zenit*, 37: 62 - 6.

\*Kupferberg, Feiwei 1975, 'Klassförhållandena i Sovjetunionen. En kritik av trotskismen och stalinismen', *Marxistiska studietexter*, Volume 2, Stockholm: Förlaget Barrikaden.

\*Kupferberg, Feiwei 1976, 'Om statssocialismen och vingklippta marknader',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IX, 4: 42 - 9.

\*Kupferberg, Feiwei 1979, 'Bahros Alternativ',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XII, 6: 3 - 37.

Kurata, Minoru 1974, 'Rudolf Hilferding. Bibliographie seiner Schriften, Artikel und Briefe',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327 - 46.

\*Kuroń, Jacek and Karol Modzelewski 1966, *List otwarty do partii*, Paris: Institut Littéraire SARL. [*Solidarność: The Missing Link? The Classic Open Letter to the Party by Jacek Kuroń and Karol Modzelewski*, edited by Colin Barker, London: Bookmarks, 1982.]

\*Kusin, Vladimir V. 1976, 'Apropos Alec Nove's Search for a Class Label', *Soviet Studies*, 28: 274 - 5.

Lacapa, Dominick 1983,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mmers, Karl Christian 1979, 'Om overgangen til socialisme/kommunisme inden for den marxistiske tradition', *Historievidenskab*, 17: 13 - 41.

Landy, Sy 1997, 'Twenty Years of the LRP', *Proletarian Revolution*, 53 (Winter).

Lange, Oskar 1970, 'The Role of Planning in a Socialist Economy' (1958), i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lation edited by P. F. Knightsfield, Oxford [etc.]: Pergamon Press.

Langels, Otto 1984, *Die ultralinke Opposition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Laschitza, Annelies 1996, *Im Lebensrausch, trotz alledem. Rosa Luxemburg: eine Biographie*, Berlin: Aufbau-Verlag.

\*Laurat, Lucien[Otto Maschl] 1931, *L'économie soviétique. Sa dynamique. Son mécanisme*, Paris: Librairie Valois.

\*Laurat, Lucien[Otto Maschl] 1939, *Le Marxisme en faillite? Du marxisme de Marx au marxisme d'aujourd'hui*, Paris: Ed. Pierre Tisne.

Laurat, Lucien[Otto Maschl] 1965, 'Le Parti Communiste Autrichien', in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du Comintern*, edited by Jacques Freymond, Geneva: Librairie Droz.

\*Law, David 1976 - 7, [Review of Purdy 1976], *Critique*, 7(Winter): 111 - 18.

\*Law, David S. 1982, 'Trockij and Thermidor', in *Pensiero e azione politica di Lev Trockij*, edited by Francesca Gori, Florence: Leo S. Olschki, II.

\*Lazitch, Branko 1957, 'Milovan Djilas et la "nouvelle classe"', *Le Contrat Social*, 1 - 5(November): 310 - 14.

Lazitch, Branko and Milorad M. Drachkovitch 197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ominter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Lebowitz, Michael A. 1992,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Lebowitz, Michael A. 1986, 'Only Capitalist Laws of Motion?', *Monthly Review*, 38, 6(November): 32 - 41.

\*Lebrun, M. [Mário Pedrosa] 1940, 'Mass and Class in Soviet Society', *New International*, VI, 4: 87 - 91.

\*Le Corre, Darius 1961, 'Pourquoi l'économie soviétique est un capitalisme d'Etat',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47(November): 426 - 37.

\*Le Corre, Darius 1965a, 'Oui, l'URSS est un capitalisme d'Etat',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81(March): 293 - 308 and 183(May): 466 - 82.

\*Le Corre, Darius 1965b, 'Le profit en URSS: simple indice ou catégorie du capitalisme bureaucratique d'Etat?',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88(December): 523 - 31.

\*Le Corre, Darius 1966, 'Quelles sont les bases marxistes du capitalisme bureaucratique d'Etat de l'Union Soviétiqu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89 - 190(January - February): 129 - 40; 191(March): 256 - 72; 192(April): 324 - 42;

193(May): 474 - 87 and 194(June): 79 - 98.

\*Lee, Grace, Pierre Chaulieu[Cornelius Castoriadis] and J. R. Johnson[C. L. R. James] 1958, *Facing Reality*, Detroit: Correspondence.

\*Lefort, Claude 1960, 'Qu'est-ce que la bureaucratie?', *Arguments*, 17: 64 - 81. ['What Is Bureaucracy?', in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6.]

Lefort, Claude 1976 - 7, 'An Interview with Claude Lefort', *Telos*, 30(Winter): 173 - 92.

Lefranc, Georges 1966, 'Le courant planiste dans 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de 1933 à 1936', *Le Mouvement Social*, 54: 69 - 90.

\*Lenin, V. I. 1964[1920], "'Left-Wing" Communism - An Infantile Disorder', trans. Julius Katzer,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1, Moscow: Progress.

\*Lenin, V. I. 1974 [1918],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trans. Jim Riordan,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8, Moscow: Progress.

\*Lenz[Helmut Fleischer] 1950, 'Thesen zur russischen Frage. Die historische Einmaligkeit der russischen Entwicklung', *pro und contra*, 6(June): 8 - 11.

\*Leo, Rita di 1970, *Operai e sistema sovietico*, Bari: Laterza.

\*Leo, Rita di 1977, *Il modello di Stalin*, Milan: Feltrinelli.

\*Leonhard, Susanne 1953, 'Zur Russlandfrage', *Funken*, IV, 1(June): 8 - 15.

\*Leonhard, Wolfgang 1952, *Schein und Wirklichkeit in der UdSSR*, West Berlin: Freies Wort.

\*Leser, Norbert 1985, 'Otto Bauers Haltung gegenüber dem Bolschewismus', in *Otto Bauer: Theorie und Politik*, edited by Detlev Albers, Horst Heimann and Richard Saage, West Berlin: Das Argument.

\*Levi, Paul 1922, 'Einleitung', in Rosa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Berlin: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Lew, Roland 1983, 'La nature sociale des pays du "socialisme réel"', *Revue des Pays de l'Est*, 1 - 2: 233 - 48.

\*Liebich, André 1977, 'Socialisme ou Barbarie. A Radical Critique of Bureaucracy', *Our Generation*, III, 2(Autumn): 55 - 62.

\*Liebich, André 1981, 'I menscevichi di fronte alla costruzione dell' Urss', in *Storia del marxismo*, III - 2, Turin: Einaudi.

\*Liebich, André 1987, 'Marxism and Totalitarianism. Rudolf Hilferding and the Mensheviks', *Dissent*, 34(Spring): 223 - 40.

\*Liebman, Marcel 1965, 'Retour à Trotsky', *Les Temps Modernes*, 230(July):

132 - 52.

\*Linde, H. 1932, 'Die ideologische Vorbereitung der Intervention durch die II. Internationale',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VI: 19 - 41.

\*Linden, Marcel van der 1979, 'Drie meningen', *Discorsi*, XIII, 13(2 May): 25 - 8.

\*Linden, Marcel van der 1980, 'Siep Stuurman en het Oosteuropese raadsel', *De Internationale*, 26(May): 28 - 33.

\*Linden, Marcel van der 1981, 'Problemen bij de theorie van de gedegenereerde arbeidersstaat', *Toestanden*, 4(December): 5 - 22.

\*Linden, Marcel van der 1983, 'Het aktuele marxistische debat over de Sovjet-Unie', in Hans Kaiser et al., *Het Sovjetraadsel. Poging tot begrip van de Oosteuropese maatschappij*, Antwerp: Leon Lesoil - Toestanden.

\*Linden, Marcel van der 1990, 'Wat voor samenleving werd voortgebracht door de Russische Oktoberrevolutie? Een andere visie', *Daad en Gedachte*, 26, 5(June): 5 - 9.

Linden, Marcel van der 1998, 'Socialisme ou Barbarie: A French Revolutionary Group(1949 - 1965)', *Left History*, 5, 1: 7 - 37.

Livorsi, Franco 1976, *Amadeo Bordiga*, Rome: Editori Riuniti.

\*Lobe, Henner 1978, 'Arbeitsteilung, Klassenherrschaft, Staat - Einige Thesen zur Bahro-Diskussion',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3: 40 - 9.

Lockwood, David 2000,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in Globa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ohmann, Karl-Ernst 1978, '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vkräfte und realer Sozialismus', *Das Argument*, 108: 230 - 40.

Lomax, Bill 1982, 'Hungary: The Rise of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 V - 3/4(Summer): 2 - 7.

\*Lombardo Radice, Lucio 1978, 'Staatssozialismus', in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State Socialism',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Loone, Eero 1990, 'Marxism and Perestroika', *Soviet Studies*, 42: 779 - 94.

Loone, Eero 1992, *Soviet Marxism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Lovell, David W. 1985, *Trotsky's Analysis of Soviet Bureaucratization. A Critical Essay*, London: Croom Helm.

\*Löw, Raimund 1980, *Otto Bauer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Vienna: Europa Verlag.

\*Löwy, Michael 1980, 'Sul concetto di "casta burocratica" in Trockij e Rakovskij', *Il Ponte*, XXXVI: 1462 - 70.

Lowy, A. G. 1969, *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 Bucharins Vision des Kommunismus*, Vienna: Europaverlag.

Lugowska, Urszula and August Grabski 2003, *Trockizm. Doktryna i ruch polityczny*, Warsaw: Wydawnictwo 'Trio'.

\*Lukács, Georg 1923, 'Kritische Bemerkungen über Rosa Luxemburgs "Kritik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in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 Malik.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Rosa Luxemburg's "Critiqu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Lukács, György 1971,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socialist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20: 3 - 12.

Lukács, Georg 1973, 'Budapester Schule', *Praxis*, 2 - 3: 299 - 302.

\*Luke, Tim 1985, 'On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Telos*, 63(Spring): 187 - 95.

\*Luke, Tim et al. 1984, 'Review Symposium on Soviet-Type Societies', *Telos*, 60(Summer): 155 - 91.

\*Lund, Ernest 1941, 'Basis for Defensism in Russia', *New International*, VII: 187 - 91.

\*Lustig, Michael M. 1989, *Trotsky and Djilas: Critics of Communist Bureaucrac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Luxemburg, Rosa 1916, 'Leitsätze über die Aufgaben der internationalen Sozialdemokratie' *Gesammelte Werke*, 4, Berlin[GDR]: Dietz Verlag, 1974: 43 - 7.

\*[Luxemburg, Rosa] 1917a, 'Die Revolution in Russland', *Spartacus*, 4 (April): 3 - 4.

[Luxemburg, Rosa] 1917b, 'Der alte Maulwurf', *Spartacus*, 5(May): 1 - 2.

Luxemburg, Rosa 1918 - 19, 'Rede für die Beteiligung der KPD an den Wahle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 *Gesammelte Werke*, 4, Berlin[GDR]: Dietz, 1974.

\*Luxemburg, Rosa 1922,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Aus dem Nachlass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P. Levi, Berlin: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 Bertram D. Wolfe, in *Rosa Luxemburg Speaks*, edited by Mary-Alice Water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Lynd, Staughton 1967, 'What Went Wrong?', *Monthly Review*, 19, 6 (November): 29 - 31.

McLellan, David 1983, 'Politics', in *Marx: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edited by David McLellan, London: Francis Pinter.

\*McNeal, Robert H. 1961, 'Trotsky's Interpretation of Stalin',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 87-97.

\*McNeal, Robert H. 1977, 'Trotskyist Interpretations of Stalinism', in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 W. Norton.

\*McNeal, Robert H. 1982, 'Trockij and Stalinism', in *Pensiero e azione politica di Lev Trockij*, edited by Francesca Gori, [Milan]: Leo S. Olschki, II.

Macdonald, Dwight 1958,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Essays in Political Critic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MacDonald, Dwight 1959, 'Bruno R.', *New Leader*, 16 November: 29-30.

MacIntyre, Alasdair 1961, '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 6(Autumn): 20-3.

\*Maclean, Gavin 1980, 'Sanctuary of the Disenchanted: Comments on "Century of the Unexpected"', in *The Nature of So-Called Socialist Societies*, London: Big Flam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Mänchen-Helfen, Otto 1932, *Russland und der Sozialismus. Von der Arbeitermacht zum Staatskapitalismus*, Berlin: J. H. W. Dietz Nachf.

\*Maetzel, M. et al. 1979, 'Beiträge zur Diskussion über den Charakter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und die Revisionismuskritik',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4: 38-119.

\*Magdoff, Harry 1985, 'Are There Economic Laws of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37, 3(July-August): 112-27.

\*Main, Peter and Heath, Clare 1994, 'Walter Daum -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alinism*', *Permanent Revolution*, 10(Spring-Summer): 140-63.

\*Maitan, Livio 1992, 'Après la fin de l'URSS: quelle transition?', *Critique Communiste*, 116-117(February-March), 5-12.

Malandrino, Corrado 1987, *Scienza e socialismo. Anton Pannekoek (1873-1960)*, Milan: Franco Angeli.

\*Mallet, Serge 1974, *Bureaucracy and Technocracy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London: Spokesman.

\*Malrieu, Jean 1947, 'La question de l'Etat',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7(Summer): 30-1.

Mandel, Ernest 1962, *Traité d'Economie Marxiste*, Paris: Julliard, 2 vols.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rans. Brian Pearce, London: Merlin Press, 1968.]

\*Mandel, Ernest 1965, 'La réforme de la planification soviétique et ses implications', *Les Temps Modernes*, 229(June): 2161-86.

\*Mandel, Ernest 1968a, '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Fifty Years of World Revolution.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dited by Ernest Mandel, New York: Merit Publishers.

[Mandel, Ernest] 1968b, 'Roman Rosdolsky(1898 - 1967)',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33(April): 70 - 2.

\*Mandel, Ernest 1969, *The Inconsistencies of State Capitalism*, London: 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

\*Mandel, Ernest 1970a, *The Mystifications of State Capitalism*, London: 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

\*Mandel, Ernest 1970b, 'Du "nouveau" sur 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de l'URSS',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XXVIII, 25(September): 12 - 24.

\*Mandel, Ernest 1973a, 'Zehn Thesen zur sozialökonomischen Gesetzmässigkeit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 zwischen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in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edited by Peter Henric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en These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aws Governing the Society Transitional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Critique*, 3(Autumn 1974): 5 - 21. ]

\*Mandel, Ernest 1973b, 'Democrazia e socialismo nell'URSS in Trockij', *Annali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XV: 843 - 64.

\*Mandel, Ernest 1974, 'Some Comments on H. Ticktin's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SSR"', *Critique*, 3: 23 - 6.

\*Mandel, Ernest 1977, 'Bahros Bombe', *Was Tun*, 22 September: 10 - 12.

\*Mandel, Ernest 1978a, 'Fatalismus als "Alternative"?', *Was Tun*, 2 March: 9 - 12.

\*Mandel, Ernest 1978b, 'Sobre la naturaleza de la URSS[Interview]', *El Viejo Topo*: Extra 2: 30 - 6.

Mandel, Ernest 1978c, *The Second Slump. A Marxist Analysis of Recession in the Seventies*, trans. Jon Rothschild, London: New Left Books.

Mandel, Ernest 1979a, *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 London: New Left Books.

\*Mandel, Ernest 1979b, 'Why the Soviet Bureaucracy is Not a New Rul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31, 3(July - August): 63 - 76. [A longer version is: 'Pourquoi la bureaucratie soviétique n'est pas une nouvelle classe dominante',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XXXVIII, 1(1980): 61 - 77. ]

\*Mandel, Ernest 1979 - 80, 'Once Again on the Trotskyist 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Critique*, 12: 117 - 26. [Almost identical is: '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XIII, 1(Spring 1981): 35 - 9. ]

\*Mandel, Ernest 1985, 'Marx and Engels on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Bureaucracy.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n *Rethinking Marxism. Struggles in Marxist Theory. Essays for Harry Magdoff and Paul Sweezy*, edited by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Brooklyn: Autonomedia.

Mandel, Ernest 1987, 'The Significance of Gorbachev', *International Marxist Review*, 2, 4(Winter): 7 - 39.

\*Mandel, Ernest 1990, 'Une théorie qui n'a pas résisté à l'épreuve des faits',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37 - 38: 75 - 96. [ 'A Theory Which has Not Withstood the Test of Fact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49(Winter 1990): 43 - 64. ]

\*Mandel, Ernest 1991a, *Beyond Perestroika. The Future of Gorbachev's USSR*, London: Verso.

\*Mandel, 1991b, 'The Root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Soviet Economy', *Socialist Register 1991*: 194 - 210.

\*Mandel, Ernest 1992, 'The Impasse of Schematic Dogmat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56(Autumn): 135 - 72.

Mandelbaum, Kurt [Kurt Martin] 1974, *Sozialdemokratie und Leninismus. Zwei Aufsätze*, West Berlin: Rotbuch.

Manifesto 1946, 'Manifeste de la conférence d'Avril 1946 de la IV<sup>e</sup> Internationale aux travailleurs, aux exploités et aux peuples coloniaux du monde entier',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April-May: 36 - 50.

\*Marcoux, J. 1948, 'De Burnham à... Burnham',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20 (January - February): 44 - 8.

\*Marcuse, Herbert 1958,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78, 'Protosozialismus und Spätkapitalismus - Versuch einer revolutionstheoretischen Synthese von Bahros Ansatz', *Kritik*, 19(1978): 5 - 27. [ 'Protosocialism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Based on Bahro's Analysis', in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

Marković, Mihailo 1975a, 'La philosophie marxiste en Yougoslavie - le groupe Praxis', *L'Homme et la Société*, 35 - 36 (January - June): 5 - 28.

Marković, Mihailo 1988, 'Raya Dunayevskaya: Great Socialist Humanist Who

- Lived Her Philosophy All Her Life', *Praxis International*, 8, 3(October): 372 - 4.
- Marković, Mihailo and Robert S. Cohen 1975, *Yugoslav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Humanism. A History of the Praxis Group*, Nottingham: Spokesman.
- \*Markus, György 1981, 'Western Marxism and Eastern Societie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6: 291 - 318.
- \*Martin, Jean-Paul 1947, 'Quelques néo-staliniens d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September - October): 49 - 57.
- Martin, Kurt[Kurt Mandelbaum] 1979, 'I Am Still the Same, but... ',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0: 503 - 13.
- \*Martinet, Gilles 1947, 'Le socialisme et les sociétés de transition; de Trotsky à Burnham',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7(Summer): 12 - 30.
- Marx, Karl 1972,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II, trans. Jack Cohe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trans.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78,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81,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rx, Karl 1989, 'Marginal Notes on the Programme of the German Workers' Part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4,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1992,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sterman, Margaret 1977,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ited by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uch, Michael 1977, 'Das Problem der Erklärung des "Stalinismus"', *Das Argument*, 106: 826 - 43.
- \*Masuch, Michael 1980, 'Hoe kon het in Marx' naam? De paradox van het stalinisme', *De Gids*, CXVIII, 2: 100 - 14.
- \*Matgamna, Sean 1998, 'Introducti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Marxism', in *The Fat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st Texts of Critical Marxism*, I, London: Phoenix Press.



\*Matgamma, Sean 1999, 'Cliff's State Capitalism in Perspective', *Workers' Liberty*, 56(June - July): 21 - 4, 37 - 54.

Mattick, Paul 1962, 'Marx and Keynes', *Etudes de Marxologie*, 5: 113 - 215.

\*Mattick, Paul 1969, *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Boston: Porter Sargent Publications.

Mautner, Wilhelm 1926, '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e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Grünberg-Archiv)*, 12: 280 - 3.

Meikle, Scott 1981, 'Has Marxism a Future?', *Critique*, 13: 103 - 21.

\*Melotti, Umberto 1970 - 1, 'Marx e il Terzo Mondo', *Terzo Mondo*, 9 (1970): 11 - 28 and 11(1971): 7 - 32.

\*Melotti, Umberto 1971, 'Marx e il Terzo Mondo. Per uno schema multilineare della concezione marxiana dello sviluppo storico', *Terzo Mondo*, 13 - 14: 3 - 169.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trans. Pat Ransfor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7.]

\*Melotti, Umberto 1975,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e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Una polemica sui paesi socialisti', *Critica Marxista*, VIII, 6: 169 - 72.

\*Melotti, Umberto 1976, 'Il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Terzo Mondo*, 34: 108 - 12.

\*Melotti, Umberto 1979, 'Socialismo e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nei paesi in via di sviluppo', *Terzo Mondo*, 37 - 38: 66 - 79.

Melville, Ralph 1992, 'Roman Rosdolsky(1898 - 1967) als Historiker Galiziens und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in Roman Rosdolsky, *Untertan und Staat in Galizien. Die Reformen unter Maria Theresia und Joseph II*, Mainz: Von Zabern.

\*Men, L. L. 1986, 'The Capitalist Nature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 Politico-Economic Analysis', in *Two Texts for Defining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rogramm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Mergner, Gottfried 1973, *Arbeiterbewegung und Intelligenz*, Starnberg: Raith.

Merquior, J. G. 1986, *Western Marxism*, London: Paladin.

\*Meyer, Ernst 1922, 'Rosa Luxemburgs Kritik der Bolschewiki', *Rote Fahne*, 15 January.

\*Meyer, Gerd 1977, *Bürokratischer Sozialismus. Eine Analyse des sowjetischen Herrschaftssystems*,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Meyer, Gerd 1979, *Sozialistische Systeme. Theorie - und Strukturanalyse*, Opladen: Leske + Budrich.

\*Meyer, Gert 1974, 'Zum Problem der "etatistischen Bürokratie" in der UdSSR', *Links*, 53(March): 18 - 20.

\*Meyer, Gert 1977 - 8, 'Industrialisierung, Arbeiterklasse und Stalinherrschaft

in der UdSSR', *Das Argument*, 106(1977): 844 - 59; 107(1978): 42 - 59 and 108 (1978): 202 - 21.

\*Meyer, Gert 1978, 'Jean Ellensteins Darstellung des "Stalinschen Phänomens"', in *Beiträge zur Sozialismusanalyse*, I, edited by Peter Brokmeier and Rainer Rilling, Cologne: Pahl-Rugenstein.

\*Meyer, Heinz 1953, 'Zum Sturze Berijas.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einzelnen Machtgruppen im totalitären Staat', *Funken*, IV, 3(August): 1 - 3.

\*Meyer, Peter[Josef Guttman] 1944, 'The Soviet Union: A New Class Society', *Politics*, March: 48 - 55 and April: 81 - 5.

\*Meyer, Peter[Josef Guttman] 1947, 'Reply to Leon Blum', *Modern Review*, I : 317 - 20.

\*Miasnikoff, G. 1932, 'De klasse-grondslagen van den Russischen Sovjet-staat', *De Nieuwe Weg*, VII : 18 - 23, 38 - 45, 78 - 86, 107 - 15, 147 - 52, 181 - 86. [Originally: *Ocherednoi obman*. Paris(no publisher) 1931.]

Miasnikoff, G. 1939, 'Dictature et démocratie', *Cahiers d'Europe/Europäische Monatshefte*, 2(February): 12 - 16.

\*Miermeister, Jürgen 1977, 'Opposition(elle) in der DDR: Rudolf Bahro - nur zum Beispiel', *Zeitung für eine neue Linke*, II, 29: 18 - 20.

Miermeister, Jürgen(ed.) 1986, *Rudi Dutschke: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Migliardi, Giorgio 1985, 'I menscevichi e lo Stato Sovietico', in *L'Internazionale Operaio e Socialista tra le due guerre*, edited by Enzo Collotti, Milan: Feltrinelli.

\*Miliband, Ralph 1975, 'Bettelheim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I, 91(May - June): 57 - 66.

\*Miliband, Ralph 1979, 'A Commentary on Rudolf Bahro's *Alternative*',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9*: 274 - 84.

\*Möhner, F. K. 1979, 'Elemente für eine marxistische Phänomenologie der osteuropäischen Systeme - Thesen zum Buch "Die Intelligenz auf dem Weg zur Klassenmacht"',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3: 109 - 27.

\*Mohun, Simon 1980, 'The Problem of the Soviet Un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3: 235 - 90.

\*Molyneux, John 1987, 'The Ambiguities of Hillel Ticktin', *Critique*, 20 - 1: 131 - 4.

Montaldi, Danilo 1975, *Korsch e i comunisti italiani. Contra un facile spirito di assimilazione*, Roma: Savelli.

\*Morris, Jacob and Haskell Lewin 1976, 'More on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7, 10(March): 4 - 10.

\*Morris, Paul 1991, 'The Crisis of Stalinism and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Permanent Revolution*, 9(Summer-Autumn): 96 - 148.

\*Mosley, Hugh 1978, 'The New Communist Opposition: Rudolf Bahro's Critique of the "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New German Critique*, 15(Autumn): 25 - 36.

Müller, Hans-Harald 1977, *Intellektueller Linksradik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ronberg/Ts: Scriptor Verlag.

\*Munis, G. [Manuel Fernandez Grandizo] 1946, *Los revolucionarios ante Rusia y el stalinismo mundial*, Mexico D. F. : Editorial 'Revolución'.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as *Les révolutionnaires devant la Russie et le stalinisme mondial*, Mexico D. F. : Editorial 'Revolución', 1946.]

\*Munis, G. [Manuel Fernandez Grandizo] 1948, *Jalones de derrota, promesa de victoria*, Mexico D. F. : Editorial 'Lucha Obrera'.

\*Munis, G. [Manuel Fernandez Grandizo] 1975, *Parti-Etat, stalinisme, révolution*, Paris: Spartacus.

\*Munis, Grandizo[Manuel Fernandez Grandizo] and Benjamin Péret 1967, *Pour un second manifeste communiste*, Paris: Losfeld.

Myers, Constance Ashton 1977, *The Prophet's Army. Trotskyists in America, 1928 - 1941*,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Nair, K. 1972, 'Charles Bettelheim bouleverse la scienc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4 - 16.

\*A Natureza da USSR (Antologia) 1977, Porto: Afrontamento.

Nash, George H. 1976,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New York: Basic Books.

Naville[Pierre] 1938, 'Extrait du rapport adopté par le 2e Congrès du P. O. I. (Novembre 1937)',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June: 78 - 81.

\*[Naville, Pierre] 1947, 'L' Avenir est-il à la "classe directorale"?' ,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6(June): 385 - 7.

\*Naville, Pierre 1958, 'Djilas et le "communisme national"', *Arguments*, 6: 13 - 16.

Naville, Pierre 1959, 'Un revenant: Bruno. R. ', *Le Contrat Social*, III - 1(January): 60 - 1.

\*Naville, Pierre 1960, 'La bureaucratie et la révolution', *Arguments*, 17: 47 - 64.

\*Naville, Pierre 1962, 'Degenerazione burocratica e rivoluzione', *Tempi moderni dell'economia, della politica e della cultura*, 5: 121 - 34.

\*Naville, Pierre 1970, *Le Nouveau Léviathan*, II : *Le Salaire socialiste*, Part

I, Paris: Ed. Anthropos.

\*Naville, Pierre 1972, 'La bureaucratie et les contradictions sociales en URSS', *Critique Socialiste*, 7: 54 - 63.

Naville, Pierre 1987, *Memoires imparfaites: le temps des guerres*, Paris: La Découverte.

\*Naville, Pierre and Bruno Rizzi 1960, 'Une polémique sur la bureaucratie', *Arguments*, 20: 59 - 60.

Nettl, J. P. 1966, *Rosa Luxembu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umann, Philipp 1971, 'Der "Sozialismus als eigenständig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und ihrer Anwendung in der DDR', *Kursbuch*, 23(March): 96 - 142.

\*Nicolaijevski, Boris 1947, 'Nature de l'Etat soviétique. Capitalisme? Socialisme? Ou quoi?',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6(December): 515 - 25.

\*Nicolaijevsky, Boris 1957, 'Zur Soziologie der Macht in der totalitären Diktatur', *Ostprobleme*, IX, 28: 974 - 86.

\*Nicolaus, Martin 1975,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USSR*, Chicago: Liberator Press.

\*Nitsche, Hellmuth 1984, *Antwort an Bahro und Genossen. Wesensmerkmale, Ergebnisse und Grenzen des realen Sozialismus*, Berne: Verlag SOL.

\*Novack, George 1968, 'The Problem of Transitional 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29, 6(November - December): 17 - 34.

Novack, George 1973, 'Max Shachtman: A Political Portrai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34, 2: 26 - 9, 44.

\*Nove, Alec 1975, 'Is There a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27, 4(October): 615 - 38.

\*Nove, Alec 1983,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Revisited', *Soviet Studies*, 35, 3(July): 298 - 312.

Nowak, Stefan 1977, *Methodolog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General Problems*, Dordrecht: Reidel.

Nowotny, Helga 1975, 'Controversies in Science: Remarks on the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ir Us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4: 34 - 45.

Oakes, Walter J. [Ed Sard] 1944, 'Towards a Permanent Arms Economy?', *Politics*, February: 11 - 17.

\*Occeña, Bruce and Irwin Silber 1980, 'Capitalism in the USSR? An Opportunist Theory in Disarray', *Line of March. A Marxist-Leninist Journal of Rectifica-*

tion, I, 3(October - November): 47 - 72.

\*Öconomicus[Heinz Meyer] 1951, 'Zur Analyse der Ökonomie der UdSSR', *pro und contra*, II, 9(September): 129 - 31.

\*Öconomicus[Heinz Meyer] 1952, 'Zum Problem der russischen Bürokratie', *pro und contra*, III, 3 - 4(March - April): 44 - 7.

\*Olle, Werner 1974a, 'Zur 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 Probleme von Theorie und Geschichte in Theorien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 *Prokla*, 11 - 12: 91 - 144.

\*Olle, Werner 1974b, 'Zur Problematik der mao-strukturalistischen 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 in *Übergangsgesellschaft: Herrschaftsform und Praxis am Beispiel der Sowjetunion*, edited by Peter W. Schulz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Orsini, Alessandro 2004, *L'Eretico della sinistra. Bruno Rizzi, elitista democratico*, Milan: Franco Angeli.

\*Orso, A. [Amadeo Bordiga] 1948 - 52, 'Proprietà e Capitale', *Prometeo*, 10 (June - July 1948) - 14 (February 1950) and Series II, 1 (November 1950) and 4 (July - September 1952).

Orsoni, Claude 1981, 'Karl Korsch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in *Zur Aktualität von Karl Korsch*, edited by Michael Buckmiller, Frankfurt am Main: EVA.

Orwell, George[Eric Blair] 1946, *James Burnham 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 Socialist Book Centre.

\*Pablo, Michel[Michel Raptis] 1951, 'Où allons-nous?',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February-April: 40 - 50.

Pannekoek, Anton 1920, *Weltrevolution und kommunistische Taktik*, Vienna: Arbeiterbuchhandlung.

Pannekoek, Anton 1972, *Partij, raden, revolutie*, edited by Jaap Kloosterman, Amsterdam: Van Genneep.

Panaccione, Andrea 1987, *Kautsky e l'ideologia socialista*, Milan: Franco Angeli.

\*Paramio, Ludolfo 1975, 'Sur la nature de l'Etat soviétique', *Les Temps Modernes*, 349 - 350(August - September): 184 - 201.

\*Paris, Rainer 1975, 'Class Structure and Legitimatory Public Sphere: A Hypothesis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Class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tion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New German Critique*, 5(Spring): 149 - 57.

\*Park, Henry 1987,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0: 27 - 58.

- \*Patri, Aimé 1947a, 'Une nouvelle classe dirigeante peut-elle exister?',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8(October): 96 - 102.
- \*Patri, Aimé 1947b, 'L'ère des "Organisateurs". Remarques à propos des conceptions de Burnham', *Masses - Socialisme et Liberté*, 11(October-December): 23 - 5.
- Pečulić, Miroslav 1967, 'Kritika teorijske misli o strukturi socijalističkog društva', *Socijalizam*, X, 11: 1384 - 1408.
- \*Pellicani, Luciano 1977, 'Sul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in Bruno Rizzi, *Il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Milan: Sugarco edizione.
- \*Peralta[Benjamin Péret] 1946, *Le 'Manifeste' des exégués*, Mexico: Editorial 'Revolución'.
- Peregalli, Arturo and Sandro Saggioro 1995, *Amadeo Bordiga (1889 - 1970) : bibliografia*, Paderno Dugnano: Colibri.
- Peregalli, Arturo and Sandro Saggioro 1998, *Amadeo Bordiga : la sconfitta e gli anni oscuri (1926 - 1945)*, Milan: Colibri.
- \*Persson, Anita 1975, 'Klasstriderna i Soviet. Charles Bettelheim och övergångssamhället"',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VIII, 4: 45 - 53.
- Piccard, E. 1960, *Simone Weil. Essai biographique et critique suivi d'une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s oeuvres de Simone Wei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Plogstedt, Sybille 1979, 'Bahro', *Courage*, January.
-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lock, Friedrich 1929,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Leipzig: 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 Pollock, Friedrich 1932,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I : 8 - 27.
- \*Pollock, Friedrich 1941,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X : 200 - 25.
- \*Pommier, André 1974, 'Sur la restauration du capitalisme en URSS', *Communisme*, 12(September - October): 55 - 79.
- \*Pouillon, Jean 1954, 'Staline: Catoblépas ou Phénix', *Les Temps Modernes*, IX, 2: 2233 - 47.
- Prager, Rodolphe(ed.) 1978, *Les Congrès de la IV<sup>e</sup> Internationale, vol. 1 : Naissance de la IV<sup>e</sup> Internationale*, Paris: Ed. La Brèche.
- Prat, Michel 1984, 'L'échec d'une op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 gauche dans le

Komintern, 1926', *Communisme. Revue d'Etudes Pluridisciplinaires*, 5: 61 - 75.

Preobrazhenskii, E. A. 1926, *Novaia ekonomika. Opyt teoreticheskogo analiza sovetskogo khoziaistva*, Moscow: Kommunisticheskaia Akademiia. Sektsiia Ekonomiki.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Purdy, David 1976, *The Soviet Union: State-Capitalist or Socialist. A Marxist Critiqu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 London: Communist Party.

\*Rabassière, Henri[Heinz Pächter] 1954, 'And Can There Be Peace?', *Dis-sent*, I, 3(Summer): 242 - 7.

Rabehl, Bernd 1973, 'Die marxistische Theorie der Transformationsgesellschaft am Beispiel der Entwicklung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in *Gesellschaftsstrukturen*, edited by Oskar Negt and Klaus Meschka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Rabehl, Bernd 1975, 'Der "neue" Staat und die Keimformen einer "neuen" Klasse in der Sowjetunion', in Dutschke and Wilke(eds.) 1975.

Rabehl, Bernd 1977, 'Die Stalinismuskussion des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mus nach dem XX. Parteitag der KPdSU', in *Entstalinisierung. Der XX. Parteitag der KPdSU und seine Folgen*, edited by Manfred Crusius and Manfred Wil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Rabinovitch, Sonia 1935, 'L'Etat Soviétique est-il oui ou non un Etat prolétarien?', *L'Etudiant Socialiste*, November: 6 - 7.

Radziejowski, Janusz 1978, 'Roman Rosdolsky: Man, Activist, and Scholar', *Science and Society*, 42: 198 - 210.

Raina, Peter 1978,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land 1954 - 1977*, London: Poets and Painters.

\*Rakovski, Marc[György Bence and Janos Kis] 1974, 'Le mar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soviétiques', *Les Temps Modernes*, 341(December): 553 - 84. ['Marxism and the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ies', *Capital and Class*, 1 (Spring 1977): 83 - 105.]

Rakovski, Marc[György Bence and Janos Kis] 1976, 'L'Union du Capital et de la Science passé et present', *Les Temps Modernes*, 355(January): 1241 - 70.

\*Rakovski, Marc[György Bence and Janos Kis] 1978, *Towards an East European Marxism*, London: Allison & Busby.

\*Rakovsky, Christian 1929, 'Pismo Kh. G. Rakovskogo o prichinakh pererozhdeniia o gosudarstvennogo apparata', *Biulleten' Oppozitsii*, 6: 14 - 20. ['The "Professional Dangers" of Power', in *Selected Writings on Opposition in the USSR, 1923 - 30*,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Gus Fagan,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Redaktionskollektiv 1976, 'Zur Entwicklung der Neuen Linken in Ungarn',

*Politikon*, 50(February): 2 - 9.

Rees, Richard 1966, *Simone Weil - A Sketch for a Portrai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chman, Henry 2004, [Review of Resnick and Wolff 2002, and Haynes 2002], H-Russia, November(H - RUSSIA@H - NET. MSU. EDU).

Reinhartz, Dennis 1981, *Milovan Djilas: A Revolutionary as a Wri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instein, Boris 1974, 'Der "Sozialimperialismus" als höchstes Stadium des Schematismus', *Die Internationale*, 3(March): 44 - 75.

\*Renner, Karl 1917,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Kritische Studien über offene Problem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und des praktischen Sozialismus in und nach dem Weltkrieg*,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1987,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1993, 'State Capitalism in the USSR: A High-Stakes Debate', *Rethinking Marxism*, 6 - 2(Summer): 46 - 67.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1994a,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Capitalism: What Was Soviet "Soci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7 - 1(Spring): 9 - 30.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1994b, 'Capitalisms, Socialisms, Communism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14: 135 - 50.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1994c, 'The End of the USSR: A Marxian Class Analysis', in *Marxism in the Postmodern Age*, edited by Antonio Callari, Stephen Cullenberg and Carole Biewene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1994d, 'Lessons from the USSR: Taking Marxian Theory to the Next Stop', in *Whither Marxism*, edited by Bernd Magnus and Stephen Cullenberg, London: Routledge.

\*Resnick, Stephen A. and Richard D. Wolff 2002,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 London: Routledge.

\*Revolutionary Union 1974, *How Capitalism Has Been Restore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World Struggle*, Chicago: Revolutionary Union.

\*Riasanovsky, Nicholas V. 1963, '"Oriental Despotism" and Russia', *Slavic Review*, 22: 644 - 9.

\*Richards, Frank[Frank Füredi] 1987, 'The Myth of State Capitalism', *Confrontation*, 2: 87 - 113.



\*Richards, Frank[Frank Füredi] 1989a, 'The Myths of Gorbymania', *Living Marxism*, 8(June): 18 - 23.

\*Richards, Frank[Frank Füredi] 1989b, 'Theses on Stalinism in the Gorbachev Era', *Confrontation*, 5(Summer), 101 - 10.

\*Richardson, Al 1991[Review of Daum 1990], *Revolutionary History*, 3, 4 (Autumn): 34 - 6.

Richardson, Al 1996, 'Michel Pablo(1911 - 1996)', *Revolutionary History*, 6, 2 - 3(Summer), 255 - 6.

\*Ridley, F. A. 1947, 'Comment', *Left*, 128(June): 139 - 40.

\*Riechers, Christian 1977, 'Die Ergebnisse der Revolution "Stalins" in Russland',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V: 139 - 68.

Rieland, Wolfgang 1977, *Organisation und Autonomie. Die Erneuerung der italien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 Neue Kritik.

Rigby T. R. 1977, 'Stalinism and Mono-Organizational Society', in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Rigby, Tom 1998, 'Stalin's Russia: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Workers' Liberty*, 45(March): 43 - 8.

\*Rilling, Rainer 1978,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ismusanalyse in der intellektuellen Linken der BRD seit Mitte der 60er Jahre', in *Beiträge zur Sozialismusanalyse*, I, edited by Peter Brokmeier and Rainer Rilling, Cologne: Pahl-Rugenstein.

\*Rimbert, Pierre 1948, 'Révolution directorale et socialism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20(April): 353 - 70 and 21(May): 542 - 53.

\*Rimbert, Pierre 1958, 'Djilas prisonnier de la nouvelle class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15(March): 296 - 307; 116(April): 424 - 35; 117(May): 535 - 43 and 118(June): 656 - 66.

Rivière, François 1974, 'Pour l'Ecole de Budapest', *Les Temps Modernes*, 337 - 8(August - September): 2736 - 47.

\*Rizzi, Bruno 1937, *Dove va l'URSS?*, Milan: La Prora.

\*R[izzi], Bruno 1939,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 Paris: Imprimerie Les Presses Moderne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p. 11 - 99 in Rizzi,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trans. Adam Westoby, London: Tavistock, 1985.]

\*Rizzi, Bruno 1962, *La lezione dello stalinismo. Socialismo e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Rome: Opere Nueve.

\*Rizzi, Bruno 1967, *Il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Imola: Galeati.

\*Rizzi, Bruno 1970, 'Quale socialismo?', *Terzo Mondo*, 9: 81 - 5.

\*Rizzi, Bruno 1971, 'Sulla natura dell'URSS: replicando a *Giovane Critica*', *Giovane Critica*, 28: 51 - 63.

\*Rizzi, Bruno 1972, 'Società asiatica e collettivismo burocratico. Osservazioni a Melotti e a Carlo', *Terzo Mondo*, 18: 75 - 94.

Rizzi, Bruno 1983, 'Lettere a Trockij, 38 - 39', *Bel fagor*, 38, 6 (30 November): 683 - 98.

Robinson, Cedric J. 1983,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London: Zed Books.

Röder, Werner and Herbert A. Strauss (eds.) 1980,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Vol. I: *Politik, Wirtschaft, Öffentliches Leben*, Munich [etc.]: K. G. Saur.

\*Rogozinski, Jacob 1980, 'Alternative et dissidence: Remarques sur *L'Alternative* de Rudolf Bahro', *Les Temps Modernes*, 412 (November): 809 - 41.

\*Rojas, Mauricio J. 1981, 'Den ursprungliga ackumulationen i det byråkratiska samhället av sovjetisk typ: en omvärdering av Sovjetunionens historia',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XV**, 3: 21 - 45.

Romano, Joseph 2003, 'James Burnham en France: l'import-export de la "révolution managériale" après 1945',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53: 257 - 75.

Romano, Paul [Phil Singer] and Ria Stone [Grace Lee] 1946, *The American Worker*, Detroit: Facing Reality Publishing Committee.

\*Rosdolsky, Roman 1959, 'Zur Analys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in *Die Sozialismusdebatte. Historische und aktuelle Fragen des Sozialismus*,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1978.

Rosdolsky, Roman 1964, 'Friedr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IV**: 87 - 202.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Critique*, 18 - 19 (1987).]

Rosdolsky, Roman 1968,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3 vols., Frankfurt am Main: EVA.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2 vols., London: Pluto Press, 1989.]

\*Rossanda, Rossana 1972, 'Die sozialistischen Länder: Ein Dilemma der westeuropäischen Linken', *Kursbuch*, 30: 1 - 34.

\*Rotermundt, Rainer 1977, 'Oktoberrevolution und Sozialismus. Zur Bedeutung des Massenbewusstseins für die Herausbildung nicht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kla*, 27: 77 - 102.

\*Rotermundt, Rainer, Ursula Schmiederer and Helmut Becker-Panitz 1977, "“Realer Sozialismus” und realer Sozialismus. Bedingungen und Chancen einer sozi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n Gesellschaften sowjetischen Typs",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5: 9 - 37.

\*Rotermundt, Rainer, Ursula Schmiederer, and Helmut Becker-Panitz 1979, *Die Sowjetunion und Europa. Gesellschaftsform und Aussenpolitik der USSR*,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Rubel, Maximilien 1951, 'Réflexions sur la société directoral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44(February): 181 - 94.

Rubel, Maximilien 1960, *Karl Marx devant le bonapartisme*, The Hague: Mouton.

\*Ruch, Ursula 1975, 'Die antikommunistische Verfälsch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durch den Trotzismus',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Gesellschafts- u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Reihe*, 24: 5 - 15.

\*Rüdiger, Mogens and Vibeke Sørensen 1979, 'Teorier om Sovjetunionen sam overgangssamfund', *Historievidenskab*, 17: 65 - 114.

\*Rühle, Otto 1920a, 'Moskau und wir', *Die Aktion*, X, 37 - 38(18 September).

\*Rühle, Otto 1920b, 'Bericht über Moskau', *Die Aktion*, X, 39 - 40(2 October).

\*Rühle, Otto 1924, *Von der bürgerlichen zu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Dresden: Am Anderen Ufer.

\*[Rühle, Otto] 1939,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Begins With The Struggle Against Bolshevism', *Living Marxism*, IV, 8(September): 245 - 55.

Rupnik, Jacques D. 1976, 'Conflicts au sein du mouvement communiste en Tchécoslovaquie au début des années trente: l'affaire Guttman',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26: 770 - 99.

\*Salvadori, Massimo L. 1973, 'La concezione del processo rivoluzionario in Kautsky(1891 - 1922)', *Annali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6 - 80.

\*Salvadori, Massimo L. 1978a, 'Realtà sovietica e ideologia marxista', *Mondoperaio*, 31, 1: 89 - 98.

Salvadori, Massimo L. 1978b,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 - 1938*, London: New Left Books.

\*Sandberg, Mikæl 1981, 'Sovjet: ägande och makt', *Häften för kritiska studier*, XV, 3: 4 - 20.

\*Sandemose, Jørgen 1976, 'Kapitalismens utvikling i USSR - en litteraturstudie', *Røde Fane*, 2 - 3: 26 - 75.

\*Sandemose, Jørgen 2002, 'Tilbake til USSR', in *Stat, religion, økonomie: Karl Marx om kapitalismens former*, Oslo: Aschehoug & Co.

\*Santamaria, Ulysses and Alain Manville 1976, 'Lenin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ition', *Telos*, 27(Spring): 79 - 96.

Sapir, Boris 1947, 'Is War with Russia Inevitable? An Examination of Burnham's New Thesis', *Modern Review*, I : 360 - 6.

Sapir, Boris 1979, 'Boris Ivanovitsj Nikolaevskij', in *Over Buonarroti, internationale avantgardes, Max Nettlau en het verzamelen van boeken, anarchistische ministers, de algebra van de revolutie, schilders en schrijvers*, edited by Maria Hunink et al., Baarn: Het Wereldvenster.

Sapir, Jacques 1980, *Pays de l'Est: vers la crise généralisée?*, Paris: Fed-erop.

Sapir, Jacques 1989,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en URSS 1941 -1985*,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

\*Sapir, Jacques 1990, *L'économie mobilisée. Essai sur les économies de type sovié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Sapir, Jacques 1993, 'Régulation et transition', *Critique communiste*, 128 - 9 (February): 49 - 54.

\*Sapir, Jacques 1997, 'Le débat sur la nature de l'URSS', in *URSS et Russie. Rupture historique et continuité économique*, edited by Rotame Motamed-Neja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Actuel Marx.

\*Sara, Henry 1940, 'Not State Capitalism', *Left*, 40: 20 - 4.

Sarney, Ygal 2000, 'A Revolutionary Lif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I , 87 (Summer): 137 - 49.

\*Sawer, Marian 1978 - 9,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Russian Soci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1906 - 1931', *Critique*, 10 - 11: 15 - 35.

\*Sawer, Marian(ed.) 1978, *Socialism and the New Class. Towards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Within 'Socialist' Societies*, [Austral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Monograph 19], Adelaide.

\*Schäfer, Gert 1978, 'Was heisst bürokratischer Sozialismus? Versuch einer Würdigung von Rudolf Bahros "Anatomie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Prokla*, 31: 33 - 55.

\*Schaff, Adam 1982, 'Les pays socialistes sont-ils socialistes?', *L'Homme et la Société*, 65 - 6: 3 - 21.

\*Scharrer, Manfred 1976, 'Gefahren der Dialektik. Zur neueren Diskussion der

Sowjetgesellschaft', *Der lange Marsch*, 23(September): 10 - 11.

\*Schlögel, Karl 1975, 'Bettelheim; Klassenkämpfe in der UdSSR',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1: 25 - 48.

\*Schmidt, Wolf-Dietrich 1975, 'Dutschkes Leninismus-Kritik', *Das Argument*, 94: 991 - 8.

\*Schmiederer, Ursula 1973, 'Zur Analyse von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Kritik zu Johann Eggert "Die Sowjetgesellschaft"', *Links*, 49(November): 15 - 18.

\*Schmiederer, Ursula 1977, 'Der "reale Sozialismus", die Opposition und wir', *Links*, 86(March): 17 - 18.

\*Schmiederer, Ursula 1980a, *Die Aussenpolitik der Sowjetunion*, Stuttgart: Kohlhammer.

\*Schmiederer, Ursula 1980b, 'Zum Problem von Bürokratie und Herrschaft im "realen Sozialismus"', *Soziologische Revue*, 3: 403 - 11.

\*Schöler, Uli 1985, 'Otto Bauer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m sowjetischen Modell', in *Otto Bauer: Theorie und Politik*, edited by Detlev Albers, Horst Heimann and Richard Saage, West Berlin: Das Argument.

\*Schöler, Uli 1987, *Otto Bauer und Sowjetrußland*, West Berlin: DVK-Verlag.

\*Schöler, Uli 1991,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oder 'Staatsklaverei'? *Die theoretische Verarbeitung der sowjetrussischen Entwicklung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 und Österreichs(1917 -1929)*, 2 vols, Hamburg and Münster: Lit.

Schöler, Uli 1999, *Ein Gespenst verschwand in Europa. Über Marx und die sozialistische Idee nach dem Scheitern des sowjetischen Staatssozialismus*, Bonn: Dietz.

Scholer, Robert and Robert Kellogg 1966,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oolman, Morton 1980, *The Imaginary Witnes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chulze, Peter W. (ed.) 1974, *Übergangsgesellschaft. Herrschaftsform und Praxis am Beispiel der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Schulze, Peter W. 1977, *Herrschaft und Klassen in der Sowjetgesellschaft. Die historischen Bedingungen des Stalinismu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Schuman, Frederick L. 1976, 'More on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7, 10(March): 1 - 4.

\*Schuman, Frederick L. 1980, 'Born-Again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32, 6(November): 48 - 51.

Schwarz, Solomon M. 1951, *Labor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Sedova, Natalia] 1951, 'Text of Letter to SWP from Natalia Trotsky', *The Militant*, 4 June.

\*Senghaas, Dieter 1980a, 'Sozialismus - Eine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und entwicklungstheoretische Betrachtung', *Leviathan*, VIII: 10 - 40.

\*Senghaas, Dieter 1980b, 'Wittfogel Redivivus', *Leviathan*, VIII: 133 - 41.

\*Serge, Victor 1947, 'L'URSS a-t-elle un régime socialiste?', *Masses - Socialisme et Liberté*, 9 - 10(June - July): 21 - 4.

Seton-Watson, Hugh 1956,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Shachtman, Max 1940a, 'The Crisis in the American Party. An Open Letter in Reply to Comrade Leon Trotsky', *New Internationalist*, VI: 43 - 51.

\*Shachtman, Max 1940b, 'Is Russia a Workers' State?', *New Internationalist*, VI: 195 - 205.

Shachtman, Max 1951a, 'Comrade Natalia's Indictment', *Labor Action*, 11 June.

\*Shachtman, Max 1951b, 'The 4th International's Capitulation to Stalinism', *Labor Action*, 25 June.

\*Shachtman, Max 1962,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York: The Donald Press.

\*Shachtman, Max and Earl Browder 1950, 'Is Russia a Socialist Community?', *New Internationalist* (May - June): 145 - 76.

Shortall, Felton C. 1994, *The Incomplete Marx*, Aldershot: Avebury.

\*Silver, Geoffrey and Gregory Tarpinian 1981, 'Marxism and Socialism: A Response to Paul Sweezy and Ernest Mande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III, 1(Spring): 11 - 21.

Sinclair, Louis[no date], *The IS-Papers*, II, Typescript,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Sinigaglia, Roberto 1973, *Mjasnikov e la rivoluzione russa*, Milan: Jaca.

Skrzypczak Henryk 1980, 'Rudolf Bahro oder die Wiedergeburt des Marxismus aus dem Geiste der Religio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6: 125 - 91.

\*Smith, H. 1937, 'Trotsky and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 III, 4(April): 27 - 32.

\*Social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48, *Russia since 1917: Socialist Views of Bolshevik Policy*, London: SPGB.

Söllner, Alfons 1987 - 8, 'Marcuse's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1940s and 1950s',

*Telos*, 74(Winter): 65 - 78.

Sohn-Rethel, Alfred 1971, *Warenform und Denkform.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EVA.

Sohn-Rethel, Alfred 1972,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Erweiterte und ergänzte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76.]

Soltysiak, Grzegorz 1992, 'Grupa Hassa', *Karta*, 7: 57 - 77.

\*Soviet Studies Project 1981, 'The Concept of State Capitalism', *Progressive Labor Magazine*, **XV**-1(Spring): 8 - 19.

\*Spencer, William 1939, 'Is Russia a Workers' State?', *Revolt*, **II**-8: 4 - 9.

Spohn, Wilfried 1975, 'Die technologische Abhängigkeit der Sowjetunion vom Weltmarkt', *Prokla*, 19 - 20 - 21: 225 - 59.

\*Spohn, Wilfried 1978, 'Geschichte und Emanzipation. Bahros Beitrag zur Sozialismus-Diskussion', *Prokla* 31: 5 - 31.

\*Sprenger, Rudolf[Helmut Wagner] 1933 - 4, 'Das gesellschaftliche Gesicht des Bolschewismus', *Rote Revue*, **XIII**: 314 - 20.

\*Sprenger, Rudolf[Helmut Wagner] 1940, *Bolshevism: Its Roots, Role, Class View and Methods*, trans. Integer[Hermon Jens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enger, Rodolfo[Helmut Wagner] 1947, *El Bolchevismo. Su papel. Sus metodos. Su filiación. Sus objetivos*, Santiago-Chili: Imprinta Nueva.

\*Spurkeland, Trond 1974, 'Stalinismens fallit', *Vardøger*, 6: 159 - 94.

\*Stahl, Peter 1949 - 50, 'Der Schicksalsweg der bolschewistischen Jakobiner', *pro und contra*, 2(December 1949): 11 - 27; 3(January 1950): 23 - 28 and 4(February 1950): 7 - 8.

\*Stark, David 1981, 'Consciousness in Command', *Socialist Review*, 57(May - June): 128 - 49.

Stenson, Gary P. 1978, *Karl Kautsky 1854 - 1938.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Stehr, Uwe 1973, *Vom Kapitalismus zum Kommunismus. Bucharins Beitrag zur Entstehung einer sozialistischen Theorie und Gesellschaft*,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Steiner, Helmut 1990, 'Der aufrechte Gang eines DDR-Ökonomen: Fritz Behrens(1909 - 1980)', *Utopie kreativ*, 2(October): 80 - 4.

Steiner, Helmut 1992, 'Fritz Behrens. Lebensbilanz eines sozialistischen Wis-

senschaftlers', *Deutschland-Archiv*, 25: 1160 - 8.

\*Steiner, Herbert 1967, 'Am Beispiel Otto Bauers - di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r Austromarxismus', *Weg und Ziel. Monatsschrift für Frag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Special issue, July: 3 - 21.

\*Steinhauer, Erwin 1978, 'Europa, Weltrevolution und "nichtkapitalistischer Weg"', *Theorie und Praxis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3: 50 - 64.

Stephan, Cora 1974, 'Geld- und Staatstheorie in Hilferdings *Finanzkapital*',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2: 111 - 54.

\*Sternberg, Fritz 1951,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vor dem Weltgericht*, Hamburg: Rowohlt.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n Trial*, trans. Edward Fitzgerald,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

\*Sternberg, Fritz 1952, *So endete es... Von der Oktoberrevolution zum reaktionärsten Staat der Welt*, Cologne: Bund Verlag.

\*Sternberg, Fritz 1955a, 'Ein Beitrag zur Charakterisierung des russischen Staates', *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 3: 169 - 72.

\*Sternberg, Fritz 1955b, 'Der soziale Gehalt der russischen Diktatur', *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 6: 374 - 8.

Sternberg, Fritz 1963, 'Conversations with Trotsky', *Survey. A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47: 146 - 59. [An expanded and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as: 'Gespräche mit Trotzki. Ergänzte und überarbeitete Fassung des 1963 in "Survey" erschienenen Essays', in Grebing 1981. ]

\*Steuermann, Carl[Otto Rühle] 1931, *Weltkrise - Weltwende. Kurs auf Staatskapitalismus*, Berlin S. Fischer.

\*Stone, George 1947, 'Where Is Russia Going?', *Left*, 134(December): 277 - 81.

\*Stone, George 1948, 'The Failure of the Apologists', *Left*, 137(March): 55 - 60.

\*Stojanović, Svetozar 1967, 'The Statist Myth of Socialism', *Praxis*, 3, 2: 176 - 87.

Stojanović, Svetozar 1968, 'Još jedanput o etatiističkom mitu socijalizma. Odgovor Miroslavu Pečujliću', *Socijalizam*, XI, 1 - 2: 191 - 8.

\*Stojanović, Svetozar 1973,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trans. Gerson S. S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Izme'u Ideala i Stvarnosti*. Belgrade: Prosveta, 1969. ]

Strachey, John 1933, *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 New York: Covici, Friede.

\*Stuart, J. B. 1965, 'Deuschers Meinung über die Trotzkiisten', *Die Internationale*, 10: 51 - 63.



Stutje, Jan Willem 2004, 'Ernest Mandel in Resistanc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in Belgium, 1940 - 1945', *Left History*, 10, 1(Fall - Winter): 125 - 52.

\*Stuurman, Siep 1974, 'Stalinisme en anti-communisme', *Amsterdams Sociologisch Tijdschrift*, 1, 4: 113 - 41.

\*Stuurman, Siep 1979, *Het reëel bestaande en het noodzakelijke socialisme*, Amsterdam: Van Gennep.

\*Stuurman, Siep 1980, 'State Proper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31, 11(April): 51 - 6.

\*Süss, Walter 1979, 'Bürokratische Rationalität und gesellschaftliche Synthesis in der Konstitutionsphase des sowjetischen Systems', *Prokla*, 35: 133 - 70.

Sweezy, Paul M. 1942,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weezy, Paul M. 1947, 'Les illusions de la révolution directoral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9(November - December): 179 - 82.

\*Sweezy, Paul M. 1968, 'The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Czechoslovakia,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20, 5(October): 5 - 16.

\*Sweezy, Paul M. 1969, 'Reply', *Monthly Review*, 20, 10(March): 10 - 19.

\*Sweezy, Paul M. 1970, 'Reply', *Monthly Review*, 22, 7(December): 14 - 21.

\*Sweezy, Paul M. 1974,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6, 6(November): 1 - 16.

\*Sweezy, Paul M. 1975, '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II', *Monthly Review*, 26, 8(January): 1 - 15.

\*Sweezy, Paul M. 1976a, 'Transition au socialisme ou transition socialiste?', *Les Temps Modernes*, 355(January): 1296 - 8.

\*Sweezy, Paul M. 1976b, 'Paul Sweezy Replies', *Monthly Review*, 27, 10(March): 11 - 14.

\*Sweezy, Paul M. 1977a, 'Réponse à Bernard Chavance', *Les Temps Modernes*, 375(October): 527 - 33.

\*Sweezy, Paul M. 1977b, 'Bettelheim on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USSR in the 1920's', *Monthly Review*, 29, 5(October): 1 - 18.

\*Sweezy, Paul M. 1977c, 'Paul Sweezy Replies', *Monthly Review*, 29, 1(May): 13 - 19.

\*Sweezy, Paul M. 1978, 'Is There a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Monthly Review*, 30, 5(October): 1 - 17.

\*Sweezy, Paul M. 1979, 'Paul Sweezy Replies to Ernest Mandel', *Monthly Review*, 31, 3(July - August): 76 - 86.

- \*Sweezy, Paul M. 1980,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32, 6 (November): 1 - 13.
- \*Sweezy, Paul M. 1981, 'Paul Sweezy Replies', *Monthly Review*, 33, 1 (May): 55 - 6.
- \*Sweezy, Paul M. 1985a, 'After Capitalism - What?', *Monthly Review*, 37, 3 (July - August): 98 - 111.
- \*Sweezy, Paul M. 1985b, 'Rejoinder', *Monthly Review*, 37, 4 (September): 56 - 61.
- \*Sweezy, Paul M. 1986, 'A Final Word', *Monthly Review*, 38, 7 (December): 38 - 41.
- \*Sweezy, Paul M. and Charles Bettelheim 1971,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weezy, Paul M. and Leo Huberman 1964, 'Peaceful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15, 11 (March): 569 - 90.
- \*Symposium 1938: 'Was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Failure? A Symposium', *Modern Quarterly*, 11, 1 (Autumn): 8 - 28.
- Syré, Ludger 1984, *Isaac Deutscher, Marxist, Publizist, Historiker. Sein Leben und Werk 1907 - 1967*, Hamburg: Junius.
- \*S. Z. Tübingen 1977, 'Bürokratische Herrschaft und Arbeitsteilung. Kritik der Sowjetgesellschaft', *Links*, 88: 13 - 5.
- Szelényi, Ivan 1977, 'Notes on the "Budapest School"', *Critique*, 8 (Summer): 61 - 7.
- \*Szelényi, Ivan 1978 - 9,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Critique*, 10 - 11: 51 - 76.
- \*Szelényi, Ivan 1980, 'Whose Alternative?', *New German Critique*, 20 (Spring-Summer): 117 - 34.
- \*Szymanski, Albert 1979, *Is the Red Flag Fly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Union Today*, London: Zed Press.
- \*Tacchinardi, Riccardo and Arturo Peregalli 1990, *L'URSS e i teorici del capitalismo di stato*, Rome: Lacaíta.
- \*Tarbuck, Ken 1969 - 70,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A Clock without a Spring', *Marxist Studies*, II, 1: 7 - 25.
- \*Tautin, Pierre 1947, 'Le centralisme bureaucratiqu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17 (Summer): 31 - 3.
- \*Ter-Grigorjan, G. G. 1978, 'Karl Kautsky und die Theoretiker des Austro-marxismus über die Probleme der sozialistischen Revolution und des Sozialismus', in

*Bürgerliche und kleinbürgerliche ökonomische Theorien über den Sozialismus(1917 - 1945 )*, edited by Werner Krause, Berlin[GDR]: Akademie-Verlag.

\**Texte zur Stalinfrage* 1979, Hamburg: Reents.

\*Thomas, Martin 1997, 'Stalinism and State Capitalism', *Workers' Liberty*, 43 (November): 41 - 6.

\*Thomas, Martin 1999 - 2000, 'The USSR and Non-Linear Capitalism', *Workers' Liberty*, 59 - 60(December - January): 55 - 6.

Thompson, E.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Thompson, Paul 1980, 'The Origins and Basis of State-Collectivism', in *The Nature of So-Called Socialist Societies*, London: Big Flam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Thompson, Paul and Guy Lewis 1977, *The Revolution Unfinished? A Critique of Trotskyism*, Liverpool: Big Flame.

\*Tibert, G. 1972, 'A propos de la nature de l'URSS',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7 - 8: 47 - 56.

\*Ticktin, Hillel 1973,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SSR', *Critique*, 1: 20 - 41.

\*Ticktin, Hillel 1974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Intellectual', *Critique*, 2: 5 - 21.

\*Ticktin, Hillel 1974b, 'Socialism,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Critique*, 3: 65 - 72.

\*Ticktin, Hillel 1975, 'The Capitalist Crisis and Current Trends in the USSR', *Critique*, 4: 101 - 9.

\*Ticktin, Hillel 1976, 'The Contradictions of Soviet Society and Professor Bettelheim', *Critique*, 6: 17 - 44.

\*Ticktin, Hillel 1976 - 77, 'The USSR: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Critique*, 7: 88 - 93.

\*Ticktin, Hillel 1978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USSR and the Elite', *Critique*, 9: 37 - 61.

Ticktin, Hillel 1978b, 'Detente and Soviet Economic Reforms',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edited by Egbert Jahn, London: Allison & Busby.

\*Ticktin, Hillel 1978 - 9, 'Rudolf Bahro: A Socialist without a Working Class', *Critique*, 10 - 11: 133 - 9.

\*Ticktin, Hillel 1979 - 80a, 'The Afghan War and the Crisis in the USSR', *Critique*, 12: 13 - 25.

\*Ticktin, Hillel 1979 - 80b, 'The Ambiguities of Ernest Mandel', *Critique*, 12: 127 - 37.

\*Ticktin, Hillel 1982, 'Troickij and the Social Forces Leading to Bureaucracy', in *Pensiero e azione politica di Lev Troickij*, edited by Francesca Gori, Milan: Leo S. Olschki, II.

\*Ticktin, Hillel 1986, 'The Year after the Three General Secretaries: Change Without Change', *Critique*, 17: 113 - 185.

\*Ticktin, Hillel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in the Transitional Epoch', *Critique*, 20 - 1: 7 - 25.

\*Ticktin, Hillel 1988, 'The Contradictions of Gorbachev',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4, 4(December): 83 - 99.

\*Ticktin, Hillel 1990, 'The Nature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of the USSR',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2: 209 - 52.

\*Ticktin, Hillel 1991, 'The International Road to Chaos', *Critique*, 23: 9 - 32.

\*Ticktin, Hillel 1992a, *Origins of the Crisis in the USSR.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isintegrating System*, Armonk: Sharpe.

\*Ticktin, Hillel 1992b, 'Permanent Chaos Without a Market: The Non-Latinamericanization of the USSR',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5, 3(September): 242 - 56.

\*Ticktin, Hillel 1993, 'The Growth of an Impossible Capitalism', *Critique*, 25: 119 - 132.

\*Ticktin, Hillel 1995a, 'Leon Trotsky and the "Russi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Ideas of Leon Trotsky*, edited by Hillel Ticktin and Michael Cox, London: Porcupine Press.

\*Ticktin, Hillel 1995b, 'Leon Trotsky's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SSR', in *The Ideas of Leon Trotsky*, edited by Hillel Ticktin and Michael Cox, London: Porcupine Press.

Ticktin, Hillel 2000, 'Why the Transition Failed: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ost-Soviet Period in Russia', *Critique*, 32 - 33: 13 - 41.

\*Ticktin, Hillel and Włodzimierz Brus 1981, 'Is Market-Socialism Possible or Necessary?', *Critique*, 14: 13 - 39.

\*Tökei, Ferencz 1977, *Zur Dialektik des Sozialismu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Originally: *A szocializmus dialektikájához*,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1974.]

\*Tomlinson, J. 1977, 'Hillel Ticktin and Professor Bettelheim - A Reply', *Critique*, 8: 53 - 9.

\*Tresse, Pierre 1954, 'Russia; Method of Analysis', *Dissent*, I, 4 (Autumn): 399 - 405.

\*Trotsky, L. 1920,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Kautsky*, Hamburg: West-Europäisches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Reply to Karl Kautsk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Trotsky, Leon 1925, 'Erklärung des Genossen Trotzki gegen die Zeitschrift "La Revolution Proletarienne"', in *Die Linke Opposition in der Sowjetunion*, II, edited by Ulf Wolter,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1975.

Trotsky, Leon 1929, 'Interview by the *Osaka Mainichi*' (April 24, 1929),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29], New York: Pathfinder 1975.

\*Trotsky, Leon 1931, 'Problemi razvitiia SSSR', *Biulleten' Oppozitsii*, 20 (April): 1 - 15.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SR - Draft The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 on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0 - 31], New York: Pathfinder, 1973.]

\*Trotsky, Leon 1933a, 'Klassovaia priroda sovetskogo gosudarstva', *Biulleten' Oppozitsii*, 36 - 37 (October): 1 - 12.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3 - 34], New York: Pathfinder, 1975.]

\*Trotsky, Leon 1933b, 'The Degeneration of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Degeneratio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2 - 33], New York: Pathfinder, 1972.

\*Trotsky, Leon 1937a, 'Chetvertyi Internatsional i SSSR', *Biulleten' Oppozitsii*, 54 - 55 (March): 49 - 52.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5 - 36], New York: Pathfinder, 1970.]

\*Trotsky; Leon 1937b,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London: Faber & Faber.

\*Trotsky, Leon 1938a, 'Nerabochee i neburzhuaznoe gosudarstvo?', *Biulleten' Oppozitsii*, 62 - 63 (February): 15 - 9. ['Not a Workers' and Not a Bourgeois State?'],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7 - 38], New York: Pathfinder, 1976.]

\*Trotsky, Leon 1938b, 'Discussion with Trotsky III: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7 - 38], New York: Pathfinder, 1976.

\*[Trotsky, Leon] 1938c, 'Agoniia kapitalizma i zadachi Chetvertogo Internatsionala', *Biulleten' Oppozitsii*, 66 - 67 (May - June): 1 - 18. ['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Leon Trotsky,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for Soci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1977.]

\*Trotsky, Leon 1938d, 'Prodolzhaet li eshche sovetskoe pravitel'stvo sledovat' printsipam, usvoennym 20 let tomu nazad?', *Biulleten' Oppozitsii*, 66 - 67 (May -

June): 19 - 21. [‘Does the Soviet Government Still Follow the Principles Adopted Twenty Years Ago?’,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7 - 38 ], New York: Pathfinder, 1976. ]

\*Trotsky, Leon 1939, ‘SSSR v voine’, *Biulleten’ Oppozitsii*, 79 - 80 (August - October): 1 - 9. [‘The USSR in War’, in Leon 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 New York: Pathfinder, 1973. ]

Trotsky, Leon 1940a, ‘Dvoinaia zvezda: Gitler-Stalin’, *Biulleten’ Oppozitsii*, 81 (January): 1 - 7. [‘The Twin-Stars: Hitler-Stali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 - 40 ], New York: Pathfinder, 1973. ]

Trotsky, Leon 1940b, ‘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World Revolution’, 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 - 40 ], New York: Pathfinder.

Trotsky, Leon 1973, *In Defence of Marx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Trotsky, Leo 1988, *Schriften 1 : Sowjetgesellschaft und stalinistische Diktatur*, 1. 2 (1936 - 1940), Hamburg: Rasch und Rohring.

Ulmen, G. L. 1978,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Mouton.

Ulmen, G. L. 1981, ‘Über Wittfogels Weg zur Marxschen Auffassung Russlands’. Foreword in Karl Marx, *Enthül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Diplomatie im 18. Jahrhundert*, edited by Karl August Wittfog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Unger, F. 1969, ‘Zum Problem des Revisionismus in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 *Sozialistische Politik*, 1, 4 (December): 104 - 13.

Uoroll, R. L. [R. L. Worrall] 1940, ‘Iavljaetsia-li SSSR proletarskim ili kapitalisticheskim gosudarstvom?’,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7 (459).

\*[Urbahns, Hugo] 1929a, ‘Über den Konflikt Russland-China’, *Fahne des Kommunismus*, 3, 31 (23 August) and 32 (30 August).

\*[Urbahns, Hugo] 1929b, ‘Einige theoretische Hinweise’, *Fahne des Kommunismus*, 3, 33 (6 September), 34 (13 September), 39 (25 October) and 40 (8 November).

\*Valić, Dominique 1975, ‘Kritik der Dutschke’schen Leninkritik’, *Die Internationale*, 6: 62 - 93.

Vance, T. N. [Ed Sard] 1950, ‘After Korea What?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U. S. Perspectives’, *New Internationalist*, 145 (November - December): 323 - 33.

Vance, T. N. [Ed Sard] 1951, ‘The Permanent Arms Economy’, *New Internationalist*, 146 (January - February): 29 - 45; 147 (March - April): 67 - 92; 148 (May - June): 131 - 59; 149 (July - August): 232 - 48; 150 (September - October): 251 -

66; 151(November - December): 333 - 59.

\*Varga, Eugen 1970, 'Die Nomenklatur: wie sowjetisch ist die Sowjetunion?', *Wiener Tagebuch*, 3(March): 4 - 7.

\*Varlet, Claude 1978, *Critique de Bettelheim*, I,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et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Paris: Nouveau Bureau d'Édition.

Vega, Alberto[R. Maille] 1952, 'La crise du bordiguisme italien', *Socialisme ou Barbarie*, 11(November - December): 26 - 46.

\*Vidal Villa, J. M. 1977, 'La URSS: Una nueva sociedad de clase', *El Viejo Topo*, 5(February): 19 - 22.

\*Vidal Villa, J. M. 1978, 'Eurocomunismo y nueva sociedad de clase', *El Viejo Topo*, 11(August): 17 - 21.

\*Vincent, Jean-Marie 1982, 'Trotsky et l'analyse de l'URSS', in *L'URSS vue de gauche*, edited by Lilly Marco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Vogt-Downey, Marilyn(ed.) 1993, *The USSR 1987 - 1991 : Marxist Perspectives*,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y Books.

Voinea, Şerban[Gaston Boeuvre] 1955, *La Morale et le socialisme*, Ghent: La Flamme.

\*Voinea, Şerban [Gaston Boeuvre] 1965a, 'L'Union Soviétique est-elle une société socialist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79(January): 40 - 53.

\*Voinea, Şerban[Gaston Boeuvre] 1965b, 'L'Union Soviétique est-elle un "capitalisme d'état"?',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87(November): 394 - 416.

\*Voslenskij, Michael S. 1980, *Nomenklatura. Die herrschende Klasse der Sowjetunion*, Vienna: Molden.

\*[Wagner, Helmut] 1934, 'Thesen über den Bolschewismus', *Rätekorrespondenz*, 3 (August): 1 - 22. ['Theses on Bolshevism', *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 1, 3 (December 1934): 1 - 18.]

Wagner, Helmut 1968, 'Mit den Waffen von Karl Marx. Junge Polen wider den Monopolsozialismus', *Osteuropa*, XVIII: 628 - 43.

\*Wajda, Mihaly 1985, 'A quoi le "socialisme réel" répond-il?', *Les Temps Modernes*, 468 - 9(July - August): 88 - 102.

Waldschmidt, Hans-Jürgen 1966, *Lenin und Kautsky - Verschiedene Wege der Weiterentwicklung des Marxismus*, Würzburg: Inaugural Dissertation.

\*Warski, Adolf[Warszawski] 1922, *Rosa Luxemburgs Stellung zu den taktischen Problemen der Revolution*, Hamburg: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Weber, Henri 1982, 'La Russie soviétique et le "pape du marxisme" Karl

Kautsky', in *L'URSS vue de gauche*, edited by Lilly Marco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Weber, Hermann 1971, 'Zwischen kritischem und bürokratischem Kommunismus. Unbekannte Briefe van Clara Zetk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XI: 417 - 48.

Weber, Hermann 1984, 'Susanne Leonhard gestorben',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20: 155 - 6.

Weber, Max 197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Vollständiger Nachdruck der Erstausgabe von 1922*, Tübingen: (J. C. B. Mohr/Paul Siebeck). [English edition of Part I: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A. R.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London: William Hodge and Co., 1947.]

\*Weil, Felix 1928, 'Rosa Luxemburg über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Grünberg - Archiv)*, XIII: 285 - 98.

\*Weil, Simone 1933, 'Allons-nous vers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158: 311 - 19.

\*Weinberg, G. 1952, 'Kann Staatskapitalismus ein Schritt zum Sozialismus sein?', *Funken*, II, 9(February): 10 - 13.

\*Weinberg, G. 1953, 'Gefährliche Illusionen', *Funken*, III, 12(May): 14 - 16.

West, John[James Burnham] 1935a, 'Roosevelt and the New Congress', *New International*, II, 1(January): 1 - 3.

West, John[James Burnham] 1935b, 'The Roosevelt "Security" Programme', *New International*, II, 2(March): 40 - 3.

West, John[James Burnham] 1935c, 'The Wagner Bill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International*, II, 6(October): 184 - 9.

West, John[James Burnham] 1936, 'Will Roosevelt Be Re-Elected?', *New International*, III, 2(April): 33 - 6.

Westoby, Adam 1981, *Communism since World War II*,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Westoby, Adam 1985, 'Introduction', in Bruno Rizzi,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Tavistock.

\*Westoby, Adam and Tim Wohlforth 1978, *Communists' Against Revolution.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Assimilation*, London: Folrose Books.

Wiggershaus, Rolf 1994,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Polity.

\*Wildt, Andreas 1979, 'Total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On the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Function of Soviet-Type Societies', *Telos*, 41(Autumn): 33 - 57.



\*Willen, Paul 1955, 'What Manner of Change in Russia?', *Dissent*, II, 1(Winter): 71 - 5.

\*Wittfogel, Karl A. 1950, 'Russia and Asia', *World Politics*, II, 4(June): 445 - 62.

\*Wittfogel, Karl A. 1953, 'Ruling Bureaucrac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 Phenomenon that Paralyzed Marx', *Review of Politics*, XV: 350 - 9.

\*Wittfogel, Karl A.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ittfogel, Karl A. 1960, 'The Marxist View of Russian Society and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XIII: 487 - 508.

\*Wittfogel, Karl A. 1963b, 'Reply', *Slavic Review*, XXII: 656 - 62.

\*Wittfogel, Karl A. 1963a, 'Russia and the East -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Slavic Review*, XXII: 627 - 43.

Wolfe, Bertram D. 1948, *Three Who Made the Revolution - A Biographical History*, New York: Dial Press.

\*Wolin, Simon 1974, 'Socialism and Stalinism', in *The Mensheviks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7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edited by Leopold H. Haim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lter, Ulf 1975, *Grundlagen des Stalinismus*, West Berlin: Rotbuch.

\*Wolter, Ulf(ed.) 1978, *Antworten auf Bahros Herausforderung des 'realen Sozialismus'*, West Berlin: Olle & Wolter.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ited by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1980.]

Worcester, Kent 1995, *C. L. R. James. A Political B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orrall, R. L. 1939, 'U. S. S. R: Proletarian or State Capitalist?', *Modern Quarterly*, XI, 2(Winter): 5 - 19; also in *Left*, 39(1939): 319 - 24 and 40(1940): 19 - 20.

Worrall Tribute 1996, 'A Tribute to Ryan Worrall(1903 - 1995)', *Revolutionary History*, 6, 2 - 3(Summer): 249 - 51.

Wright, Steve 2002,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Yvon, M. [1936], *Ce qu'est devenue la Révolution russe*, Préface de Pierre Pascal, Paris: La Révolution Proletarienne.

\*Yvon, M. 1938, *L'URSS telle qu'elle est*, Préface d'André Gide, Paris: Gallimard.

\*Zaremba, Zygmunt 1957, 'Groupe, couche ou classe dirigeante?', *La Revue*

*Socialiste*, New Series, 111(November): 418 - 27.

\*Zarembka, Paul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System',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3: 123 - 61.

\*Zaslavsky, Victor 1978, 'Regime e classe operaia in URSS', *MondOperaio*, XXXI, 6: 74 - 83. [Viktor Zaslavsky, 'The Regime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SSR', *Telos*, 43(1979 - 80).]

\*Zaslavsky, Victor 1979, 'La struttura di classe della società sovietica', *MondOperaio*, XXXII, 5: 107 - 16.

\*Zaslavsky, Victor 1982, *The Neo-Stalinist State: Class, Ethnicity and Consensus in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M. E. Sharpe.

\*Zaslavsky, Victor 1984 - 5, 'Soviet Society and the World Systems Analysis', *Telos*, 62(Winter): 155 - 67.

\*Zetkin, Clara 1922, *Um Rosa Luxemburgs Stellung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Hamburg: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Zimin, Alexander 1977, 'On the Question of the Place in Histor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amizdat Register*, I, edited by Roy Medvedev, New York: W. W. Norton.

\*Zimine, Alexandre 1982, *Le stalinisme et son 'socialisme réel'*, Paris: Ed. La Brèche.

Zimin,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84, *U istokov stalinizma: 1918 - 1923*, Paris: Izd-vo Slovo, 1984.

Zimmermann, Rüdiger 1978, *Der Leninbund. Linke Kommun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Droste.

Znaniecki, Florian 1919, 'Methodological Note', in Florian Znaniecki, *On Humanistic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 凤凰文库书目

###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鍜 张一兵 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 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 著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段忠桥 著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 张一兵 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张亮 著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 谢永康 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景源 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李景源 吴元梁 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 姜建成 著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周穗明 王玫 等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 张文喜 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孙伟平 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 唐正东 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 欧阳英 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 王广 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 王浩斌 著

###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 施瓦茨 著 徐佳 译
-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 著 郭为桂 黄宁莺 译
- 《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 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 译
- 《社会正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 著 应奇 译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 译
- 《新社会主义》 [加拿大]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译
-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 著 余江涛 译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 译
-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 著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 著 应奇 译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拉克 大卫·韦戈尔 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 译
- 《现代欧洲的战与社变: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著 唐皇凤 武小凯 译
-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 著 郭为桂 李艳丽 译
-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 著 刘骥 等译
-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 诺德林格 著 孙荣飞 等译
- 《强社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 著 张长东 译
-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 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 译
-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著 刘训练 等译
-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 著 刘训练 译
-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冯克利 译
-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张国清 译
- 《社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译
-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允春喜 译
-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劳斯科 著 毛兴贵 译
-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 达尔 著 范春辉 等译
-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著
-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 著 辛亨复 译
- 《阐释和社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忠华 编
-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 主编
-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美]安娜·M. 史密斯 著 付琼 译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珍妮弗·皮茨 著 金毅 许鸿艳 译
-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 《现代性的谱系》 张凤阳 著

### 三、纯粹哲学系列

-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 叶秀山 著
-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 黄裕生 著
-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 谢地坤 著
-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尚杰 著
-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 宋继杰 著
-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赵广明 著
-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黄裕生 著
-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赵广明 著
-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王恒 著
-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 黄文前 著
-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SEIN》 李文堂 著
-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尚杰 著
-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期文本研究》 陈志远 著
-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方向红 著
-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 陈亚军 著
-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刘永谋 著
-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 叶秀山 著
-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 叶秀山 著
-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 户晓辉 著
-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 倪梁康 著
-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王齐 著
- 《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黄裕生 著
- 《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张柯 著
-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 叶秀山 著
-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 张荣 著

### 四、宗教研究系列

-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 杜继文 著
- 《中国佛教通史》(15卷) 赖永海 主编
-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魏道儒 著
- 《佛教史》 杜继文 主编
-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 《基督教史》 王美秀 段琦 等著
- 《伊斯兰教史》 金宜久 主编
- 《中国律宗通史》 王建光 著
- 《中国唯识宗通史》 杨维中 著
- 《中国净土宗通史》 陈扬炯 著
-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 《中国三论宗通史》 董群 著
- 《中国华严宗通史》 魏道儒 著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 潘桂明 著
- 《禅与老庄》 徐小跃 著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基督教思想史》 [美]胡斯都·L. 冈察雷斯 著 陈泽民 孙汉书 司徒桐 莫如喜 陆俊杰 译

《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 赵敦华 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如来藏与中国佛教》 杨维中 著

##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非非洲化自然的比较》 [美]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等译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美]A. 麦金太尔 著 宋继杰 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R. M. 昂格尔 著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文化的解释》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颀 译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 [美]理查德·塔克 著 罗炯 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男性气概》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刘玮 译

《黑格尔》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张国清 朱进东 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 默顿 著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个体的社会》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实践感》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蒋梓骅 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利奥·施特劳斯 著 申彤 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褚松燕 译

《传统的发明》 [英]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美]海登·怀特 著 陈新 译

《卢梭问题》 [德]恩斯特·卡西勒 著 王春华 译

《自足语文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 [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 著 周允程 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权威的概念》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 著 姜志辉 译

##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 著 赵旭东 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 著 杨立华 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 [美]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中国与达尔文》 [美]詹姆斯·里夫 著 钟永强 译

-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 著 陈仲丹 译
-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黄卫总 著 张蕴爽 译
-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王晓山 著 文韬 译
- 《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 著 王启发 译
-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著 黄建华 黄迅余 译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 著 史建云 译
-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刘岳兵 译
-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 著 李伯重 连玲玲 译
-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 著 甘万萍 译
- 《为权力祈祷》 [加拿大]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 译
-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洪天富 译
-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德里克 著 翁贺凯 译
-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 布朗 等著 朱勇 译
-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 著 王福明 译
-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唐晓峰 译
-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 著 程钢 译 刘东 校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 著 高淑娟 孙彬 译
- 《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 著 卞东坡 译 张强强 朱霞欢 校
-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 胡纓 著 龙瑜成 彭珊珊 译
- 《〈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 著 陆越 译
-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 著 苗延威 译
-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 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点 译
-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 著 鲁西奇 译
-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风 著 纪志刚 郑诚 郑方磊 译
-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 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 译
-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 著 张天虹 张胜波 译
- 《18世纪的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 罗有枝 著 陈仲丹 译
-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 著 梁侃 邹劲风 译
-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 著 严蓓雯 韩雪临 伍德祖 译
-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 著 郭万平 高飞 译
- 《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 杨美慧 著 赵旭东 孙珉 译 张跃宏 校
-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 [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芹芹 译
-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董科 译
-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王玉茹 张玮 李进霞 译
-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郑洁西 译
-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 著 卜永坚 译
- 《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刘岳兵 何莺莺 孙雪梅 译
-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孟凡礼 尚国敏 译
-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王玉茹 译
-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美]卢苇菁 著 秦立彦 译



-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美]易明 著 姜智芹 译
-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美]林郁沁 著 陈湘静 译
-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美]戴维·艾伦·佩兹 著 姜智芹 译
-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周启乾 译
-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 [美]艾志端 著 曹曦 译
-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巴菲尔德 著 袁剑 译
-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德]狄德满 著 崔华杰 译
-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 [美]季家珍 著 杨可 译
-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美]艾米莉·洪尼格 著 韩慈 译
-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林满红 著 詹庆华 林满红 译
- 《寻求中国民主》 [澳]冯兆基 著 刘悦斌 徐磬 著

## 七、历史研究系列

- 《中国近代通史》(10卷) 张海鹏 主编
- 《极端的年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等 译
- 《漫长的20世纪》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 著 姚乃强 译
-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 《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 钱乘旦 主编

##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 《世纪末的维也纳》 [美]卡尔·休斯克 著 李锋 译
- 《莎士比亚的政治》 [美]阿兰·布鲁姆 哈瑞·雅法 著 潘望 译
- 《邪恶》 [英]玛丽·米奇利 著 陆月宏 译
-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戴从容 译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丹尼尔·贝尔 著 严蓓雯 译
- 《流动的恐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杨超 等 译
- 《流动的生活》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徐朝友 译
- 《生活的艺术》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仇子明 等 译
-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武媛媛 译
- 《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编 陈维振 陈明达 王峰 译 李平武 审校
-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英]丹尼斯·史密斯 著 萧韶 译
- 《萨义德》 [英]瓦莱丽·肯尼迪 著 李自修 译
-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 [美]理查德·沃林 著 吴勇立 张亮 译
- 《未来的形而上学》 [美]爱莲心 著 余日昌 译
- 《文化理论关键词》 [英]丹尼·卡瓦拉罗 著 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 译
-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 [英]安德鲁·甘布尔 著 王晓冬 朱之江 译
- 《异端人物》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刘超 译
- 《当代文化理论》 [澳大利亚]安德鲁·米尔纳 著 刘超 译
- 《感受与形式》 [美]苏珊·朗格 著 高艳萍 译
- 《公共领域的伦理学》 [英]约瑟夫·拉兹 著 葛四友 译

##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美]梅雷迪斯·D.高尔等 著 许庆豫等 译

《教育基础》 [美]阿伦·奥恩斯坦 著 杨树兵等 译

《教育伦理学》 [台]贾馥茗 著

《认知心理学》 [美]罗伯特·L.索尔索 著 何华等 译

《现代心理学史》 [美]杜安·P.舒尔茨 著 叶浩生等 译

《学校法学》 [美]米歇尔·W.拉莫特 著 许庆豫等 译